

学术研究

ACADEMIC
RESEARCH



1

社会科学类国际交流刊物 JOURNAL FOR WORLD EXCHANGE

1995

“邓小平理论与广东改革开放” 征文评奖揭晓

由广东省委宣传部牵头,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学术研究杂志和广东社会科学杂志共同主办的“邓小平理论与广东改革开放”大型征文活动,于去年10月结束。这次征文得到了广大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的热烈响应,共收到来稿280多篇,筛选后发表72篇。经由有关专家、学者组成的评审组评议,共评出一等奖1篇、二等奖6篇、三等奖10篇。

一等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广东的成功实践	周燎刚、张丙申、 刘少波、肖立见、曾开垠	《学术研究》1994.6
------------------	-------------------------	--------------

二等奖

市场经济与党的建设	林祖基	《南方日报》1994.5.9
把广东对外开放推向新阶段	宋子和	《羊城晚报》1994.10.27
学好邓小平开放理论,做好大开放这篇文章	许德立	《广东社会科学》1994.4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加快发展	肖贤成	《学术研究》1994.4
努力实践邓小平的市场经济理论	曾牧野、李新家	《南方日报》1994.10.24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唯物史观基础	包心鉴	《学术研究》1994.5

三等奖

迎接新世纪的勇敢探索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与深圳特区的实践 论“两手抓”	吕锐锋、杨建和	《广东社会科学》1994.5
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	刘景泉	《广东社会科学》1994.4
学会科学思维与决策	涂柏荣、杨健海	《南方日报》1994.8.8
广东的实践:敢于以开放的现代意识来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曾繁耀	《南方日报》1994.6.27
论邓小平的发展观	顾作义、曾少华	《羊城晚报》1994.9.29
邓小平市场经济思想与广东市场取向改革	张继红	《学术研究》1994.3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模式	梁钊	《羊城晚报》1994.9.15
广东:走出一条外向化国际化的经济发展之路——邓小平外向型经济思想及其对 广东的启示	杨永华	《南方日报》1994.7.11
当代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和基石 ——论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观	曾崇富	《羊城晚报》1994.6.29
	梁渭雄	《学术研究》1994.4

目

学术研究

(双月刊)

刊名题字

郭沫若

主编

梁渭雄

常务副主编

张硕城

副主编

刘斯翰

编务主任

黄荣显

· 邓小平理论研究 ·

把握社会发展新趋势，开创广东对外开放新格局

..... 广东对外开放政策建议课题组 (6)

· 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研究 ·

建立珠江三角洲经济区若干对策思考 李春洪 (11)

组建企业集团 发挥规模优势

——实施珠三角经济区战略决策的一个重要抉择

..... 张继红 (13)

关键在于建立利益协调机制 龚唯平 (15)

谈珠澳第三产业的合作与一体化 ... 高兆锦 胡波 (17)

· 经济 ·

屡治屡胀，病根何在

——我国通货膨胀的透视 李善民 罗必良 (20)

提高生活质量与广东发展战略 李新家 (23)

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种理论方案：可转让的

集体产权 何琼隽 (26)

企业兼并：问题与对策 张兆安 (29)

美日现代企业制度比较及其启示 林勇 (32)

对“科斯定理”的三点质疑 吕中楼 (37)

对我国股市供给扩容问题的思考 苏铭 (40)

· 哲学 ·

文化力：经济发展的内驱力 贾春峰 (42)

经济文化：一个崭新的研究课题 张江明 (46)

从发生学角度看人与自然的关系 张书琛 (49)

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理论研究概述 ... 李尚德 (54)

“和”的文化意蕴及其现代价值 ... 曾庆榴 陈创生 (59)

· 历史 ·

抗日战争时期的李汉魂 沙东迅 (64)

晚清佛学与近代社会思潮 麻天祥 (71)

希罗多德与司马迁 凌峰 (76)

儒学的历史嬗变与现代人格的建构 王敏 (82)

1995 年第 1 期

录

· 文化 · 教育 ·

市场经济条件下广东文化战略思考 张 焯 (87)

现阶段广东高等教育发展的经济分析 冯增俊 (91)

· 语言 · 文学 ·

“20 世纪中国新文学当代形态与新文学传统” 研究笔谈
..... (95)

世纪之交: 当代文学的走向(陈其光) 中国当代文学
的文化内涵(王晋民) 中国当代文学的两种文化倾向
(柯可) 中国新文学的当代性与承传性(黄树红)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时代性(黄修己) 文学的失魂(喻
季欣) 新时期文学创作潮流成因(邝邦洪) 当代文
学中美与善的进退(翁光宇) 现实主义仍然有很强的
生命力(赵士聪) 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特征(温宗
军) 当代文学研究中的“新”与“后”(钟晓毅)

当代文学批评中的“后现代”(吴爱萍) 当代文学: 批
评与创作的疏离(姚玳玫) 从读者的接受看社会政治
小说的意义(何慧) 新文学当代形态的形成(陶原
珂)

论笔记体与传奇体的品格差异 陈文新 (108)

海外的中国古音研究 李葆嘉 冯 蒸 (113)

· 学者访谈录 ·

“场有哲学” 与中西文化比较研究

——唐力权教授访谈录 本刊记者 陶原珂 (118)

从传统观照现代 从现代反思传统

——访李宗桂教授 哲 生 (121)

· 书评 ·

敞开历史的襟怀

——评《岭南文学史》 区 铁 (124)

文学思潮研究漫兴

——王国健《明清小说思潮论稿》读后 ... 童 轩 (126)

· 信息与动态 ·

“梁凤仪现象” 研讨会综述 周 文 (128)

十年育人 成绩斐然

——广东社科大喜庆建校十周年 陈家义 (130)

ACADEMIC RESEARCH

主办

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编辑

学术研究编辑部

广州市黄华路四号之二

电话: 3345916

邮码: 510050

出版

广东人民出版社

排印

佳达电子公司

发行

广东省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 46-64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国外代号: BM268 北京 399 信箱

刊号

ISSN1000-7326

CN44-1070

广告经营许可证

粤工商广字 01044 号

Siezing the New Trend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Establishing a New Pattern for Guangdong's Open to the Outside	by a Research Group on the Problems and Proposals of Guangdong's Open to the Outside (6)
Some Strategic Thinking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Economic Zone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Li Chunhong (11)
Forming Enterprise Groups to Take the Advantages of Economic Scale —A critical choice for implementing the strategic decision of the economic zone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Zhang Jihong (13)
Establishment of Profit Coordinating Mechanism as a Crux	Gong Weiping (15)
A Talk about the Cooperation and Unity of the Third Industry between Zhuhai and Macao	Gao Zhaojin and Hu Bo (17)
Survey of the Inflation in China	Li Shanmin and Luo Biliang (20)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Improvement of Living Quality and Guangdong's Developmental Strategy	Li Xinjia (23)
Transferable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 a Theoretical Scheme of the Modern Enterprise System in China	He Qiongjuan (26)
Enterprise Annexation: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Zhang Zhaoan (28)
A Comparison of the Modern Enterprise Systems between America and Japan and an Inlightenment from It	Lin Yong (32)
Three Points of Query to "Coase Theorem"	Lü Zhonglou (37)
A Ponderation over the Problems in Expanding the Supply of Stock Market in China	Su Ming (40)
Cultural Force as an Internal Driving For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ia Chunfeng (42)
Economic Culture: a Brand—new Problem for Research	Zhang Jiangming (46)
Looking 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through the Viewpoint of Generation	Zhang Shuchen (49)
An Outline of the Research on the Human Theory of Former Soviet Marxist Philosophy	Li Shangde (54)
The Cultural Intensions of "Harmony" and Its Modern Value	Zeng Qingliu and Chen Chuangsheng (59)

- Li Hanhun (1896—1987) in the Anti—Japanese War (1937—1945)**
..... Sha Dongxun (64)
- Buddhis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Ideological Trends in the Modern Society of China** Ma Tianxiang (71)
- A Comparison between Herodotos (about 484—425BC) and Sima Qian (about 145—87BC?)** Ling Feng (76)
- The Historical Change of Confucianis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Personality**
..... Wang Min (82)
- A Consideration over the Cultural Strategy of Guangdong under the Condition of Market Economy** Zhang Chuo (87)
-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Present Higher Education in Guangdong**
..... Feng Zengjun (91)
- A Conversation by Writing on “The New Chinese Literary Shapes and New Literary Tradition in the 20th Century”** (95)
- The Differences in Quality and Style between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Sketches and Tales of Marvels** Chen Wenxin (108)
- The Research on Ancient Chinese Phonology Abroad** Li Baojia (113)
- Philosophy of “Field and Being” and a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Western One—an interview of Prof. Tang Liquan from US**
..... Tao Yuanke (118)
- Reflecting Modernness through Tradition and Repondering Tradition through Modernness—an interview of Prof. Li Zonggui** Zhe Sheng (121)
- Breadth of a Historical Mind—a comment on a New Works “Literature of South of the Five Ridges”** Ou Hong (124)
- A Free Talk about the Research on the Trends of Literary Thought —after reading “Dissertation on the Ideological Trends of the Stories in the Ming and QingDynasties** Tong Xuan (126)

把握社会发展新趋势， 开创广东对外开放新格局

广东对外开放政策建议课题组

一、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趋势和对外开放的新任务

早在 80 年代，邓小平同志就指出：“要继续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前提下，执行一系列已定的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并总结经验，加以改进。”对外开放是长期的连续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总结、不断完善、不断发展的过程。当前，广东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建设大规模展开的重要历史时期，必须科学地把握广东面临的发展形势和发展任务，果断地把对外开放推向新阶段。

走向现代化，要经过若干发展阶段，如包括以发展经济为主的现代化原始积累阶段，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阶段，城市化现代化全面建设阶段，高技术、高消费、高质量发展阶段等等。1978 年以来，广东迅速进入以国民经济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原始积累阶段。十多年来，广东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成功地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全面起飞。从 1978 年至 1990 年，广东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由 240 美元增长到 850 美元。至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已基本完成现代化的原始积累，并开始了以交通道路建设和能源通讯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阶段。由于发达国家“现代化示范效应”的作用，在现代化原始积累后期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时期，实际上已同时展开大规模的城市化、现代化建设。大规模城市化、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新时期已到来。

随着经济社会成长新时期的到来，国内区域竞争的内容也发生重大变化。无论是广东省内各地区之间，还是国内各省市之间的发展竞争，已开始由量为主转向以质为主。今后，决定国内区域之间竞争优劣的关键主要不是经济发展的速度或产值的大小，而是经济社会文化综合发展的水平和质量。同样，评价我们现代化建设水平的关键指标首先不是经济产值和发展速度，而是经济社会综合发展的质量、水平。国内外现代化发展的经验教训表明，只有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经济规模的扩张，没有经济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不是完整意义的现代化，也不可能让人民最大限度地享受现代化发展的文明成果。广东必须在经济取得较大发展的基础上，抓准时机把全省工作由经济建设为主转向经济、社会、文化和人综合协调发展的新的历史轨道上，把广东发展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并以经济、社会、文化和人的全方位、高水平的发展重建广东迈向 21 世纪的新优势，使广东继续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先导地区。

当前，国际形势发展有几个十分有利于广东经济社会发展转轨的趋势：

（一）国际关系继续走向缓和和合作，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的光辉论断愈益为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所验证。虽然局部冲突与对抗连绵不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较量仍未停息，但全球性大冲突的危险已大大下降。

(二) 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心继续由大西洋地区转向环太平洋地区,东亚和南亚地区成为这一地区经济增长的主力,特别是中国,拥有国际上最大的经济增长潜力和经济发展活力。

(三) 以发达国家为先导,特别是以美国建设“信息高速公路”为起动,国际经济社会正在加速进入以光纤通讯技术和多媒体信息网络技术为特征的信息社会。这使我们在刚刚开始进入大规模城市化、现代化建设时,又面临着全球经济社会信息化浪潮的新挑战。同时,又为我们提供了承接发达国家现代化发展最新成果,采取跳跃式发展战略,在更高的发展基点上加速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前提。

(四) 从 70 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已逐步由传统经济增长模式转向“以人中心”的环境、经济、社会、文化与人全面发展的新发展模式上来。进入 90 年代,这一发展新趋势正在推向全球。1995 年的世界首脑会议的主题就是社会综合发展问题,1995 年将成为全球社会发展年。这又为广东的发展转轨升级提供了新的外部动力和“先导效应”。

在新的国际发展背景下,广东对外开放面临的新任务是,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形成经济、社会、文化与人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通过全方位开放,更大规模地承接世界现代化文明发展的最新成果,在更高的起点上,全面加速广东经济、社会、文化和人的现代化,迅速形成广东对内辐射的新领域和新优势,确立广东在全国全面现代化建设中的先导地位。同时,借助这种新优势,建立更先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广东经济迈上新的发展台阶创造新的社会前提。

二、开创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

在 80 年代,广东的对外开放具有与现代化原始积累阶段相适应的一系列特点: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相适应,对外开放主要在经济技术领域;与经济成长的初始阶段相适应,对外开放主要以引进资金技术为景,引进技术以消化、运用为主;与参与国际竞争的相对劣势条件相适应,对外开放主要以优惠让利、低廉地价和劳动力为手段;与广东国际经济技术社会关系发育相对薄弱相联系,对外开放主要借助港澳“二传手”实现。

显然,原有的开放格局已经与广东经济

社会发展的新阶段、新任务不相适应了。首先,以经济技术为主的对外开放格局与广东开始进入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与人全面、协调发展、全面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新任务不相适应;其次,以港澳“二传手”为主要通道的开放格局与广东自主走向世界,在更广泛的世界交往中促进经济社会高起点稳定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第三,广东对外开放、发展的后方、腹地相对的薄弱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不相适应;第四,以让利及低廉劳动力、低廉地价等为主要手段的对外开放格局与广东劳动力工资、土地及其他发展资源使用成本急剧上升,全国各地政策趋于均衡的新形势不相适应;第五,以引进港澳台资金技术投机型投资为主的引进格局与广东转向对全世界开放,并由突出发展规模转向突出发展水平与质量的战略型发展新要求不相适应。对外开放的旧格局与广东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新阶段、新任务不相适应的矛盾表明:广东对外开放的旧格局已经结束,必须迅速开拓广东全方位对外开放新局面,继续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迈向新的阶段,再造广东迈向 21 世纪的新优势。

要开拓广东对外开放新格局,必须根据国际国内新形势和现阶段对外开放所面临的新任务,实现对外开放的六大转换:一是由侧重经济开放转向经济、社会、文化与人的全面开放,形成多维开放新格局;二是由以引进资金技术、出口产品为主的单向开放转向以全面介入国际分工为基础的发展要素双向对流,形成双向开放新格局;三是由廉价生产要素和让利优惠引导的对外开放转向以国际分工和地缘经济、地缘社会结构为基础的结构开放性开放,形成均衡优势结构开放新格局;四是由侧重开放规模转向重视开放的水平与质量,形成高质效开放新格局;五是由主要借助港澳“二传手”的对外开放转向以港澳及东南亚为基础,辐射大西洋,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六是由侧重经济流开放转向以人流开放为主导的主体开放,建立充满主体活力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一) 由经济技术一维开放转向经济、社会、文化与人多维开放,通过多维开放全面促进广东现代化建设,确立广东在全国经济社会现代化综合发展中的领先优势。

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

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是正确的,要长期坚持,对外文化交流也要长期发展”。当前,在经济技术发展方面对外开放已没有多大的疑义,但在文化、观念、信息传媒、社会与人的对外开放方面,却还没有真正放得开。广东要在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方面先走一步,高起点、高水平、超前推进现代化建设,必须在对外开放方面进一步解放思想,由经济技术的单一开放推向经济、技术、文化、信息传媒、社会与人的多维全面开放;必须把我们的现代化建设融入世界文明发展的共同大道上,以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为本,以世界文明发展一切优秀成果为用,在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大融合中再造现代中华文化的新优势。无疑,广东肩负对外全面开放“先遣军”的重任。

要形成多维全面开放新局面,必须突出抓好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以信息开放为突破口,促进多维对外开放。过去我们在信息开放方面基本上处于被动的地位,一方面对海外信息未能及时吸收、消化和利用,另一方面,却没能有效地组织起我们自己的信息向国际社会辐射。我们必须尽早突破这种被动格局,主动扩大开放。

二是进一步扩大文化、学术、技术、社会与人的对外开放与交流,更广泛地介入国际社会生活中。一方面积极学习和吸收世界上文明发展的成果,促进我们的文化、社会与人的综合协调发展;另一方面,总结与提高中华文化、岭南文化,创造一批跨世纪的文化发展成果,并积极向世界辐射。

三是逐步推动和扩大国际间民间接触和交流,形成国内外社会广泛融合的民间网络。

四是建设一批现代化开放式国际经济、文化、技术、社会交流的基地或中心,为促进国内外多维交流开放提供物质条件。

五是积极推动和加入国际性经济、文化、技术、社会发展的民间会社,积极参加国际组织的各类国际性文化、体育、科技、社会、经济等交流活动,并积极争取在广东主办各类文化、体育、科技、社会、经济等国际交流活动。

由此,逐步形成广东多维全面开放新格局,

推动广东经济、社会、文化、科技、体育等领域的全面开放和繁荣。

(二) 进一步深化对外经济开放,建立国际化产业体系。

要把经济对外开放由原来的优惠政策和廉价资源导向转向国际产业结构性合作的轨道上,实现经济开放的新飞跃。

——积极主动开放市场。开放市场是经济合作发展到一定高度的必然要求。广东要率先把利用外资优惠政策的重点从让税利过渡到出让部分企业股权(产权)和市场。要开放更多的投资领域,除国家规定的特殊行业外,在资源开发、金融、保险、证券、港口、码头、机场、公路、铁路、商业、旅游、科技、文化教育以及城市管理等方

面,大胆吸纳外资。与此同时,要把开放点从沿海地区延伸到内地山区,把开放面从经济领域铺向经济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

——加快建立外向主导型产业结构。要以国际产业经构和贸易结构转型为契机,大力发展“三高”农业,提高“创汇型”农业在整个农业生产中的比重;以促进工业产品结构的高度化为目标,通过积极寻求与国际大财团、跨国公司的技术资金合作和专利技术入股等方式,发展一批资金、技术密集型的新兴外向型工业产业群体;要在更高层次上吸引外来投资,加速改造传统产业,促进产品升级换代,以提高其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并形成规模生产和规模经营,增强市场竞争力;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建立信息—贸易—金融—运输一体化服务体系,逐步形成国际化的大贸易、大市场、大循环、开放型的经济新格局。

——积极推进跨国经营。跨国经营将是广东经济发展的一个新增长点,它必将扩大资源的来源,相对补充境内资金的不足,冲破多种贸易壁垒,带动商品、技术、劳务的输出,并更快地使广东摆脱目前过分依赖港澳的局面,实现市场多元化,真正以国际市场为舞台,参与国际分工、国际合作和国际竞争,不断提高广东经济社会的国际化程度。

在组织形式上,由于国有企业占据经济的主导地位,且以大中型企业居多,因此,必须以国有企业为龙头进行必要的改组和重组,组成企业集团参与跨国经营,以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这种企业集团组织形式

应较为紧密,便于对外实行统一的战略,对内实行有效的分工合作和管理;其次,要充分发挥中小型企业尤其是乡镇企业的作用。可以参照“四小龙”的经验以中小型企业 and 乡镇企业为肌干,组成“企业联盟”的形式,共同制定计划和确定产品项目,联合从事海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其三,在海外投资活动中,也可以尝试合资、合作、合营的方式,甚至有意让海外上市公司收购省内企业,借壳上市,融入跨国集团的网络,这既可以减少投资风险,又能从中获得技术、资金、市场和管理经验。

在行业重点的选择上,必须根据广东的条件和需要,结合投资所在国的情况来确定。现阶段可选择资源开发、材料工业、高新技术行业、国际旅游业、金融业等,生产型与贸易型并重,实行多元化经营:以贸易型开路,生产型、高新科技行业为骨干,发展金融业和国际旅游酒店业,形成多元化的体系。

在区域战略上,要把发展中国家放在重要位置。根据广东目前的技术水平和产品档次,发展中国家有着广阔的市场。

——把以引进为主的单向开放转向引进来、打出去的双向开放。要在继续扩大引进规模和质量的基础上,依据经济地缘关系和国际分工格局,选择重点地区向国外进行产业辐射。

(三) 加强内联,扩大广东对外开放的腹地。

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从广东现实看,内地腹地的拓展是广东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前提。腹地越广,辐射能力越强,对外开放实力就越大。改革开放后,广东虽然也抓了内联,但是还没有真正从建立对外开放腹地的角度上发展和扩大与周边省区及内地其他省市的经济、社会、文化、科技合作关系,国民经济与内地省区的关联度偏低,腹地不广,关系不稳定。

从地缘经济和地缘社会的意义上看,广阔的内地都是广东对外开放的腹地。但是,从战略上看,广东需要依据经济的走向和社会的关联度建立意义不同的开放腹地层圈:第一层圈为广西、湖南、江西、海南等,需要逐步建立关系比较紧密的华南经济、文化、社会协作区;第二层圈为包括四川、贵

州、云南等省区,需要逐步拓展区域合作关系,使广东成为大西南地区走向世界的重要通道;第三层圈是内地其他地区。广东对内地腹地也要实行双向开放,既要引进来,也要与内地腹地联手进行内地产业开发。必须看到,随着广东产业的高度化,在分工规律的作用下,开放腹地将成为广东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的动力源。而沿海地区的全面开放,又使广东在建立开放腹地方面面临严峻的挑战。广东必须把握时机,主动工作,加速对外开放腹地开发。

(四) 推行地缘战略,加入国际合作“俱乐部”,建立广泛的对外开放国际关系网络。

可以说,直至现在,广东的对外开放基本上还是自发的被动式的开放,还没有形成一个自主的对外开放区域战略。现在是到了研究和确定广东对外开放区域战略的时候了,舍此不能真正把广东对外开放推向新的成熟的阶段。

广东的对外开放区域战略包括三个目标:一是建立推动产业高度化的国际资金、技术源地;二是建立产业国际开发的相对优势市场,为产业国际化提供必要的稳定的国际市场前提;三是为广东产业国际化创造宽松和谐的国际社会文化环境。

(五) 建立促进广东在开放条件下再造区域竞争优势的开放发展机制。

对外开放的最终目的是建立竞争优势,加速发展自己。因此,建立完善的开放发展机制是十分重要的。

开放发展机制主要包括三个环节:

开放吸纳机制。高效且具吸引力的开放吸纳机制(包括开放的“软”、“硬”环境等),是最大限度地吸收世界一切文明发展的先进成果,获得巨大的现代化发展资源的首要条件。

消化再造机制。我们必须形成强大的科研系统,把世界先进文化和科技成果与我们的历史、文化、经验结合起来,在东方文化基础上再造东方现代文化,重建我们走向21世纪的世界的文化优势。

辐射机制。我们必须通过建立广泛的经济技术合作和社会文化交流,建立开放发展腹地,建立起广东对外对内辐射的机制。同时,通过辐射拓展我们的开放领域,由此,形成广东开放吸收、优势再造、辐射发展的

良性循环的开放机制。

(六) 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 彻底破除计划经济的旧体制, 建立和完善全新的政策运作体系。

广东在过去 16 年中取得的成绩, 主要是借助政策优势、地理人缘优势, 在破除计划经济旧体制的过程中实现的。在现阶段, 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要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 要促使经济、社会、文化协调发展的总水平更上一个台阶, 必须在体制改革中达到一种质的转换, 创造全新的政策运作体系。

这种全新的政策运作体系应具有以下特点: 政策机构更有弹性, 减少管理层次, 简化工作程序, 加强综合调控职权, 提高工作效率; 管理价值、管理作风等“软”管理方面更加得到重视, 公仆意识、服务观念和政务公开化等得到加强; 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工作日益增多, 且要求越来越高, 要花更多的精力、经费来解决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公共福利、人口控制、教育和就业等问题; 对经济和社会的干预日趋法制化, 各种法律法规体系不断健全和趋于完善。

与这种全新的政策运作体系相适应, 政府及其各部门要大力转变职能, 当前要增强如下职能: 加强研究和制订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战略和中长期规划; 加强开展经济发展预测, 研究制定产业政策, 为企业和社会提供信息服务; 加强生产和流通领域重大问题的综合协调和管理, 搞好总量控制与平衡; 加强国有资产管理, 确保其不断增值; 加强人口增长控制, 提高全民素质, 完善社会保险系统; 加强研究制定发展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的方针政策, 促进各项公共事业协调发展; 着力进行城乡建设规划、土地开发利用、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 加强民主法制建设, 维护社会治安。

在具体的体制改革方面, 广东必须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大刀阔斧地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外经贸体制及市场体系等方面的改革。以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的标准, 尽可能地采用国际上通行的成功运作方式, 加速新体制的完善过程, 建立起适应对外开放的机制。当前尤其要注意在继续完善投资“软”环境方面下大力气: 保持区域政治和经济局面的相对稳定, 保持重要经济政策的连续性, 增加政策运作的透

明度, 降低经济扩张——紧缩之间的波动度; 放宽对外商投资的产业控制, 考虑把这种控制方式由“肯定法”转为“否定法”, 即只规定少数不开放领域, 其余的全方位向外资开放; 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推进教育和培训制度的改革完善, 大面积大幅度提高劳动者的综合素质; 加快要素市场的国际化进程, 率先按照国际惯例给外资企业以国民待遇; 在不违背国家法律的条件下一有关外商投资经营的法规并加以系统化, 同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法律管理, 保障外资的合法权益。

把广东对外开放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必须转向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与人综合协调发展的轨道上来, 并以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与人的高素质发展来重建广东走向 21 世纪的新优势, 使广东继续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先导地区。在这个历史转换中, 人的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和提高是关键。她不仅是我们发展的根本目的, 也是实现高水平发展的前提。因此, 在我们推动对外开放迈向新阶段时, 必须抓住人这个中心环节。人的高水平的全面发展, 是一个复杂的、综合的系统工程。它要求我们在系统地进行经济的、科技的、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社会文化的现代化建设中逐步实现。现代化的生产力表现着人征服自然的能力的现代化, 现代化的科学技术表现着人的认识、思维和实践手段的现代化, 现代化的经济关系表现着人的需要及满足方式的现代化, 现代化的政治制度表现着人高度的民主意识、参与意识和现代化的政治态度, 现代化的道德观念表现着人的精神文明境界的现代化, 现代化的社会风尚表现着人的人格现代化。据此, 我们认为, 全省各级党和政府在“人的全面高水平的发展既是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最终目的也是根本手段”这一点上形成共识并且不断加以强化、贯彻落实, 是把广东对外开放推向新阶段的最根本的战略对策。

(课题组组长: 田丰
副组长: 梁桂全 杨明
成员: 李惠武 刘志光
关智生 温宪元 郭克莎)
责任编辑: 石成

建立珠江三角洲经济区若干对策思考

□ 李春洪

省委、省政府作出建立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战略决策，对于推动我省 20 年实现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建立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必须有正确的对策，本文就此谈些个人看法。

一、关于总体产业对策。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总体产业发展，我认为应采取跳跃式对策，即跨越重化工业发展阶段，直接迈向后工业化发展阶段。从三大产业发展的趋势看：农业应该实现生产的专业化、规模化、商品化、外向化和城郊化，形成优质、高产、高效的现代化农业经济体系；工业应该坚持轻型化优势，但要加快由劳动密集型向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过渡，形成以高新技术为依托的支柱产业群，使之成为世界最有活力的加工制造业中心之一；第三产业应该加快发展速度，尤其要加快金融业、科技业和信息产业的发展，形成内外辐射力强劲的金融、贸易、科技和信息中心。总的来说是要强调三大产业的协调发展，最终形成三大产业紧密关联、协调，与国际国内经济体系交融，宏观经济效益高，具有自我升级换代能力的产业体系。

二、关于市场对策。必须把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建设放在国际国内市场体系中来考虑，采取正确的市场对策。珠江三角洲地区目前已形成了外向型经济格局，这既是珠

江三角洲地区前十几年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也是今后继续高速发展的重要条件。因此，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市场对策，必须继续坚持依靠国际市场，参与国际分工，进入国际市场大循环为主的战略。但是，决不能忽视国内市场，特别是在现阶段。由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产业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和技术水平在国内市场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而在国际市场上并没有明显优势，如果忽视国内市场，将会给资金积累带来困难。因此，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市场对策，应以国内市场为依托，以国际市场为导向，充分发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枢纽作用。

三、关于协作对策。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必须是一个全方位开放的经济区，只有充分实现经济区内外生产要素的置换和优化组合，才能永葆经济活力。因此，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必须十分重视对内对外的协作。首先是加强内部协作，经济区内各市（包括县级市）必须打破行政区域的局限，在支柱产业布局上合理分工，各具特色，形成整体优势，联合成“团体冠军”。其次是加强珠江流域协作，既要加强广东境内珠江流域的协作，也要加强广东境外珠江流域的协作，做到优势互补、互相促进，这既是珠江三角洲经济区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其带动珠江流域其他地区发展的需要。其三是加强同港

澳台的协作。珠江三角洲地区目前已同港澳台建立了密切的经济合作关系,但由于受政治因素的影响,目前的合作水平还比较低,远未达到应有的水平。随着香港、澳门主权的回归和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的改善,珠江三角洲经济区与港澳台地区的合作将跃向一个新的高度,四地区的经济协作应该由现在的以贸易合作为主转向以金融、贸易、产业、信息等具有明显优势的结构性协作为主。通过协作,四地完全有可能在环太平洋经济圈形成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增长点。

四、关于城乡一体化对策。城市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随着农村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珠江三角洲地区正出现城乡一体化的趋势。1992年珠江三角洲地区有城镇406个,城市人口760多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30%多,如果加上大批“离土不离乡”的离农人口和外来劳工,实际上城市化人口已占总人口的50%以上。可以说,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建立将使这一地区城市化的趋势更加明显。为此,经济区必须按照城市化的客观规律作出新的发展规划。这里有三个问题必须高度重视。一是基础设施网络建设,要按照城乡一体化的要求,形成现代化的高速公路网络、信息高速公路网络、机场港口网络;二是要改革城市户口管理制度,变城乡二元化为城乡一体化的户口管理,使城乡人口能比较自由地转移和流动;三是农村土地使用管理制度,现行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农户分散使用的管理制度,极不利于农业生产的专业化、规模化和商品化经营,不仅制约着农业的现代化,而且制约着城乡一体化发展。必须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在保持农村土地所有制不变的前提下,改革土地的使用制度,如通过土地使用权入股、招标承包等方式,将分散的土地使用权集中起来,形成农业生产的规模经营;通过国家大面积征用,统一规划,形成新的工业区或现代化农场等。从而使农村土地使用制度适应城乡一体化的要求。

五、关于组织政策。建立珠江三角洲经

济区必须有强有力的组织对策,这是实现上述各项对策的关键。组织对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 企业组织对策。当前珠江三角洲地区企业组织对策的首要任务是,针对企业该大不大该小不小的问题,进行重组,实现规模经营。重组的方向,一是以规模效益为原则组建一批企业集团,发挥其产业骨干作用;二是以专业化协作为原则,进一步提高小型企业的专业化水平。重组的方式应以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为主,因为这两种方式可以在保留原投资者资本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使分散的资产在法人财产权环节集中,比较容易协调各企业所有者的利益关系。同时股份的市场流动性也为今后企业资产的再次重组提供了方便途径。

(二) 政府组织对策。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建设必须在发挥市场机制基础作用的同时,切实加强政府组织作用,以弥补市场机制调节之不足。利用经济的、法律的以及行政的手段,消除企业外部的不经济,引导经济区的建设朝着预定的目标前进。政府组织对策主要包括:一是建立一个跨市县的行政协调组织,对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内以及区外的经济发展进行规划、组织、协调和指导,防止和纠正本区内的过度竞争和恶性竞争,使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形成一个“团体冠军”,进一步提高市场综合竞争力;二是建立一个灵敏的信息反馈系统,及时采集和反馈区内各方面的经济信息,对经济区的发展进行监测;三是建立一个有效的调控系统,根据信息反馈系统提供的信息,运用经济的、法律的和行政的手段,对经济区的建设进行引导。

珠江三角洲地区是我省经济发展的“龙头”。我们相信,只要采取正确的对策,珠江三角洲经济区一定能抓住机遇,发挥优势,率先实现现代化,并对全省的现代化建设作出历史性贡献!

作者单位: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责任编辑:郑英隆

组建企业集团 发挥规模优势

——实施珠三角经济区战略决策的一个重要抉择

□张继红

珠江三角洲如何突破一市一县行政区域传统发展模式的局限性,由“单打冠军”联合成“团体冠军”?这是实施珠三角经济区战略决策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笔者认为,从当地自然地理特点和经济内在联系出发,组建一批跨行业、跨地区、跨国界的大型企业集团,从而形成在国内国际市场上搏浪潮头的规模经济,不失为实施这一战略决策中的一个重要抉择。

在社会化大生产和发展现代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企业组织走大型化、一体化和集团化的道路,企业经营实施综合化、多功能和规模型发展战略,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纵观当今世界发达国家,象美国的“通用”、日本的“索尼”、西德的“西门子”等企业,无一不是集团化、综合化的跨国经营。珠江三角洲要率先成为现代化经济区,其企业组织和经营有必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果断地走规模型、集团化的路子。

首先,这有利于珠江三角洲经济核心即城市经济凝聚力的进一步增强以及区域经济整体优势的充分发挥。生产经营的集中化是企业集团的重要特点之一。不论企业集团是采取产品集团模式、行业集团模式,还是混合集团模式,其建立都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生产要素在地域上的集聚,增强城市经济特别是广州、深圳、珠海等地经济的凝聚力和辐射力,推动珠三角区域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壮大。组建企业集团,发展规模经济,对企业本身来说,可以使之具有前所未有的较

高的规模经济效益;对区内其他中小企业来说,可以发挥其主导作用,带动一大批中小型企业,通过组织产品专业化、零部件专业化和工艺专业化,组织产品链和产业链,提高产品竞争能力,扩大市场占有率;对珠江三角洲地区来说,则可以形成以城市经济为依托,城乡经济密切结合并逐步迈向城乡一体化,尤其是科工贸、技工贸、贸工农、农工商一体化的新经济格局,促进区域经济功能的完善和区域整体优势的发挥,从而发挥龙头作用,促进省内其他地区的发展,确保全省实现现代化。

其次,有利于珠江三角洲统一产业布局,形成合理分工,促进区域经济内部结构的优化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众所周知,由于长期以来习惯于以一市一县行政区域来谋篇布局、发展经济,珠三角地区也难免存在各自为政、分散作战、产业结构缺乏协调;甚至出现恶性竞争、以邻为壑的情况。象1986年的“电风扇大战”和1994年的“空调器大战”,就是突出的例子。同时,就这一地区大多数企业而言,生产过于分散,企业平均规模偏小,社会化程度不够高。为扭转这种局面,必须实行大联合大协作,统一规划,发展集团经济。这样既可以提高生产集中度,取得规模效益;又可以避免重复建设、互相残杀,抑制过度的无序的竞争;还可以有效改变目前企业总体格局粗放化的状况,促进经济区产业、产品结构的优化。因为通过组建企业集团,发展规模经济,一

方面由于经营的多角化,可以增强企业在市场上的生存能力,使产品适应多层次、多样化的市场需求,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内部产品结构的优化;另一方面由于生产要素的重新分化和优化组合,可以避免区域经济内部“小而全”、“大而全”这种不利于规模经济发展的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推动整个珠三角地区合理布局产业项目,优化资源配置,充实壮大现有优势产业,扶持支柱产业和企业上规模、上档次,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

再次,有利于珠江三角洲地区企业在国内尤其是国际市场上形成集团竞争优势,增强国际市场的抗风险能力。市场经济下的竞争,说到底是一种文化力的较量。文化力是一个企业人才、技术、管理、产品、规模、商标、形象等多种因素合力的体现。谁拥有这种强大的合力,谁就能在竞争中取得优势,保持十年、几十年、上百年的长盛不衰。放眼国际经济舞台,只有大企业、企业集团和跨国公司才能做到这一点。中国即将“复关”,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即将融为一体,珠三角经济区要同国际经济接轨,其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而当前世界经济所表现的国际化 and 区域集团化趋势,使国际经济已具有区域性垄断和跨国公司集团垄断的性质。当代国际市场的竞争实质上是垄断条件下的集团竞争。因此,我们面临的对手将是大型、特大型企业、企业集团和跨国公司。根据这种情况,珠三角经济区要走向现代化,必须培植一批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集团。“船大方能抗风浪”。如果仍然是分散的小型化结构、低量的企业规模、“游击式”的经营方式,控制能力必然差,市场竞争力软弱,这就很难与世界大型跨国公司相抗衡,无法立足于国际市场。特别是珠三角地区乡镇企业多,要增强企业竞争能力,适应市场变化,加速与国际市场接轨,更应改变各自为战、势单力薄、难以形成合力的局面,通过组建企业集团,营造“联合舰队”出海,实现优势互补,规模推进,形成群体优势和综合功能,主动地迎接国内外市场的挑战,抵御市场经济的

风浪。

组建企业集团,发展规模经济,这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应该说已经具备一定的基础。从大三角的范围来看,这一地区人文地理环境相同,市、县之间经济发展速度和效益差别不大,产业类型、产品结构比较接近,有一部分企业已初具规模,有些还初具跨国公司的雏形。比如深圳赛格集团,就是一个由158家企业联合而成的外向型企业集团,在美国开办了太平洋赛格有限公司,在肯尼亚开办了肯尼亚赛格电子有限公司,还在日本、德国、澳门等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技工贸结合的分支机构;近几年,该集团出口产值已经超过总产值的50%以上。又如惠州市的TCL电子集团公司也拥有33家成员公司,一万多员工,集科研、产品开发和销售服务于一体,还在香港设立了分公司。这些都为发展集团经济树立了样板。同时也说明,珠三角经济区完全有条件、有能力拥有自己的“通用”、“索尼”。珠三角要增创新优势,再造新辉煌,当务之急是要施展雄才大略,立即着手制订国际化、实业化、综合化、集团化的企业发展战略,努力把这一地区的企业向企业集团推进,从而跃上规模竞争、多元经营的战略新阶段。

珠三角经济区组建企业集团,在具体模式的选择上,应根据当地实际,遵循社会化大生产分工协作的客观规律,趋利避弊,扬长避短。目前似不宜大规模发展工业型集团,而应有计划地大力发展科工贸、技工贸、贸工农、农工商一体化、联合化的企业集团。在组建形式和发展步骤方面,可以考虑采取分步推进的办法:第一,先以一个或多个大企业为龙头,以一种或多种产品为依托,组成紧密层、半紧密层、松散层等多层次、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相互配套的经济联合体;第二,瞄准国际市场,发展外向型企业集团。比如,发展工贸一体化外向型企业集团,以一个或几个大型骨干企业为核心,联合一批在经济技术上有密切联系的企业,生产一种或几种产品,并通过自己的销售系统打入国际市场。又如发展外贸联营型企业集团,以一个或几个外贸企业为龙头而

联合，为众多的中小企业提供出口服务。还可发展交通运输型、金融投资型、劳务输出和对外服务型等外向型企业集团，等等；第三，在取得丰富经验和打下良好经济基础的条件下，可借鉴日本和韩国的方式，把实力雄厚，具有生产、科研、贸易、融资、服务等综合功能的大企业改造为综合商社，以贸易为主体，发展集贸易、金融、信息、产业、综合服务于一体的贸易型跨国公司。

组建企业集团，发展规模经济，由于存在着复杂的内部、外部关系和强烈的多方位扩张倾向，在联合纽带问题上，比较好的选择是资产纽带，即集团母公司通过“参与制”，以资金参股、控股方式将集团母公司与一批子公司紧密联结起来或通过参加集团的成员企业以本身的资产作为对集团母公司的参股，成为其子公司。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使集团内部关系牢固，便于统一规划发展；可以突破行政区域和所有制、隶属关系方面的限制；可以开辟直接融资渠道，使企业集团能够得以通过股票的发行和转让，及时筹措到改造技术设备、扩大生产经营所必需的巨额资金；还可以与国际惯例相衔接，为吸引外资、中外合资以及国内企业参与跨国经营创造有利条件。

珠三角经济区发展集团经济，是这一地区走向现代化、国际化的重要途径，前景良好，任务艰巨。要做好这一工作，有关方面的领导一定要增强经济区意识、协调发展意识和现代化意识，尤其要突破狭隘的区域观，树立大协作大联合的观念，立足珠三角，面向全国，面向国际，面向 21 世纪，实行以市场为导向的大跨度的组合；组建起来的集团内部成员企业既要统筹规划、协调经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又要防止吃“大锅饭”、搞平调、刮“共产风”，使集团整体始终充满旺盛的活力。要达到以上目标，除了做好经济区规划工作外，当前需要加大改革力度，从企业产权变革入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组建大型企业集团铺平道路。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经济学系
责任编辑：石 成

关键在于建立

利益协调机制

□ 龚唯平

广东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建设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战略构想，描绘了一幅令人鼓舞的宏伟蓝图：把珠江三角洲建成经济快速发展、科学技术先进、产业结构优化、社会分工合理、基础设施配套、服务设施完善、生态环境优美、城乡融为一体、具有高度文明的经济区、大都会、城市群，在全省率先实现现代化，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成为全国外向型经济的重要基地，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示范区。然而，描绘在纸上的蓝图毕竟还只是确立了一个奋斗目标，要把蓝图变成现实，不仅需要长期的艰苦奋斗，而且需要从一起步就有一个清晰而正确的发展思路。

众所周知，目前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各市县行政分割所产生的“大而全、小而全”的诸侯经济，造成低水准的重复建设、产业结构雷同、基础设施不配套、以及恶性竞争和生态环境恶化。提出建设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构想，正是针对

这一问题,以求从根本上解决珠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发挥区域规模经济的整体优势,合理配置资源和促进产业升级转型,并带动全省经济发展。因此,实施“珠三角战略”的要点与难点就在于如何使珠江三角洲地区九市真正协作、协调。

新的战略构想公布后,理论界和有关部门提出了不少实施构想的思路 and 对策。概括起来大致有四种:一是以省政府为主,实行统一领导和统一规划,采用计划手段实现合理布局 and 分工。二是设立洲一级的政府,逐步削弱各市权力及精简机构,由洲政府对珠江三角洲进行统一规划、建设和管理。三是主要依靠规划进行协调,对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分布、生态环境保护和城乡建设等方面做到统一规划。四是增强大协作观念,通过宣传教育统一思想认识,思想认识统一了,步调也就一致了。

上述四种思路 and 对策无疑都有合理之处,但又有不合理的一面。首先,省里的领导和规划是必要的,但以计划为主要手段则欠妥。过去长时期里不也是有计划调节吗?为什么并没有解决问题呢?恰恰相反,行政分割下的诸侯经济正是计划经济后遗症之一。并且,在实行市场经济新体制的今天,再返回计划经济的老思路,既不合理也行不通。其次,设立珠江三角洲一级的政府看起来可以强化行政管理和组织落实,但问题是如何对现有各市削权和改变现存的行政构架,如何处理省、洲、市三级之间的各种关系?珠江三角洲中还有深圳和珠海这样的经济特区,涉及中央政府的监管,又如何处理呢?如果不能削权,设洲级政府就只会是叠床架屋徒增行政层次而难收实效。再次,制定科学的规划无疑是重要的,而且必须规划先行。但是,规划不能关起门来做,须依赖各市的参与协商,而各市在参与规划时不可能不会意见分歧;并且,再好的规划也只有实行后才真正有实效,又如何保证各市严格按规划执行呢?最后,通过宣传教育增强大协作观念和经济区意识当然也是必要的,建设大经济区要求在观念上有一个转变,但事情并非“只要认识统一就会步调一致”那么简单,历史反复证明,这样的假设推理是极不可靠的。

更根本的因素是利益,即地方的物质利益或经济利益。一般而言,各市的负责人都是赞同建设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但涉及到具体问题时又不能不以本地利益出发来考

虑问题。不论是区内中心城市的选定,还是重点产业选点或基础设施的分布及配套,都涉及全局与局部、眼前与长远、本市与他市、既得与未得等方面利益上的差异与协调。尽管省里明确宣布“不搞平调、不刮共产风”,也不可避免在经济区建设过程中将牺牲某些局部利益,扩大各地在经济收益上的差距。例如,各市在建的机场、港口,有的可能停建,而有的则保留或扩建。保住本地的既得利益,并为本地争取更多利益,是各市地方官的普遍心态。

忽视地方利益是不行的。改革开放十多年来,随着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瓦解,地方利益不断壮大和加强,已经形成既定事实。地方经济建设。从资金筹集到企业培育,大多依赖地方自主努力。自己生的娃再丑也是自己身上掉下的肉,焉有不维护之理。为此,只有在承认和正视地方利益的前提下,方可言经济协作和协调发展。

因此,建设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关键在于建立利益协调机制。这是符合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以市场机制为主配置资源、以经济手段为主管理经济的改革总思路的。建设珠江三角洲经济区是一项浩大的社会系统工程,研究建立地区之间的利益协调机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对于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也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如何建立利益协调机制?结论和方案只能产生在深入的调查和严格的实证研究之后。在这里,仅简谈几点不成熟的看法:第一,按商业原则协调各地利益、实行投资与收益对称原则,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和分配利益。第二,在充分发挥各地优势的基础上形成整体优势,贯彻比较利益原则,促进协同发展。第三,对不同层面的协调采取不同的协作方式,强调契约原则。如公共工程合股投资经营,产业配套按产业联系分别承包或共组企业集团,以及招标承租等。第四,充分发挥各类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坚持以经济手段为主的原则,特别要注重运用财政税收来调节与平衡地区之间的利益差别。第五,贯彻统筹兼顾的原则,处理好全局与局部、当前与长远等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总之,只有建立起了一套完善的利益协调机制,才能使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建设宏伟蓝图早日变成现实。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
责任编辑:郑英隆

谈珠澳第三产业的 合作与一体化

○高兆锦 胡波

澳门与广东珠江三角洲自古以来就有着密切的联系。从理论上说,澳门是珠江三角洲通往世界的桥梁之一,而珠江三角洲则是澳门向外扩展的理想腹地。但是从实际上看,澳门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技术合作和文化科技交流,似乎并不令人满意,两地的各自优势也没有真正发挥出来。这种理论与实际的分离,既有客观条件的限制,又有主观因素的制约。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要是两地经济结构差异和科技文化教育方面反差较大,合作和交流的外在条件尚不太成熟。主观方面的原因,主要是思想观念、认识和体制等方面的因素,主观上努力不够,合作与交流自然难以有大的突破。本文拟就第三产业问题谈谈我们的粗浅认识。

一、现象与思考

发达的第三产业是现代化经济发展的要求和标志。第三产业所占比重的不断扩大是三次产业结构变化的一般趋势。产业结构的这种变化趋势,在珠江三角洲和澳门、香港等地同样存在。1987年顺德第一、二、三产业的产值比为13:52:35。其中第三产业增幅最大。仅金融业中银行业务的储蓄业额工作量,1987年就比1980年增加了近13倍,平均每年递增高达45%以上,超过了列入社会总产值统计中的任何一个产业部门的增长速度。①中山市1983年第一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7.8%,1991年则降为27.7%;第二产业1983年为41%,1991年则升

为48.2%;第三产业1983年为21.2%,到1991年则升为24.1%,而且这种上升的趋势还在继续。②一般地说,第三产业的发展及其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增加,是以第一、第二产业的发展为依据的。但是,珠江三角洲和澳门两地第三产业的发展并不完全按这一规律来实现。一方面,第三产业相对第一、第二产业而言发展速度太快,出现第三产业“过热”现象;另一方面,第三产业内部层次结构出现比例失调。信息、咨询、技术服务等以及为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居民素质服务的部门、为社会公共需要服务的部门,发展速度较慢,而商业、饮食业以及房地产业等在第三产业中所占的比重几乎是成倍地增长。中山市就是一个典型。1991年运输、邮电业只占国民总收入的2.1%,而商业、饮食业却占了6.2%,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第三产业的第一、二、三、四层次的比例也不协调,大致为55.6:35.0:7.2:2.2。③第三产业结构的不平衡,必然会影 响第一、二产业的兴盛,尤其是金融保险、邮电通讯、交通运输和信息咨询等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最终必然影响或限制经济的增长;金融保险业的滞后,直接影响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及其内部各层次的活力和弹性;科学研究、综合服务、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视事业的贫血现象,也将会 在更广范围和更深的层次上决定第一、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中其它层次的命运。

二、澳门与珠江三角洲的

第三产业合作

珠江三角洲如何缓解由于第三产业内部某些较低层次发展“过热”带来的矛盾与冲突,如何使第三产业适应第一、第二产业发展的需要,使产业结构逐步进入适当状态?在我们看来,把珠江三角洲与港澳放在统一的大的经济圈内进行整体规划,避免不必要的市场竞争和人财物消耗,共同发展,实现经济一体化,应是出路所在。

具体到珠江三角洲的中山、珠海、江门、佛山等市,除了与港、穗等地保持密切合作关系外,更重要的应是加强与澳门的经济技术、科学文化等方面的合作,在相互认同、相互支持、密切配合中发展。

澳门最近几十年的经济繁荣以及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发展,与珠江三角洲的支持分不开。而珠江三角洲的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实际上也离不开澳门,更少不了与澳门的合作。因为,澳门和香港不仅拥有雄厚的金融、技术、通讯、信息等方面的实力,而且在发展第三产业方面有着惊人的业绩和许多可供珠江三角洲等地借鉴的经验。

澳门有发达的旅游业和较齐全的服务业,有较丰富的进出口贸易经验和较优越的地理条件。更有以其本身独特的地位(保持资本主义制度、关贸总协定成员、国际多纤组织成员、与欧共体的特殊关系等)而形成的,内地和香港所不可取代的某些优势。从总体上看,澳门经济是以第三产业,即服务业为主。以1984年为例,包括旅游、商业、金融、行政服务及其它服务等第三产业产值约占澳门区内生产总值的51%。^④也就是说,第三产业是澳门自身的优势。尤其是最近十几年,随着港澳工业大量内迁,第三产业比重大幅提高。所以,保持第三产业的繁荣和发展是澳门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但就第三产业内部结构来看,澳门自身也有一个调整的过程,因为澳门第三产业内四个层次发展也不平衡,旅游过分偏重于博彩娱乐,大众化的设施不足,商业和饮食业虽有其特色,但对外依赖性也比较大。占区域经济主导地位的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势必影响第三产业整体发展,从而也直

接限制了澳门经济的起飞。

澳门经济发展的区域相关研究显示出其对于珠江三角洲的高度依赖性。澳门缺乏珠江三角洲所拥有的丰富多样的农副产品和人力、物力资源,堪称支柱的旅游业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珠江三角洲。据有关方面统计,随着内地旅游业的兴盛,经澳门进入内地(主要是珠江三角洲)的游客逐年增加,到澳门的300多万香港游客中,有1/5是顺路访问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到澳门的70多万外籍游客中,也有超过1/5的客流量,直接转赴珠江三角洲。近年来,珠江三角洲赴澳门旅游的人成倍增加。大批游客及其随之而来的消费,对珠澳经济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刺激作用。

三、经济一体化,合作的必然趋势

澳门与珠江三角洲,如何实现真正的经济文化合作?有不少学者提出了珠港澳经济一体化的新的发展战略。认为珠港澳三地经济的互相联系、互助互长、融为一体,可以促进共荣与稳定。^⑤应该说这一设想是富有建设性的。但是他们似乎只是强调贸易、金融、科技一体化,却仍然没有看到整个第三产业一体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其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和“借鸡生蛋”的思维模式之影响痕迹依然存在。从长远来看,这种思维模式不利于经济一体化的总体战略实施。珠港澳经济一体化就是要将三地经济放在一个统一的发展战略中来规划,充分发挥三地的优势,统筹兼顾,合理安排,使三地的人财物最大限度地得到合理分配、充分利用。

其次,他们也没有充分认识到三地产业结构上存在的差异性和第三产业内部层次结构上的不均衡不合理现象。过多地强调了发展第三产业的重要性,而忽视了第三产业赖以存在的基础,这显然是一个误区。无论是澳门还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第三产业都存在着质与量的问题,需要提高第三产业的总体水平,也需要在保证质的情况下增加量的积累。同时,两地第三产业都偏重于旅游、饮食、服务和商贸方面的发展和资金投入,尽管旅游等行业可以带动其它产业的发展,

但如果第三产业其它层次发展速度跟不上,最终还是要抑制旅游等业的增长速度,降低经济效益。

因此,澳门与珠江三角洲的合作和经济一体化是两地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必然趋势。而这种合作和经济一体化,具体地讲也就是第三产业的合作和一体化。这一方面是因为澳门本身的产业结构事实上已经以第三产业为主,发挥澳门第三产业已有的优势,比过多地强调第二产业的合作似乎要切合实际;另一方面,珠江三角洲的第三、第二产业还有很大的发展余地,这二次产业的内部结构急待调整,三次产业结构也有必要在发展比重上作新的调整和转换,而要进行这种结构大调整和转换,外在力量,其中包括与澳门的合作,显得十分重要。

实现这种合作,两地必须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达成共识。

首先,要把各自发展计划纳入整个珠港澳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来规划,避免重复作业,减少不必要的人财物投入,避免不必要的争论和政策倾斜。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具体规划时,必须有整体利益观念和长远打算,力图减少那种功利性的短期经济行为。

其次,在思想认识、观念意识上,要逐

渐确立合作观念、服务意识、团体整体意识和全局观念,采取积极合作积极参与的态度,在心理上、思想认识上与珠港澳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保持一致。

再次,双方必须看到珠江三角洲与澳门的合作,珠港澳经济一体化,首先是第三产业的合作与一体化,其次才是第二、一产业的一体化。第三产业不仅是港澳两地经济的支柱,而且在珠江三角洲经济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看,第三产业是珠港澳经济的最显著特色,也是最大的优势。珠港澳第三产业一体化,对三地经济的腾飞与共荣,对广东乃至全国经济结构的转变,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①王光振等:《广东四小虎》,第11章,广东高教出版社,1989年版。

②③中山市统计局编:《广东省中山市国民经济统计资料》,1983年,1991年有关统计数字。

④澳门华侨报社编:《1984/1986澳门经济年鉴》。

⑤冯平等著:《珠港澳经济一体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作者单位:中山市社科联、中山孙文学院

责任编辑:郑英隆

屡治屡胀，病根何在

——我国通货膨胀的透视

○李善民 罗必良

通货膨胀象一个幽灵游荡在我们周围，威胁着我们的生活，阻碍着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进程。改革开放16年来，我们已经经历了四次较严重的通货膨胀，每次我们都采用紧缩银根的办法来医治通货膨胀，但每次都死灰复燃。1993年开始到目前的这轮通货膨胀，继续采用以往的紧缩银根的宏观调控措施来加以医治能否奏效？对此我们必须探索它的起源。

在西方，对于通货膨胀的起源有许多不同的学派，如垄断说，货币制度说，政府行为说，需求拉动说，成本推动说等。在我国理论界也提出了一些观点，如体制转轨说，改革说，人口说，效益说，以及借鉴西方理论形成的成本推动和需求拉动学说。从中可以看出，引起我国通货膨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目前有不少文章论述我国通货膨胀的根源在于改革，是由于改革步伐加快造成的，对此，我们认为现阶段的通货膨胀是结构调整造成的。分清这两种通货膨胀的区别，不仅在理论上澄清是否，而且在实践上对于制订政策措施都是十分重要的。

结构性通货膨胀是指由于社会经济结构方面的因素而引起的物价水平在一定时期内的持续上涨。美国经济学家查理·舒尔茨认为，工资和价格缺乏向下弹性，资源缺乏流动性和短期中出现需求在部门之间的大规模转移，是造成通货膨胀的三个主要原因。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改革开放后，工资水平不断提高，沿海地区甚至丧失了劳动力价格低廉在世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竞争优势，工资侵蚀利润的机制和收入攀比的机制双重作用使通货膨胀加速。据调查，有不少企业帐面亏损，但职工工资仍居高不下，工资没有真正与效益挂钩。就价格来看，每次的价格上涨，在采取措施后的小幅度回落之后，又引起更大幅度的上涨，如此循环往复，价格只有上涨而无真正的回落。

资源缺乏流动性，使资源不能从需求下降的部门流向需求扩张的部门。一般来说，劳动力等资源将从供过于求的市场转移到供不应求的市场，但由于我国体制上的障

碍,在这种转移过程中,如果失业对货币工资增长率的减缓作用小于工作空位对货币工资增长率的推动力量,就会导致工资和物价水平的上涨。现阶段,国有企业应该破产的不能破产,应该出让的不能出让,就是明显的例证。

短期中出现需求在部门之间的大规模转移,是造成现阶段我国通货膨胀的又一主要原因。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和经济的迅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需求多样化趋势日益明显,但我国的不少企业还没有整体营销观念,不能迅速了解消费者需求的变化,致使不少企业产品积压,开工不足,另一方面,居民存款急剧增长,经济中出现表面上看来需求大于供给的通货膨胀。实际上这只是结构性的通胀,而并非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了相当发达的产品供大于求的经济阶段。

我国结构性通货膨胀原因表现在产业结构上,一是工业的超高速增长与农业的低速增长形成尖锐矛盾。在比较利益驱使下,农村投资向非农产业倾斜,使农业生产发展后劲明显不足。致使农业在不太严重的自然灾害下,就会受到严重打击,近两年农副产品价格,尤其是蔬菜、肉食品价格直线上涨就是很好的说明。二是工业内部结构过分地向一般加工业倾斜,基础工业和能源交通等瓶颈产业发展严重滞后。进入90年代,情况并未好转,投资结构仍然偏重于机电等长线产业和产品,而作为“瓶颈”的能源工业的投资比重并未上升,运输、邮电、通讯业虽有一定程度的加强,但多数投资属于地区性的,对于改善全国的交通、通讯状况作用不大。总之,产业结构的这种不合理状况,势必使得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受到制约,有效总供给的增加受到限制,必然会拉大供求之间的缺口。这种情况表现在1993年则是生产资料缺口拉大,导致消费资料成本增加,消费品物价上涨。

目前这轮通货膨胀的原因,确有改革因素的作用,但是否要将其归结为“改革型通货膨胀”,值得商榷。有人测算过石油价格、煤价、电价、运价、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改

革使成本增加,也测算过税制改革、汇率并轨、利率调整对成本的影响,据此认为,这一轮通货膨胀属于“改革型通货膨胀”,也有人认为是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出的“转轨型通货膨胀”。我们认为,石油、煤炭、电力、运输价格的改革是针对我国基础工业和能源交通等瓶颈产业发展不足,而采取的调整结构的改革措施,改革是手段,不是目的,最终是为了使产业结构合理,是为了发展已经严重滞后的基础工业和能源交通等产业,限制机电等长线加工业,促使整个国民经济全面协调发展。至于税制改革,也是为了税负公平,以便通过税收这个经济调节杠杆促使资源合理配置,达到促优限劣的目的,虽然税制改革还有待完善,但根本的目的也是使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汇率改革采取汇率并轨的方式,仅仅是外汇体制改革的开始,人民币自由兑换才是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汇率并轨虽然增加了成本,但它是我国经济与国际经济接轨的必然要求。人民币币值长期高估,不利于产品出口,反而鼓励了进口,对于我国经济长期发展不利。汇率并轨后,人民币没有持续贬值,反而在最近有小幅升值,说明我国经济具有强劲的发展势头,也说明我国的出口产业在汇率并轨后得到了较为合理的调整。

众所周知,一国经济发展的目标有国内均衡和国外均衡两方面。国内均衡是指充分就业、物价稳定、适度的经济增长率和资源的有效利用,国外均衡是指国际收支平衡。不论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改革措施,只有使国民经济全面协调发展,才能实现这两方面目标。

弄清结构性通货膨胀与改革型通货膨胀的区别,就可以采取适当的对策。“改革型通货膨胀记”似乎会给我们一种误解,就是既然通货膨胀是不可避免的,就不应该加快改革,步子应稳一些。从其对策来看,似乎把控制货币发行放在首位。诚然,货币发行是通货膨胀的原因,但并不是根本原因,货币增多只是通货膨胀的表面原因,根本的原因,在于我国经济结构的长期失衡,在于

结构上出现部分产品供大于求,部分产品供不应求,尤其是当供不应求的产品是基础工业和能源交通部门的产品时,会通过生产资料价格的连锁反应,推动消费品价格上涨。鉴于此,我们主张,我国现阶段治理通货膨胀要把治标与治本结合起来。过去我国治理通货膨胀,主要把目标放在压缩总需求上,通过控制货币发行量的银根紧缩措施来医治。压缩总需求固然能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但不能根治通货膨胀,过一段时间之后,通货膨胀的死灰又会复燃。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通货膨胀问题,必须从产业结构方面入手,结合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医治。因此,我国目前治理通货膨胀应在控制需求(治标)的同时,抓好产权、结构、金融和投资体制改革,使之尽快适应正在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只有这样,才能在压缩总需求的同时,增加有效供给,使我国经济不至于走入滞胀的低谷。基于此,我们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第一,在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的基础上,加强政府对物价的宏观调控。通货膨胀在于结构失衡,要纠正结构不合理,政府必须不断推进改革的进程。但国内外经济运行的经验教训表明,在结构调整中通货膨胀虽不可避免,但政府也不是撒手不管,或无所作为。相反,即使在市场经济国家,政府也都十分注重对价格的管理,反垄断法就是例子。可喜的是,我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如何操作却大有学问。一方面在财政政策方面必须严格控制开支,减少不必要的财政支出,尤其是消费基金、集团购买力的

开支要严加控制;二是必须加强物价立法,以使价格管理有法可依。虽然已有反不正当竞争法,但实施效果不好,还要加强执法力度;三是建立储备体系和价格调节基金,控制物价水平的过大波动。

第二,尽快推行金融体制改革。目前采取的信贷总量控制的方法已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要求,有一些部门或产品本是应该鼓励发展的,但由于不易取得贷款,难以发展。我们反对用扩大货币发行量的方式促进经济增长,同时我们也反对盲目的宏观调控,尤其是目前一调控就是收缩,使许多企业、部门难以维持。表面上看,一刀切的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减少信贷投放量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但实际上由于货币的乘数作用,与固定资产有关的产业部门也受很大影响。目前的经济形势不容乐观,今年的经济形势也许会更严峻。因此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让金融市场在结构调整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刻不容缓。当前一方面要推进商业银行的企业化进程;二应允许银行向企业投资控股,以便明晰产权;三是让市场利率在融资市场中发挥作用;四是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控制流通中的货币量。

总之,在治理通货膨胀时,必须弄清通货膨胀的根源,从现阶段实际出发,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华南农业大学经贸学院

责任编辑:郑英隆

提高生活质量与广东发展战略

□李新家

一

经济和社会发展达到一定高度,提高生活质量会成为一种普遍的要求。

生活质量的概念是加尔布雷斯 1958 年在其所著《富裕社会》一书中首次提出的。形成这一概念的背景是,美国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很高,但他们社会需求和智力需求方面的满足却明显落后。人们开始认识到仅仅把经济增长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并不会使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反而会使生活质量受到损害。60 年代关于生活质量的研究涉及到更多的方面。不仅注意到人的情感和心理健康,而且注意到生活满意程度的评价。

萨缪尔逊在《经济学》一书中说:“过去,经济学教科书不讨论这些极其重要的问题。而现在和将来,经济学则将用很大气力研究生活质量问题。”近些年来,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关注和研究伴随经济增长而来的生态环境恶化和生活质量下降问题,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引起重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给人民生活的提高创造了条件。我国人民和政府也开始重视生活质量问题。1990 年 12 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中多次提到生活质量及相关概念。“建议”指出人民生活逐步达到小康水平,是 90 年代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并且具体指明:“所谓小康水平,是指在温饱的基础上,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达到丰衣足食。这个要求既包括物质生活的改善,也包括精神生活的充实;既包括居民个人消费水

平的提高,也包括社会福利和劳动环境的改善。”而且还指出:“环境保护是一项基本国策,也是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些说明,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追求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目标之一。

二

什么是生活质量呢?美国社会学家坎贝尔 1976 年将生活质量定义为“生活幸福的总体感觉。”美国社会学家林南 1990 年提出生活质量是对生活各方面的评价和总结。这种定义倾向于把生活质量表达为一种主观感觉。但主观的感觉并不是主观主义,它由各方面的客观原因所引起。一般说来,人们的生活状况(包括物质生活的和文化生活的状况)从量的方面说,就是生活水平,它由人们所消耗的物质资料和劳务的总量来表示,也可用为此而付出的货币量来表示;从质的方面说,就是生活质量,它由人们生活的方便程度和舒适程度来说明,并且反映在人们通过各种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而得到的满足上。在通常的情况下,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相对较低的情况下,生活中消费的物质资料和劳务较多时生活质量也较高。但在经济发达,居民收入较高的情况下,实际并不一定如此。因为在高消费的情况下,消费效益下降,造成浪费的可能性增加,其中有些消费并不给人们身心带来满足。同时,有一些影响人们生活幸福愉快的东西不是能由个人通过金钱就能取消的。

在研究中,人们设计出多种不同的指标体系来反映一个社会、国家或地区人们的生活质量。美国学者莫里斯 1979 年在其所著

《衡量世界穷国的状况——物质生活质量指数》一书中,用识字率、婴儿死亡率及一岁预期寿命三个指标通过指数计算综合出物质生活质量。其理由是:它们从一定的侧面反映了人们的普遍愿望,描述了生活质量本身某些方面的情况;具有泛人类色彩,不反映任何种族或特定社会价值观的偏见;这三项指标反映的不是生活中的投入,而是“产出”,是结果,因而体现了生活质量。我们认为,仅此三项指标是不足以全面反映人们生活质量高低的。因为它包括的内容仅仅是人们生存时间的长短和是否识字。一些研究者提出来的描述生活质量的指标体系实际上是描述影响生活质量高低的因素。例如世界银行在《1989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将生活质量归纳为:平均多少人有一名医生;平均每日摄取热量;通货膨胀率和人均能源消费量四项指标。可以说这些只是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的客观因素的部分,间接地反映了生活质量的高低。

综合来看,影响居民生活质量高低的因素有如下几类。1、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由此决定的居民收入水平、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服务于居民生活的市场体系;医疗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交通、通讯等各类服务行业的发展情况;以及社会分配制度、收入差距、通货膨胀等方面的情况。2、社会进步所决定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教育、民主、文化、精神文明建设,人际关系、社会风气、社会公德、治安和秩序;人们闲暇时间的多少以及社会生活方式等等。3、生活环境,包括自然生态环境、人工物质技术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状况。4、科学技术发展的状况。因为科学技术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从而使许多高科技产品不断进入居民消费领域,引起消费革命;因为科学技术能改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进步;因为科学技术的应用能改善环境;因为科学技术能使人们的生活科学化。因而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决定生活质量高低的重要因素。

影响生活质量高低的这些因素,为我们揭示出提高生活质量的途径。包括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们的消费水平;促进消费结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和科学化;打击各种假冒伪劣商品的生产经营活

动,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等。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加强对广大消费者的引导和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确立正确的生活追求,改进自己的生活方式,使主体在与客体的有机结合中提高生活质量。

三

生活质量是涉及到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大问题。广东率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较快,居民生活水平提高速度较快,幅度较大。邓小平南巡讲话更给广东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可以预见,广东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将继续在全国先走一步。这也就提出了广东应该率先研究生活质量问题,在提高广大群众的生活质量方面做出较大的努力。因为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决不仅仅是国民生产总值或人平国民收入的增加,决不仅仅是社会、地区和个人物质丰裕程度的提高。而应该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做到社会进步;做到广大群众个人素质的提高和劳动者整体素质的提高。我认为有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是值得我们重视并研究解决的。

第一,我们应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广东?给人民创造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条件?包括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我们应该引导人民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和追求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象这样一些问题,决不是没有意义的空谈。因为一个社会、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和进步所能利用的资源总是有限的,追求不同的目标,不同的生活方式,就会使这些有限的资源派上不同的用场。如果我们选择不好,追求不科学,将来必造成极大的浪费,带来极大的损失。

一个先进的地区,现代化的地区,人们究竟应该怎样生活这样的课题,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目标是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满足程度。但是,什么样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既是科学的又是现实的?什么样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才是值得追求的?回答这样的问题,既要考虑到整个人类历史发展所创造的文明的“惯性”作用,也要考虑到客观的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给予人类的决定作用和制

约作用,还要考虑到西方发达国家所创造的生活方式的影 响。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人类生活方式的选择应该有自己的主张。或者说站在历史的科学的进步的立场上,人类社会对自己的生活方式应该有一个合理的选择。

第二,如果追求什么样的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涉及到目标的选择,那么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战略上的思考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基本指导思想。战略上的考虑必须联系历史、立足现实,着眼未来,要考虑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在将来会引起什么后果,这种后果是否符合我们所选取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方式。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有过一段论述。他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517—518 页)今天我们可以在恩格斯之后继续举出许多类似的例子。在“大跃进”甚至往后多年内,我们都可以看到一种宣传画,画面上有许多高矮不一的烟囱,冒出蓝色的烟火,以此来表达我们所憧憬的未来。那时人们是否想到这些烟囱将给环境带来多么严重的污染,并由此引起各种严重的后果呢?长江已经变成了“黄河”,森林被过度开采,沙漠日益扩大,耕地日渐减少等等。这些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社会生活领域内,解放后灭绝多年的丑恶现象死灰复燃;一些人的精神和心理上出现信仰危机,精神空虚;贪污腐败,社会秩序和治安状况令人担忧;下一代人受到不健康因素渲染和不科学的教育;社会分配不公和两级分化现象突出;当一些人肌不饱腹时,而另一些人则奢侈浪费,物欲横流。我们应该承认和面对这种值得忧虑的现象采取措施改变这种状况。给人们创造一种高质量的生活环境,应该成为我们大显身手的一个领域。

第三,运用系统论的观点和方法来指导广东发展,为广大人民群众创造一种能够提高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在决策中的基本要求是做到经济、社会、环境和科技发展的协调。要求这些方面在发展中相互协调的基本原因有如下几点:首先,在人们和社会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过程中,单纯经济的增长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人们的需要和作为整体的社会需要依靠经济发展、社会文明、环境改善和科技进步才能满足,而且对各方面的要求客观上存在一个合适的相互配合问题。其次,在今天,人类活动的领域不断迅速扩大,使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环境改善和科技开发方面的联系日益加强,它们之间在发展中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单方面的经济增长,不仅不能带来预期的后果,而且还会造成极大的损失,造成社会生活等方面的过高代价。再次,在促进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环境改善和科技开发方面需要投入的资源需要一个合理的安排,这方面的资源配置单纯依靠市场的力量是不够的。因此政府在保证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同时,还应通过其他经济调控手段引导资源的合理配置,才有可能做到几方面发展的协调。

这样一项工作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内尤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在经济发展水平极为低下的情况下,经济增长是最根本的甚至是唯一重要的任务。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情况下,人的需求已从几乎是单一的经济上的追求扩展到文化社会生活和环境等各个方面,社会也具备条件满足人们这些方面的需要。

第四,重视并在决策中采取措施来促进经济、社会环境和科学技术的协调发展,必须做一些先导性的基础工作。必须研究经济、社会、环境、科技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现实表现。必须研究居民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变化的具体情况,分析经济、社会、环境、科技发展对生活质量影响的具体方式和途径,并且对各方面的未来发展趋势作出科学的预测。广东应在创造新优势,制定新发展战略上占据人类社会发展的制高点。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郑英隆

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种理论方案： 可转让的集体产权

□何琼隽

一、我国产权问题的提出与对所有权的重新理解

按照社会主义公有制原则建立的我国国营企业，属于国家所有，国家拥有所有权，企业作为政府机关的附属，接受国家计划指令，完成国家下达的任务，所获利润上缴，所需资金由国家下拨，职工工资列入预算，谈不上企业产权。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让国有企业作为一种经济实体，享有经济权益，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而作为这种“两权分离”的实际操作措施，先后推行了企业承包和租赁。经营权的出现，企业产权问题就必然地摆在人们的面前了。

如何理解产权？这是对我国现有企业制度进行分析的前提。现代的产权理论认为，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来说，产权是指使用权、收益权、决策权和让渡权。所谓使用权是在权利所允许的范围内以各种方式使用的权利；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况下可以享受从使用中所获得的各种利益就是收益权；而改变事物的形式和内容的权利则称为决策权；通过出租、租赁等方式可以把收益转让给他人或把所有权出售给他人就是让渡权。由此可见，产权是一组可分解的权利。

有了有关产权的概念，就可以对所有权作重新的解释。所有权意味着拥有以上全部权利，即完备的产权构成了所有权。但是，从法律意义上来说，所有权则不是完备的，甚至是不明确的。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人们

对某一事物的权利都是受到限制、受到约束的，不可能达到拥有全部权利。因而，人们实际上拥有的是产权。这样所有权便可分解成若干个权限，它们彼此之间是可以相互独立的。

二、可供选择的产权安排模式

经济活动中的产权问题，首先是由交易费用引起的。由于资源的稀缺性，任一社会都将发生为资源利用与使用的目的进行竞争，因而必然出现一套指导竞争的规则和约定。而协商、订立和实施这些规则是要付出交易费用的。一方面，交易费用的增加意味着社会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指导竞争的规则一旦确立又能极好地减少资源的浪费，社会就在这两者之间进行抉择。产权制度的发明和创新旨在使社会经济体制运转的交易费用达到最低。考察现有的产权制度，至少有如下几种产权安排模式可供我们选择。

1. 私有产权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产权一旦归私人，私人就可排他地使用和获益，私人也就将关心自己的产权，注意不受他人侵犯，并推动界定私人产权和保障产权的制度形成。私人的产权一旦界定，产权立即会根据市场价格自由交换，资源将因此流向最高出价者，流向利用效率最高的使用者。私有产权制度的确定在事实上会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私有产权是产权制度演化的起点，随着生产社会化的发展，私有产权会逐渐显露出其缺陷。

2. 社团产权 (communal property rights)

当某个个人对某种资源行使某种权利时,并不排除他人对资源行使同样的权利,或者说,这种产权是共享的。这种产权就称为社团产权。

3. 集体产权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一种产权如果属于集体,那么关于如何行使对资源的各种权利的决定就必须由一个集体做出,由集体的决策机构以民主的程序对权利的行使制订规则和约束。这种集体的产权通常将采纳某种投票表决程序选出代表各个成员的“委员会”。对于如何行使产权以及如何有效地利用资源和财产的问题,委员会将通过民主表决程序进行决策。决策的方式可以采取“完全一致规则”,也可以采取“多数通过规则”。相应地,集体表决也可以采取“弃权”来转让权利。

4. 可交换的产权 (exchangeable property rights)

产权是可以交易的,但是并非所有的产权都是可交换的。如果产权是可以交换、转让的话,那么,通过其中某些权利的变动或交换就可以使当事人的福利得到改善。可以转让的权利有一个市场价值,竞争会使人们为取得这种权利的出价达到最高,因而获得这种权利的成本必须促使获得该权利的人有效地使用权利,保护权利。

5. 排他性的产权 (exclusive property rights)

可交换的产权排斥那些没有通过交换的方式取得这一权利的人,这就是排他性的产权。但是,如果不能够有效地阻止他人“免费搭车”,这种产权就是非排他性的。因为人们能免费搭车,那么谁也不会自愿地交费,所以排他性是可转性的必要条件,也是产权市场形成的必要条件。一旦产权是不排他的,交换或转让产权就是多余的了。

三、可转让的集体产权结构的优越性

集体产权结构是以财产所有权的分散化为前提的,若这种产权同时又是可转让的,就构成了可转让的集体产权。现代股份

有限公司恰恰就是这种可转让的集体产权的一种现实形式。我们知道,独立个人持有的私有产权结构和企业财产的私人所有制形式的组合是古典企业的制度安排;但企业资产以股份形式构成的现代公司制度的产权结构是以民主程序和股东代表大会的形式安排起来的集体产权结构。在这样一种集体的产权下,单个股东既可以通过股东大会的民主程序履行和保护自己的出资者权利,也可以通过转让或出售其拥有的股权来表达不同意见。股东作为出资者只就其所认购的股份对公司负责,并且取得红利和股息,但不承担公司债务,与公司债权人没有任何联系,这些构成了出资者所有权的全部含义。

股份有限公司虽然也和其它形式的公司一样具有人的因素(股东)与物的因素(资金),但它是典型的资合公司,而且法律意义上的重点在后者。股东的个人色彩极为淡薄,例如设立公司时不须全体股东在章程上签名,股东人数和股东名单无须登记。至于股东的出资,以现金为限,不可以信用和劳务出资,但对资本的募集、核查、保持、动用等,都有详细而严格的规定,足见对于资本的重视。股份有限公司的资本就是全体股东出资的总和,股份有限公司本身就是法人,公司以其全部资本对债权人负责,公司财产的多少,最初取决于资本的多少,公司资本在公司开始营业后即转化为公司财产,即公司财产是固定的,承担债务仅以注册资本为限。以此形成法人财产权,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

由此可见,股份有限公司这种可转让集体产权结构的优越性体现在出资者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相分离,公司以其全部法人财产,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依法纳税,对出资者承担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同时也以公司财产承担有限责任;出资者则享有按投入资本额所具有的所有权权益,这包括资产受益、参与决策、选择管理者等权利,但必须指出,公司的股东们的权利是极其有限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关于法人财产权与出资

者所有权均属于法律意义上的产权,应该是严格界定的。在界定的前提下,可以分解成一组权利。产权分解为一组权利,这正是产权的基本特征。我们认为,现在较为流行的把产权分为古典产权与现代产权之说,概念上是粗糙的,理论上是肤浅的,也将不利于进行产权的界定。如果说私有产权是产权制度的起点,那么,社会产权、集体产权、可交换产权、排他性产权则是产权制度的演化和发展,而且它们是可以相互替代的。

可转让的集体产权结构的优越性还体现在它是保证公司效率的重要制度安排。在股票交易所中股票价格行情反映了公司经营情况,因此,经营不佳的公司股票价格将下跌,使得股东纷纷抛出该公司的股份,该公司就有破产的可能性。因此,可转让的股份就是公司效率的晴雨表。

四、产权结构的嬗变与我国国有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转变

利用上述可供选择的产权安排模式来剖析我国现有的企业制度,我们发现,我国原有的国营企业具有社团产权结构特征。

社团产权的最重要特点在于社团产权在个人之间是完全不可分的,即完全重合的。因此,即使每个人都可使用某一资源,但每个人都没有权声明这个资源是属于他的。换句话说,每个人对此都拥有全部的产权,但这个资源或财产实际上并不属于每个人。产权属于社团,而不属于该社团的各个成员,这正是我国公有制下国营企业产权结构的本质特征。

如果我们确信可转让的集体产权结构具有降低大规模企业的风险,同时还可以降低因庞大的监督管理所需要的巨额费用,以

及降低取得资本的成本和巨大的债务风险,保证企业效率的优越性,那么,就有理由认为这种产权结构是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理想方案。因而,我国现有国有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的具体操作方法就是把企业中现有的社团产权结构向可转让的集体产权结构嬗变,从而有效地实现出资者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的分离,使得政企可以分开,经营机制实现转换,企业摆脱对行政机关的依赖,国家解除对企业承担无限责任,同时也有利于国有企业筹集资金,分散风险,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生存发展。

根据这一方案,我国现有的国有企业中的行业总公司要逐步地按照集体产权结构改组为控股公司,发展成为以产权联结为主要纽带的跨地区、跨行业的大型企业集团,发挥其在促进结构调整,提高规模效益,加快新技术、新产品开发,增强国际竞争能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国有的中型企业可以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小型的国有企业则可以出售给集体或个人,以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找到或设计出一套可行的理论方案是头等重要的任务。可转让的集体产权可以作为一种理想的现代企业制度安排,成为我国现有企业制度的替代,从而实现经营机制的实质性转换。为了最终实现这一转换,有步骤地清产核资、界定产权、清理债权债务关系,评估资产、核实企业法人财产占有量等等是国有企业稳步地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的先决条件。

**作者单位: 广东工学院管理系
责任编辑: 谭湛明**

企业兼并： 问题与对策

□张兆安

企业兼并，作为企业有偿让渡的形式，是一种打破存量刚性，促进存量资源再配置，推动结构转换的经济机制。产生于80年代初期的中国企业兼并，对解决亏损企业转轨和潜优企业规模发展问题已取得明显的效果。据有关部门统计，80年代累计，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和13个计划单列市共有6226家企业兼并6966户企业，共转移存量资产82.25亿；减少亏损企业4095家，减少亏损金额5.22亿。1989年，全国先后有

12个企业产权交易市场挂牌营业。进入90年代后，中国的企业兼并发展更快。但中国的企业兼并毕竟尚处在初始阶段，还有许多问题与难点需要我们去研究解决。

一、问题与难点

企业兼并是一种涉及面很广的企业产权让渡形式，它的发展离不开宏观经济走势与宏观改革的基本面状况。为此，兼并难免会出现困难与问题。目前的问题与难点主要有如下几个。

1、兼并活动的非市场化现象，难以推动企业兼并的健康发展

良性的企业兼并应是经过市场竞争和市场方式，并按照经济和法律的程序来进行的。由于中国的兼并市场刚开始，尽管有些企业兼并已进入产权交易与资本市场，但大宗的兼并行为采取的还是非市场化的方式，操作上很不规范。就目前来说，企业兼并实现的非市场化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政府撮合。这种兼并占大多数，或企业主管部门带有明显的行政力因素。二是隐性兼并。这是兼并双方为了避免政府可能的干预而协议进行的企业产权交易。这种兼并在一些小企业、小公司表现得十分突出，同中国兼并市场不发达状况密切相关，也是当前企业兼并行为不规范的重要根源。非市场化的兼并，由于缺乏客观公正的资产评估和企业诊断，往往会导致产权交易不公平，交易手续不健全，债务处理混乱，缺乏法律保护等问题，从而影响中国企业兼并的健康发展。

2、企业产权模糊，难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兼并与兼并市场

企业产权关系不明晰，使企业缺少处置资产的权力，直接影响到企业产权的真正让渡。一是导致决定企业兼并的主体不明确，尤其是国营企业产权主体不到位，产权代表不明确，使企业无权决定兼并或被兼并，具体操作更是步履重重。二是企业兼并根本上是一种产权所有者的行为，作为国有资产管理者或代表者的政府部门实际上也就成了企业兼并的决策主体，并在企业兼并完成后调整和协调各方的利益。同时，存在着的产权部门实际所有极大地遏制了企业兼并在

跨部门、跨地域、跨所有制方面的拓展。三是兼并企业新增的资产产权不落实,有偿转让和兼并交易费用的归属也难以确定。这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企业利用自筹资金去兼并企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3、社会对被兼并企业职工的容纳能力有限,影响兼并容量的放大

中国企业兼并的发展同被兼并企业的妥善安置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而被兼并企业职工妥善安置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发达程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尽管目前在具体兼并行为的操作过程中,多数采用的是企业吸纳和社会吸纳两条途径兼容的方式,但由社会吸纳的比例甚低。这说明社会对被兼并企业职工承载与吸纳能力是十分微弱的。在实际的兼并操作中,一些被兼并企业往往把兼并企业吸纳部分或全部劳动力作为重要的交易条件和筹码,或是兼并企业按接受被兼并企业劳动力的数量少支付兼并价款。因此,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体系欠发达,劳动力安置采取非社会消化的途径,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市场化企业兼并的发展。

4、政府行为欠规范,影响企业兼并的实效

政府行为欠规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部门充当企业兼并的决策主体,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借助于行政力量迫使企业接受兼并与被兼并的现象。由于企业产权不明晰,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的代表者,在企业兼并中作必要的干预是正常的,但要强调的是政府干预的有效性。如果盲目干预,必然会给企业兼并带来影响,甚至出现负效应。二是在企业兼并过程中,政府部门搞“硬性搭配”,把经济效益差的企业“搭配”给经济效益好的兼并企业,造成新的“劫富济贫”和“内部慈善”现象。这在企业集团组建时兼并其他企业时表现得尤为突出。这种不以实际需要和可能出发,把落后企业包袱强行转嫁给其他企业的后果:使一些经济效益好的企业出现滑坡,甚至被拖垮;导致企业兼并的行政性垄断,不利于企业走向市场,削弱优势企业的竞争实力和发展势头;

违背经济与市场规律,人为地规定生产要素的流向,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保护了落后企业,不利于企业自我约束的强化。

5、企业资产评估环节薄弱,影响产权交易价格的真实体现

企业资产评估是兼并行为的核心,关系到等价交换原则的真实体现,以及企业兼并后的健康发展和资产有效利用度的提高。就目前来说,企业兼并过程中的企业资产评估还是粗线条的,难以真正反映企业产权交易的价格。一是产权意识淡漠,资产评估粗糙。国有企业均按帐面价值划转,不同所有制之间也缺少仔细核算。在企业产权的定价与交易上,主要看资产与负债状况,资不抵债的,采用承担债务的方式;资大于债的,则在承担债务的基础上支付一定的转让费。这种简单的操作方式,极不利于企业兼并的市场化交易。二是注重有形资产的评估,忽视无形资产的评估。无形资产对企业的产出能力起着特殊的作用,能为企业创造超额利润。在目前的企业兼并中,对无形资产的评估甚少。三是忽视土地使用权的作价和有偿转让。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应随着企业兼并产生使用权转移,但目前的兼并活动中,土地不作价或作价混乱,没有统一的章法,影响到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的真实价格。

二、对策思考

中国的企业兼并正方兴未艾,企业兼并市场日趋活跃。为促进中国企业兼并健康发展,更符合国际惯例,当前务必在政策上和制度上抓好几件事。

1、决策——主体化。政府部门要把企业兼并的决策权交给企业,使企业真正成为兼并行为的决策主体。政府在致力于企业产权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同时,改政府对企业兼并的直接作用为间接作用,使企业兼并活动逐步引导到兼并市场上来,由市场对让渡或购买产权的企业进行自主运作。政府主要通过对企业兼并市场的引导和协调,通过政策法规、经济手段来发挥对企业兼并活动的指导和调控作用。

2、途径——市场化。走出目前企业兼并困难的出路在于市场化。诱使市场机制进

入企业兼并,不仅为企业相互兼并提供信息、场所和选择的机会,为企业兼并行为的规范和法制创造条件;而且兼并市场作为整个市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加有利于企业之间存量资产的优化组合和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同时,企业兼并的市场化运作,有利于企业兼并操作的公开平等合理,有利于减少人为因素的干扰和控制,有利于中国的企业兼并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3、市场——网络化。市场经济发达与否的标准之一是是否有一个统一的完善的市场体系和网络系统。尽管我国的企业已从过去的凝固、封闭状态中走出了兼并、流动的第一步,各种区域性兼并市场初步形成,但这毕竟是一种初始市场,区域分割的状况远未消除。这些地域性的市场体系尚待进一步完善,全国性的产权交易市场与兼并市场也有待建立。

4、条件——法律化。企业兼并需要建立和健全与之相配套的法律体系。兼并双方的合法权益需要有法律的保障,通过立法对企业兼并的法律涵义加以界定并明确其法律地位;明确规定企业兼并应坚持的原则和兼并的范围;用法规设定企业兼并的形式与程序;明确有关产权转让费问题的法律规定;明确规定被兼并企业债权债务的处理和企业兼并后产权转让的资产归属问题;明确有关被兼并企业职工及离退休职工安置的法律规定;明确规定什么是不正当行为,应承担何种法律责任。当然,尽快出台《企业兼并法》是当务之急。

5、行为——规范化。企业兼并的规范

化,就是企业兼并活动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消除企业兼并过程的强制性和随意性。企业兼并的规范化,一是要坚持平等自愿的原则。兼并作为企业的自我调整行为,并非行政的强制改组,兼并双方必须是自愿兼并与被兼并,通过协商达成合同条款,并自愿接受这些条款的约束。同时,兼并双方有权选择兼并的具体形式。二是坚持等价有偿的原则。企业兼并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把企业作为商品买卖的交换活动。因此,只有坚持等价有偿的原则,才能实现价值规律的要求并保证兼并活动的公平性。三是坚持公开合理原则。企业兼并活动必须真正采取市场化方式,保证兼并活动的公开性,同时,我们只有通过市场交易,才能正确反映资产价值的价格,才能保证兼并活动中的机会均等。

6、保障——社会化。中国企业兼并发展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是劳动力市场不发达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优势企业一旦兼并了劣势企业,就必须同时承担起被兼并企业原有职工的就业责任与社会责任。这种沉重的就业压力和社会负担的结果必然会影响到企业兼并的发展及其作用的发挥。因此,宜尽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使被兼并企业职工安置走社会化道路。只有将被兼并企业的劳动力再就业和繁重的社会保障任务逐步还给社会,才能使兼并企业轻装上阵。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
工业经济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郑英隆

美日现代企业 制度比较及其启示

□林 勇

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美日等国,现代企业制度已有较为成熟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机制。对它们作一些必要的比较,会有助于我国现代企业制度建设。

一、企业产权组织的基本形式

美国的企业产权组织形式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在工业化初期,主要形式是独资企业,美国称为单业主制(**Proprietorships**),这种形式的特点是一个人出资经营,所有者单一,在法律上不具有法人资格。其优点是管理简单,经营上受制约较少。缺点是资本有限,且当企业破产的时候,业主的财产除了可以留下极少数以外,必须用来偿还债务。第二阶段:主要形式是合伙企业(**Partnerships**)。合伙制企业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合资经营的企业。其优点是经营的资金量比较大。但不足之处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为一体,合伙人对合伙制企业的债务负无限责任,适应不了大规模生产经营和生产现代化、社会化的需要。第三阶段:主要形式是公司企业(**Corporations**),其特点有三个:股东负有限责任;企业独立于出资人成为法人实体;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管理者是股东所雇佣的董事和职员。目前,公司制已成为现代企业的主要形式。从数量上看,股份企业占企业总数的比例很小,但从资产和销售额来看,股份公司占的比例很大。美国1979年总共有1618万家企业,其

中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有1360万家,占80%;股份公司有258万家,仅占美国企业总数的16%,但其资产占全国企业总资产的85%。其销售额则占全国销售额的89%。

美国的股份公司一般分为三类:企业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即上市公司或公众化公司;将资产折成若干股份并交由家族成员掌握,但不公开发行股票的不上市公司;介于二者之间的既公开发行股票,又由有关家族成员掌握其股票主要部分的公司,兼顾上市公司和不上市公司的特点。在这三类公司中,从数量来看,不上市公司为绝大多数,如美国不上市公司在公司总数中,1985年达到99%左右,但从资产占有量来看,上市公司是主要的,约占美国股份公司总资产的70%左右。

日本现代企业基本形式与美国略有区别。根据日本商法的规定,企业可分为个体商人、无限公司、股份两合公司、股份公司和有限公司。(1)个体商人,即经商行为的主体不是公司组织,而是个人,个体商人以自己的资金为基础从事经营,对于经营的债务负无限责任。在日本,农业和零售业大多数采取这种经营形式。(2)无限公司。这是由几个人出资组成的公司组织,这些人对公司的债务负无限责任。这类企业一方面受公司成员数和出资额的限制,另一方面成员固定、责任无限,现在日本已名存实亡。(3)股份两合公司。这是由在出资额限度内负有

有限责任的公司成员及其它负有无限责任公司成员组成的组织。(4)股份公司。这是资本与经营分离的现代经营组织。股票所有者也就是股东,只在出资额限度内负有有限责任。股东的意图通过股东大会来体现;实际业务由专业经营者承担。目前,日本民间企业中,大约有60%以上的企业都采取股份公司形式。(5)有限公司。有限公司以全部出资者的出资总额为限,负有有限责任,但公司成员把出资所产生的权利让与非公司成员时,要经过成员全体会议讨论通过。总之,由于日本公司类型不同;多数出资者与法人经营的结合方式也不相同。对此,日本的商法及有限公司法均分别作出了规定。其中现代日本大企业的代表形式是股份公司。

与欧美公司相比,日本两合公司的特点是:(1)其公司成员既是出资者又是经营者,资本与经营不分离,两合公司是由在出资额内负有有限责任的公司成员,与其它负有无限责任的公司成员联合组成的公司。(2)其以合作社为公司形态,内部关系是依据民法有关合作社的规定形成的。(3)业务经营方针由过半数的成员决定。(4)原则上,公司成员各自负责其自己的业务岗位,并分别代表公司,但是,也可根据章程规定特选代表公司的公司成员。(5)两合公司中的有限责任成员,具有监督无限责任成员业务与财务状况的权利。有限公司与股份公司相比的特点是:(1)有限公司相当于股东大会的是公司成员大会,而且董事也是选出来的,所以资本与经营分离的原则大体上有所体现,但由于允许从公司成员中选任董事,故资本与经营的分离又是不完全的。(2)法律上对有限公司成员大会没有作出仅限于表决公司章程所规定内容的规定,故公司成员大会与董事之间的权限较为模糊。(3)法律上未规定有董事会之类的全体会议,董事也可为一。董事的任期没有特别规定。(4)有限公司人数不超过50人,故资本额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5)有限公司禁止向现公司成员以外人员转让所持份额。(6)有限公司决算内容可以不公开。

由上可见,日美企业产权组织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日本特有的两合公司及有限公司

上,但其共同的地方则在于股份公司都成为企业产权组织的主要形式,股份公司占公司数量大多数,其中上市公司的资产更是占全部企业资产的绝大比例。因而有必要从股份公司来剖析日美现代企业制度的差异。

二、美日股份公司的异同及发展变化

1 股权结构差异

美国股份公司的股权结构具有下述特点:(1)企业的股东很多,除极少数公司外,股份公司的股权极为分散。持有1%的股份,即有机会成为大股东。控制公司有5种形式:所有权控制;持有多数股票控制;依靠少数股票控制;借强大财力,在占有微量股票的情况下进行控制;管理人员控制。近十年来,后两种控制发展很快。(2)个人股东人数占主要优势。1990年美国股份公司个人持股率为56%。法人机构如退休基金、投资基金等投资者位列第二位。近年来,美国个人股东所占的优势有所下降,但随着“基金公司”的兴起,间接持股人数相应猛增。(3)一般股东只关心股票的增值。很多股东不参预公司的日常管理工作,其持股的目的在于取得短期的收益。(4)机构股东中以投资基金为主。投资基金考虑的首要目标是获取最大收益与降低风险,故对是否同公司保持稳定的伙伴关系不太关心,导致对公司长期经营目标关注不够,影响了股份公司的长期发展。

与美国相比,日本股份公司股权结构的特点是:(1)持股法人化,即企业的大部分股票为法人企业持有。目前法人的持股率高达70%以上。而个人股东则占不到30%,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持股率为0.2%左右。(2)持股中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机构占有特别突出。1949年-1990年,日本金融机构的持股率由9.9%上升到45.2%,如日本三菱银行在三菱集团的几乎所有企业中成为最大股东。这一点与美国不同,美国法律上规定商业银行不能持有上市公司的股票,以防止银行业的垄断,导致经济上的波动。(3)作为企业集团领导机构的经理起着核心作用。(4)法人相互持股,综合商社所处的地位不断提高。日本的银行、企业、商社相互持股率高,有的甚至已达到实际上并未出多少资便可相互成为大股东的程度。一旦企业

不景气,各法人股东不仅不会散伙,反而会彼此协调互相通信息,争取共渡难关,成为“稳定股”。股份公司法人持股的相互关系及综合商社地位的提高决定了日本股份公司的产权结构相对稳定。

不同的股权结构决定不同的管理目标、决策结构和管理结构。

2、管理目标差异

日本的法人相互持股使公司之间形成了稳定的交易关系和产权纽带。日本企业谋求长远的目标。首先,重视企业的长远利益。其突出表现是,进行决策时注重提高公司在社会上的影响。对于那些在短期内收效不大,但从长远看能扩大企业的影响,并且一定能够盈利的事业,企业都抱着积极的态度。其次,企业目标的重点以扩大事业量为重点。日本企业把扩大市场占有率放在第一位,通过提高市场占有率谋求事业长远发展。而美国公司则注意股东资本利润率和股东分红率。以提高投资收益率和股票价格为重点经营目标。

3、决策结构差异

董事会作为企业的最高决策机构,美日公司皆同。但董事的来源构成不同,决定了决策结构与职能有差别。美国公司企业外董事占相当大比重。董事会发挥最高战略决策职能,而下设的各种委员会及各职能部门,在总经理领导下,发挥着执行战略决策机构的职能。而日本是以企业内董事为主体的战略决策。日本企业的制定决策和执行决策的职能是一致的,一般都由经营会议代表董事会制定战略决策,并且这些组织作为总经理的辅助机构起最高执行决策机构的职能,董事会的成员既是决策的制定者,又是决策的执行人。这种由决策机构同时担负制定决策与执行决策两种职能,是日本企业决策机构的明显特点。据统计,决策权与执行权相统一的公司占日本股份公司的 92.8%。

4、管理结构差异

美国公司特别重视主要负责人即总裁的人选。并赋予总裁很大的权力和很高的报酬,企业的收益分配权、重大投资决策权等过去由大股东直接掌握的现已为经理阶层掌握了。而总裁选择失误,董事会也要承担责任。美国商用电脑公司曾因用错人,1/3

董事自动辞职。而日本公司管理则注重集团经营。体现家族主义经营思想。日本公司经营的最大特点是集体决策,共同负责。

在企业内部管理方面,美国企业属于刚性组织,从本世纪初到 50 年代,采用垂直式(等级制)组织结构,后来发展为矩阵式的组织结构。80 年代末出现了内部市场制。即企业内部各单位,打破条块界限,与其他部门直接进行斜向联系的组织形式;同时,引入市场机制,各部门之间各自相对独立,单独核算,经营亏损,也实行破产。日本的企业则无论在管理体制上,还是在机构的设置上都具有较大灵活性。组织机构比较简单,作业和管理部门的分工比较灵活,许多企业可以根据生产和经营需要及时地扩充和收缩某些业务部门。日本这种柔性管理是在 60 年代以后的推行项目组形式的热潮中迅速发展起来并于 70 年代后得以广泛推广。

比较上述两国股份公司特点,可有结论如下:(1) 个人股东均难以影响公司决策。也没有影响决策的强烈动机。(2) 法人持股比例高则决定产业结构相对稳定,对公司实现长期目标有利。(3) 相对于日本,美国公司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分离程度更高,这是由于股权分散化所导致的。

三、政府与企业的联系

美日政府对企业的管理具有下列内容:

1. 主要通过运用财政金融政策促进企业发展。但具体操作不同,在日本,负责财政政策的是日本政府,而金融政策的制定者则是日本银行,在执行过程中两者是密切配合的,但美国则由政府机构分别制定政策,对企业的影响常受其它因素的影响。在利率政策上,美国则把再贴现率作为调节经济周期的手段。日本总的倾向是实行低利率政策,以保证企业获得足够的发展资金。

2. 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手段不同。利用产业政策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重要手段是日本特有的做法。政府对有发展前途的行业或企业给以援助和扶植,对需要缩小的行业采取抑制的措施。通过不断明确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诱导广大企业向有广阔前途的行业转变。而美国对企业的干预,则主要是在反托拉斯,涉及国家安全的出口控制,自然

垄断行业的价格,以及强制性的公民保健保险,劳动安全保险等方面。

3 美日都通过大量立法管理企业。日美都是重视通过法律来监督管理企业。但具体执行有区别。日本的做法值得注意有:(1)注意立法的连续性和灵活性,每项立法都有明确的时效性,法律措施执行期满,行将失效之前都及时颁布新法律;(2)注意其它经济手段的配合,不少立法都与“补助金制度”,优惠贷款以及特别折旧制度直接挂钩,企业乐于接受。美国则在实际执行中做到:(1)以法律禁止为原则,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被认为是合法的,政府不得干预。(2)政府一般都采取事后监督方式,却以事后追究制代替事先审批制。

4 利用中间组织如行业协会来沟通企业与政府的联系。美国的行业协会往往在行业管理和技术管理方面发挥着主要的影响,政府只起最后仲裁的作用。日本则通过这些组织向企业贯彻政府的政策和意图,并通过这些组织的影响和广泛的活动,从不同角度帮助企业发展。

5 适当采取行政手段。行政指导也是资本主义国家实施经济计划、协调企业与政府的关系的一种手段。主要是政府通过提出命令、建议、劝告和进行说服等方式,使企业接受政府某种意图并付诸实施。但美日行政手段作用的主要对象有所区别。美国行政手段的使用对象主要是对国有企业的管理,美国部分国有企业由有关的部、处以及根据美国国会的各种决议而设立的专门常设委员会来管辖。政府可通过各部的行政“指令”确定企业的投资指标,有权任命国营企业的领导人、确定国营企业工资发放水平、实行财务监护。以便确保国家对企业的利润分配以及亏损等方面的决定权。日本政府指导主要是由各主管经济的省、厅根据政府的意图对企业和个人提出建议,内容主要是调整重要部门的投资比例。所以日本政府的行政领导的对象范围要广得多。

四、企业制度的社会人文环境

企业制度的人文环境可视之为企业制度的“软件”,值得引起重视,它包括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

1. 企业制度的内部人文环境

过去,一般认为企业生产的唯一目标是利润,企业主要保护投资人的利益,把社会成员的利益放在次要地位。这种观点已经过时,日美公司新的做法是:(1)注重职工的利益,关心本企业员工的个人问题。如美国广泛开展的职工持股运动,日本则通过终身雇佣制把从业人员和雇主的利益拴在一起,使从业人员对企业产生“忠诚心”,从业人员的工资取决于工龄的长短和企业经营的好坏,使企业职工能长期安心工作。(2)改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创造和谐的工作环境。如美国麦当劳公司总部大楼,员工能经常见到公司领导,上下称呼姓名而不用称呼职务。日本企业则倡议大房间集体办公,有利于缩短上下级的距离,提高工作效率。(3)通过非正式组织活动密切企业人员之间的关系。如日本企业内部广泛存在有“亲睦会”、“同友会”、“俱乐部”。包括总经理在内的各级经营管理人员都积极参加非正式的组织活动,一方面在企业内创造一种和谐、愉快、舒适的气氛,激发职工的工作热情和劳动积极性,另方面加强企业内部各类信息的沟通与交流,创造出一种超出每个人力量之和的“群体力量。”

2 企业制度的外部人文环境

企业必须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处理好企业同地方社区团体、消费者团体、环境团体及政府的关系是现代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必要。目前影响日美企业发展的外部社会条件主要有三个。一是消费者和环境保护团体对企业施加保护环境压力。即企业必须主动治理污染,保护生态平衡。通过治理生态环境来处理好与当地居民和有关团体的关系。二是政府有关政策的变化。美国企业尤其是一些大公司非常重视参与国会的立法活动,派出代表积极施加影响。立法一旦通过,企业则必须依法经营。另外,企业为了获取更高的利润率,必须树立自己公司的良好社会形象,承担一些社会责任,兴办社会事业。但一般不存在各种各样的摊派。其各种赞助都是在结合自身生产经营的条件下进行的。

五、总结与启示

1 从企业制度的产权组织形式看,股份制是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方向的现代

企业制度的最基本形式。但股份公司形式多样,日美等国上市公司的资产所占比例较大,但公司数所占比例不大。因此,我国应严格掌握上市公司的标准,推荐大型企业、基础产业、效益优良的企业上市,中小公司可采取其它公司形式,总之,应允许试验,重点选择。

2 从企业制度的产权组织结构看,我国应选择法人相互持股;以法人股权、投资基金股权和个人股权相结合的较为稳定的股权结构为主。当代企业制度的发展和演变表明,股权结构对企业的产权效率具有相当大的影响。美国股权分散化导致固定资产投资率和技术投入下降的经营短期化行为值得注意。据日本《东洋经济统计月报》等统计,80年代后期,美国企业对股东的分红率为54%,日本则为30%。但高分红率导致企业储蓄率下降。美国企业设备投资率均为19%,日本则为25%以上。1989年日本民间企业等对科技投入的经费占当年国家全部科研经费近83%,而美国则为54%,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和成长需要较高的投资储蓄率,选择合理的股权结构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

3 从企业制度的产权效率看,提高组织效率的核心是处理好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关系。美日两国股份公司发展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分工的深入,所有权对经营权的分离是必然的。但是,并非两权分离越彻底越好,美国股权的分散化,大量个人股东弱化了所有权对企业的控制。故建立高效的产权效率既要通过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确立经理阶层的决策地位,也要通过所有权对经营权的控制保证股东和企业的长期利益。当两权关系纠缠不清,相互抵触并严重削弱企业进行决策的效率和权威时,两权应分,而当两权关系明晰,相互之间有约束力,且企业又需要较强的决策时,两权应有一定程度的合。美国近年来出现的投资基金间接经营模式值得借鉴。投资基金是两权“双层

分离”模式,第一分离是公司内的分离,即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表现为股东与经理职能的分离。第二层分离是公司外分离,即公司持股股中的“两权分离”。由加强股东所有权而形成的投资基金成为公司的大股东,但它作为有效率的产权其内部也出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投资基金经理掌握了基金经营权,另方面代表基金股东行使对股份公司的所有权,这种“双层分离”是在不降低经营效率下加强控制的一种较好选择,可作为我国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模式之一。

4 从现代企业制度运作的社会条件看,现代企业制度的完善,要求企业和政府更紧密结合起来。(1)现代企业制度的完善不能完全脱离政府的干预,政府与企业的相互协调和促进,是现代企业发展的重要条件。(2)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既必须如美国那样建立政府与企业的稳定的契约关系,也必须有日本政府和企业的诱导、扶植与保护的关系。(3)政府应改进对企业运作的调控。经济手段、行政手段的管理和调控都必须依法进行,经济立法必须有时效性,并建立事后督查制度。

5 移植现代企业制度须注意企业制度的人文社会环境。不能简单认为,企业制度只是股权改造的问题。譬如,我国与西方股份公司截然不同的是要处理好公司内党、工等组织与公司管理机构的关系及各自所处的位置。其次,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股份制改造必须保证劳动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主人翁地位,因而,建立职工持股计划应成为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内容之一,就目前来说,可以考虑将由企业福利基金和奖励基金形成的资产和部分企业积累形成的资产中划出部分股份,以配送的方式转让给企业职工,形成企业内部职工股。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经济系
责任编辑:郑英隆

对“科斯定理”的三点质疑

□吕中楼

一、“科斯定理”能避免同义反复吗？

对科斯定理，现有三种表述是比较公认的。第一种表述是：只要允许自由交换，不管产权最初是怎样界定的，最终都能使社会总产值达到最大化，即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这种表述可概括为自由交换论。第二种表述是：如果交易费用为零，不管产权最初怎样界定，自由交易的结果，会使社会总产值达到最大化。这种表述可概括为交易费用论。很显然，第二种表述的条件比第一种表述的条件要强得多，因为自愿交易并不见得没有交易费用。由于交易费用论的条件比自由交换论的条件强，交易费用论的适用范围就比自由交换论的范围要小。为什么要在自由交换论之外还要提出交易费用论呢？因为有反例证明自由交换论不能成立。例如在存在交易费用的情况下，交权界定清晰后，自由交换并不能保证实现社会总产值最大化，因为交易费用甚至使交易无法进行，尽管存在着帕累托改进的可能性。后来人们发现，即使交易费用为零，也不能保证产权界定清晰后就可实现社会产值最大化。例如，在存在小数目问题的情况下，即谈判一方人数很少，而另一方人数很多的情况下，即使交易费用为零，谈判双方的地位不对等，也会造成谈判的失败。人数少的一方会利用他们的垄断优势来争取更多的利益。针对这种情况，他们提出了科斯定理的第三种表述，即科斯定理完全竞争论表述。意思是说，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产权的初始界定，与资源配置效率无关。显然完全竞争论的假设比前两种表述的条件都要强。

这三种表述，每一种表述都要比前一种

表述的条件更强。第一种表述说，只要允许自由交易，就能实现社会总产值最大化。但事实上，仅有自由交换这一条件并不能保证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状态。当存在交易费用时，自由交换论不能成立。为了排除交易费用对改进资源配置状态的障碍，有人提出了交易费用论的科斯定理，但是，当存在小数目问题时，交易费用论的结论并不能成立。为了排除小数目问题，有人提出了完全竞争论的科斯定理。显然，完全竞争论的假设条件最强。但是一个定理的条件越强，它的适用范围就越小。完全竞争论比自由交换论的科斯定理更接近于成立，但它的适用范围却是很小的。完全竞争论实际上是一种同义反复。因为新古典理论已经证明，完全竞争状态和帕累托状态是等价的，完全竞争状态同时也就是帕累托状态。完全竞争论的科斯定理说，在完全竞争状态下，不论产权如何界定，都能达到帕累托状态。这其实是同义反复，假设条件就是结论，是不需要证明的。由此看来，这三种科斯定理要么是不能成立，要么是同义反复。

新制度经济学当然不承认科斯定理是同义反复。他们不接受科斯定理的完全竞争论解释。他们通常采用的是交易费用论的科斯定理。如上指出的，存在小数目问题时，交易费用论解释不能成立。事实上，即使小数目问题不存在，交易费用论的解释也是不成立的。就是说科斯定理除了交易费用为零的假定外还有别的隐含假设。（1）自愿交易的互惠性；（2）完全的信息，包括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等方面的信息；（3）不存在小数目问题；（4）法院裁决无成本；（5）没有财

富效应；(6)不存在策略性行为；(7)经济人范式：生产者追求并实现着利润最大化，消费者追求并实现着效用最大化。

这七个隐含假设的任何一个对科斯定理都是必要的。比如，无财富效应假设。如果有“财富效应”(wealth effects)，则消费者财富的增减将影响他在特定价格下购买某一商品的意愿，从而财产权的初始分配将通过“财富效应”影响最终资源配置结果。因此，在考虑到财富的效应后，“科斯定理”应陈述为：“如果交易费用为零，并且无财富效应，则关于外部性问题的私下交易谈判结果，与产权的初始分配无关，而只由效率因素决定”。

同样，如果考虑策略性行为，“科斯定理”就应陈述为：“如果交易费用为零，并且无策略性行为，则关于外部性问题的私下交易谈判结果，与产权的初始分配无关，而只由效率因素决定”。如果再考虑其他的隐含假设，就必须对科斯定理再作类似的修正。

由此看来，只有将一切对达成有效协议的障碍都排除掉，才能保证科斯定理成立，但这样做的时候，就又使科斯定理成了同义反复。科斯定理要想站得住脚，就必须表述为“如果没有对达成效率的协议的任何障碍的话，人们总能私下达成解决外部性的最有效的协议。”这显然是同义反复。科斯及其追随者，有的把“交易费”定义得包罗万象，从而使“科斯定理”变成“同义反复”，有的强调“科斯定理”可以成为对现实的合理近似。后者的结论能成立吗？

二、“科斯定理”可以成为对现实的合理近似吗？

“科斯定理”要想超越“同义反复”，就必须证明交易成本虽不为零，但可以忽略不计。“科斯定理的关键前提是达成和执行一个有效率协议的成本很低。”但是，这个关键前提在大多数情况下与事实不符。

确实，在有些情况下，达成和执行协议的成本是低的，使得“科斯定理”可以成为对现实的合理近似。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达成和执行协议成本极高。如果抽烟不

被允许，抽烟者如何被“补偿”？是叫得越响的抽烟者被补偿得越多吗？如果非抽烟者也假称吸烟以便得到补偿怎么办？谁来补偿抽烟者，航空公司还是非吸烟乘客？等等。显然，法律此时规定不许在飞机上抽烟就比私下交易谈判更有效率。另一个例子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用水问题。加州85%的水用于农业，但农业生产只占加州总产值的5%。许多人认为将水用于其他工业或居住用途将有效很多，但法律、政治障碍重重。这也正说明现实生活中交易费用之高，使得科斯定理如隔靴抓痒。经济学的一些最新进展，也证明了交易费用较高是多数情况：(1)比奇洛证明，当有两种以上的外在性同时存在时，自由交换很少能达成有效协议；(2)不完全信息的对策论证明，当谈判双方信息不对称时，自由交换的结果通常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3)合作对策论证明，当谈判多于三方时，即使在完全信息下，也常常出现“空核心”(empty core)角，即自由交换的结果不是有效的。这三个理论中的三个条件，即有两种以上的外在性同时存在、当谈判双方信息不对称、当谈判多于三方，在现实中是经常遇到的。现实中的交易不是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就是满足其中的一个或两个。因此“科斯定理”不能被视为对现实的合理近似。

三、科斯产权理论是新发现吗？

1. 科斯产权理论的实质

科斯定理企图证明在零交易费用条件下，市场机制能实现帕累托状态。而帕累托状态本来就是在无交易摩擦的假设下通过市场机制达到的，因此，科斯定理不过是同义反复，没有增加任何信息量。科斯当然知道零交易费用的假定是不现实的，因此又提出了被他的追随者称为科斯第二定理的思想，即正交易费用情况下，产权初始界定影响最终的资源配置。很明显，这里的最终配置就是帕累托效率。由此可以看出，帕累托效率始终是科斯心目中的效率标准。科斯定理是科斯心目中的理想境界。当科斯不得不面对现实时，他提出了“科斯第二定理”的思想，以后他的工作就是寻找缩小理想与现

实的差距的办法,即寻求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结构。虽然他认为在能降低交易费用的情况下,可用企业和政府代替市场交易,但只把它作为一种不得已的次优选择。他在《联邦通讯委员会》中说到:“如果市场运行费用大大超过行政机构的运行费用,我们可能会默认行政机构由于无知、缺乏弹性以及迫于政治压力产生的资源分配的失误。”可见,帕累托状态是科斯的理想,而靠市场机制达到这一状态是他的信念。科斯定理的主旨,就是不管权利属于谁,只要清楚地界定是私有,市场的运作能力就会应运而起,权利的买卖者互定合约,使资源的使用达到最高的生产总值,科斯是会同意这一概括的,因为他在《〈社会成本问题〉的注释》一文中写到:“权利的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基本前提,但最终结果(产值最大化)与法律判决无关,”“这就是科斯定理的实质”。

2. 科斯产权理论是新发现吗?

如上分析,“科斯定理”只有在同义反复的意义上才能是正确的。科斯及其追随者,有时(或有些人)极力为“科斯定理”辩护,提出“科斯定理”的不同表述形式;在另一些时候(或另一些人)又说,“科斯定理”只不过是“科斯第二定理”的铺垫。“科斯第二定理”表明存在着限制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的种种障碍,表明了市场并不总能纠正资源配置失当。在我看来,“科斯第二定理”自然是正确的。确实,财产权和法律等制度安排对资源配置有重要影响,但这一“正确性”很难被认为是新发现。事实上,“科斯第二定理”所要强调的无非是说制度(产权界定实际上是一种制度安排)是重要的,但是强调制度重要性并不是科斯的发明。亚当·斯密的理论就特别强调制度的重要性,“国富论”的目的就是在倡导一种制度,斯密认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是最有效率,最能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科斯的理论无非是想在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破产后,重新来证明它。科斯的批判对象庇古(pigou),早有同样的看法。我们更不用说,马克思早已发现生产关系和其它制度安排对最终资源

配置结果有重大影响,并已对此作过全面而深刻的论述。马克思主义强调制度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者把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最终走向共产主义制度作为他们的奋斗目标。为什么要变制度呢?因为制度是最重要的,不同的制度对人和阶级的行为有不同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者和科斯们都强调制度,都希望变革制度,不过,他们的方向是不同的。

严格说来,科斯第二定理是“科斯定理”的反定理。科斯第二定理已经包含在“科斯定理”之中了。我们知道,每一个定理都有正定理和反定理,正定理和反定理实际上是等价的,科斯第二定理说,在交易费用不为零的情况下,产权的初始界定是重要的,第一定理说,如果交易费用为零,产权初始界定不重要,这两个定理实际上讲的是同一个意思。

那么,为何这种同义反复的,并非新发现的“科斯产权理论”在国际和国内影响这么大呢?我认为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学术问题,答案要到当前国际和国内复杂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以及意识形态斗争中去寻找。

参考文献

- [1] Coase, Ronald H. "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59. 2 (October), pp. 1-40
- [2] Coase, Ronald. "the Nature of the Firm: origin, Meaning and Influence",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1988 Vol 4, No. 1.
- [3] Coase, Ronald "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Produc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2 Vol. 82, No. 4.
- [4] 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
- [5] Coase, "Coase Theorem", *The New Palgrave: 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The Macmillan Press, 1987 vol. 1. pp. 457-9.
- [6] Deserpa, Allan, "Pigou and Coase in Retrospect", *Cambridge Journal*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
责任编辑:郑英隆

对我国股市供给扩容问题的思考

□ 苏 铭

我国股市经历了长达 16 个月的低迷、徘徊之后,期间因 1994 年 8 月初以中国证监会三大利好政策的发布引发“牛气冲天”的反弹,然而,好景不长,仅不足两月,再返低迷。人们不禁要问:我国国有企业及非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股市能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稳步健康地发展?正在实施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及全面铺开工作能否按设想的初衷继续下去?答案应当是肯定的。从我国股市短短几年的历史情况来看,要保证我国股市的健康发展,除了要尽快制定和完善我国企业股份制改造及股市的发展战略和与其配套的法规外,对我国历时三年多的股市供给扩容问题,亦有必要进行反思,从而探索出一条有利于我国股份制经济发展的股市供给扩容路子来。

一、历史的教训值得吸取

我国股市的发展的三年多中,有过辉煌的发展历程,也经历了极度低迷的困境时期。从 1993 年 4 月上旬起,至 1994 年 7 月底止,股市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在整个股市的历史发展长河中,这虽只是一个非常短暂的瞬间,但对于仅有三年多发展历史的我国股市却是一段比较漫长的时期。人们不会忘记,到 1994 年 7 月底,我国股市已经到了极度低迷的状况,上海证券交易所指数低到 333 点,深圳证券交易所指数只有 96 点。股市如此低迷,不仅与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而且也无法反映上市公司的客观现实。当时相当一部分股票市价已跌到了净资产以下,一些基金的市价跌破了发行价和面值,有的股票的市盈率至 5 倍左

右。

诚然,导致我国股市低迷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应当指出:股市的供给扩容过快,市场股票发行太多,而相应的资金供给又跟不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据有关部门统计,1993 年 8 月以后,股票供给扩容月递增为 7%,而投入的资金月递增只有 3% 左右。形成了股票市场供求的严重失衡。

二、股市扩容应遵循的原则

应当看到,我国股市还处在起步阶段,近几年虽发展迅速,但股市的规模还是比较小,1993 年我国股市市值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13%。而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均达到或超过国民生产总值。如美国 1984 年的股票市值就为国民生产总值的 145%;1988 年韩国为 171%、新加坡为 130%、香港为 130%、台湾为 118%。因此,我国还需要不断扩充股市规模。但在一定时期扩充到什么程度合适?怎样扩充?这的确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本文认为,我国股市扩容应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股市规模扩容应切实考虑市场的承受能力。股市供给扩容不能只强调供求平衡的问题,而且还应考虑到为股市留有一定的余地,要给股市以一定的上升空间。现在,有人认为我国城乡居民现有银行存款数目巨大,股市规模多扩一点并不可怕。须知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均存款只有 1000 多元,如果扣除数亿农民的存款和用于养老、买房、婚嫁、上学等方面的存款;再扣除投资于国债、企业债券等方面的资金,能投入股市的资金并不甚多,所以,在供给扩容时,对市场的购买力不能估计过高。

第二,采取“双向”扩容,既要考虑股票的供给扩容,也要考虑入市资金的扩容。如果只考虑股票供给,而不考虑资金供给,只会导致股票供过于求,使股市疲软。目前需要继续研究解决的是如何扩大资金供给的问题。在扩大资金供给方面,应着重考虑以下几方面:一是应鼓励机构入市。从世界各国股市发展情况看,初期支持股市、参加股市交易的主要是广大散户,继之是少数大户。在成熟时,机构投资者逐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日本证券市场,1951年个人持股比例高达61.3%;到了1990年个人持股只占22.6%,而机构持股的比例占73%。英国股市在1963年个人持股比例为58.7%,到了1989年个人持股比例下降为18%,机构持股比例达80%以上。所谓机构投资者,包括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各种基金组织、工商企业等。特别需要发展投资基金。积极发展投资基金,不仅可以增加资金投入,改变当前股市资金不足的问题,而且可以加快我国股市成熟的进程。二是应大胆利用外资,适时允许外国和境外投资者参加我国A股市场交易。这不仅有利于解决我国股市资金不足的问题,还可以促进我国证券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当然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可以选择几家国外运作规范、信誉好的基金进来试办;也可以与外国基金合办建立中国基金,这样既便于管理,也便于解决外汇与人民币的兑换问题。

第三,股市扩容规模的计算应是广义的,既应包括发行上市的各种新股,也应包括上市公司的各种配股、送股、内部职工股转为公众股;国家股、法人股的上市部分,也应计算在股市供给扩容规模之列。

第四,股市供给扩容应稳妥而有计划地进行,应避免一下扩得过猛。特别是扩容要与全国的经济、金融形势相适应。

三、对上市公司的送、配股应严格控制

据中国证券业协会在截至1994年6月下旬,对我国已公布分红方案的186家上市公司的统计,1994年通过送配股方式新增的股本就达77亿元之多。其中新增社会公众股23亿元,以配股方式明确的个人资金达19.2亿元。如果说在中国股市刚刚兴起的最初两年,上市公司送配股在稳定股市、调整需求、平抑股价等方面还能起着重要的作用的话,那么在股市已扩容到一定规模的今天,送配股,特别是大比例、高溢价的配股,其消极作用却是与日俱增。已成为中国股市的一大隐患。上市公司的高送配股不但对股市供给的高速度扩容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也不利于企业之间公平竞争。

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的根本目的是促进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上市公司把增资配股作为主要集资手段,无疑是成本低、风险小、见效快、净资产增值高,而一些非上市公司的资金来源都主要依靠银行贷款或发行债券,利率高、风险大、净资产增值慢,这就造成了两者之间的不公平竞争。同时源源不断的配股资金有可能使某些上市公司淡化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意识,达不到股份制改造的根本目的。同时,还需要指出,大比例、高溢价的配股行为是一种自私的集团利益的做法。这种做法,将可能导致资金流向过于集中于某些企业,造成一、二级市场资金紧张和其它企业筹集资金困难等,给股市的发展埋下隐患。

综上所述,我国股市的供给扩容不仅要考虑市场的承受能力,同时还要考虑“双向”扩容的问题,即入市资金要与上市股票的市值有一个适当的比例。另外,也应科学地确定上市股票的规模及量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股市供给扩容逐步进入科学化、规范化的轨道。

作者单位:清远市纺织工业总公司

责任编辑:石 成

文化力： 经济发展的内驱力

□ 贾春峰

一是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来说。

国际经济学界不少论著认为，现代市场经济走向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经济与文化的“一体化”发展，这就是说，现代商品中的文化含量、文化附加值越来越高。文化产业异军突起，文化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日趋显著。在现代商品生产中，降低资源、能源、财力的有形投入即“硬投入”，提高文化、科技的无形投入即“软投入”，已经成为现代企业富有竞争力发展和整个社会经济增长所追求的目标。从这个发展走势所引出的结论，是必须高度重视智力因素、人才培养和教育发展，高度重视科技实力和“文化力”的增长。

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趋势，就是在经济格局中，人为相对优势将取代传统的经济发展优势。绿色革命与材料科学革命的兴起已经降低了经济发展过程中自然资源的重要性。拥有自然资源未必能致富，自然资源贫乏未必是致富的障碍。日本既无铁又无煤却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钢铁工业。一场电信——电脑——运输——后勤保障体系的革命使全球资源网得以形成，而且还可以发展为一个世界性的资本市场。这就是说，电脑和电信手段使拥有资本积累不再是优势，今后只有掌握技术和拥有人才才是真正的优势。微电子、生物科技、新材料工业、民用航空、电信、机器人加机床以及电脑加软件是未来几十年的七项关键产业，它们都可以说是脑力产业。这些产业可以设在地球的任何一处。谁能有效地组织调动人的智力从事上述产业的发展，这些产业就在谁那儿落脚。既然科技创造了人为

相对优势，那么，争取人为相对优势就必须要求企业从上到下，每一个层次的职工都具备技能。职工的技能将是 21 世纪关键性的竞争装器。人的智能创造新技术，而技术劳工则是手足，有了他们，创造出来的新产品和新加工技术才能为人所用——以低成本掌握和运用新产品和新加工技术。下一个世纪，自然资源、资金与新产品技术将会在全世界迅速流动。人也流动，但相比之下要慢得多。有技能的人才是唯一持久的竞争优势。这个观点，在不久前出版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的《21 世纪的角逐》（此书副题为“对撞：正在到来的日本、欧洲、美国经济战”）一书中作了集中阐发，是值得重视和研究的。从对这个发展走向的分析中引出的结论，同样是必须高度重视智力因素、人才培养和教育发展，高度重视科技实力和“文化力”的增长。

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重要趋势，就是对员工整体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在国际经济学界，不少人士从市场经济的开拓和市场竞争中特别强调这个问题，是从以下事实出发来进行分析的。

在历史上，无论个人、企业还是国家，若要致富，一是要拥有比竞争对手更多的自然资源；二是要天生富有，获得人均占有资本（包括工厂与设备）高于别人的优势；三是要使用更高超的技术；四是要拥有更多的技术工人。具备上述四个条件，加上合理的管理，成功便有了保障。然而新技术和新体制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四大竞争优势的传统来源。自然资源实际上不再是竞争的要素。天生富有的优势也远不如过去那么重

要。技术本身调了个儿,新加工技术变得更为重要了。过去经济上的成功者往往是新产品的发明人。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都是靠发明创造致富的。但是21世纪持久不衰的竞争优势主要来自于新的加工技术。从已经进入大众消费市场的三种主要新产品,即磁带摄影机和录相机、图文传真机以及激光唱片机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明白这种变化的性质。美国发明了前两种,欧洲人(荷兰人)发明了后一种,但是,若看销售额、就业人数和利润三个方面,上述三种重要产品都变成了日本的产品。这说明,谁能降低产品的成本,谁就能从发明者手中夺走产品。在今天的世界上,新产品的发明者若不能同时又是成本最低的产品制造者,发明的收益就微乎其微。而要成为成本最低的制造者,职工的整体素质就很重要。而提高素质,就要有教育发展和在职培训的配合。从这个发展趋势中引出的结论,是企业要在市场竞争中取胜,就必须高度重视“文化力”的开发,重视职工培训工作,大力提高职工整体素质。

我们知道,美国在经济发展中,就是靠争夺国际人才得到甜头的。新华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一本《面对世界的人才之争》的书,作者徐仲人等介绍了世界各国有关人才竞争的情况,很值得一读。拿美国来说,争夺搜罗国际人才,遍及180多个国家和地区,数量逾百万。这是其他国家都比不了的,在世界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的。据美国自己公布的统计数字。从1949年至1973年,共吸收外国高科技人才22万人,加入了美国籍。其中,有16万名科学家和工程师,6万名医士。世界权威的诺贝尔科学奖。美国科学家已占获奖者的一半,而其中相当多数是美籍外国人。如,伟大的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就是美籍德国犹太人;被称为“氢弹之父”的恩里科·费米,原为意大利人,后加入美国国籍;再如,杨振宁、李政道和丁肇中,都是美籍华人科学家,分别获1957年和1976年的诺贝尔物理奖,李政道得奖时年仅31岁,是世界上最年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之一。所以,美国人说:移民科学家“永远给美国科学超级精英增添光彩”。据统计,在硅谷、休斯敦航天中心等科技人才密集的地方,外国科技人员已占一半以上。美国许多重点科研机构、大公司研究中心的科

技带头人,许多重点大学的系主任,百分之七十是美籍外国人担任。

另外从国际营销和跨国经营来看,文化的沟通或文化的障碍,也成为引起人们不得不重视的问题。有一种观点在分析现在国际、国内企业为什么越来越热衷于海外投资或跨国经营时,就认为国际营销企业从出口营销转向海外投资的深层原因,就是海外投资比出口能更好地克服国际文化障碍。因为文化差异有时是出口营销最大的障碍之一。而在海外直接投资和经营,可以大大密切企业与当地文化的交流,切实地了解当地的消费文化和获取市场反馈信息,使自己的产品在品种、款式、外观、包装、服务、广告和推销上适合当地的生活方式、习惯和特殊需要。而在国际营销中,文化因素常常是管理上的一个难题。我国现在“三资”企业日益增多的劳资纠纷和雇员流失中,不少就是源于文化价值取向上的冲突。因此在发展“三资”企业、引进外资时,光讲国际惯例不讲文化适应性,是观念上的一个误区。(参见《文汇报》1993 10 14)

最近,我看到国内一位学者关于《文化管理与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的研究,提出了这样的见解:全球经营战略的实施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但在实践中,由于实施能力与战略目标的矛盾,往往导致跨国公司全球战略陷入困境。这突出表现在面对多元的、不确定的国际文化环境,跨国公司由于文化摩擦从而导致市场机会的损失以及与全球战略相应的矩阵结构的低效率上。由于文化摩擦造成的全球战略实施障碍却往往被上层管理者所忽视,同时也不是单靠产品多样化、组织结构复杂化等策略所能克服。因此加强跨国的文化管理对当今跨国公司全球经营战略的实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份研究资料还说,跨国公司面对的是多元的、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而国际经济环境与国际文化环境是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消费方式,满足需要与欲望的顺序以及工作价值观和努力程度都是以他们所在国家的文化背景为基础的。文化作为人类知识、信仰、伦理、法律、风俗习惯等等的总和,时刻都在影响着人们生活、工作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总和。而文化又是随时间、地点变化而变化的,在国际文化环境不同地区的人存在着不同的文化,从而存在着形形色色

的文化差异。这个分析,捕捉到了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新征兆,显示出一种催人思考的洞察力。从这个事实中所引出的结论,是必须在商贸活动中高度重视文化的作用,并且随着国际市场经济不断涌现新势头来不断发展我们的企业文化。

正是为了防止营销中的文化障碍,实现文化沟通,现在国外企业界正在搞“跨文化培训”计划。因为经济发展全球化,企业经营跨国化,已是当今企业发展的潮流。在这个潮流中,美国企业最先兴起了“跨文化培训”的热潮。他们认为,对国外文化的不了解会使派出人员因观念不同与当地人发生冲突,因而不能实现企业的营销计划。因此,进行“跨文化培训”就成为企业不可缺少的事情。在美国,“跨文化培训”的内容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学习国外营销地的语言,熟悉他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了解他们的历史、宗教、文化、政治等基本情况。二是理解营销地民族所特有的价值观,并且要了解这种价值观所源于的悠久历史文化。“跨文化培训”要求每个受训者懂得:要学会用当地人的是非标准、行为准则来考虑和处理问题。现在,美国的一些大学也开始参与这种“跨文化培训”。又如韩国的三星公司也不惜代价,派出几百人到国外学习东道国的文化、传统、习俗。日本还开办了企业家大学进行跨文化培训。其中,日本松下电器株式会社,就是一个号称制造人、制造优秀人才的工厂。该厂经常选送员工到国外学习。

二是从国际范围内几种市场经济模式的比较来说。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几种主要模式——英美式市场经济、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和日本式市场经济的比较研究,已成为国际经济理论界的热门话题。在这几种模式的比较研究中,大都提出了不同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问题。如有的学者称美国 and 英国的市场经济为“个人资本主义”的模式,日本和德国的市场经济为“社团资本主义”。他们认为,个人资本主义与社团资本主义之间的竞争正在开始。个人资本主义同社团资本主义的基本区别,是在争取经济成就过程中,前者强调个人价值,后者强调社团价值。美国 and 英国鼓吹个人价值:杰出企业家,诺贝尔奖得主,巨额工资差别,掌握技能的个人责任,轻易解雇和辞职,利润极大化,敌

对的兼并和吞并。相反,德国和日本鼓吹社团价值:商业集团,掌握技能的社会责任,协调配合,企业忠诚,产业战略,产业政策。英美企业是极限利润的追求者,日本企业是“战略征服”的追求者。美国人信奉“消费者经济学”,日本人信奉“生产者经济学”。这些分析,是把不同市场经济模式中企业的不同的具体的运作方式与不同文化背景 and 不同价值观联系起来了。正因为有这个不同,在英美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中的公司制、股份制同日本、德国的公司制、股份制都有自己的特点。虽说都是股份制,却有很大的不同。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在他的《对撞——行将到来的日欧美经济战》一书中就详细地分析了这些不同。如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方面,公司与职工的关系和人员流动方面,追求利润方面、股东、雇员、顾客的地位排列方面,雇员培训方面,奖金制度、会计制度等等。在瑟罗看来,这些不同的背后就有一个不同的文化背景 and 不同的文化价值问题,所以对于现代企业制度这个当前我国经济改革、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最重大的课题,一个核心的课题,一个攻坚的课题,可以多方面加以研究,也可以从文化的角度加以研究。就是说,现代企业制度,股份制、公司制度同文化传统是很有关系的。前不久我看到山西《发展导报》记者采访美籍华人科学家杨振宁先生的一篇长篇谈话,题目是《科技、文化与社会发展问题》,其中讲到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很值得注意。杨振宁谈到,“21世纪肯定不是美国的世纪,美国正在走下坡路,美国太多的社会问题严重地阻碍着它的发展,而这些问题出现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和推到了极端的‘个人至上’观念有关”。他还说,“中国强调‘集体’的精神,这是儒家文化长期孕育出来的社会整体发展的一个基本思想,这个是中国弱点,也是中国的强点。我对中国的发展前途持非常乐观的态度。当然,问题也多的不得了,可是中国有巨大的潜力。……这是中国的内在的、巨大的潜力。这些潜力能帮助中国把种种困扰排除掉,从困境中安全地渡过来”。“在中国的传统中,每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是非常重要的,从小就讲先天下之忧而忧,而西方这类观念非常少,甚至是不存在的,我想对于西方的孩子,加重一点社会责任心,

强调一点集体主义精神是有好处的”。杨振宁说他已古稀之年,前三分之一时间生活在中国,后三分之二时间生活在美国,这是他的亲身体验。从他这番话,也可以看出,比较市场经济模式的优劣,离不开文化传统。经济的运作,离不开“文化力”的渗透和作用。可以说,市场经济在整个运作过程中,都是和“文化力”交织在一起的。

三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建立来说。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宏大的系统工程,它需要多方面工作的有效配合,相辅相成。这里既要运用经济的手段,也要运用行政的手段和法律的手段,还要有思想道德文化力量的协调配合。因此,思想道德文化建设,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新秩序的建立来说,并不是什么外加的,可有可无的,而是其题中应有之义,是其健康正常地向前发展所绝不可缺少的。这里也可以用得上这样两句话:“合则齐美,离则两伤”。市场经济单靠市场机制这一只看不见的手不行。道德力量也是另一只看不见的手,这两只手不可缺少。看来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多只看不见的手,也需要看得见的手。美国有一位教授名叫小艾尔弗雷德·D·韦德勒,曾写有一本著名著作叫《看得见的手》,被称为对“经济学和公司历史研究的一个大贡献”。书中把企业管理列为“有形之手”,强调管理协调这只“看得见的手”。比亚当·斯密所谓的市场协调的“看不见的手”更能有效地促进经济的发展。至于企业文化,是有形之手还是无形之手;不能笼统地讲。有些硬件,是有形的,而价值观、道德力量、企业精神,则是无形的,但是能动的、能影响、渗透于企业行为、员工活动的方方面面。最近我注意到关于股份制与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的这样一种说法:经济的发展与一定的文化氛围和传统是分不开的。股份经济或股份制与传统文化同样是密不可分的。股份制之所以在西方国家捷足先登地获得了广泛发展,而在东方各国却迟缓一步,除了经济发达程度和经济制度的差异之外,不同传统文化的影响无疑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我认为,这有道理。如西方文化传统中的竞争意识、冒险进取精神、利用一切手段使资本增殖的那种资本所有者的内在冲动,强烈的投资意识和牟利欲

望,就同股份制相适应。今天我们创立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制度;也离不开自己这个无所不在、无所不展示影响力的文化传统。

四是从市场经济运作极需倡导良好的经营境界来说。近几年来,市场上假冒伪劣商品问题相当严重。对此,广大消费者极为不满。解决这个问题,要靠法制,要靠思想教育(包括职业理想、职业道德、职业纪律、职业责任的教育),也要注重提高企业家、经营者的文化素质。到一些地区可以看到,那里市场很活跃,经营手段很灵活,但正在崛起的一些企业家、经营者们的文化素质不高。文化素质低,对于市场发育来说,会带来不少问题。我一直认为,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在市场竞争中,提出一个经营境界的概念是很有意义的。而良好的经营境界是同一定的文化境界、职业道德境界紧密相联的。在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时期,被称为“企业之王”、“金融之王”、“株式会社”企业组织方式的创始人涩泽荣一就提出过“论语加算盘”的理论,也叫“经济道德合一”说。他反对违背商业道德的投机、垄断、欺诈、贿赂等行为。例如他对三井财团以压低运价为手段挤垮其他轮船公司而垄断航运业,以及对海军实行贿赂的作法均持批判态度。我们今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市场经济和建设精神文明,就更应该大力倡导职业道德,使职业责任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得到价值定位。

五是从综合国力的竞争来说。当前国际竞争的实质是综合国力的较量。综合国力当然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包括经济力、政治力、军事力,也必须包括文化力。过去,毛泽东同志讲过,新的政治力量、新的经济力量、新的文化力量,都是中国革命的力量。我们今天讲文化力,其含义也就是毛泽东当年讲文化力量的含义。日本人在论述经济与文化相互关系时提出文化力概念,我觉得不可小看。“文化力”在综合国力中具有巨大的凝聚力量、动员力量、鼓舞力量和推动力量。因此,增强综合国力,不仅要发展经济和政治力,发展国防力或军事力,也必须发挥精神文明这个优势,发展“文化力”。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宣传部

责任编辑:冯 生

经济文化： 一个崭新的研究课题

○张江明

综观历史的长河，经济文化源远流长，在它的长远历史进程中经历过否定之否定的扬弃过程，即从原始经济文化到市井经济文化、再到现代经济文化的辩证过程。

经济文化是随着社会经济和生产劳动的发展而发展，并推动它逐渐地由低级形式到高级形式，由传统到现代化的转换的。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文化是现实的反映，尤其人民群众经济生活的反映，又能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在原始社会里，生产力很低，整天共同进行艰苦劳动，仅能维持最低的生活，人们为了使劳动有节奏地进行，减轻疲劳，增强劳动效果，或抒发心中的劳动激情，歌颂劳动中的好人好事，再现劳动的历程和成果，在漫长的生产劳动过程中，原始的诗歌、音乐、舞蹈等也就随之产生，原始文化开始出现了。劳动创造世界，劳动也创造文化和精神财富。劳动的节奏形成了音乐、舞蹈的节拍和歌谣的韵律。最初的乐器有的就是劳动工具。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中阐明了原始人在劳动中发出有节奏的呼声，自然而健康的韵律实际上就是诗歌和音乐的起源，也是文学创作的最早的开端。普列汉诺夫对文化艺术的产生作了深刻的分析和概括，指出：人类“在其发展的初级阶段上，劳动、音乐和诗歌是极其紧密地互相联系着的，然而这三位一体的基本组成部分是劳动”（《论艺术》1993年中译本，第36页）。因为生产劳动是人类生活和生存的基础，是社会的轴心。这时候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还没有分开，社会上尚未出现独立从事文化艺术的人群。普列汉诺夫说的“三位一体”，实质上是经济和文化的一体化。这是最早的原始的经济文化一体化。

随着社会经济、社会分工和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的物质生活资料，除了维持生活之外，还有剩余，以至日益增长。人类社会出现了几次大分工，主要是：畜牧业和农业分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城市和乡村的分工，以及手工业从农业中分化出来等，促进了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适应着社会经济和分工的需要，交换、流通和早期商品相继出现。这便产生了市井。按照我国古

书《说文解字》的解释：市，为“买卖所之也”。井，指水井，是饮水、洗涤等地，也是古代人们必去的地方，容易被人们作为以物易物或以钱易物的商品交换场所。《正义》一文说：“古者相聚吸水，有物便卖，因成市，故云市井。”《管子·小匡》也说：“处商必就市井。”后来，专门作为进行商品买卖的“市井”转变为“市场”。《全唐诗》有“堤绕门津喧市井，路交村陌混樵渔”的名句。所以，市井经济实际上就是初期市场经济。这种市场经济也是有个从低到高、从古代到现代的发展过程的。在欧洲，经过启蒙运动、文艺复兴、工业革命、科技革命，出现“市民阶层”、“市民社会”，市井（市场）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大发展。

自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化以后，逐渐地形成一个从事精神生产的智力阶层，他们进行文学艺术的创作，自然和社会的科学研究，人才的培养和教育、智囊的咨询和决策参与，历史的记载和经验总结，文化娱乐的活跃和演出等等。社会形态中出现了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领域，鼎足而立（经济是基础）。这时的文化就它的本身来说，也是多层次、多视角、多形式的。大体上可以分为宫廷文化，士大夫文化，乡土文化，或者叫皇家文化，贵族文化，平民文化。这三个层次的文化同市井经济的关系各不相同，皇家的宫廷文化和贵族文化同市井经济文化相分离，只有乡土文化同市井经济文化有不同程度的结合，开始出现市井经济文化，其中有的从士大夫高雅文化中转化过来，带有朴素自发的性质。随着市井经济的大发展，市井经济文化也就日渐成长。这种市井经济文化是对原始经济文化的扬弃。

在我国的齐文化中已有重商的经济思想，认为“通商积财”、“无市民乏”。为了发展商业，吸引更多的人到齐国做买卖，他们实行开放和优惠政策，打开关禁，不搞地区封锁，降低关税“五十而取一”。齐国规定：“带4匹马1辆车来的商人，免费吃饭；带12匹马3辆车的，既免费吃饭又供给饲料；带20匹马5辆车的，除上述优惠外，还配备5个服务员供使唤。齐国把完善市场、

管理市场、公平交易看作是繁荣市场、发育市场的重要途径。（详见贾春峰《对当前中国文化发展中一个重要趋势的述评》）这种文化，实际上也是市井经济文化的初期表现。

我国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也有重商经济思想，在《琵琶行》一诗中就有“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反映重商的诗句。他肯定商人趋利的合理性和冒险性：“苟利之所在，虽水火蹈焉”。他还主张取缔特权商人：“天涯地角无禁利，熙熙同似昆明春”。唐代实行收现钱不收实物的“两税法”，变相增加农民负担，造成很大痛苦。他在《赠友》和《重赋》的诗中给以揭露。农民为了得到现款，只好“贱糶粟与麦，贱贸丝与绵”，结果是“岁暮衣食尽”、“憔悴畝间”。在《卖炭翁》一诗中针贬由宫廷派出宦官去市场，名为购物“而实夺之”的“宫市”。这也是市井经济文化某个侧面的反映。

如同一切事物一样，市井经济文化的发展也是曲折的。早在800多年前，我国曾经有过市井经济文化的初步繁荣，例如，张择端画的《清明上河图》，画的是北宋京城汴梁（今开封），以及后来南宋京城临安（今杭州）的市井风情，都曾当时世界上百万人口以上最繁荣的商业大城市。还有南来北往的商人和各色人等。适应文化娱乐和经济生活的需求，形成了一个为广大市民所欢迎的民间艺人的阶层，他们有固定剧场和专人撰写曲艺、剧本，反映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出现了“市民社会”的雏形。市井经济文化正是城市经济和商业经济发展的成果。

由于我国高度集中的封建统治势力十分强大，地主阶级顽强地抵抗和阻止新的生产方式出现，加以农民阶级受着残酷剥削，个体小生产不能成为新生产力的代表。因此，市井经济和市井经济文化总是处在时起时伏、时高时低的状态，跳不出封建的藩篱。到了近代，帝国主义的洋枪利炮打破了闭关锁国的大门，一方面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半封建；另方面通过资本输出和文化渗透，破坏了自然经济和农业经济，缓慢地曲折地向资

本主义经济转变。当时处于中国经济中心地位的上海,具有资本主义属性的市井经济和市井经济文化一度显出繁荣趋势,尤其是在电影、戏剧、文学、艺术等方面。特别是茅盾于1932年12月完稿的《子夜》(还有《林家铺子》和《春蚕》等),是我国解放前市井经济文化的代表作,也是文学艺术方面市井经济文化的最高成就。茅盾站在时代的制高点,运用形象思维的艺术手法,透过以吴荪甫这个民族资产阶级典型人物的两重性格和以上海为中心的典型环境的剖析,反映了中国社会错综复杂的关系及其主要矛盾的面貌,显示了整个时代的波澜壮阔发展趋势。《子夜》一书刻划了一系列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但贯穿全书的主题是吴荪甫和买办金融家赵伯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吴荪甫的失败,形象地说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结尾处从侧面带出工农红军的日益壮大,点明中国的真正出路。瞿秋白认为《子夜》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长篇小说”。鲁迅认为茅盾这一本小说是其他人“所不能及的”。有的人标新立异,哗众取宠,胡编乱造,否定《子夜》的重大意义,把茅盾从中国文学大师中排除出去。这不是什么“创见”,实属无稽之谈。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中,我国的市井经济文化受到极大摧残和扼杀。建国后,意识形态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指导下,政治文化压倒经济文化,不可能取得新的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取消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广东是改革开放的“窗口”和综合试验区。当时的形势是:一方面适应发达资本主义的需要和国际经济发展同文化紧密结合的要求,“文化力”的作用越来越大,现代经济文化出现;加以苏联瓦解,东欧剧变,世界范围的冷战结束,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政治文化下降,经济文化上升,进一步促进现代经济文化对市井经济文化的扬弃。另方面,广东是中国最早通向世界的大门,从秦汉到19世纪50年代2000多年

来,广州一直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也是持久不衰的贸易中心。建国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尤其是处于前沿地带,创办经济特区最多,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广东,用大量事实证明,发展经济必须同文化相结合,把“两张皮”,变为经济文化一体化,而且自发地进行现代经济文化的实践,取得良好的成果,在全国发生较大影响。当现代经济文化——首先是企业文化传到广东来,较快地同广东的实际相结合,便在广东生根、开花,结出第一批硕果。

从以上经济文化发展的历程看,它是经历原始经济文化的“合”,到市井经济文化的“分”,再到现代经济文化在新基础上“合”的扬弃过程的,这个扬弃是吸取前段的科学因素,排除糟粕成份,经过消化吸收成为新的成果和新的起点。所以,这个经历过否定之否定过程的扬弃,是曲折前进、螺旋上升的。

现代经济文化是一门新兴的交叉性的综合性的学科(科学)。它的实践时间较长,作出理论性的概括到20世纪末才初步提出和形成,还有一个逐步完善和发展的过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显示它的重大作用和生命力。

为了促进现代经济文化的发展,必须对现代经济文化的理论加强研究,掌握它的涵义、内容、层次,明确发展方向,逐步搞好理论体系的建设,充分发挥它在促进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

对现代经济文化学的定义和研究对象的表述,有多种不同看法,可以继续探讨,经过深入的实践检验、摘优综合、以求得共识。现代经济文化学是研究现代化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经济与文化的相互关系、辩证结合、融为一体,以及研究社会生产和经济运行的文化因素、文化氛围、文化价值、文化行为、研究“文化力”转化为生产力,促进经济与文化一体繁荣、协调演进、整体发展的规律。

按照现代经济文化的研究对象的要求,它的研究内容有多方面,主要是:(1)现代经济文化的理论研究,包括商品、市场经济

理论与文化关系等；(2) 现代经济文化的艺术创作研究，包括小说、报告文学、电影、电视、图画、戏剧、诗歌、新闻、出版等反映现代经济文化的内容与生动形象；(3) 现代经济文化发展战略研究；(4) 现代经济文化体制和制度研究；(5) 现代经济文化经营管理和伦理道德研究；(6) 现代经济文化产业、文化市场、文化经济实体和文化经济活动研究等等。

经济文化是个大系统、大文化，它有广义、中义和狭义之分，应该从多视角进行多层次的研究。在空间层次上，有世界现代经济文化，中国现代经济文化，社区或企业现代经济文化；时间层次上，有原始经济文化，市井经济文化，现代经济文化；主客体层次上，有整体经济文化，群体经济文化，个体经济文化；经济产业分工层次上，有工业经济文化，农业经济文化，商业经济文化，交通经济文化，旅游经济文化，金融经济文化，信息文化，以及饮食文化，茶文化，酒文化，等等。这些层次的划分是为了研究得更具体，工作更落实。它们之间往往又分又合，互相联结、互相交错的。

从现代经济文化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层次上看，它既不是一般性文化学或文化学分支；又不是一般性经济学或经济学分支，也不是把经济学和文化学简单地相加，外在的拼凑一起。现代经济文化的最大特色是经济和文化的一体化，把它们辩证地融合起来，发挥两个方面的优势，取得更大的科学成就和效益。它同文化学、经济学有密切关系，又不从属于任何一个方面。经济文化就是“经济的文化”和“文化的经济”的辩证统一。由于它的研究有自己特定的对象、内容、层次和规律，因而成为相对独立的新兴学科——交叉学科、边沿学科。

作者单位：广东社科大
责任编辑：冯 生

从发生学角度看 人与自然的关系

□张书琛

一、生命个体的活动和自然本性的形成

在没有出现人类之前自然就已存在了，只是有了人才有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因而，我们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首先必须考察人类的起源。

人类产生的直接前提是作为一种高级动物（类人猿）的个体的生命活动，而个体的生命活动的基本方式是它与外部环境之间的新陈代谢。个体的新陈代谢活动有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一是通过合成代谢把从外界输入有机体的物质、能量和信息转换成具有反

射功能的生命物质、生物能量和生物信息,从而达到个体的满足(体内协调)和个体与环境之间的协调。二是通过分解代谢排出废物、释放能量(包括质能、动能和信息能),并在活动中消耗能量,造成个体内部的匮乏以及个体与环境之间的失调。

在新陈代谢活动中产生的能量除了用于维持体温、支持机体的活动外,还能与外部刺激相结合而引发感觉神经系统的反射活动,从而在生理活动的基础上产生心理活动。

个体的反射活动是通过两条神经通路(系统)进行的双重反射活动。首先是感觉器官把体内外的刺激转换为神经冲动。当这种神经冲动传递到中枢神经系统的延髓时,就开始沿两条神经通路进行传导:一条沿着非特异神经通路把感觉器官的感受、体验传输到大脑皮层下部位和大脑皮层的运动区,从而引起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和反应。这种传输来的感受和体验引起大脑皮层的一定的反应,就转化成了各种企图保持或强化满足感和协调感、消除匮乏感和失调感的心理倾向,即需要,如生理的需要、心理的需要等。另一条则沿着特异神经通路把感受器官所感知、知觉到的各种信息传递到大脑皮层的感觉区。这些信息经过大脑的整理、编码,就形成了一定的认知结构,这一认知活动与能量相结合,就形成了认知能力。而大脑皮层联合区的活动则把需求和认知联结成统一的反射活动。同时,机体内按一定的需要而流动的能量与有机体的各种活动相结合,还会形成与各种活动相附随的各种能力,如生理方面的新陈代谢能力、感受——反应能力、操作能力;心理上的感受能力、情感能力、欲求能力、感知能力等。

新陈代谢和反射活动是生命活动的两个既相区别、又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没有新陈代谢这种生理活动造就的感性物质和释放出的能量,反射活动就不能进行;没有反射这种以感觉神经系统的生理活动为基础的心理活动,个体也会停止新陈代谢,成

为一具僵尸。因此,任何一种生命活动都是这两种活动的统一。

生命活动的直接结果就是需要和能力的形成,二者作为生命个体的两个最基本的动力学特性,构成了人的自然个性的两个既相区别、又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需要是一种个性倾向性,它决定着个体的好恶、取舍和活动的方向,能力则是个性的一种功能特征,它决定着个体的能量大小和活动水平。需要支配着能力,能力又制约着需要。个体的任何一项活动都是需要与能力在一定水平上以一定方式相结合的结果,不可缺少其中任何一个环节。

二、两种关系的发生和现实障碍的出现

在需要某种对象而又有能力取得这一对象的情况下,个体的获取对象以满足需要的主动性活动就必然发生。而这种活动一旦开始,个体与外部自然的关系也就建立起来了。

生命个体是从它的本性出发去活动而同外界发生关系的。因此,与生命个体的自然本性的两个方面相联系,人凭自己的自然本性的冲动而建立起来的生命个体对外部自然的关系也有两种基本的关系:一是个体需要与所需对象之间的供需关系,其中包括生理需要与所需对象的关系和心理需要与所需对象的关系。在这里应当指出,对象是具有多种属性的复合体,而生命个体所需要的只是对象的某些能满足个体需要的功能,因此,我们所说的对象实质是指对象的功能,所谓需要与对象的关系也就是指个体需要与对象功能之间的关系(供需关系)。二是个体能力(包括自身的能力和所支配的工具的能力)与对象功能之间的功能关系,其中包括生理能力与对象功能之间的关系;心理能力与对象功能之间的关系。相比较而言,供需关系比功能关系更为根本,因为需要是个体活动的出发点,因而也是个体对外界的关系得以建立的初始原因。同时,需要也是人对世界关系的核心,并且它与对象构成人与世界关系的两极,在这两极中间包含

着功能关系。个体的能力既可以看作是需要与对象之间的中介,也可以看作个体所需要的对象。因此,从根本上看,生命个体与外部自然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就是个体需要与对象功能之间的关系。

需要是一种企图消除匮乏感的个性倾向,而匮乏感的消除又必须通过摄取外界物来满足。离开外界物,需要就不能得到满足,个体就不能生存。正是个体需要与外物功能的这种不可分离的关系把个体与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所需对象又在个体之外,并且它常常对抗人的需要。这就使需要与对象必然发生矛盾。因此,在个体需要与对象功能的关系中,既有尖锐的对立,又有紧密的统一。可以说,这种关系(以及此后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人与自然之间的价值关系)是对立统一规律的最典型、最生动的表现。

需要与对象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性质,决定了二者之间关系可以呈现各种不同的状态,其中最基本的状态有两种:一是自然同一状态(自然协调状态)。是指对象与需要的自然符合,需要与对象之间不缺少环节、也不存在障碍的情况,动物就是在这种状态下生存的。二是矛盾状态(失调状态)。在这种状态下,需要与对象之间缺乏必要的环节,存在着难以使二者结合的种种障碍,个体之所需非对象所能直接满足。

需要与对象结合的障碍一般有以下几种:一是“中介性障碍”。这是指需要与对象虽然并存,但却由于缺乏把二者结合起来的中间环节(如能力、工具及其他条件等)。二是“对象性障碍”。这是指需要与所需对象虽然并存并且相互联系,但对象却不符合甚至否定需要(即无用或有害)。三是“主体性障碍”。这是指个体的某种理想性的需要,在现时却不存在可满足的对象,我们之所以把这种障碍称之为“主体性障碍”,是因为这种障碍只能在作为主体的人的活动中才能出现,动物不会以非现存的东西为所需之对象,因而不会出现这种障碍。

三、自然本性的扬弃和活动方式的改变

不论是人还是动物,他(它)都必须为

满足自己的需要去进行生存活动。在生存活动中,都会遇到需要与所需对象之间相矛盾的状况,都会遇到一些障碍。但在漫长的生物进化过程中,无以数计的动物系列在自然灾害(障碍)面前灭绝了,幸存下来的少数动物也是虽经亿万年的进化而变化不大;而少数的高级灵长类却在巨大的自然灾变面前脱离了动物界,并得以繁衍发展。这是由二者对待(看待和处理)自身需要与外部自然之间关系的不同的活动方式造成的。

动物的正常的生存状态是由大自然给它提供的供需之间的自然同一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动物所需要的东西俯拾皆是,获取它不需要思想上的谋求和行动上的创造。动物也有需要和一定程度的认知能力,但它不能使自己所渴望的东西出现在想象之中,因而它不能把自己的“是怎样”的自然需要升华为“应当怎样”的自觉意志。动物不发达的大脑也不可能把简单的认知提升为抽象的理智。没有意志和理智就不可能去进行自觉的设想和创造,因而,当它因自然的灾变(障碍)而失去所需的对象,造成需要与对象的严重失调时,它就只能躲避、屈从(忍耐)或因束手无策而灭绝了。

人的正常的生存状态不是靠大自然所提供的,而是他自己所创造的。既使人遇到了自然同一的状态,他也不会满足于这种状态,而是去追求更好的情境。人的需要总是超出现实的,因而是现实所不能最终满足的。因而,对于不断追求新东西的人来说,不存在需要与对象完全符合的自然同一状态,而需要与对象之间的矛盾状态对人来说却是一个恒久的现实。

与动物不同,人在遇到需要与对象相矛盾的情况下,他既能够扬弃自己的自然本性(需要和能力),并且能够按自己的需要去改变外部世界(工具和对象)。首先人能够扬弃自己的自然需要,把自己的自然需要转换成一种价值性意识。当人感到自己的需要被现存状况否定了的时候,他能够凭自己的高级思维、想象和反应能力把被现存状况所否

定了的“是怎样”的自然需要转换成“应当怎样”的理想性需要,这种“应当怎样”的理想性需要就是一种价值性的需要、价值性意识。不但如此,人还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把这种“应当怎样”的价值性意识转换成一种关于“应当怎样”及“要怎样”去行动的实践观念和行动意志。可见,价值性意识不仅是一种理想性(超然)的意识,同时也是一种批判性、创造性、实践性意识(黑格尔将它称之为“实践的观念”)。从“是怎样”的事实性意识到“应当怎样”的价值性意识的转变,是心理、精神发展史上的一次根本性的飞跃。正是由于这一飞跃,使人的意识超出了自然而区别于动物心理,使人的活动成为一种不同于动物本能活动的追求和创造价值的实践活动。正是这种实践的活动造就了人,组成了人类社会历史,实现了由自然史到人类史的转变,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其次,人能够扬弃自身的能力。他不但能把自身的生理能力和心理能力加以有意识的锻炼、培养和提高,而且能把自己的生物本能改变成一种社会实践能力(如生产能力、政治活动能力和文化创造能力等)。同时,他还能够通过制造物质工具和语言符号工具,扩大、延长和强化自己的生理能力和心理能力,把自己所掌握和支配的能力扩展到身体之外,以克服自身力量的不足。

再次,人还能够按理想性的需要和内在的价值尺度,运用现实的力量改变现存对象和现存状况以适合自己的需要。

个体一旦扬弃了自身的自然本性,动物的在自然本性冲动下的生命活动也就转变成了人的有理性意识作指导的为满足自身需要而追求和创造价值的社会实践活动了。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已不再是只具有自然本能的动物而是具有社会性的人了;个体与外部自然的关系也不只是作为一种自然物的动物与其他自然物之间的事实关系,而是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物的人与外部自然的以事实关系为基础的价值关系了。从此,人不再

以自然的本能的活动方式而是以社会的理性的活动方式对待自身需要与对象功能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了。

四、现实障碍的克服和价值关系的形成

人类的需要是超于现存状况的理想性(价值性)的需要,能满足这种需要的对象(价值物)不能凭自然的赐与而只能靠自己的创造。因此,在上述的诸种活动方式中,创造所需要的价值物的实践活动是人类对待自身需要与对象功能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最基本、最主要的活动方式。其中,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更具有根本性,它是整个人类的生活和社会历史形成、发展的基础。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历史活动就是对待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创造物质生活资料的活动。但这一活动又需要有一定需要和能力的人来进行;需要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其中主要是生产关系);需要必要的社会管理;需要有一定的精神和文化上的准备……。这样,一系列的社会需要就随之产生了。这些需要驱动着人的能力,运用一定的工具(物质工具和语言符号系统),作用于一定的对象,就形成了一系列的创造各种价值的活动——如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人的生产、社会交往活动、社会管理活动、精神生产以及新的需要的产生等等。随着这一系列活动的开展和一系列障碍被克服,一个包含着物质价值、人的价值、伦理价值、政治价值和精神价值的价值关系系统就形成了,包括经济、政治和精神文化在内的社会结构也就确立了。

考古学的研究已经证明,在史前时期,人和猿的共同远祖——森林古猿就在热带森林中与环境处于自然同一的状态,在长期的森林生活中所形成的较为发展的自然需要和生物本能,也为开展较为复杂的活动奠定了生理和心理的基础。至一、二千万年前,激烈的造山运动给古猿的生存造成了巨大的障碍,使它们的自然需要与所需对象之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在这种情境下,大量的动物灭绝了,而一部分猿类(如西瓦猿,后

来它的一支又演化成南猿),则在自然灾变的逼迫下从林中转向地面。在新的环境下,南猿的一支——南猿粗壮种仍能凭粗壮的体质和发达的牙齿食用在身边俯拾皆是的杂草而保持着本能式的活动方式(后来灭绝了),而南猿的另一支——南猿纤细种则因不能食用身边的杂草而产生了一些凭自然界的供给已无法满足的“应当怎样”的对非现成的对象的需要(如杂食、狩猎、使用天然工具、手脚分工等)。因能满足这种需要的对象只能靠自身的活动去创造,所以在对非现存对象的需要的基础上又形成了对创造活动的需要。正是在这种情境下,萌生了最初的价值性意识和价值性活动的萌芽:即“对个别有实际效益的条件的意识”和“能产生预期效果的”、“‘有益的’劳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页)随着活动中生理能力和心理能力的发展,又逐步创造了物质工具和语言符号,学会了人工取火,结成了原始公社,从而超越了个体自身能力的局限。语言符号的创造使人类的思维成为现实,思维的出现又导致了原始宗教、神话和原始艺术的产生。至此,一个包括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在内的原始的价值体系和社会结构也就初步形成了。原始人的宗教、神话和禁忌实质上是在当时条件下原始人对自身与外部自然的价值关系的理解。原始人称之为神并加以崇拜的东西(自然物、自然力、祖先、生殖等),实质上是被他们认为是与自己利害攸关的价值性的东西,价值才是“神”的本质,所谓善神、恶神和无常神,是原始人对各种价值物或价值现象的不同性质的辨别;而所谓的高级神和低级神,则是对各种价值物或价值现象的不同层次、等级的区分。

五、考察自然的方式及人与自然的关系

要考察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首先要了解人和自然。人不仅是一个为支配事实而去认知事实的事实性的存在物,更是一个为满

足需要而去创造价值的价值性的存在物。自然不仅是人所接触、认知的对象和材料,更是值得人去求取、改造的财富和价值物。只以事实观点去观察人和自然及其关系是舍本逐末,只从心理的认知能力与外部自然的关系去理解人和自然及其关系,就更片面了。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作为一种自然物的生命个体在处理自身需要与外部自然关系的活动中逐渐确立的以事实关系(供需关系和功能关系)为基础的价值关系。在人类产生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确立之后,人是在社会中以实践的方式去对待自身与外部自然的关系的。因而,作为人与自然关系中一个环节的自然的关系,也被人的社会实践所规定。因此,只有从活动、实践的高度去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才能获得正确的理解。离开把人和自然统一起来的活动,孤立地考察人或自然,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考察方式。在人与自然之间关系这一问题上离开实践哲学的立场,就容易导致机械自然主义和狭隘人本主义。

与人的双重性的(事实性的和价值性的)存在相一致,人通过双重性的活动所建立起来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有两种,即事实的关系和价值的关系。其中,价值关系更为根本。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在社会实践领域内建立起来的;而实践又是人的一种为满足需要而去追求和创造价值的自觉的、有目的的以事实性活动为基础的价值性活动。因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只是一种自然的、事实的关系,即人作为一种事实性的自然存在物(动物)与其他自然物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看,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社会的、价值的关系,即人作为一种价值性的社会存在物(人)与自然(包括天然自然和人工自然)存在之间的关系。

作者单位:内蒙古社科院

责任编辑:冯 生

苏联马克思主义

哲学人学理论研究概述

□李尚德

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理论是客观存在的,这已为苏联哲学家的研究成果所揭示。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理论遗产挖掘工作的代表人物是:奥伊则尔曼、纳尔斯基、格里戈里扬、卡尔塔赫恰等。他们认为,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的核心著作,而人的问题则是这部著作的核心问题”。①如果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德法年鉴》中发展了人的观点,那是在克服和清洗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体系的过程中完成的,那末,《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人的观点恰是在同费尔巴哈抽象的人本主义的斗争中钻研出来的。很遗憾,在苏联的哲学研究中,长期来,这一点并没有引起重视。为此,这批哲学家从研究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开始,全面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理论的一般原则、基本理论内容,批判资产阶级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的歪曲议论。他们为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理论作出了自己的学术贡献。

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理论的一般原则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奠基人,在研究和理解人的问题时,首先规定了一般哲学原则,这正是与人本主义的根本不同,人本主义哲学在研究人的问题时,把人的存在理解为某种纯粹的主观性——人、个人的存在,先验的或生物精神的自我,从而脱离了人的社会历史文化存在的客观基础。马克思写道:“……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

界”。②由此,马克思在研究和理解人的问题时,首先揭示人存在的最客观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马克思的把自然界“历史化”。即自然与文化历史现实的统一。格里戈里扬指出:马克思主义在认识人存在的最客观的基础时,其出发点是“人以能动的、具体活动的、革命批判的和创造性的态度对待世界。对待自然现实和社会现实。……而实践是社会的人掌握自然力和社会力量,实现作为认识基础和最高目的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的统一的、具体能动性的表现”。③这样,马克思主义就把研究和理解人的问题建立在世界的物质的和历史的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一元论原则之上。“按照这个原则,尽管自然和社会的统一有各种物质前提,但它只有在人的历史的具体活动过程中才能实现。这种统一并不是物质自然界预先给予的,而是人们历史创造活动的结果。”④就是说,自然界和人的世界的统一只有通过社会的“第二自然”,通过文化才能实现,自然界也只有在文化中才能成为人的存在和历史存在的基础。苏联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理论的这个一般原则,不仅克服了唯心主义、自然主义、人本主义割裂自然与社会历史现实的联系,孤立地考察人的问题所产生的各种错误观点,同时,为人学理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科学的方法论原则。很清楚,理解自然不能离开历史,而理解历史更不能离开人,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和体现者,社会及其经济、政治结构和文化形式不是脱离人和人的活动的某种独立自在的整体,而是人的实践活动本身的各种关系和形式的

总和。从这样一个方法论原则出发去研究人的问题,才能获得真理。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在自然与社会历史现实统一的基础上研究和理解人的问题的一般原则时,还提出了在充分注意人的生命活动的客观因素的前提下真正科学地解释“人的主观性”和“主观因素”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理论原则。苏联哲学家认为,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的原则。马克思写道:“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⑤,很明显,马克思的人的“主观性”思想体现在具体的、革命批判活动的实践学说中;从前的各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仅仅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而马克思指出:“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⑥由此,马克思提出了革命的改造周围世界和安排世界的要求,以便使人从这个世界中获得他应有的印象,使他习惯真正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感觉到自己是人,马克思主义对自然社会的客观因素和人的主观因素的本质联系,以及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的主观因素相对自主性的论述,为深入研究人的本质、人的个性等一系列涉及人的问题的重要论题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根据,也为在对人的问题的研究和论证中摆脱片面性,从而以完整的人的形象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理论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方法论前提。

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理论

奥伊则尔曼院士在他的《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及其解释》一书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理论内容作了概述,随后,在《马克思·哲学·当代》一书中也有补充性论及。弗罗洛夫的《人的前景》、纳尔斯基的《异化与劳动》、格里戈里扬的《哲学人类学》、科尔涅耶夫的《现代哲学人类学批判》等著作都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课题进行了论证。弗罗洛夫院士指出:“马克思关于人的学说是同唯物史观、同对劳动和人的实践活动在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决定

作用的认识、同对人的社会本质的理解、同科学的、真正的人道主义理论密切联系在一起”。^⑧可见,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内容包括:人的本质、人道主义理论和异化问题等三大方面。

马克思在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由此苏联哲学家得出结论:马克思一开始就很明确,人的本质不是其“抽象的肉体的本性,而是人的社会特质”,^⑨因此,“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⑩马克思要求人们,“首先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研究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这样,在确认人的全人类特点和类本质的时候,马克思主义主要是要研究者对人进行历史的分析,揭示各种社会关系的特点和劳动的性质等等。”^⑪按照外部特征把人同动物区别开来的作法决不是对人的本质的揭示。苏联哲学家进一步分析,马克思如此定义人的本质是从人的特殊活动和生活着眼的,因此,对人的本质的深刻理解只能到人的劳动中寻找。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指出:“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正是劳动创造了人,并且恰恰是在劳动中人的特殊本质得到了实现和发展。可见,马克思把劳动不仅看作是谋生的手段,而且规定为人自我确认的形式,在劳动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⑫劳动首先是对自然的社会关系,因而,人的本质必然包括“人的共同性”,包括人的社会性,但是,苏联哲学家又深入地指出,马克思在强调人的社会本质时,赋予人的存在和发展的自然生物因素和生物本性以重要的意义。马克思写道:“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⑬一方面马克思把人的本质定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另一方面,他又把人的特点和爱好看作人的“本质力量”。恩格斯论证并发展了这一观点,他肯定:“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⑭

这样,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人的本质应该是社会因素和自然生物因素的辩证统一:社会因素在本质上支配着人的自然生物因素,而自然生物因素则是人存在的必要条件。弗罗洛夫总结性地指出:“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的哲学不是在同人的自然生物因素相对立的情况下,而是在同它们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之中来确定人的本质的。……这既能克服庸俗社会学的极端观点,也能克服社会生物学的极端观点。”^⑮奥伊则尔曼院士补充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中关于人的本质论述的相关内容,他揭示了马克思的一个命题:人类的全部历史就是人的生成。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道:“社会的人的感觉不同于非社会的人的感觉”,这里,马克思所说的社会的人与非社会的人不同是指什么呢?人本身是社会的存在物,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使人的社会本质畸型化,使各种反社会的属性在人的身上发展起来,使人与人相对立,结果,人作为社会的存在物变成非社会的,即利己的、个人主义的存在物。恩格斯肯定了马克思的这一关于人的社会本质发生变化的观点,并写道:正是由于共产主义,“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⑯由此可见,马克思在论述人的本质问题时,揭示了人生成的历史规律。也就是人的本质真正恢复的道路:通过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这一点,马克思表述得非常清楚:“私有财产的废除,意味着一切属于人的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⑰如同马克思由自由主义和唯心主义,经革命民主主义向辩证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转变过程一样,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进展过程:从早期“抽象的人道主义”经1844年“真正人道主义”到《共产党宣言》中现实的人道主义。

青年马克思,在1835年中学时代所写的《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就表露出只有为他人幸福而劳动的人才是完善的人的思想,这是一种大公无私的人道主义。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反对宗教对人的压抑和对人道主义的否定,阐述了人获得自

由决不能偏离世界,脱离环境的观点,这时,马克思是站在人道主义立场谈自由的。但对自由的论述还很抽象,因此,他的人道主义思想还处在含糊不清的抽象之中。

19世纪40年代初,马克思为《莱茵报》撰稿,这种抽象的人道主义开始变得具体显明,至少,他非常注意对劳动者利益的保护,并且自觉地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提出并解决“人类解放”的道路问题,直到1844年在《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两部著作中,马克思把自己的人道主义公开称作“真正的人道主义”,这种真正的人道主义揭示了一切异化形式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指出了克服异化的途径,马克思把人类的彻底解放,从而使人真正获得自由的道路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政治革命,同消灭私有制紧紧联系在一起,就是说,马克思已把人道主义的实现与具体的历史活动和革命的社会力量结合起来了。

苏联著名哲学家费多谢也夫院士说:“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是现实的人道主义的第一宣言”,^⑱苏联哲学家把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称之为现实的人道主义,其主要含义在于:《共产党宣言》标志着从宣告人道主义的抽象原则转到了切实实现人道主义的理想和现实中,奥伊则尔曼写道:“马克思把自己的学说与其说规定为共产主义,毋宁说规定为现实的人道主义”,^⑲因为,他把共产主义看成是通向人道主义的道路,亦即通向人的个性和社会关系全面发展的道路,作为现实的人道主义,马克思认定,人只有获得彻底的解放,才能真正实现人道主义,现实的人道主义要求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就是要摧毁那个人剥削人的不合理社会,马克思主义正是要坚持这种现实的人道主义,而不是空谈人道主义。

异化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重要的理论内容,从70年代起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对这一问题的理论探讨,特别反映在苏联哲学家对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成果中。

纳尔斯基教授认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已经摆脱了黑格尔、费尔巴哈异化观的影响,

完全溶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中,这时,“马克思所揭示的异化范畴是异化劳动,但异化劳动的后果囊括了整个社会机体”,^{②0}由此,马克思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给异化下了这样的定义:“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的、不受我们控制的、与我们愿望背道而驰的并抹杀我们的打算的物质力量,这是过去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②1}可见,异化是具有反面影响的一般社会范畴,反面影响意味着压迫、歪曲、毁坏和蹂躏。

奥伊则尔曼院士指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最高成就,就是马克思提出并论证了“异化劳动”这一概念。“马克思通过对私有财产产生原因的研究,发现了异化劳动这一基本现象”。^{②2}异化劳动主要表现在:劳动产品对生产者的异化,生产活动本身的异化,奴役人的社会关系的异化方面,异化劳动最终造成人的关系的非人化,人的本质对象化为非人的那种不符合人的本性的社会关系。

那末,异化劳动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奥伊则尔曼和纳尔斯基同时指出,异化劳动和私有制互为因果,奥伊则尔曼写道,马克思指出,他所表述的异化劳动这一概念的内容是“作为私有财产的运动之结果”而被揭示出来的,“但对这一概念的分析表明,即使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了的劳动的根据和原因,实际上毋宁是外化了的劳动的结果。正象神灵本来不是人类理性迷误的原因,而是人类理性迷误的结果一样,后来,这种关系就变成相互作用〔的关系〕”^{②3}这样,“应当把产生了私有财产的异化劳动的原始形式同它后来在私有财产基础上跟私有财产一起存在和发展的历史形式区别开来,不这样区分就不能理解,为什么私有财产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废除,同时也意味着异化劳动的消灭。”因此,“把私有财产理解为结果,理解为一定的历史产物这就等于理解了它的暂时性。”^{②4}这一点,非常重要,纳尔斯基将这一观点具体化:马克思从存在两种形式的异化劳动的观点出发得出结论:最初的劳动异化先于私有财产,第二种派生的劳动异化是私有财产的结果,上述关系的两个

方面既反映出私有制运动的历史,又看出私有制的历史暂时性。

马克思揭示异化是为了揭露私有制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对人的压抑,迫害的罪恶,因此,摆脱异化、消除异化是题中之义。纳尔斯基指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得出结论说:人要摆脱异化而获得解放,既不能象黑格尔那样靠唯心主义的歪曲现实情况的方法,也不能象费尔巴哈那样靠启蒙的方法,消除异化,不可能是进行某种局部改革的结果,而只有在消灭私有财产并建立公有财产的基础上才能发生,也就是说只能是对社会进行根本的共产主义改造的结果,使人类最终摆脱异化而获得完全解放的历史承担者。便是饱受劳动异化之苦的无产阶级。

资产阶级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理论的歪曲

哲学副博士科尔涅耶夫写道:“马列主义哲学对人的研究是同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理论的尖锐斗争中进行的。……哲学修正主义以资产阶级哲学人类学为依据,力图歪曲现实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实质,歪曲马列主义关于人的学说”。^{②5}因此,苏联哲学界认为,批判资产阶级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理论的歪曲,是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理论之必需,在这方面,奥伊则尔曼、格里戈里扬、科尔涅耶夫、卡里姆斯基、阿韦林采夫、安东诺维奇、柳布京等哲学家做了大量的工作。

奥伊则尔曼清楚地指出,资产阶级哲学主要从三个方面歪曲和攻击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马克思是哲学人本学和存在主义的鼻祖;青年马克思是人道的,老年马克思是非人道的;完全抹煞青年马克思和晚年马克思之间的区别。

德国信仰神学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家蒂尔专门把青年马克思的一些跟马克思后来创立的科学的哲学世界观不一致的论点断章取义摘引出来,然后,把“人的本质的本体论”学说强加给马克思,说马克思承认“自然的东西和社会的东西基本等同化”,这样马克思就被蒂尔说成是唯心主义的哲学人本学创始人和存在主义的鼻祖,由此他们得出了一个荒谬的结论:青年马克思不是一

个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发展阶段,“从这个立场出发,他们把马克思在哲学、经济学和共产主义方面的经典著作,看成是这一学说的退化。”^{②⑥}

自从马克思《1844 经济学——哲学手稿》正式发表以来,一些资产阶级哲学家,马克思主义批判家便把马克思的这部早期著作同他后来的主要著作对立起来。“据这些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解释者所说,青年马克思是人道主义者,而创作了《资本论》这样一些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马克思则是一个不关心人的活生生的感性本质、个性和主体性的经济学家。”^{②⑦}是一个反人道主义者,这样,两个马克思的神话出现了,奥伊则尔曼院士尖锐地指出:“这样的对立,归根到底就是要否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特别是否定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②⑧}在资产阶级哲学家看来,人道主义就意味着否认阶级斗争,意味着把属于不同阶级的个人的共性绝对化,他们一方面把这种立场强加给青年马克思,另一方面又指责老年马克思背叛了这种立场,去搞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其实,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也没有否认过阶级斗争,相反,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论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论证了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必要性,只要不怀偏见就会发现在早期著作中,马克思正逐步地克服哲学人本学的影响,暗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形 成,资产阶级哲学家强行把马克思“一分为二”,不是怀有某种政治目的,也便是无知。

与把马克思“一分为二”的做法相对立的做法是完全抹煞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之间的区别,即混淆马克思早期著作和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之间的质的界线,这也是资产阶级哲学家抵毁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的惯用手法,这些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家论证这样一个结论:《资本论》和马克思的其他经典著作尽管形式不同,却是同一思想的发展,即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展开,马克思的早期思想仍然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思想,是马克思早在青年时代从黑格尔和费尔巴

哈那里借用来的思辨主题的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没有摆脱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这样,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被归结为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所包含的思想,奥伊则尔曼指出,这种把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合二而一”的作法,同把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根本对立的作法,“发挥着同样的意识形态上的作用。”^{②⑨}不管前者,还是后者,最终把马克思划入唯心主义者和费尔巴哈的拥护者行列。可见,苏联哲学家开展对资产阶级哲学歪曲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理论的批判意义深远,它至少可以纯洁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理论。

①科西切夫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迫切问题》莫斯科,1980年。

②⑬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第128页,第97页,第157页。

③④格里戈里扬:《哲学人类学》,莫斯科,1982年。

⑤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6页、第17页。

⑧⑪⑫弗罗洛夫:《人的前景》,莫斯科,1983年。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270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174页。

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第110页。

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23页。

⑰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9页。

⑱费多谢也夫:《现时代的辩证法》,莫斯科,1978年。

⑲⑳㉑奥伊则尔曼:《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及其解释》,第79页,第14页,第65页。

㉒纳尔斯基:《异化与劳动》,莫斯科,1983年。

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37页。

㉔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6页。

㉕科尔涅耶夫:《现代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人的学说批判》,莫斯科,1981年。

㉖㉗㉘㉙奥伊则尔曼:《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及其解释》,第20页,第17页,第18页,第23页。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冯 生

「和」的文化意蕴及其现代价值

在传统文化中，“和”是一个寓意极为丰富、深邃的范畴。“和”是一种思维方法、行为方法，也是人追求向往的一种境界。“和”涵盖着华夏文化的方方面面，既是对这一文化基本精神的概括，也对这一文化的发展产生深刻久远的影响。“和”是一种极富东方色彩、浸润着世代华人精神生活的文化。今天，当我们正孜孜于现代化建设时，“和”的文化将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启迪呢？

一、“和”——传统文化的主旋律

作为一种远古意识，“和”首先是古人对天象生态的和谐存在状态及协调运行状态观察认识的结果。它由此发端，凝结成思维和哲理，衍绎派生成易学、阴阳五行之学、中庸之学等等，并渗透贯串于诗书礼乐以及各经各史的理义之中。全部华夏文化，可以说是围绕“和”而展开的。

标志着远古最高思辨成果的《周易》，讲的其实就是“和”的道理。它揭示：纷繁复杂的天象地貌和生态世界是有秩序的，整个宇宙就是由爻而卦渐次演绎而成的和谐系统；阴阳和谐是万物生成发展的原因，其推演当位，则万物和谐兴旺；反之，则会招灾致祸；阴阳和谐不是静止僵化的，而是一个不断更新发育的过程，它千变万化，无尽无穷。这里，《周易》以其独特的思辨，从外部世界得到了“和”的意念，又以之解释外界。《乾卦·彖》：“保合太和”；《中孚卦》：“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从这些言辞中，我们不是可以感悟到“和”之玄美意蕴么？

阴阳五行之说，展示了“和”的另一种意味。阴阳之学鉴于和谐才能存在和发展，主张根据不同情形补亏损盈，使对立物（阴阳）保持协调的状态。而五行之学，则从复杂事物中推衍、提炼出五种具体物质（金、木、水、火、土），并揭示其中的相生相克关系，主张从多种事物的联系及生克制化中，求得事物的平衡和发展。可见，所谓阴阳五行之学，撩开其神秘的面纱，乃是关于“和”的应用之学。

将“和”提到理念的层次，并以之为行为规范（修身）的，是“中庸”之学。它是

古人对客观和谐事物的体察及协调处置经验的总结。中庸也叫做“和”，即《中庸章句》所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作为儒家学说的方法论，秉仁用礼，追求大同，将“和”伦理化、政治化，并付诸实践的意义。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儒家侧重于从人伦方面发挥“和”的理义，逐步明朗地设置了一套以“仁爱”为核心，以“礼”为规范，以“大同”理想为感召的建立和谐有序社会的方案。所谓忠义孝悌，睿慈隐恻，温良恭俭让等等，无不包摄“和”的精神，无不以“和”为前提或归宿。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展开“和”的意义的，是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道家对紧张与对立怀有一种天然的斥拒，而毋宁以一种退遁的方式执着于精神、肉体同宇宙自然的耦合，在这种耦合中品味天人和合、身灵和合的乐趣。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庄子主张顺从自然，以求得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道家思想影响至深，特别是对文学、美学的影响尤为久远。中国古代大量的山水诗、田园诗所表现和追求的，就是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情趣。文学史上的性灵说、神韵说、意境说等等，也无不以天人合一、物我一体，情景交融为其哲学、美学的思想基础。

在医学、养生等方面，“和”的理义也被广泛运用着。中医以阴阳调和作为防病治病之本，太极拳和气功，追求澄澈清静，在心理、生理和哲理的互感中求得灵肉和谐。在中国人的意识和语言中，有关于“和”的种种说法，诸如心平气和、和颜悦色、瑞气祥和、和气氤氲、鸾凤和鸣、和衷共济、和睦兴邦、和气生财、政通人和、家和万事兴，以及“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等等。这反映出“和”的蕴义行迹及远，涵盖一切，并积淀为一种文化心理结构，浸淫于世俗文化中，对国人的思维、行为有着极大的范导作用。

总而言之，如果把传统文化比作一部乐

章，那么，“和”就是这部乐章的主旋律，以其为基调谱成之长歌短曲，奏出迭宕起伏、缠绵久远之和声，并将它的独特情调、风格贯串始终。

二、“和”的文化意蕴

“和”之所以会对古人的宇宙观、社会观及身心观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是由这一理念在漫长的历史中所融汇凝结的丰富意蕴是分不开的，这主要是：

第一，“和而不同”。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和同之辨，是传统文化中极富启迪意义的思辨。什么是“和”？什么是“同”？晏婴对齐景公说：“和如羹焉”。厨师配以不同的食料和调料，经过精心的制作，就能煮出美味的食品。在君臣之间，臣勇于说出自己不同的意见，善于纠正或补充君主看法，使政治开明而不出错误，这样的关系称为“和”。而象梁丘据（当时的臣子）那样：“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则只可以说是“同”，而不能称为“和”（《左传·昭公二十年》）这是关于和同问题的一段著名议论。这里将“和”与“同”明确区别开来，赋予“和”以兼容、化合而非简单凑合的含意，使“和”的行为更具原则性和深刻性。

这样看来，“和”是以承认事物的差异、杂多、矛盾、对立为前提的，是差异的综合、多样性的统一，其精髓正在于对不同质的事物的兼容性这一点上。“和”之为“和”，唯其充满着齟齬对立，唯其对对立两极的认可与张扬，唯其在对立中找到一种合理的张力，它只是对立物按照一定的秩序互相激荡后的协调、兼容结果。这种认识，当然是很有见地和启迪的。

第二，“中则和”（适度为和）。作为一种思维，“中则和”。进一步涉及到矛盾的转化，出现了“中”与“度”的问题。“中则和”，应解释为“执中”则可以致“和”，以“中”即适度为“和”的基本含义、核心和灵魂。要求在思维、行为上要适度，不偏不倚，以它平它；要察乎两间，审其取舍之几；要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宽以济猛，猛以济

宽；要兼相爱，交相利，总之要平等接物待人，处事以不离中道为准绳。古人还认为，君子要和而不同，群而不党，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这都是指为人处事要适度、要符合“和”的原则。古人特别反对失度、失衡，认为“过”与“不及”都是不好的。《淮南子·原道训》称：“夫喜怒者道之邪也，忧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过也，嗜欲者性之累也。”这些是失度、过界的表现，不符合中和的原则。古人还认为，在必要的时候，应主动克制，约束自己，去求得事物的平衡协调。在事物的联结中把握“适度”的原则，这无疑闪烁着辩证法的光辉。

第三“和为贵”。“中则和”的思维具体化为一种解决矛盾的操作方法，是强调对立面的协调、渗透，而不刻意于矛盾的紧张对峙与互荡激溢。《论语》曰：“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宋人张载也说：“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正蒙·太和》）。有人认为，调和是不分是非、不讲原则的“调和主义”，是“和稀泥”。其实，调和的本义并不坏，《吕氏春秋·去私》曰“庖人调和而食之”。指的是烹调得当，五味可口。调和是指矛盾的统一，是承认对立是“同一东西的两极”。无疑，调和与斗争都应解决矛盾的有效方法。在事物总体发展过程中，由于矛盾的性质、特点以及发展阶段上的各异，什么时候强调斗争与对抗，什么时候应强调协调与和谐，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况且，“和”并非无“斗”，“斗”也并非无“和”。“剪刀、锤子、布”的游戏中，三者之间并没有绝对的一方克服另一方，而是处于循环制胜的和谐关系上。一切对立而都或隐或显地存在着一种互洽共存的关系，“和”作为解决矛盾的一条“向下的路”（赫拉克利特语），是事物发展的一种动力和途径。以“和”的方式解决矛盾，是基于对矛盾总体性质、发展状况和对立面的总摄把握之上。这里需要知识、经验，要进行不懈的探索，甚至要冒一定的风险！显然，它与不讲原则、不分是非的“和稀泥”无涉。

第四、“和实生物”。“和”的另一层意蕴是“和实生物”。史伯对郑桓公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它平它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国语·郑语》）“和实生物”到汉代发展为“合和生物”。王充说：“天地合气，万物生焉，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论衡·自然》）这都是指事物是在多样性的统一掺和中产生的，单一的要素决不能构成新物。在传统文化中，“一”是单子，“二”是殊异，“三”（叁）是对立、杂多的统一，是完满，而“叁”即“和”，其作用，就是促使天地万物的化育。这反映出对事物生生相继法则的深刻见解，说明“和”是物之所生必不可少的前提。这一思想与现代耗散结构理论关于只有随时能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系统的内部格局才得以演化，系统才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思想是一致的。“和实生物”、“和合生物”的命题，赋以“和”开放的意义。

应当指出，“和”的文化构成了华夏文化的特点和优点，同时也包裹了其局限和弱点。作为一种宇宙观，“和”意示天道即是人道，只要执着于现世，便可获得来生的超越，而不用求诸彼岸世界的恩赐，因而，多了些入世的乐观，少了些出世的狂迷。而既然天人之间本就是一种同分异构体，也就大可不必过于穷天人之际，因而，多少也就忽视了主体对客体的探求与改造；作为一种思维方法，强调“和”，使在对事物的把握上有极强的宏观感与整体感，但由于缺乏必要的“分”析，这又难于使认识从经验提升为科学；作为一种行为方式，“和”强调“执中”、“适度”，却忽略“极”的价值，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极”的行为往往有可取之处；作为一种社会文化观，强调“和”，使华夏民族具有极强的凝聚力和同化力，却也在对此的过分玩赏中酿出某种封闭守旧，唯我独尊的心态；作为一种审美观，“和”所创造的静态的古典艺术，成为世界艺术史上的高峰，但却也在与西方近代艺术高峰的比照中，显出静穆而不激荡，浑一而不分解，在优美尽致之余缺少一种惨厉，悲壮和崇

高。

三、“和”文化的现代价值

今天,每一个认真思考、反省的中国人无不深切地感受到现代化进程中种种选择的困惑、抵牾和冲突。如何加以弥合、超越?这是一个极为现实的课题。透过历代思想家对“和”的林林总总的论述,破译“和”所蕴涵的文化密码,我们深深地感到,“和”的文化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思维视角或价值。“和”的文化所触及的人自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一系列问题,正是现代化建设中社会协调发展所必须迫切解决的问题。

(一) 天人之和——社会与自然的协调

如果说在原始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为以人的受虐意识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人对自然的恐惧与屈从,那么,在近代理性主义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则表现为以人的施虐意识为前提建立起来的人对自然的征服和支配。人类由于对自然的无限制的摄取、占有,导致了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日益严重的污染。好在人类今天已由过去那种基于理性的自信、乐观、一往无前的超越走向带有浓厚悲剧色彩的反省,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人类已进到了一个充满忧患意识的时代。当代新型的全球伦理应包括“发展一种对自然的新态度,它的基础是同自然协调而不是征服”(《人类处在转折点——给罗马俱乐部的第二个报告》三联书店,第143页)。而这恰好暗合着“和”的文化所揭示的“天人合一”观。在我国那个“人定胜天”理念被曲解的时代,由于不能正确地对待自然,酿出了许多苦酒。时至致力于现代化的今天,不少人仍把发展经济看成是一种人类向大自然索取的单向运动,将各种自然要素构成的生态系统,仅仅看作是一般的生产对象。这就造成我国目前生存空间不断缩小,生态基础十分脆弱,环境污染日益严重。这些问题正不同程度地转化为巨大的压力,制肘现代化的顺利展开。我国的现代化,必须寻求一种人与自然、社会与生态相协调的新型关系,树立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新型发展观,自觉增强环境意识和总体协调的发展意识。

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使自然界能朝着更利于社会的方向发展。把自然放在现代化的视野之外,现代化不可能有真正的成功可言。

由此看来,我国的现代化固然不可避免地突破天人之间的原始和谐,但并不意味着可以由此导向天人的对峙。合理的思路也许是在打破旧和谐的同时又在总体上建构新的和谐。人既是自然的光环与荣耀,却仍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不应“竭泽而渔”,而应持“子钓不网,弋不射宿”(相传孔子只钓鱼,而不以网捕之;射鸟,却不射眠宿之鸟)的宽容,对人类的家园——自然深怀感恩之情。这也正是“和”文化意蕴的历史性回归。

(二) 人人之和——社会张力的合理释放

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人际关系的冲突和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组织异质化程度的增大,出现了利益不同,特点、功能、规模各异,文化背景千差万别的群体;现代化进程中机会均等和成就自赋原则的确立并非一日之功,即使这一原则得以确立,也意味着竞争的激烈;况且,现阶段竞争行为的失范也时有发生。因而,利益冲突、心理冲突普遍存在。另外,早发型国家对后发型国家的示范效应,又往往导致国民过高的期望值和失落感,容易引发过激的心理、行为,导致社会的震荡。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除了直接对抗国家人民的刑事犯罪分子之外,这种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个人、群体与政府之间的矛盾,绝大多数是根本利益一致上的矛盾。人们的某些不满情绪、行为,即使是某些失范与越轨,也不能看作是不可调和的对抗与冲突。因而,要解决这些矛盾,实现有效的社会控制,促进现代化的有序展开,如果依靠剧烈的外部斗争方式将是于事无补的,而单靠以惩罚或压抑的刚性控制手段,也难以奏效。“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在和平建设时期被宣告失效。调和与化解的方式才是可靠的选择。其突出作用,就在于以维护群体团结和社会稳定的方式,来松弛紧张与冲突,消减不满与愤懑,以合

法的方式宣泄、排遣压抑,在冲突中保持一种必要的弹性和合理的张力,缓冲社会的震荡,提供一种相对平和宽松的氛围。营造有利于推动现代化建设的良好环境。

(三)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和谐共洽——现代化品格的铸塑与呈现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是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基本问题之一。工具理性肯定了人类睥睨万物,涵容宇宙的恢宏的理性力量,确证了人的主体地位。然而,工具理性并未达到主体的内在超越,由于其抽去人类情感和信仰的力量,由理知唤起的主体精神便显得苍白,价值理性从更为本体的层次上肯定了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直接从人的情感和精神层次需要上,将人类崇拜的对象由它物转为人自身。绝对倚重工具理性,斥拒价值理性,必然导致人对目标、功利的畸型膨胀;反之,如果忽视工具理性,则所谓终极理想也将坍塌。简单的道理是,当人类仅仅关注于物质利益,仅仅关注于物质家园的构筑时,必然显得人生的单调与乏味;而当人类无法营造自己的物质家园时,任何精神召唤必定底气不足,精神家园也将显得虚无飘渺。

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对工具理性的倚重,实现了经济的腾飞,然而由于对价值理性作用缺乏自觉,导致了物欲世界的泛滥,人际交往异化,情感生活萎缩和信仰、理想失落。我国建国后有一段时间,却走了一条相反的道路,将信仰、理想幻化,实际上表现为对价值理性过分渲染,而漠视工具理性。结果留给后人的只是一则空头政治的现代“乌托邦”笑话。中西现代化道路上两种理性背离的教训是深刻的,“和”文化互补共济的价值观,在中国现代化品格的铸造上将发出会心的微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确立,“姓社”、“姓资”论争的澄清,宣告了以往以对价值理性单纯热情来取代工具理性冷静思考的行为是幼稚的。但是另一面,在中国这个具有悠久、浓厚人文精神积淀的大国展开现代化,失却对终极价值的热忱与追求,同样会阻滞现代化的进程。当前,社会转型期的某种价值空白,社

会上功利原则的某种片面导向,已使现代化建设显出种种的尴尬。实践证明:随着现代化的全面深入,两种理性的渗透互摄、适度张扬与和谐共洽是极为必要的。具体地说,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并非仅仅是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必须体现在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上,转化为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并且通过可实际操作的规章制度深入人心。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同样,市场经济也决非是一种单纯的经济行为和纯粹的工具理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将在刺激技术、经济进步的同时,使人们从一切非经济的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还人以独立自主的现实存在,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它应具有一种把工具理性升华到价值理性的内在冲动。

如果说,在西方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功能互补、协调的意义主要是以非自觉的方式实现的话,那么,在今天的中国,其协调互补、和谐共洽、珠联璧合则将成为自觉的选择。“和”的文化意蕴所展示的,也许应该是这种选择的理性基础。

(四) 和平共处——处理国家之间关系的新思考;“一国两制”——和睦兴邦的必由之路

今天世界仍存在着许多的动荡与不安,然而现实已使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战争并非是解决争端的好办法。同样,以意识形态先行的作法于人类和平与发展也无益。世界的繁荣、文明的进步需要更多的宽容、理解和合作,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代世界的主题。在这种背景下,“和”文化在某种意义上为当代人类的和平发展提供了一个民族的历史经验,也为人类提供了一个新的思维视角。“和而不同”对人类共同体中的和谐相处是一条重要的原则。即使己之所欲,也不必强施于人,因为不同的国家、地区、民族有不同的历史和现实,输出革命固然十分荒谬,要求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所有的人都必须按同一种价值方式生活也绝非明智。

实现港澳回归、海峡两岸统一是炎黄子孙的历史使命,实行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是

抗日战争时期的李汉魂

□沙东迅

中华民族走向振兴的必然趋势。从经济发展上看,港澳、台湾已取得相当的成就,但也面临着继续发展中的许多难题;大陆 16 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但目前,现代化建设亟需引进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在当前国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全球地区经济保护主义高涨的情况下,双方在很多方面已形成很强的互补之势。从政治上看,两制共存,和平统一,更有利于中华民族以强盛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和则两利、斗则两伤。当然,由于历史的原因,强求一致,既不现实,也不可行。当前应该积极探索如何建立一种真正取长补短、和平共促的良性机制。“一国两制”的构想已为此提供了一个总体的设计框架。可以相信:“仇必和而解”。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设想既是现实的要求,也是历史的必然。

现代化意味着社会—文化系统的转换。当代任何一个民族的社会文化,都已被整合到世界体系之中。这使得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不必重复西方文化的近代、现代等不同时间维度所孕育的文化范式,而在共时态意义上对它们的整合提供了可能。“和”的文化提供的思维视角是在承认差别、矛盾的基础上求得协调发展。中国的文化现代化整合运动正是在这一点上体现了“和”的意蕴:它并不排斥人类精神的内在差异,取消精神的各种具体样式,而只是对其作出扬弃;它不是各种时间维度精神样式的机械堆积,而是揭示其内在本质的契合点,在多极中求和谐。

思想家曾用:“信仰的时代”、“冒险的时代”、“分析的时代”等语言来标示不同时代人类精神的特征。也许,21 世纪应该是“和”的时代。回顾扑朔迷离的历史,放眼未来,我们深深地意识到,传统并不是人类记忆长河中的浮岛,而恰恰是长河本身。现代化时期,是人类极不协调而又必须致力于协调的时期。“和”——这一体现着东方智慧的文化,已远远超出了古代的文化范畴,而具有更为深广、更为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意蕴。新的历史承载,要求新的思想空间!

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责任编辑:冯 生

李汉魂(字伯豪,广东吴川人)生于 1895 年,早年参加同盟会,习武从军投身旧民主革命运动,大革命时期,投身北伐战争,为著名的“铁军”之一员,屡立战功而升迁;后参加追剿红军的活动,驻兵韶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率部警备粤东,奋战华中,重创日军,屡立战功;特别是自从广州失陷后,他接任粤省主席近 7 年之久,坐镇粤北,统管全省,工作兢兢业业,政绩卓著,颇为粤

人所称赞。抗战结束后不久为治疗耳疾回避内战即偕同妻子儿女赴美国。1949年初,蒋介石被迫下野后,李宗仁代总统任命李汉魂为总统府参军长,授陆军上将军衔。先后任何应钦、阎锡山内阁政务委员兼内政部长。10月16日在香港宣布辞职。12月与李宗仁夫妇飞往美国,实际基本上脱离了台湾蒋介石集团。1982年以88岁高龄,应廖承志副委员长邀请,偕夫人吴菊芳及子女回祖国大陆参观访问,受到叶剑英、邓小平的接见。1987年6月30日因病在美国纽约逝世,享年92岁。①祖国各有关部门分致唁电哀悼,并对他的历史功绩和爱国行为,予以赞扬。

一

1935年,广东独立第三师改编为陆军第二军第六师,李汉魂任师长,驻军汕头,兼任广东省东区绥靖委员,管辖24县及市、局各一。

1936年1月,国民政府授予李汉魂陆军中将军衔。5月,升任第二军副军长,免兼第六师师长,仍兼广东东区绥靖委员。正当此时,陈济棠、李宗仁发动了“两广事变”。李汉魂见国难已深,为了顾全大局,7月6日,由汕头致电陈济棠,辞去职务,劝其取消行动,并封金(库存20余万元)挂印而去。电文中还希陈“翻然变计,目标只在抗日,领导仍仰中央”,“不应于强邻虎视之时,兄弟阋墙,令日寇坐收渔人之利……”。又通电粤中将领,联合劝谏。不久“两广事件”和平解决。蒋介石对李汉魂在“两广事件”中的表现十分赞赏。7月20日,国民党中央发表电令,李仍任广东东区绥靖委员及第二军副军长兼任第六师师长。8月,第六师改为155师新番号,李仍任该师师长,随后奉命由韶关移驻潮汕。是年底获三等云麾勋章。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战爆发。此时,李汉魂已升任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第64军军长兼第155师师长,下辖155师、156师,驻军潮安。②是时,日舰环伺潮汕沿海,李率部积极备战,准备抗击日军进犯,还预立遗嘱,誓死守土。9月,兼岭东防空司令。10月,兼广东第五区战时

民众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同月上书国民政府请缨赴沪参加抗战。12月,奉命率部移防惠州,后改增城。当时中央军委副委员长冯玉祥将军写了一首《斥汉奸、颂良将》的诗也赞扬了李汉魂。诗曰:“君不见,奋力为国拚性命,佟(麟阁)赵(登禹)英名传五洲。汕头师长李汉魂,誓死不屈把土守。”

1938年4月28日,最高统帅部电令64军全部调赴武汉,并限5月10日到达。李5月10日飞抵武汉,即面见蒋介石及武汉卫戍总司令陈诚,领取了军令,率军调往河南省归德(今之商丘)。

这时日军精锐第14师团土肥原率部已由濮阳大举南下,渡过黄河,进袭鲁豫交界、经陇海铁路绕鲁西南转入河南大平原的门户兰封,其意图是在于堵截我在津浦线上大军西撤之路。当时徐州会战以后,我军完成了对敌的消耗目的,李宗仁指挥的10万兵员正需要急速向陇海线方面撤退。第一战区司令程潜、豫东兵团总司令薛岳奉统帅部命令于6月初旬以前保住豫境郑州以东的陇海线,因为徐州大军可能在这限期前西撤完毕,同时战场上将会出现另一阶段的新部署。敌派骁将土肥原一个师团在罗王砦车站一带驻守,以图切断自徐州南下的通道。薛岳下令李汉魂限一昼夜攻克罗王砦,否则军法从事。李奉命后,即召集部属商讨作战计划,决定5月25日凌晨1时施行总攻。原来155师已占领了罗王砦车站,但又撤出,造成失误,所以这次接受命令后,全体战士(以粤籍者居多),均抱以身许国之心,表示不负“广东健儿”称号,立志再克罗王。25日午后,155师又一次冲入站台,把敌人压向站外;然而敌方恃其火力炽盛,又抢入站台,我方战士不得已撤出,傍晚攻势再开始时,薛岳亲临指挥所指挥。命令58师加强对何砦、范店之攻击,以牵制罗王车站敌方兵力。5月26日拂晓,罗王砦正面再由64军发动攻击,155师仍当前列,午后,李汉魂命令援军炮兵伴随步兵前进,至接近敌人千米然后发炮,至27日,经过浴血奋战,终于突破罗王砦敌军主阵地,收复罗王车站及村砦。东线71军亦同时克复兰封,陇海铁

路重新打通,使我火车42列全部安全撤回,经开封、郑州西驶。是役敌我伤亡相若,在缴获品中发现有土肥原自佩军刀一柄,证实此次土肥原亲至砦内指挥,为漏网之鱼。此次大破敌人精锐土肥原师团,打通陇海线的胜利消息传出,轰动中外,鞭炮彻夜不停,各地贺电如雪片飞来。军政部长何应钦说:“历次作战从未有力攻陷敌人据点者,有人,自此次155师始!”蒋介石在武汉还邀李汉魂共进午餐,以示嘉许。李因功获颁华胄荣誉奖章。

6月9日,李升任第29军团长,仍兼64军军长。6月15日,因武汉告急,奉调南浔线,参加保卫武汉大会战。当时李被编为第九战区(司令陈诚)第二兵团任总司令,率部坐镇九江、马头镇、马当等要点,阻击日军溯江而上。7月23日,日军两个师团在九江以东的姑塘、启家庄登陆后,在其海、空炮火支援下,向九江守军展开猛烈攻击,李部激烈抵抗3天后撤离九江,退守南浔铁路一线。日军占领九江后,企图沿南浔铁路南下,李率部顽强抵抗,重重阻击,双方相持1月之久,使日军不能再前进一步。10月21日,华南重镇广州不发一枪而弃守,武汉外围的要塞也均被日军攻陷,粤汉、平汉铁路被切断,10月24日,蒋介石下令放弃武汉,历时4个半月之久的武汉会战结束。李汉魂在此期间,前后指挥过31个师,于9、10月间取得几次胜利,与广东第十二集团军不战而败形成鲜明的对比。由于武汉会战中作战有功,李升任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29军团长,还获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赠“忠勇无双”锦旗1面,所辖第64军荣获“钢军”旗帜一面。

11月14日,李汉魂奉命率部由赣北回师救粤。^③

二

广州不战而失,使广东人民对广东军政当局非常不满,曾以“余汉无谋,吴铁失城”的民谣来讥讽。国民党中央当局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除给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记大过、革职留任处分外,还撤换了省主席吴铁城的职务。1938年12月23日,国民

政府正式任命李汉魂为广东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长。(不久辞民政厅长兼职;后曾兼广东军管区司令、广东省保安司令、建设厅长、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主任委员等要职。)

李汉魂于1939年元旦在连县就任广东省主席职,随即将省政府迁往韶关。并于1月25日发表了经省府会议通过的《告广东各界同胞书》指出:当以“抗战高于一切”为前提,作各方面之发动,做到“人人抗战,处处抗战”,“以保持我独立之主权”,要“加紧政治动员,以协助军事而收复失地”。提出当务之急是:“褒扬忠义,选用贤能,铲除贪污土劣,肃清汉奸土匪,以及厉行禁烟禁赌”、“成立省振济会,……从事难民难童救济,失业失学救济,以及疾病灾害救济”。又明确指出,抗战至此阶段,“决胜已不在都市而在乡村,主力已不在士兵而在民众”,所以必须“一方面从事乡村经济之建设,一方面从事于人民之组织与训练,……”。他向全省父老乡亲表示,“锋镝余生之汉魂”,决心“卧薪尝胆,沼吴有日,目的所在,不达不休”。^④李汉魂这些方针政策和决心是符合当时广东的实际情况的,广东人民给予欢迎、寄以希望。

当时李汉魂面对的广东形势非常严峻。沿海地区,包括富庶的珠江三角洲、海南岛、广州、汕头、佛山、江门、海口等大中城市,三分之一的人口和地区都已先后沦入敌手,而省政府能够管辖的多为贫瘠落后地区。在陈济棠时期刚刚建立起来的工业、交通、财政金融、邮电通讯、文教卫生等等设施都受到敌人严重的破坏,日军到处烧杀淫掠,人民流离失所,四出逃难,李汉魂的确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在任内做了不少艰巨的工作,取得卓越的政绩,为广东人民所称道。

首先,民政方面。

(一) 整饬吏治

李的整饬吏治,惩办贪污,在粤西北区工作时已驰誉全国。李就职后颁布了公务员五守约:1、不得营私舞弊贪赃枉法;2、不得庇护烟赌;3、不得擅自加人民负担;4、不得玩弄功令;5、不得擅自离职守。违反者依

法严惩。

行政接近人民的基层组织为县政府,李对县长的任用,异常重视而谨慎。制定县长工作的标准两条:第一,县长以爱民为第一要义。爱民首在亲民,故必须经常出巡,深入民间,勤求民隐,一切兴革均以民众利害为前提;第二,现在的县长,一面要鼓励民众抗敌守土,一面要引导民众致力建国,要以自身为表率,振奋精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县长职责所在,更当矢其忠勤。在中央派李宗黄来韶宣传讲述新县制之后,李汉魂即极力推行,以粤北曲江、乐昌等7个大县作为新县制的试点。为了贯彻行新政用新人之旨,乃商准考试院于1942年在曲江举行第一届广东省县长考试,李汉魂奉派为典试委员长,应考者700多人,只取录8人,先后派任县长,以推行新县制。

此外,李为了加强抗战力量,在组织上陆续增加了民、财、建、教以外的许多机构,如行政效率委员会、行政干部训练学校、统计处、侨务处、田粮处、救济处、盐务局、妇女联合会、社会救济院、华侨农场等,规模完备,效益显著;特别是设立广东省临时参议会,以发扬民意;同时对兵员补充训练,亦很出色,为粤北第一、二次大捷,直至抗战胜利以及广东部队参加第二方面远征军(赴越南)打好了基础。

(二) 救济港澳同胞

1941年12月李汉魂闻悉日军进攻香港,十分关怀,拟派兵从淡水等地往援,但缓不济急。当时香港180万人口,90%是广东人,而且中央及省的军政人员在香港亦不少,如何使他们脱险归来?又闻敌人以香港粮食不足为由,将强迫疏散70万人回乡,应如何救济不使日军鱼肉?于是在韶关各界和机关团体组织成立“紧急救济港侨委员会”。

1942年1月制成《救济港侨工作大纲》,要点如下:

1、凡归侨经过的地方,无论县城、市镇应即成立“救侨办事处”和“归侨招待所”,负责招待归侨膳宿。

2、归侨回乡,每人每日发给旅费2元。

3、其无家可归或愿意留韶参加抗战工

作的应妥善安置。

脱险回韶的人员,最初为陈策将军,继而有中委邓青阳、詹菊似、罗翼群、胡文藻、省银行副行长曾晓峰、华侨领袖司徒美堂和陈济棠等。他们都受到省军政部门的热情接待。

香港同胞每日经淡水等地,背负行李拖男带女而回者不下千人。李汉魂即飭沿途各市镇设立办事处及招待所,照章招待并发给旅费;并严飭各地团队认真搞好治安,保护归侨安全回到自己的家乡,当时归侨无不感泣,谓李主席爱民如子,真不愧为民之父母。为了紧急救济归侨,李汉魂曾发起“出钱救侨运动”,李即席捐助1万元,余汉谋亦捐助1万元,各厅处长以及各界人士亦分别捐助。最后省政府捐助50万元,省银行捐助30万元,共捐得100万元左右以应急。至救侨工作结束时,其支销除中央拨来1000万元,救侨运动捐助100万元以外,尚略有不足,后由省赈款内报销。^⑤

其次,财政方面。

日军入侵时,广州市及滨海滨河富裕县多数先后沦陷,税源大大减少。战前1937年广东税收为3000余万元,1938年减为1300余万元,^⑥财政异常困难。

当时省政府主要采取了节约支出,筹措公债,整理旧税,开征新税等措施,1939年逐步恢复。1940年全国口岸已被敌人封锁,惟广东还可以从东江的沙鱼涌和南路的广州湾(湛江)附近的麻章输入,省政府在宝安和遂溪设两个税局,大抽“舶来品”税,使税收大为增加。^⑦又利用人民的爱国热情,我方税收人员与敌伪在沦陷区和游击区争夺税收。

1940年收支数已超过战前1倍,1941年又打破本省有史以来财政入不敷出的记录。1941年以后,省财政并入中央财政系统。当时省库尚存现金2200多万元,拨作建设特种基金,使各项工厂的重建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⑧

广东海岸线长,港叉分歧,为走私犯出没之地。抗战军兴,走私猖獗,一方面走私漏税,运入仇货;一方面偷运违禁品出口资

敌。李汉魂乃下大决心,彻底整理缉政。1940年1月颁发《广东缉私组织规程》,成立“广东省财政厅缉私处”,其下分设“查缉专员办事处”6个,“查缉所”45个,“查缉哨”25个,“查缉组”1个。于是缉私网遍布全省各地,使走私大为减少。

广东从1941至1944年共征到各种田赋约830万市石。^⑨除田赋外,广东也发行了中央和省的公债和金库券,以解决战时急需。从1938年至1945年6月止,共募得国币15848万元,美金310余万元。^⑩

调整并加强了银行机构。1938年2月,广东省银行将实业银行、丝业银行合并,4月添设农贷部。至1941年5月,省行在省内设各级机构80多处,在新加坡也设有分支机构。中央、中国、交通、湖南、华侨等银行均在广东设有分支机构。^⑪因琼崖孤悬海外,环境特殊,经中央财政部特许发行地方券,对稳定当地的抗战起了良好的作用。省行还推广农贷,开展信托、储蓄业务,经营食盐、汽油,并在游击区发行生产贷款,对促进生产和供应也起了良好的作用。

以上种种措施,有力地粉碎了敌人的金融战和防制了敌人经济侵略的阴谋。

省政府还成立了“粤侨通讯处”,继而饬令省银行积极推进侨汇业务,并扩大储汇网,改善手续,举办“航电联汇”,特别优待,减低汇费。^⑫省行以吸收侨汇为中心工作,扩设海外行处(以美国为重点)使侨汇增加。^⑬粤籍华侨占华侨人口总数之70—80%,占侨汇总数85%。1936年粤侨汇为2.72亿元,1937年为3.83亿元,1938年为5.10亿元,1939年为10.20亿元,1940年为10.20亿元。^⑭这巨大的侨汇,使广东进出口贸易、外汇得以平衡,经济上能够维持,有力地支持了抗战建国大业。

再次,建设方面。

战乱时期,搞经济建设极为困难。但李汉魂认为,一面抗战一面建设是基本原则,而建设成功,则农产品丰收,工业品增产,足以壮大抗战的力量,为抗战胜利打下物质基础。

省政府制定了后方经济以农业为重心的

注意增加粮食、原料、外贸农产品和农民副业的生产,并提出“以粮食生产与工业建设同时并进”的施政纲领。还确定经济建设重心,从敌占的珠江三角洲转移到抗战后方,尤以粤北为主。

农林建设方面。省政府认识到,农林建设居于经济建设的首位。而增加粮食生产、开垦荒地、改良水利以至保育耕牛、防除病虫害等工作,均属农林建设之首务。

1、增加粮食生产。广东向来缺粮,每年缺粮1000万公担,岭东、琼崖等地区尤甚,其不足部分几乎全赖进口洋米供应。抗战全面爆发后,省政府为适应长期抗战,使整个战时粮食管理办法实施有效起见,于1937年12月组成了广东粮食委员会,采取了如下措施:

(1)发出大量农贷。1941—1943年共发1.1亿多万元。^⑮

(2)推广优良稻种,主要是推广中山大学农学院丁颖教授等培育的新良种。至1944年在曲江等25个县已推广133.9万余市亩,增产10—30%。在山区还推广山禾(陆稻、畲禾)。

(3)改良肥料。推广堆肥菌种、骨肥及绿肥等,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1940—1944年度,堆肥菌种22万多克,骨粉约35万市斤,绿肥54万多市亩。

(4)大力推广冬耕。过去广东,特别是粤北对冬种不大重视,为了增产粮食,省政府大力推广冬耕冬种,发放冬耕贷款,从1940—1944年共6000余万元。结果冬种面积达1834.9万余亩,占总面积50%以上,较战前增加1倍有余。1939—1943年共产粮食2.16亿市担,每年平均约4312万市担(包括杂粮、油菜等)。中央农业部一官员认为:“冬耕成绩以广东为最优。”得到中央的奖励。

(5)大力开垦荒地,特别是发动义民和华侨、港澳同胞垦殖荒地。1940—1944年度共垦荒109万多市亩。

(6)推广种植杂粮(木薯、番薯、玉米等)备荒作物。据35个县报告,种植面积约为38万市亩,收获量为300多万市担。

(7) 开展农田水利建设。组织水利测量队, 1940—1945 年施测总面积达 84.4 万市亩, 已完成白马乡、乐昌指南乡等 10 项工程, 灌溉面积达 8.65 万市亩。从 1943 年起, 推行一保一塘运动, 到 1945 年 6 月止, 共完成 5500 余宗, 受益面积达 87.2 万余市亩。^{①⑥}

由于采取了上述种种措施, 加上抗战头几年风调雨顺, 1938~1942 年粮情较为平稳, “1940 年以湘、鄂、赣、桂、粤五省收成尤佳。”^{①⑦}1942 年初, 广东名列全国积谷竞赛之首位。即使如此, 广东仍缺粮甚多。据 1940 年度统计, 东莞、新会、台山、徐闻等 41 个县共缺粮 1877 多万旧担。^{①⑧}

2、注意发展林、牧业。扩大原有林场, 分为东、西、北、中 4 个林业促进指导区, 7 所示范林场、苗圃 9 所, 至 1941 年 6 月, 各县林场面积 12.3 万市亩, 全省群众垦荒造林面积达 76.6 万市亩。至 1944 年乡镇保公有林 58833 市亩, 示范林场 3003 市亩。^{①⑨}

工业建设方面。战时广东工业建设困难极大。由于刚刚处于兴盛时期的省营工业在广州失陷时绝大部分未及内迁, 几至荡然无存, 其他民营工业损失也很大。自 1939 年省政府迁韶关后, 对省营工业曾谋复兴, 但最初两年发展不快。自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 国际形势紧张, 为防工业品输入断绝, 遂致力重建省营工业。根据战时的实际情况, 受战时财力、机械、原料及人才等的限制, 决定建立一些中小型工厂, 散布于各安全地区, 以适应战时环境。四处招聘技术人员, 深入沦陷区及香港抢购机器。设立宏大的实业公司, 推广横向贸易, 抢购物资, 同时准备大批车辆和其它运输工具, 推动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至 1941 年上半年止, 省营工业仅建有电池、肥皂、药棉 3 个厂。1942 年成立工业试验所。至 1944 年增设了 9 个厂, 还有广东企业公司开办的 8 个厂, 省银行经营的 4 个厂, 省振济会主办的 24 个厂。总之, “抗战时期广东工厂之多甲于邻省。”但上述各工厂, 资本额最高的不过二三十万元, 少的仅有数万元, 或更少, 设备之简陋、生产之薄弱, 可想而知。

加紧发展战时交通。主要集中在粤北发展公路交通, 兴筑了连贺路与星坪路, 成为联络粤桂湘交通的重要公路。连贺路粤境路段 63.5 公里, 星坪路 80 公里。修复翁新路官金段, 全长 46.5 公里。改善公路: 1939—1945 年 7 月共 37 宗, 5744 公里, 改善桥梁 184 座, 涵洞 164 座。加强养路工作, 拨抢修费 60 万元。增辟驿运路线 6 条。^{②⑩}

架设电话线方面。以韶关为中心, 东通兴宁, 西南至茂名, 北接湘赣边境, 西及连山, 与重庆中央各部办长途各线联接, 均已畅通无阻。由 1939 年 1 月起至 1944 年 12 月止, 架设电话线 30 条, 长 3394 公里, 全省电话网大部完成。1945 年 1 月韶关失守时, 破坏线路 1367 公里。省府东迁后, 复架设 10 条新电话线, 长 564 公里, 到 1945 年 8 月, 共有线路 2571 公里。^{②⑪}

复次, 文化教育方面。

韶关虽为粤北重镇, 但文化教育却异常落后, 当 1939 年春省政府迁来之初, 此地尚无一间报馆, 也没有正式的书店和印刷所。但大敌当前, 在国共合作的推动下, 粤省当局很注意战时文化工作。

首先, 组织各种文化艺术组织。

第二, 积极开展抗日文艺宣传活动。

第三, 大力发展新闻、出版事业。

这些措施, 使广东的敌后、前方都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抗战文艺运动蓬勃发展的气息, 对团结抗战起了重要的作用。

粤北战前教育事业比沿海地区落后, 大专学校一间也没有, 只有少量中小学, 战乱更造成重重困难。从沦陷区陆续迁来的学校, 图书、仪器、标本、设备几乎损失殆尽, 难以恢复。

李汉魂认为, 要把中国建设成为文明大国, 首先在推广文化办好学校。虽在抗战时期, 仍应打好基础。通过教育厅饬令各县以一保设立一间完小为原则, 经费困难者可申请补助, 故一时全省中小学蓬勃发展。

广州沦陷后, 广东所有大专院校或停办, 或他迁。李汉魂乃大力筹办教育经费 (包括中央拨款和地方筹款), 择定安全地点, 使各校迁回广东, 安定培养人材。中山

大学从云南迁回粤北坪石、乐昌，勤勤商学院由广州湾麻章迁回粤北桂头，并在桂头恢复了广东文理学院。省政府拨款使广州大学在粤北黄田坝建筑校舍复校。国民大学则部分迁至梅县。岭南大学、仲恺农校等也迁来粤北。这些都给当地教育事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使粤北成为全省教育的中心。

中等教育也有所发展。1945年度中学学校合计507间，学生141517人，教职员11038人，比1937年增加200间，增加82.98%；74002名学生，增加109.55%；3956名教职员，增加55.85%。各类中学都有增加162间，68858名学生；师范学校增加21间，4733名学生；职业学校增加17间，411名学生。

在艰难的战时环境条件下，广东高等教育有较大的发展，这是难能可贵的。1937年度大专学校7间，学生人数5178人，教职员人数1137人，1945年度13间，增加6间，大学生10990人，增长112.2%，教职员1462人，增长28.6%。^②

抗战时期，在李汉魂为首的广东省当局对抗战文化教育比较重视，尚能在遭战乱被浩劫的艰难困苦中惨淡经营，取得较好的成绩，1945年反而比战前各级教育均略有发展，这在全国也是少有的，为国家、为民族做了好事，应该实事求是地予以充分肯定。

1945年1月，韶关失守，广东省政府迁往龙川。5月，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举行，李汉魂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6月，日军东进，李汉魂仍坐镇龙川应变。其后省府再迁平远。7月李汉魂获得国防最高委员会颁发的“耕工竞赛”第一名奖状。8月13日，得悉国防最高会议已通过准李汉魂辞广东省政府主席职，派罗卓英为广东省政府主席。14日，日本正式投降。18日，蒋介石任命李汉魂为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李自1939年元旦任广东省主席职至卸任，达6年又8个月。9月1日，李办理移交，并发布《留别广东各界同胞书》，依依惜别。

①②⑤参阅《李汉魂将军日记》，朱振声编纂，1975年5月初版，香港联艺印刷有限公司印；关志昌：《李汉魂的一生》，台北传记文学第51卷第3期；陈利克、廖新强：《李汉魂》，解放军出版社的《民国高级将领列传》第四集，等等。

③《李汉魂将军北伐、抗日实录》，吴川县政协1988年7月出版。

④《战时粤政》，广东省政府编译室编印，1945年9月出版。

⑥《战时广东省财政》，载《广东一月间》1940年1月号。

⑦秦庆钧：《在国民党政府机关当会计主任的回忆》（手稿），存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第51号卷。

⑧《战时粤政》第一编第94—95页；秦庆钧：《李汉魂主粤政绩概述》。

⑨陈骏南：《广东田赋纪实及整理途径》第91—107页。

⑩据《中国战时经济志》第19册内〈中国战时财力总动员〉第17—91页，沈雷春编，台湾文海出版社出版；《战时粤政》第一编第10—11页。

⑪《中国战时经济志》第19册内〈中国战时的金融政策〉第34—42页。

⑫任泉：《抗战四年来之广东侨汇》，载《广东一月间》1941年7月号。

⑬以上见任泉：《广东西江我敌金融战策略》，载《广东一月间》1941年6月号；《广东金融的首脑部》。

⑭《广东经济年鉴》（下），广东省银行1940年度出版。

⑮《广东大事记》，载《广东一月间》1941年9月号。

⑯⑰⑱《战时粤政》第一编。

⑲《中国战时经济志》第19册内〈中国战时的产业动员〉第36页。

⑳《广东经济年鉴》（上）第十章K5页。

㉑李瑛：《粤省的农林建设》，载《广东一月间》1941年6月号。

㉒据《广东教育统计》，广东省政府教育厅1947年编印。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科院历史所
责任编辑：凌峰

晚清佛学与近代社会思潮

□麻天祥

两汉之交,佛教东传,在中国经历了初传、兴起,至隋唐便在空、有二宗分野的基础上,逐步发展成为天台、华严、净土、禅宗等中国化的佛教派系和独具特色的中国佛学。其在思想理论上,集数百年之英华,援儒入佛,重点阐述心性论问题。特别是禅宗,把心外佛变为心内佛,由外在超越转向内在超越,实现了中国佛学的第一次革命。宋元以降,佛教在经历了鼎盛之后转入了全面渗透的阶段,特别是禅宗直觉体悟、凝思寂虑等非理性思维方式,物我两忘的精神境界,随缘任运的生活态度,恬澹幽隐、亦庄亦谐的审美情趣,直接影响了知识阶层,并渗透到整个社会心理,积淀在中国文化的各个层面。这一时期,禅风虽然炽如烈火,理论上却无甚建树,“窄而深”的研究趋于神秘主义,机锋棒喝已遁入奇诡怪戾之途。超亡送死,与鬼为邻;逃禅避祸,远离嚣尘。寺僧多乏学力,佛教宗风衰颓,隋唐时代教理昌明之象已丧失殆尽。但佛法全面渗透的结果却蔚成士子学人研习佛典之风,佛儒汇通之势反而强化了佛学的入世转向和参与精神。

道咸以降,国势凌夷,知识阶层早已失去附庸风雅,浅斟低吟的宣政风流,更无威加海内,歌舞升平的康乾雄姿。年少气盛之士无不疾首扼腕,倡言变法。然而固有之旧思想,寻章摘句,为六经之奴婢;传入之新思潮,来源浅陋,与传统心理格格而不相入,均不足以承担救亡图存之重任。于此“学问饥荒”之时,所谓新学家者无不祈向佛学,欲冶中西、儒佛、新学哲学为一炉,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新学问,因此

而把佛学变成与当时社会思潮谐振的愤世疾俗的慷慨悲歌。原来追求内在超越的佛学一变而为关注国家兴亡、社会政治和人生问题的经世之学,实现了佛学由出世向入世的第二次革命。如果说晚清佛学是一支以经世为特征的通向未来的伏流,那么,它与近代社会思潮的结合,便是在现实社会中掀起滔天巨浪的理论源泉。

可以这样说,由超越变参与,由出世而入世的晚清佛学,是中国佛学在近代复兴的特殊形态。佛学的双相二重否定,双向价值取向,^①为晚清佛学的涉世精神提供了理论依据。它反对科学却包孕科学;崇尚信仰又长于思辨;追求出世而又呼唤入世;否定理性却又在构建自己的玄理。晚清佛学正是在上述宗教与科学,信仰与理性,思辨与直觉,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冲突中,实现其入世转向的。

梁启超有言曰:“晚清思想有一伏流曰佛学……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②这支伏流导源于乾隆年间的居士彭绍升。龚自珍、魏源以下,石埭杨仁山推波于后,“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会”。^③居士佛学的兴起推动了晚清佛学的发展,杨仁山以下,不仅有以太虚为代表的“汉系”寺僧和以欧阳渐为首的“宁系”居士,而且诸如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熊十力、汤用彤等著名学者也都同金陵刻经处有关。

概而言之,近代社会思潮中的佛学是由学者、居士和寺僧三个方面,从经世致用和哲学思辨两条道路向前推进的。寺僧重在卫

教,居士意在弘法,思想学术界的佛学研究宗旨则在于利生。三者虽有不同,然而其参与精神不仅推进了整个社会的变革,而且也实现了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并铺就了一条从本体高度反观人生的玄览之路。

清末民初,整个社会的剧烈变革动摇了前此以往的思想观念和共同奉守的伦理生活。“姬孔之言,无复挽回之力,即理学也不足以持世。”^④现实世界的没落为新思想清扫出一块诞生之地,社会革命也进一步要求哲学之革命。于是,学者们开始由皓首穷经,以经学形式论证王治问题,转向辩证思维,以哲学形式探讨心性问题和经世理论。具有严密逻辑思辨性的佛教哲学,便成了他们首先选择的对象。前起龚自珍,中经谭嗣同、梁启超,继以章太炎、熊十力等,无不从佛学中撷取真如、心识、缘起,三性、四谛、六尘、八识诸如此类的范畴,并藉助其思辨的方式,探求人的本质,人在社会和自然中的位置,人的认识的来源和藉以实现认知过程的形式,由是建立起以人为本位,并从本体高度反观人生的哲学体系。

这条道路发源于龚自珍晚年对天台宗的研究。至熊十力而形成了20世纪反观人生的玄览之路,基本上完成了近代哲学革命。可以说,谭嗣同心本体论的多环状经世佛学逻辑结构→章太炎可以认知的真如本体论及围绕“识”自体展开的多重关系,半开放式的认识圆圈→熊十力无形无象。体用不二的本心本体论,是这一思辨之路的主线。而梁启超的佛教哲学研究,在这条主线中,不仅对佛教哲学有新的创见,而且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谭嗣同与龚自珍具有类似的思想特征。龚氏口不择言,动触时忌,是放荡不羁的才子;谭氏则是对国势有切肤之痛,对时政刻骨铭心憎恶的桀骜不驯的斗士。龚氏醉心仕途却落拓江湖,谭氏积极的参政意识和献身精神,最终使他血染菜市口。他的诗“画里移舟,鸥边就梦;镜中人影,衣上添香”实得龚氏浪漫主义风采之三昧。他大声疾呼要效法陈涉,杨玄感揭竿而起,拚九死以求一生,足见其革命性远在龚自珍,也远在魏源、

康、梁诸君之上。所以,他的哲学也无处不表现“不可一世之概”。虽然它着重论述了心本体的态势,以及心、心力、仁、以太、体用、道器等各种范畴的相互关系,但它那以平等为内涵的政治理想,以日新为宗旨的社会变革方针,以救世为准则,以勇猛无畏为精魂的自我奉献精神,始终表现出鲜明的社会批判意识和强烈的现实政治要求。因此又与魏源所开创的以经术求治术,以佛法求世法的经世之路保持着一定的联系,故称其为“经世佛学”。这是近代建立新的哲学体系的第一次伟大尝试,为其后的章太炎、熊十力开拓出一条纯哲学思辨的径路。

章太炎的佛教哲学研究尽管也表现了“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强烈忧患意识,注意力同样集中在社会政治问题之上,但在疾呼“种族革命”的同时,又唯恐哲理“将成广陵散耳”,^⑤有意识地进行了一场哲学革命。以纯思辨的形式,构建起以人为本位,包括本体论的确立,方法论的探究,以及应用哲学在内,兼顾名理和人事,既具有西方理性思辨内容,又具有东方哲学色彩的法相唯识哲学。他取佛家的真如(Tathatā或Bhutatathata),与柏拉图的伊跌耶(idea)即理念,康德的“自在之物”相比较,首先建立起他思想上的终极依托形式,即可以认知的真如本体论。章氏通过对佛学“三性”的探究,强调“在遍计所执之名言中,即无自性,离遍计所执之名言外,实有自性。是为圆成实性。”这一真实永恒的圆成实性,即“唯识实性”或称真如。它是自然而生,又可直接证得,是“一切事端之起”,^⑥是不依任何事物,不受制于任何规律而独立存在的自在之物。所以是常,是实,是普遍和永恒,是大千世界万象万物的根本特性,因此被他奉作哲学上的本体。章太炎竭力把真如同康德的“自在之物”的不可知性区分开来,赋予真如本体更具体的内容。阿赖耶识既有真如的本体功能,又有具体的内涵,所以,被作为真如的显现物,运用到其哲学体系中,建立起“以自识为宗”的“万法唯识论”。他通过对三性、四分、八识的繁琐论证,集中说明依他起性即依相应的识为条件

而派生现象界；遍计所执性对此现象界进行分别，以为是客观实有而生妄见；圆成实性离名言所执，排除客观实有的妄见，体认一切唯有识性而得契合真如，才是对世界的正确认识。这一认识的起点是自身的“识”，它的归宿，即认识对象也不过是“自识”所表现的色心诸法。它围绕识自体形成了一个多重关系的圆。如果说，“真如本体论”是对佛学的改造和重建，“万法唯识论”是法相宗“唯识无境”说的直接演绎，那末，“齐物观”则是他以佛解庄的理论结晶。《齐物论释》便是这一结晶的拔萃之作。他对“齐物”的理论概括，包含了事物的对立统一和统一即齐物的普遍性这两条规律。“体非形器，故自在而无对；理绝名言，故平等而咸适”，便是对上述规律的纲领性解释。必须承认，章氏所持“唯识无境”和对立统一的认识方法，把一切差别泯绝在心识之中，固然表现了丰富的辩证思想，但这种病态的我向思维的最显著特征在于主观吞没客观，因此他最终还是不能摆脱他力图摆脱的虚无主义倾向。正因为如此，他的思想虽然“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又表现出“求是”和“致用”的趋合心理，以补其哲学之不足。所谓“上契无生，下教十善”，^⑦正是这种趋合心理的产物，也是其应用哲学的参与形式。

梁启超对佛学研究涉足甚广，但作为纯粹意义上的佛教哲学研究，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远不及其在佛教史、佛教典籍研究方面的贡献。然而他毕竟还不同于康有为、蔡元培等，纯以佛学为经世的借用工具，而是把佛学作为他认识社会、认知人生的部分根据。佛教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他的宇宙观、人生观、认识论和方法论，渗透在他的政治思想、学术思想、社会观念、文化观念之中。因此也可以说这是一条思辨之路。梁氏的佛学研究之一是心理分析。他认为佛法就是心理学。从心理学角度，对佛法进行专门剖析，是梁氏的一大创造。然而他对佛教哲学的研究尤为突出的是与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他用斯宾塞的实体不可知论比附佛学；用佛教的“无我”肯定笛卡尔

的“我思”否定“我在”；他吸取马赫关于一切客观存在都是心理产物的精神一元论，充实其唯心主义的人生观和社会观，又以佛教的慧观思想否认马赫的感觉经验……总之，唯心主义愈彻底，在其思想上的顺化愈迅速。他特别欣赏康德的“先验知性论”，进一步强化了他的信仰主义。并在信仰主义驱动下表现了积极的参与精神。

时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熊十力“评判佛家空有二宗大义，而折衷于《易》”，^⑧旁参西方哲学，以“反本为学”，强调“反求实证”的创造性思维。他用主体构建客体，在对法相宗万法唯识观念扬弃的基础上，构建了他那翕闢成变，体用不二的本心本体论。他强调本心本体，无形、无相、非空，唯有“反求实证”，才能深切体认，才能自识本心，返本体仁，力图以此重塑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

应该指出的是，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熊十力的佛教哲学研究有一定的联系，但它们的性质很不相同。谭氏佛学重在经世，带有鲜明而强烈的政治色彩；梁氏则多以佛法为研究对象，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继承和转化的历史责任。章氏的研究志在进行而且实现了传统哲学的革命，成就了一个新的哲学体系。熊氏则是充分运用了佛学的辩证思维，形成了一个几乎无懈可击的理性思维的整体。可以这样说，近代能够称得上哲学家的只有章、熊二人。

如果说佛学的思辨之路是在理性思维的层面，从本体高度观览现实社会和人生的话，它的救世主义则是其经世之路的核心内容。虽然佛家因慨叹人生之苦而悟万物皆空，处处表现其不甘沦溺俗界生死海的精神，其后发展而为追求一种无生、无死，也可以说是超越一切的永生境界。这种虚幻的追求，显然是出世的。但是大乘不舍世间、自利利他；小乘虽然追求个人解脱，自证生死，但根本目的也在于救人脱离生死之海。所以又都具有积极入世的一面。所以，自魏源以下，思想家无不袭取佛法中的入世精神，逐渐形成一条以经术求治术，以佛法求世法的经世之路，治世兼而治心，便是其经

世的具体实施。

魏源率先以佛经入世。他认为治世必本于心存泽物,致用首当人尽其才,人才尤须归本于人心的净化,把价值根源的人心为其经世之本。致用——人才——人心三者的逻辑推衍,使佛法和世法,治心和治世,从体用关系、社会实践的关系上密切联系起来,形成了治心为本、治世为用的净土思想。

梁启超同样把着眼点放在传统道德危机上。面对破碎山河,他痛感“哀莫大于心死”,因此主张以“国学的第二源泉”,世界文化的最高产品——佛学,为精神战胜的武器,摆脱“心为形役”,甘做自己奴隶的麻木状态,“把精神方面的自缚摆脱净尽”。^⑨特别在他生命的后期积极从事社会教育、学术研究、力主新民、开民智,改造国民性的根本方针。他以佛的绝对超越意识,结合儒家“知不可而为”的积极进取精神,形成了他那不怯不退,以尽性主义为核心的东方人生哲学,进一步展开了他的佛教救世思想。

章太炎认为,自宋以后,“朝有谀佞,而乏奸雄;野有穿窬,而鲜大盗;士有败行,而无邪执;官有两可,而少顽嚚。方略不足以济其奸,威信不足以和其众。”^⑩道德人心日趋日下是亡国灭种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他又确信“世间道德,率自宗教引生”,宗教均以“有益于生民道德为其准的”。^⑪所以他大声疾呼,“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倡导用佛教的无生、无我、平等,众生皆佛和三轮清净的思想,矫治畏死、拜金、奴隶、退屈和德色之心,培植“自尊、无畏”,“依自不依他”,百折不回的精神。

杨度的心物二元论,尽管表现了安分随缘自我解嘲的消极态度,但他仍然以“心超世界”为其终极追求,反复强调要求得“本来无我平等之心”,同样反映了他不能忘情于政治的思想倾向。

康有为救世主义的大同理想,是“治世”的典型代表。他接受了佛学“众生一体,慈悲普度”的思想,故“日日以救世为心,刻刻以救世为事”,以去苦求乐的自然人性论,人生皆苦的泛苦论以及小康救世的渐进改良社会观,编织起他的救世之网,撒向了

现实社会的茫茫苦海之中。康氏的佛教救世主义不是以心力感佛力,着重自心的解脱,而是以救世主的身份,现身于世,普度众生;不是依经说法,而是无师自通,以己意进退佛说;不单纯强调治心为本的解脱之道,尤其通过对致苦之源的分析,说明改造社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他特别强调人生皆苦,三界不安的原因是在社会内部,因而把批判武器的锋芒指向封建国家,指向论证封建制度合理性,桎梏人们思想的传统观念和文论形态。提出以“至平”、“至公”、“至仁”的大同太平之道,消除造成一切差别和苦难的九界,趋向平等、博爱、极乐、圆满的大同世界。去苦是救济众生,求乐是改造世界,充分反映了其思想上的进步性,而渐进改良的小康救世观念又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

梁启超在其学佛的早期,其意识深层已经发生了一种微妙的变化,即对自己内心精灵的深切信念和对佛教某些义理的理性信仰。这种信念和信仰不因载体所处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始终潜藏在心理深层,并不断向主体的伦理观、人生观辐射。故其终生未改爱国之心、立宪之志和新民之道。新民是治心,立宪、爱国则是治世。应当说其治世的思想同样基于“知不可而为”,具有典型信仰主义色彩的东方人生哲学。他又强调指出“出世间法界”不在彼岸和来世,要求人们灭一切分别相,因而无家可出,无世可出,立足世间,度人济世,积极投身于戊戌变法及其后一系列立宪救国的活动之中。应当看到,梁启超的救世思想着重在“治心”方面,他指出佛教思想所以宜于治世,在于它能发起人的信心,古今中外“英雄豪杰能成大业轰轰一世者”,“宗教思想为之也”,因而,从宏观上归纳了佛教的治本作用。同时又对佛教致苦之源进行了微观上的分析,反映了梁氏救世思想的日臻完善和佛教入世转向在理论上的突破。同样也必须承认,这是比康有为大同救世主义还要不现实的空想,他有意无意地回避了残酷的“人治之苦”,即社会现实问题,表现了知识分子有心救世,无力回天自我解嘲的焦急彷徨心态。

蔡元培更是直接提出了佛教护国的理论,他认为大乘的无君民权思想与当时的民主革命内容相一致,因而得出“学者而有志护国”,“舍佛教而何藉”^⑫的结论,并从无教“暴君”而“奴人”,佛教“无君”而张“民权”两个方面说明了佛教护国,也即治世的道理。当然,蔡元培还是更多地从“教”的方面,阐述了增进国民道德的固本之意。

寺僧中以佛学经世的首推太虚的人生佛学。他终生的事业不仅在于护教,而且以全副身心进行佛学的革命,即实现佛学的入世转向。人生佛学,就是要“恶止善行”、“进德增善”,达到“圆满福慧的无上正觉”。从而“承担各种济人利世的事业,改良人群的风俗,促进人类的道德,救度人类的灾难,消弭人世的祸害”。^⑬所以他坚决主张“凭各人一片清净之心,去修集许多净善因缘”,使恶浊之社会,逐渐变为庄严净土。其他如敬安“兼文理以为诗”而以爱国禅僧名闻海内;李叔同以“普利含识”为目的,在出世的形式中做入世的事业,都表现了寺僧佛学经世致用的涉世精神。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晚清佛学与近代社会思潮的有机结合,突出表现了佛教的入世精神,即参与对超越的转化。这种转化无疑是其创造者对它的改造和完善。从本质上讲,人的终极关怀终究还是自身存在问题。所以,一切本质性的知识,无论是哲学还是宗教,都和人的存在密切相关。莎士比亚有句名言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⑭古今中外所有的思想家都在探求这一问题的正确答案。晚清佛学无论是对 Buddha^⑮的追慕,对真如本体的认识,还是对自心的求证,无论是否定社会存在的批判意识,普渡众生的救世思想,还是在此岸实现庄严净土的大同观念,都反映了人类为了追求最佳生存环境的参与精神。

①作者认为,佛教遁世思想是对社会人生的否定,同时又批判俗界而表现为入世精神是二重否定。它否定人性追求佛性,再由佛性返归人性,它否定现世而趋于净土,再将净土置于现世,则为双相二重否定。它追求个人解脱、灰身灭志的绝世思想,又要点燃觉悟、普渡众生的入世激情,便是其双向价值取向。

②③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④章太炎《无我论》。

⑤章太炎《致潘景郑书》。

⑥章太炎《建立宗教论》。

⑦章太炎《荀汉微言》。

⑧熊十力《新唯识论·序》。

⑨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道》。

⑩章太炎《俱分进化论》。

⑪章太炎《建立宗教论》。

⑫蔡元培《佛教护国论》。

⑬《太虚大师全书》。

⑭William shakespeare: Hamlet。

⑮音译“布达”,即佛,意为觉悟。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凌峰

希罗多德生活于公元前五世纪(约公元前485—424年)的古希腊,著有《历史》(亦称《希腊波斯战争史》)一书,司马迁生活在公元前二世纪(公元前135年—?)的西汉武帝时期,著有《史记》(亦称《太史公书》)。他们均以自己毕生的努力及不朽的著作,奠定了中西方史学的独立地位,都被后人誉为“历史之父”。

希罗多德、司马迁以前,不能说希腊、中国就没有史学,但那只能称之为史学的胚胎或萌芽,史学还与其它学科混合交溶在一起,还没有成熟到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而恰恰是希罗多德与司马迁总结了前人这方面的实践经验和成果,集其大成,使之系统化、完善化,使史学独立为一门学科,而被后人称为“历史之父”的。那么,要比较研究这两位“历史之父”,就有必要上溯到他们以前史学发生、发展的情况。

一

西方的史学,导源于古希腊。希腊最早的文献史料,是靠《荷马史诗》流传下来的。史诗充满了神话与文学的渲染,还不是历史著作,却有极大史料价值。

公元前六世纪后半期,爱奥尼亚出现了许多用散文来写作的“纪事家”,他们把传说或见闻记载下来,或根据口碑和文献资料来编写历史,还谈不上有什么史学方法,但已有较大的真实性,具有了史著的雏形。“纪事家”中成就最大的有:赫卡泰尼斯,著有《大地巡游记》和《谱系志》,戴奥尼修斯,著有《波斯史》五卷,查隆,著有《波斯史》两卷,《希腊史》四卷。这三位“纪事家”都

对希罗多德有直接的影响,《历史》中曾大量引用其著作,甚至逐字逐句地照抄。

中国古史,最早是通过甲骨文,青铜铭文,石刻及口头传说等记述、流传的。与西方不同,中国史学的一大特点,是史官制度的设立,不但年代久远,而且历代相衔,日臻完善。刘知几认为:

“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氏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至于三代,其数渐繁。”
①夏有终古,商有高势,周有史佚、史籀等,晋有董狐,齐有南史,鲁有左丘明……。先秦史官的职责主要记史事、撰史书、掌典籍、祭祀、天文、历法等,有较高的职位。《史记》以前,已有丰富的史著,《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竹书记年》、《世本》和《楚汉春秋》等,给司马迁以直接的借鉴。在体例上,这些史书也各呈异彩,各有其特异不群之创见,既相互错综变化,又互相承继贯通,为纪传体《史记》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归纳起来,先秦之古史,有如下特点:累世不断的历史典籍,多向发展的著史体裁;专负著述职

希罗多德与司马迁

□ 凌 峰

责的史官;秉笔直书,求真求实的著史精神,戒滥辨伪的读史态度。

从以上对比中可以看出,司马迁以前的中国史学与希罗多德以前的希腊史学,无论是史家、史籍,还是体例、史学方法等等,

作为古代东方社会代表的中国,比作为古代西方社会典型的希腊要成熟得多,完善的多。究其原因,就史学本身而言,最突出,最本质的一点,在于中国古代发达的史官制度。

无论东方、西方,还是古代其他国家,史学的产生大致经过这样的过程:早在文字产生以前,人类只能凭口头记诵来保存与传播先人的事迹。文字出现早期,由于本身极不完善,加之书写不便,对较复杂、较长的故事仍主要凭口头流传,而为了记诵的方便,这些故事大多被编为有节奏、有韵律的诗歌形式。往后用文字汇编、整理记载下来,便成了史诗,《诗经》、《楚辞》、《伊里亚德》和《奥德赛》大致如此。虽然这些史诗有很浓的神话传说味道和描绘渲染夸张的痕迹,但从今天看来,其中的史料价值是无人能否定的,这就是最初的史籍。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稍后出现了史官。史官制度为中国史学的成熟、精密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古希腊史学较单纯地从神话、史诗等原始文学形式中自然生长起来,具有自然、朴素、无甚雕凿的特点,体例上没有那么多讲究,中国史学由于古代东方农业社会集权统治的需要,史官制度得以长期存在并发展,精于体例,极尽其晦涩雕饰。

史官制度产生与发达的原因,是一个较复杂的问题,也是一个饶有兴味的课题。概而言之,它是古代东方农耕社会,需要修筑诸多大规模的水利设施的经济基础之上产生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家国一体为特征的专制集权政体统治需要相适应而产生的。并与古代东方社会所特有的封禅、祭祀等礼制直接相关联的。

其次,中国先秦哲学、文学的发达对史学也有深刻的影响。哲学是史学的灵魂,说得简单点,史学无论如何追求真实、客观,总有一个主观的人如何去看待它的问题,有一个世界观、认识论与方法论的问题。先秦哲学思想极为丰富,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巨变,百家争鸣,对自然与人类社会有相当深刻的认识与理论阐述,为司马迁世界观的形成及写作《史记》提供了丰富的源泉。

希罗多德以前的古希腊,虽然也有不少哲学家与流派,如赫拉克利图的朴素辩证法思想,阿那克萨哥拉的“种子论”和德模克里特的“原子论”,毕达哥拉斯的唯心主义等等,但在对世界认识的广度深度方面,尤其在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方面不如中国先秦哲学。

文学方面,诗歌暂且不论,先秦历史散文的风采,至今仍被中国乃至世界汉学界所称道。特别是叙事散文,在我国诸多历史著作中占有极高的地位,它的渊源远在先秦。司马迁作《史记》本是想上继《春秋》的,不仅采用《尚书》和大量采用《左传》、《战国策》的史料,而且吸取它们的写作技巧和语言风格,例如《赵世家》极似《左传》,平原君,魏公子等列传又极似《战国策》。《春秋》的褒贬是非以及《左传》直书无隐的精神,为司马迁所继承,并成为后世史家撰著的原则。从司马迁起,史家之有论赞,也是受了《左传》的启示。可以这样说,散文是诸史家撰史书最得心应手的载体。希罗多德以前的希腊古典文学,是以诗歌和戏剧占绝对主导地位的,这两种文学形式对史著的神益不如散文。

二

希罗多德与司马迁,在东西方史学史上都是里程碑式的人物,比较一下他们各自所处的身世经历,社会历史环境,对认识、比较这两位“历史之父”将是不无裨益的。

(1)两人都出生在较富有的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系统的教育。

希罗多德的家庭是当地的名门望族,父亲是个拥有豪富的奴隶主,在当地颇有威望,叔父帕息斯是本地的一位著名诗人,希罗多德早年就熟习“纪事家”的著作,酷爱史诗。

司马迁出生在一个世代相传的史官家庭,所谓“世典周史”。(《太史公自序》)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远溯自己的祖先到传说中的颛顼,据说颛顼曾命南正(官名)重掌管天,北正(官名)黎掌管地。关于重、黎的传说极为纷纭,要之,他们都是著名的神

巫,掌管天文、祭祀之事。其后,从唐虞到夏商,重、黎的后代便世代代承袭这一职守。周宣王时,重、黎的后人程伯休甫失掉了世代相传的职位,而做了“司马”的官,从此就称司马氏。司马迁认为他的始祖即重和黎,他的家世即是从重、黎时代传下来的。春秋战国之后,由于时代动乱,司马氏史职中绝,一族人分散到了各诸侯国,历任各种官职。司马迁的高祖司马昌为秦始皇时的主铁官,曾祖司马无泽为汉市长(汉初长安有九市,汉市是其一),祖司马喜为“五大夫”,父司马谈为汉武帝初年太史令,是融汇天文星历、阴阳吉凶,清静无为于一身的人,虽然身为卑微的史官,但却有明确的政治见解和深刻的哲学思想。他写过一篇重要的学术论文《论六家要旨》,把战国以来的学术思想归纳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而道家学说是治理天下的最好药方。这一思想给司马迁以深刻的影响。司马谈做史官三十年,搜集、记录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并开始了部分的著述工作,这些都成为司马迁后来写作《史记》的依据与张本。司马迁“年十岁则诵古文”,继则受《公羊春秋》于董仲舒,学《古文尚书》于孔安国,为写作《史记》打下了深厚的学术根基。

(2) 两人都有过长期的漫游经历。

希罗多德早年因叔父在政治斗争中被杀而受株连,被放逐出境,曾游历了小亚细亚,爱琴海诸岛、埃及、叙利亚、巴比伦、波斯帝国的腹地,色雷斯以及黑海北岸的西徐亚等广大地区,希罗多德每到一地,都广为了了解乡土人情,细心考察文物古迹,多方采集民间传说,掌握了大量的、生动的第一手资料,生活的波折与阅历的丰富,铸就了希罗多德成为一位史学家的眼光与素质,为往后的著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司马迁“二十而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阙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峰,庖困鄆、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②足迹遍于黄河、淮河、长江流

域。实地考察了屈原沉江之处,越王勾践故事,韩信传说,孔庙的车服礼器,楚汉相争的战场,信陵君史迹,凭吊了许由冢。这次漫游,对他写《淮阴侯列传》、《越王勾践世家》、《屈原贾生列传》、《孔子世家》、《魏公子列传》、《伯夷列传》等都有很大帮助。24岁时,他侍从武帝到西北的扶风、平凉、空峒,搜集了一些关于黄帝的传说。次年又奉使巴、蜀、滇,为《西南夷列传》准备了材料。又次年参加了武帝在泰山的封禅,之后又侍从武帝东到海上,北至碣石,巡辽西,历九原,为写《封禅书》、《齐太公世家》、《蒙恬列传》、《武帝本纪》等创造了条件。他亲眼看到桑弘羊平准政策的成功,所以有《平准书》那样深刻的论述。他亲身参加武帝负薪塞河的活动,亲自参加太初历的订立,所以才有《河渠书》、《天官书》、《历书》的写作。《史记》中的许多优秀篇章,都是司马迁实地考察、切身体验后的结晶

(3) 两人都处于社会历史大动荡、大变革之后的繁荣、强盛的时代。社会发展需要人们总结历史的经验,作出学术的综合。

公元前492——前449年,希腊各城邦与波斯帝国进行了一系列生死存亡的大搏斗,史称“希波战争”,战争初期,希腊人接连失利,内部各派对城邦何去何从意见不一。温泉关失陷后,波斯陆军很快攻入雅典。……最后,泰米斯托克利力排众议,萨拉米一战,雅典几乎全歼波斯海军,扭转了整个战局,并最终战胜了庞大的波斯帝国。这次战争震动了整个希腊社会,同时也促使希腊的奴隶制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

公元前447年,希罗多德来到了经历过希腊波斯战争之后的雅典。当时的雅典,奴隶制的民主政治,工商业经济,手工业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获得了高度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带来了文化的昌盛,雅典的哲学、文学、艺术更是称雄于希腊世界。

司马迁生活于汉武帝时期。经过春秋战国的社会大动荡,大分化,诸子百家的争鸣,把中国社会历史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又经过秦末的农民战争与楚汉战争,汉兴,海内为一,社会走上安定、恢复和繁荣发展的

道路。“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经过“文景之治”的积累，到武帝时，西汉经济达到空前繁荣，国力强盛，“都鄙廩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③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第一个鼎盛时期。

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必然带来文化学术的繁荣。武帝即位，深感“四夷未宾，制度多缺”，为了适应大规模的用兵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拘一格录用人才，所以“群士慕响，异人并出”。范文澜亦认为：“西汉一朝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如大经学家董仲舒，大史学家司马迁，大文学家司马相如，大军事家卫青、霍去病，大天文学唐都、落下闳，大农学家赵过，大探险家张骞，以及民间诗人所创作经大音乐家李延年协律的乐府歌诗，集中出现在武帝时期。这是历史上非常灿烂的一个时期。”^④

由此可见，希罗多德和司马迁都具备成为史学家的主客观条件，他们的出现，乃是时代的需要，历史的必然。

三

有了前面的比较作基础，我们就可以对《历史》与《史记》本身进行一些比较了。先从著述的宗旨看：

希罗多德在《历史》的第一卷开宗明义地写道：“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尔那索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所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给记载下来。”^⑤

司马迁固有“述往事，思来者”的想法，还有“考其行事，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的观点，而且更进一步，提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卓越思想。不但要把历史事件记载下来，探明原因，以留后人，而且要探究自然与人类的关系，通观古往今来的变迁，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无疑，司马迁的著史宗旨要

比希罗多德的更深邃。

再从体例上看：希罗多德对《历史》并没有分卷，后来亚历山大城的校注家们才把它分为九卷，并分别标以希腊神话中九位“缪司女神”的名字，全书以第五卷第28节为分水岭，前一部分叙述小亚细亚、波斯、巴比伦、埃及等地区的情况，凡当时他所知道的“异邦人”之世界，记述殆遍，并叙及希波战争爆发的原因；后一部分专门叙述希波战争的经过，从伊奥尼亚城邦起义，战端初启起，一直写到公元前478年希腊人占领色雷斯的塞斯托斯城为止。

从中可以发现，希罗多德在《历史》一书中是有变化发展的。前一部分希罗多德还保留着某些爱奥尼亚“纪事家”的特色；在后一部分中，则表现了力求完整、真实的精神。是否可以这样说，《历史》是由两部书结合而成的。希罗多德原来只是一位“纪事家”，由于社会大动荡、大变迁及随之而来的文化大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影响，促使希罗多德转变为一位高度负责的、出色的历史学家。

《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从传说中的黄帝一直到约公元前104年，共三千年的历史。全书一百三十篇，分为五体，曰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以本纪叙帝王，以表排列大事，以书叙典章制度，以世家载诸侯，以列传记人物。网罗古今，经纬时空，体大精深，“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⑥

窃以为，《历史》与《史记》在体例上差异甚远。前者是连卷都不分的松散结构，后者则是高度严密的体系，表现了中国史学注重宏观整体联系的特色。

在编纂方面，《历史》和《史记》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西方史学史上，《历史》首先采用了历史叙述的形式，创立了一种新的历史编纂方法——历史叙述体，它大致与中国史学史上的纪事本末体相仿。这种编史体裁，经西方史学史上第二号开山鼻祖修昔底德著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得到了发展与完善，并

至今被西方史学奉为正宗。

其次,希罗多德视野开阔,《历史》具有“通史”的规模,表现了对历史的远见卓识。书中所叙述的不仅仅是希波战争史,也不仅是希腊史,而且包括那个时代,他所知道的整个外部世界的历史,并且不抱有民族的、地域的偏见,以一种比较客观的态度去叙述历史,这是难能可贵的。

再次,《历史》取材宏富,注意考证史料,辨别真伪,在西方史学史上最先使用了历史批判方法。希罗多德说过:“我的职责是把我所听到的一切记录下来,虽然我并没有任何义务来相信每一件事情。”

最后,希罗多德十分重视通过历史对人们进行道德训海,从而最终奠定了史学的独立地位。

司马迁的《史记》在这方面也是卓越的。

第一,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编纂的先河,建立了通史体裁。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互相配合,有机地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系,总结综合了前人的编纂成果,创造性地建立了一种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体裁。

第二,奠定史学的独立地位,扩大了史学的研究领域。司马迁以前,史学只是经学里面的一部分,没有独立地位。“以事言曰史,以道言曰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⑦《史记》一出,专门性的史著相继而起,史部方为四部之一。

我国古代,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传统,史官多记载皇亲诸侯的饮食起居、游猎、祭祀等活动的言行;而《史记》第一次囊括了古今中外,汇总了百科知识,自成体系,首创学术史传、民族史传、经济史传。记载描写了滑稽、游侠、刺客等社会各阶层人物的活动,无论从广度或深度看,都是前无古人的。

第三,实录精神,变化观点,批判态度。

《史记》向以“信史”著称。班固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近年来考古学的一些新发现,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如《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孙武与孙臆是两个人,“孙武既

死,后百余岁有孙臆,臆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各有其兵法传于世。但《孙臆兵法》以后失传,《隋书·经籍志》中即不见著录,因此宋以后,特别是明清以来,人们对于孙武与孙臆是否各有兵书传于世,存有疑义,至近代,学界甚至普遍认为孙武与孙臆是同一人,《史记》的记载有误。1972年4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发现一座汉墓,发掘中,失传了一千余年的《孙臆兵法》与《孙子兵法》及其它先秦兵书被同时发现了,证实司马迁的记载无误。

此外,《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葬始皇于郿山,……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相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后人对此多持疑义,现经科学探测,秦始皇陵中确实弥漫着大量水银汽,亦证实司马迁的记载无误。

司马迁的著史宗旨“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反映了他的变化批判的历史观,并总结出一些著史原则:

“罔罗天下放失旧闻。”“整齐百家杂语。”《报任安书》

“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留侯世家》“疑则传疑,疑者缺焉。”《仲尼弟子列传》

“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太史公自序》“择其言尤稚者。”《五帝本纪》

这些原则,至今仍是我们治史的基本方法。

《历史》与《史记》都具有无所不包的“百科全书”式的特点,不但记述了政治制度、经济生活、军事战争,外交斗争;而且生动地叙述了地理环境、民族分布、神话传说、风土人情、宗教信仰、天文历法和名胜古迹等等。两部史书几乎是总结了那个时代人类所认识到的一切。由此可以看出,在古代,许多学科尚未分野,还处于萌芽状态的情况下,史学具有包举百科的特点。

《史记》与《历史》是中西方史学的开山之作,同时又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在这方面对后世的影响也是巨大而深远的。

《史记》开创了中国传记文学的滥觞。司马迁所写的一系列历史人物,不仅表现了作者对历史的高度概括力和卓越的见识,而且

通过那些人物的活动,生动地在读者面前展开了一幅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千百年来,文学艺术家从中吸取的养料,几不亚于史学家从中得到的东西。唐宋以来的古文家无不熟读《史记》,号称“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十分推崇司马迁,把《史记》看成文章的规范,他的《张中丞传后序》、《毛颖传》等文,显然是学习《史记》人物传记的。宋代大散文家欧阳修散文的简练流畅,纡徐唱叹的特点,深得《史记》神韵,他的《五代史伶官传序》的格调,与《史记·伯夷列传》十分相似。就是作文严整简洁的清代桐城派代表方苞、姚鼐,直至近代的梁启超的文章,无不深受《史记》的影响。

明清以来的通俗小说和戏剧创作也从《史记》中吸取了丰富的养料。《游侠传》、《佞倖传》、《滑稽传》等成了后代笔记小说的源流,而渑池会、鸿门宴、垓下围等,也成了后代章回小说结构的模范,至元、明戏曲中的许多体裁,近现代舞台上的众多剧材,亦来源于《史记》。

《史记》在语言运用上也有极大的创造。从文学角度看,其最大的特色就是善于用符合人物身分的口语来表现人物的神情态度和性格特点。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在叙事和记言中还常常引用民谣、谚语和俗语。《史记》的语言,在今天看来都是所谓文言而不是白话,但它是在当时口语的基础上提炼加工的书面语,与当时语言是相当接近的。而且为了使那些古奥难懂的古籍能为一

般人所理解,司马迁在引用古书时,往往把已经僵化或含义不明的词句改成一般易懂的语言。正因为如此,《史记》直到今天,我们读起来基本上是明白晓畅的。

希罗多德深受荷马史诗的影响,在其著作中又记载了大量的神话、传说,因之颇具文学色彩。《历史》也被认为是西方第一部著名的散文作品。作者善于刻画人物,性格鲜明、形象生动、入木三分,全书语言生动,词汇丰富,叙事简明扼要。以致于希罗多德的死敌普鲁塔克在他的著作《希罗多德的阴险》中也不得不这样说:“希罗多德的风格是纯朴、轻快和活泼的,它迷惑了不少人……说服的力量是强大的,……特别是当着作者的语言有这样多令人愉快的东西和力量,以致竟然会掩盖了他的一切……缺点的时候。”

时至今日,东西方史学已各自走过漫长的发展历程,其相同与相异之处都已十分明显,其中的原委,在它们的源头已初现端倪。

①《史通》卷十一。

②《史记·太史公自序》。

③《汉书·元帝纪》。

④《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第39页。

⑤《历史》王嘉隽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⑥《通志·总序》。

⑦王守仁《传习录》卷一。

作者单位:广东《学术研究》杂志社
责任编辑:童 轩

儒学的历史嬗变与 现代人格的建构

□王 敏

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内蕴丰富,气象万千,但从某种特质意义上说,可称为是道德人格一元的文化。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类文化,都可以在这种一元的格局面前与古老的华夏民族、古老的中国文化区别开来。以道德人格为指归的儒学,流贯在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的漫长历史之中,常被人称之为静态的、超稳定的文化,然而,如果我们认真考察一下这脉文化在不同历史阶段上的不同内涵与历史特征,便会较为清晰地看到儒学在历史发展中所发生的明显的自身演变,看到这种演变对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及其人格精神产生的巨大影响,进而看到眼前我们通向现代化的道路还有多么曲折而漫长。

一、周代文化精神与儒家学说

我国奴隶制度的最后朝代——周朝,是华夏民族文化融合发展的一个至为重要的历史阶段。从现存的《尚书》、《易经》等典籍记载来看,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崇礼敬德、渴慕理想人格的文化精神,在这个时期已经初步形成。它集中表现为文王的穆穆文制、武王的践功伐纣和以周公为代表的统治者对我国道德伦理思想的总结提高、与对国家典章礼乐制度的修整规定。《尚书》中的《周书》,主要记载了周公的言论和思想,还有别人对于他言论的发挥,据此我们可以看出周代文化的基本道德内涵:1. “以德配天”,把道德视为治国的根本;2. “王其疾

敬德”,君王首先作出道德表率,为臣民层层效法;3. “制作礼乐”,将统治者德政、德教的内容通过礼乐制度规范下来。《诗经》这部集乐歌与民风一体的周代诗歌总集,可以说从更广阔的范围生动地反映了周代文化的独特精神风貌,显示了当时人们所具有的一种普遍的社会道德观念和教训规劝意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道德与人格自然地趋向于统一,有了道德,也就有了人格,有了令人敬仰的人格力量与魅力,周公在《无逸》篇中举列的几位先王的品行如恭勤国事、勤俭自节、广施慈悯、孝悌亲厚等,在《诗经》中已成为人们反复歌咏的操作标准,成为人们追求仰慕的人格楷模。同样地,失去了道德品行,也就丧失了人格尊严,甚至失去了起码做人的资格,而为众人所不齿。《邶风·相鼠》是一篇鞭鞑无德无礼之徒的民歌,“人而无仪,不死何为”,“人而无礼,胡不遄死”!这种情感抒发正是周代社会道德人格文化较为发达、并对社会成员产生全身心的涵盖与渗透的结果。

只是,奴隶制的繁荣并未能永久维持,在生产发展的推动下,一个分化动荡的社会开始了。孔子是鲁国人,春秋时鲁国是保存周礼最丰富的国家。历史的变迁,使他最早感受到的是文化问题,即礼坏乐崩、人心不古。他经过反复思考,最后得出结论:原因在于人自身,是人心麻痹了、堕落了、失去了节制,才使人的行为与礼制之间产生了疏离和脱节;而人自身,是有能力反省自己、

提高自己、超越自己的。因此,孔子自信地踏上了一条解决问题的独特道路:不是修改文制去适应人,而是要从人心入手,恢复和培养人的精神,重建人的创造能力,最终构成统一规范的社会道德秩序。这样,我国最早的一个理论学派——儒学便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出现了。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也是他的伦理学说的根本。从总体上说,它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重视人的作用,注意人的内心修养;二是协调人与之间的关系。因此,“仁”是一个总摄许多品德的综合概念,仁在孔子那里是爱君、爱亲、惠亲的统称,它不仅是一种道德行为,而且也是一种从内心发出的道德情感,体现了一种发诸善端而趋于日臻完美的人格境界。那么,人如何去拥有这种全德,到达“仁”的彼岸呢?孔子的答案包括两个层次,一是“教之”,一是“克己复礼为仁”。教之,就是要把理想的道德观念灌输给人们,使他们知德明礼,有行为准绳,“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所谓克己复礼为仁,就是要把教之的内涵由心之外推及至心之内,通过人自觉的反省、努力、学习,克服麻痹和堕落而到达行为高尚的仁人目标。

孟轲在此基点上继承了孔子的内省式思考,并进一步深化扩展,建立起以仁、义、礼、智为核心的道德理论体系。在道德修养方法上,孟子提出了更为深刻的反省之路:养心、养气。“养心”就是存诸内心、求放心的修养功夫;养气之说,更有些形而上学的意味,但却有着明确的“义”、“道”内容。孟子的养心养气说体现了人们对自我潜能的一种认识和把握,同时也加强了道德与人格二者内在的统一,所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就是唱出了一首首“浩然正气”之歌,就是到达了高超的道德修养境界、人格意志境界。由孔子、孟子等创立的儒家学说,体现了滥觞于我国奴隶制社会的道德人格文化已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标志着人们对“人”这个社会主体所作的关注与反省到达了一个较高的理

性层次。可以看出,重视人的主动精神、重视人的道德实践意志,恢复和建立统一的社会道德规范,是贯穿于先秦儒学的一个基本支点。

二、汉儒学说及其历史影响

春秋时期,诸子百家,各抒己见,未有高低之分,各诸侯国对各家学说的认可程度亦有不同。但这种局面到汉朝时为之一变,自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被——汉武帝采纳,孔子便被偶像化、圣人化了,儒家学说也被绝对化、权威化了。汉儒对儒学的推崇和经学加神学式的改造,使先秦儒家学说发生了一次历史性的演变与定位。

西汉的董仲舒被标榜为“为儒者宗”,而实际上他所阐释与宣扬的儒家理论,已是揉进了燕齐方术与墨家“义自天出”的天志、天命思想,改造了战国时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特色的阴阳五行说,建立了以“天”为中心,以“三纲五常”为基本内容、以神秘主义、蒙昧主义为理论特色的封建道德(伦理)体系。

“三纲五常”是董仲舒对儒家学说最响亮的概括集成,也是他留给世人的最通俗、最完备的道德行为准则。三纲,在《白虎通义》中明确地阐释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五常”,是董仲舒在孟子“四心”说的基础上,与“五行”相比附,提出的五种行为准则:仁、义、礼、智、信。表面上看,此说与先秦儒学尤其孟子的体系颇有相似,然却在本质上有明显的差异。先秦儒学的确也讲秩序,讲君臣等级,但他们的着眼点更在于讲道德所赋予每个社会成员的统一内容,讲各个层次无一例外所承载的道德义务,讲各方面通过履行各自的责任而形成的相互的关系。并且尤其强调在上者的道德垂范作用,在上者的道德状况对在下者所产生的影响。这与周公以王德领民风的思想是相通的。所以,孔子有“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以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论说,孟子有“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

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的论辩。而“三纲五常”则不同，“三纲”把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关系确定为不可更改的阴从于阳的从属性关系。“五常”同样是以这种绝对化的从属关系作为道德根本的。董仲舒阐述“礼”为：“礼者，继天地，体阴阳，而慎主客，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内外远近新旧之级者也。”（《奉本》）由此可见，无论三纲，无论五常，其核心只有一个，确立法定的封建社会尊卑贵贱的等级序列，由此强调等级之分不可逾越；社会各个方面的关系，不再是相互的、相对的，而是依附的、绝对的，只有着卑者、下者对尊者、上者的服从敬顺，不见了上者、尊者所应承担的道德责任与义务，这样，贯串于先秦儒学中平等的道德实践精神和统一的道德规范观念就此消逝了。

在确定了“三纲”的等级轴心之后，董仲舒似乎觉得还不够威严和令人信服，便制造了天神的绝对权威，并在人性问题上提出了“性三品”说，形成了人“受命于天”、“先天有别”的神学说教。这样，汉儒树立起“天”的主宰力量，将人们对于道德的培养和遵从，引入对“天”的敬畏与盲从之中，完全否定了作为维系道德力量的人的自主能动作用。同时，先秦社会所萌现的朴素的公平意识、平等观念，洋溢在先秦儒学中“圣人与凡人同”、“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响亮呼唤和“民贵君轻”的民主精神，也被彻底摒弃。这种极不平等的纲常制度和理论说教虽然遭到一些唯物主义思想家的猛烈抨击，但是，它却作为一种为统治者得心应手的道德模式而延续、巩固下来，成为两汉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并且逐步演化为规定中国今后文化发展的一个轴心。这就导致了一个恶劣的困境与结局：道德的统一性被破坏了，等级地位向道德提出了挑战，虚伪性、欺骗性由此而生。它不仅造就了堂而皇之的堕落、表里不一的伪饰，而且还使先秦社会凝结起来的道德人格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文化精神出现了断裂、唯上、屈从、盲目、毫无主动意志等都成了人的“美德”，道德不再体现人格的力量与尊严，反而凸现出

人格的萎缩与丧失。这无疑是一个民族性格的悲剧开始。

三、宋明理学及其社会作用

随着汉王朝的覆灭，被引向谶纬迷信和烦琐考证的汉儒学日渐失去人心，代之而起的是东汉传入我国的佛学和魏晋兴起的玄学。到了唐代，统治者虽采取“三教并容”的政策，但佛学长风日甚，儒学衰败不兴，直到中唐韩愈、李翱力排佛教、弘扬儒说、重申“三纲五常”，才开启了宋明儒学发展的新时期。这是我国历史上儒学发展、演化的又一个重要阶段。

朱熹是这个时期宋明客观唯心主义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精通儒学，出入佛老（玄学），继承与发展了宋初周敦颐、二程和张载的理论观点，吸收了佛学“一多相摄”、“月印万川”等所包含的理一分殊的思想，对三纲五常作了精密而系统的哲学论证。从此以后，朱熹的思想成为官方指定的儒学正统思想，他所编的《四书集注》，成为元、明、清历代王朝科举考试和文化人必读的教科书，朱熹本人也受到600余年的大力推崇。

然而，纵观朱熹的理学理论，其体系虽然严整，其论辩虽然精致，但在根本上，可以一言以蔽之，只是在董仲舒强调等级威严的路子上愈走愈远，将禁锢人们身心的绳索愈收愈紧而已，只不过在佛老哲学深奥体系的压力下，煞费苦心地为其实理论增加了诸多哲学思辩的色彩。

唐宋儒士们的高明之处，在于意识到了理论论证的必要，把封建道德与哲学的基本问题、与宇宙观密切联系起来，将其提升为独立于自然界和社会关系之上的“天理”，使“天理”成为最高的哲学范畴，成为派生宇宙万物的精神实体。“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河南程氏遗书》）天理是无所不在的，人们必须服从它，即使不想服从也做不到。这样，封建道德原则就被夸大成为宇宙的最高原则，而且附之烦琐的哲学论证，建立起了一个庞大完整的道德学说体系，为封建纲常制度奠定了理论的基础。

所谓“天理”，其实就是以“三纲”为

核心的道德伦理观念,“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朱熹《文集》),落实在行为规范上,父子之间就是一个“孝”,君臣之间就是一个“忠”,儿子、臣下要绝对服从父亲、君主,“臣子无说君父不是底道理,此便见得是君臣之义处。”(《朱子语类》卷十三)如果说,汉儒在确立三纲还着重强调的是明确关系,从地位上规定等级名分,而宋明理学则推进了一步,在具体的行为规范上大大强化了这一纲常的贯彻实施。由此,“忠孝大节”成为封建社会衡量人们道德的主要标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操守观念,也愈加演示为社会性的习俗。到了明代,封建道德更被强调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什么孝子挖脑取肝事父母,节妇断臂悬梁守贞操等等乌烟瘴气的宣传充斥社会,实为后来进步的思想家所指斥的:礼教杀人,罄竹难书!

宋明理学崇尚“天理”,而与“天理”相对立的一个重要概念便是“人欲”。“人欲”是“天理”的大敌,“人欲”的存在,直接构成了对“天理”的威胁。因此,“天理人欲,不容并立”。(《孟子集注》卷五)朱熹甚至把儒家学说归结为一点:“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朱子语类》卷十二)的确,孔孟儒学中的重义轻利倾向,开了我国道德史上义利之辩的先河。然而那种倾向还是与先秦历代先王种种勤俭无逸的美德、与当时国家纷争、礼崩乐坏的社会思考有直接的关联,而且尚建立在事物整体性的联系之上,讲的是相对的侧重之分。汉朝时,董仲舒发展了孔孟“节欲”思想,提出了“成性”“防欲”论,即尚承认“欲”的一般合理性,而将其限定在某个范围之内,防止其贪,防止超度。到了宋儒,理学家们则是在“防欲”的基础上又大大前进了一步,把“人欲”视为一切罪恶的源泉,把人的全部生命权利一笔勾销,对“欲”不仅是节制、限制而且是要彻底围剿、连根拔除。宋朝以降,“存天理,灭人欲”的礼教训诫便威严地响彻在人们耳旁,既成为禁锢人们思想行为的严厉枷锁,也成为统治者所欣赏的最高道德修养境界,遂而造成了几百

年对中华民族身心与个性的严重残害。可以设想,当由人所构成的社会到了半点容不下“人欲”、而只有所谓“天理”的时候,这个社会的悲哀可想而知!由此,儒学终于在特定的土壤下完成了自身的演变——从以人为主体的自我开发走到了对人全面专制与禁锢的历史反面。

四、建构现代人格是现代化的最终目标

反观儒学的发展轨迹及其对人的塑造,不难看到这样一个悖论:道德规范愈昌达,自我人格愈萎缩,社会愈流于虚伪、不道德。专制的文化对人以及人格的根本毒害,在于砍削个性以迎合社会,制造了社会与人、人与人的根本对立与分裂。在强大的社会的、家族的、官僚的、舆论的、名分的等等势力面前,个人的自我意识被层层扼杀、层层销毁,人们终将被异化为一具具无思想能力、无行为意识的躯壳,而导致了个体人格萎缩和社会活力匮乏的双向负性循环。

今天,一场重大的社会变革使古老的中国真正启开了封闭已久的大门,启动了向现代社会迈进的脚步,十多年来,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高和发展,随着改革开放愈加向纵深挺进,人们已经感受到传统文化以及所塑造的传统人格定势,正在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生发着强烈的阻抑作用。有识之士站在时代高度和未来发展背景上,致力于民族文化素质研究和现代文化重建,显示了人们对历史沉疴的正视和对现代社会的理性认识。社会的现代化终究的是人的现代化,没有人的健全发展、人格的健全发展,一切发展将失去最终的可能和意义,社会进步也将是一句空话。

改革开放的时代需要的现代人格特质是与现代化的目标相对应的,它与传统人格的根本区别应该是,能深刻地感知生活、自觉地顺应生活、主动地创造生活。有关学者将这些特质概括为:1. 认知层面的多元选择,包括生产方式的多样化和多元价值取向;具有立体思维视角,在无规可循的境况中,具有较强的价值分析和抉择能力;尊重并欣赏具有不同特点的人。2. 情感方式活跃、开朗、进取,适应功能良好,如何感受

就如何表达,善于将负性情绪如焦虑、压力、忧郁等化合提升为性格动力。3. 个性化与理性高度结合,重视自我表现和自我实现,操之在我,不需要依据权威获取安全感;尊重他人的尊重与价值,重视同辈人的人际关系。(见魏磊《中国人的人格》)

虽然,现代人格及其建构问题,是一个内涵复杂、因素纷繁的大课题,不同国家对此执着的研究也因主客观因素不同而各呈风貌。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现代社会的发展是愈来愈趋向于对人的各种权利的尊重、对人的个体意志的开发和创造能力的弘扬,有如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见的,新社会的根本原则是“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491页)因此,在我们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迈进之际,尤其需要自觉地摒弃传统人格中的名分人格、依附人格、多重人格(主奴人格)、圣人人格等模式,而着力向新型的本真人格、独立人格、统一人格(平等人格)、健全人格等结构转化,主动地去顺应和推动社会变革,营造现代社会的良好生活环境。

所谓本真人格、独立人格,即强调人的本来个性和自主性,强调人的自我意志和独立品格,它与传统的名分人格、依附人格形成强烈的对照。传统的名分、依附人格,典型地体现了封建等级社会对人性的抑制和禁锢,“名分”下的人似乎不体现一个具体的有个性的人,只是一个官位的、级别的偶像,是这个级别对那个级别的管辖或附庸,是繁缛礼节下的机械表演。尤其在官本位的社会,这种人格结构的政治语义在于,人的价值等同于“名分”的价值,人不在于做什么、有什么能力,只在于是个什么级别名分;人的能力不在于操之在我,自主地去实现,只在于是否得到另一级别的赏识恩宠。这种重名不重实、人为名累的依附性人格取向,导致了个性原创力和自主能力的极度枯萎,只会为社会制造僵化呆板的负面效应,实在为现代社会所不取。

冷峻地解剖我们自己的人格,将会发现,在其灵魂深处总埋有与传统人格难以切

断的根,那就是一种“双重人格”基因。不管它以什么方式表现,或主人、或奴才,或倚强凌弱、或以弱媚强,或高傲自恃、或怯懦自卑等,都不离其正负转化的怪圈,这就是被鲁迅先生斥之为的“劣根性”,这种劣根性尤以“主奴人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封建专制的国度,公平、平等的概念从未达到它理应具备的内涵,人们生活在层层权威奴役驱使的畏惧之中。然而,国人的劣根就在于相对于主子他是奴才、相对于奴才他是更刁刻的主子,受到了欺辱又去欺辱别人,碰到强手便只有忍气吞声、麻木不仁了。这种主奴人格极容易造成社会性的姑息养奸、为虎作伥的风气,不反省和翦除这种劣根,现代社会的公平意识、平等观念、竞争、保护、抗争等思维指向是难以在我们这个环境生发光大的。因此,社会的变革呼唤着统一人格的真正实现。

改革开放的时代,正在造就一种促进参与、呼唤献身的时代强音,在这种时代精神辉映下,“健全人格”应该是更快、更多地活跃在当今社会中的新型人格模式。健全人格是认知、情绪、价值、信仰、想象以及生化反应等诸要素整合良好的产物,它着眼于科学的身心系统的平衡和调适,着眼于对自我各种能力的尝试和把握,它不仅仅追求某种实现的结果,而更着意整个实现的过程,它不仅仅苛求成功的喜悦和完美无缺,而更乐意咀嚼全身心投入之后的平静和无憾。与传统的“圣人人格”相比,健全人格的意义在于,它并非高大无缺、煌煌盛美,并非高不可及、令人仰叹,也不必刻意雕琢、为世人楷模。作为个人的人,他可能有种种缺陷和失误,有种种欲望和苦闷,但是他却是自我的、独立的、真诚的,他在现实中学会努力地付出,学会努力地调整自己,学会建立符合历史发展的价值系统,这正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现代人格特质,也是我们人人应该经过不断体认、重组和更新去达到的人格目标。

作者单位: 山东省委党校
责任编辑: 凌 峰

市场经济条件下 广东文化战略思考

□张 绰

一、广东文化建设所面临的形势和战略目标

社会历史发展现在正处在什么时代?将会过渡到什么时代?这些时代有些什么特征?对广东的文化建设提出了什么挑战?这是我们制订文化建设战略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从时代的划分来看,社会历史的发展,主要可分为三个时代,一是“前工业时代”,二是“工业时代”,三是“后工业时代”。在文化学领域,则有人把这三个时代分别表述为“政治时代”、“经济时代”和“文化时代”。也有人把“文化时代”叫做“信息时代”。这三个时代分别代表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

从当代文化发展的大趋势来看,至少有三个比较主要的特点:一、文化性质从工业文化转向信息文化。二、文化层次由精英文化转向大众文化。三、文化结构由偏重物质文化转向精神文化。当代文化的这种发展趋势,说明文化格局正在起着根本的变化,信息时代的到来,对我们提出了有力的挑战。

那么,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中,我们是处于什么时代呢?就三个时代划分来说,我们是处于“工业时代”,是新兴的工业社会。我们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任务还非常艰巨,要在下个世纪的中叶才能赶超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我们所面临的,又是一个以电脑和高科技为核心内容的信

息时代的挑战。这种挑战,主要表现在文化已经渗透到政治、经济等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人们消费所寻求的目标,是求新、求奇、求美;文化被广泛运用于生产、管理、营销、服务等经济生活领域,而且出现了新兴的文化产业。这就迫使我们考虑文化的转型,使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虽然,就全国来说,我们还是处于解决温饱的阶段。但是,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文化的转型问题已经提上日程,也就是说,象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信息时代的特点已越来越明显,这些经济发达地区,正在开始向信息时代过渡。

广东的文化建设,是以岭南文化为根基的。岭南文化有它突出的优点,一是注重现实性。从洪秀全到康有为到孙中山,他们的学术思想都是面对现实,都是研究救国救民的道理。二是市场意识较强。在中国近代的开端,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商人阶层及其文化的出现。三是融和性。指岭南文化在和中原文化、西洋文化的冲突中,善于吸收其所长,补自己之所短,融合而成为一种新的文化特质。四是超越性。具有世界意识,在某些领域具有全国领先的地位,有对内地辐射的能力。岭南文化的这些优点,对于文化的转型,建设广东的新文化,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

但是,岭南文化也有它的劣势,这就是缺乏深厚的土壤,文化的底蕴不足,因此在

文化行为上往往表现得目光短浅,急功近利。岭南文化的这种劣势如果不正视,它必然要制约着广东文化的发展。

在确立广东文化发展的战略目标时,要从它所担负的文化使命来考虑。广东文化建设所担负的第一个使命,就是要把广州以及珠江三角洲的卫星城市建设成为全国第三个文化中心。本来,60年代初,周扬来广州时就曾明确地建议,广州应该成为与北京、上海并驾齐驱的第三个学术文化中心。时隔30多年,现在广州市提出了要建立国际大都市的雄伟计划,按照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要求建设广州新文化。这是一个很好的势头。这里,我想就战略思想上提一点意见。建设国际大都市,有两种参照系。一种是象东京、墨西哥城、大阪、香港一类的城市,它们或者是以地方大、人口多闻名,或者以经济繁荣著称。这一类的城市,也被通称为国际大都市,但却是没有文化个性的大都市。另一类大都市,则是巴黎、法兰克福和纽约,这三座城市不仅是著名的国际大都市和工商金融中心,而且也是重要的文化中心,并且不是一般的文化中心,而是有着自己强烈特色和任何地方均无法取代的文化特征。这三座城市都有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一流的文化设施,如著名的歌剧院、图书馆、美术馆和博物馆等等。有独树一帜的世界性报刊和杂志。而最根本的是这三个城市都聚集了一批最有才华和创见的知识分子,正是他们构成了这些城市的文化性格,构成了当代西方文化的晴雨表。因此,巴黎文化人,纽约知识分子和法兰克福学派早已成了大写的专有名词。这两种类型的国际大都市,其品位的高低是不言而喻的。广州要建设成为国际大都市,当然应该参照巴黎、法兰克福、纽约这一类城市的建设体系,才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品格,才能成为中国的三大文化中心之一,才能真正成为名闻遐迩的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

广东文化建设要担负的另一个使命,就是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明确地指出:“广东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

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广东建设的任务,就是“两个文明都要超过他们”,而且把它提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这个任务,落实到文化建设上,是很艰巨的。精神文明建设在硬件方面20年内超过亚洲“四小龙”,随着我们经济的发展,大概还不难达到。而在软件方面,在人的文化素质和人的文明行为方面要超过“四小龙”,就得做许多工作。在这方面,文化建设(包括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一系列的建设)就担负着更重大的使命。

因此,根据广东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广东文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应该是: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根本指针,以提高广东人的综合素质为根本目标;以发展岭南新文化为基础,坚持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面向21世纪的世界;实行经济、社会、文化一体化的发展战略。要把广东建设成为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都走向全国前列,有自己文化品格的,能够迎接信息时代挑战的,对国内外都有巨大辐射能力的一个区域性的国际文化中心。

二、实现广东文化战略目标的对策和措施

1、中西文化的契合点是现代化

在实现广东文化战略目标的对策时,首先碰到的一个实际问题,就是如何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我认为,要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只能站在今天世界发展的座标上,从传统与现代的交接上,从中西文化的接轨上,来进行我们的选择与改造。而古今和中外这两条纵横的中轴交接点,就是我国的现代化。也就是说,历史形态的文化,西方的文化,在今天必须符合我国现代化的要求,这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国情的要求。这就有赖于人们将历史意识与现代意识、民族意识与世界意识结合起来,一方面以健康的心态对待历史文化,使历史文化经过选择、改造,在现实中国文化中重新开花结果;另一方面以开放的心态面向世界,广泛吸收世界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一切优秀文

化成果,以充实和丰富我们自己的文化,将中国文化汇入世界文化的大河中去。

2、核心内容是“提高人的综合素质”

在人才的培养中,广东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采用“借鸡下旦”的做法,确实也解决了一些燃眉之急。由于这些地区的物质待遇高,全国各地的“孔雀东南飞”。这就造成了一种错觉,好象人才缺乏不成问题,有钱就行。我们一方面肯定在经济建设初期,亟需各方面的人才,用引进的办法暂时解决人才不足的问题,是能够见到成效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内地的经济发展起来后,人才也会回流,这个现象已经出现。所以,人才缺乏,始终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解决这个难题的办法,还是要靠自己培养,要发展本地的高等教育,要制订出一套优待知识分子,能够留得住人才并且使人才有机会深造的有效办法。在目前来说,可以采取引进和培养相结合的办法,但从长远来说,应该是以自己的培养人才为主,同时又能吸收全国的文化精英,共建广东经济文化。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点是人的现代化。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就是提高人的综合素质。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包括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技术素质。这就必须把“四有”作为提高人的综合素质的基本内容。因为“四有”同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是不可分割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既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又体现了全体社会成员的政治觉悟、精神状态、道德风貌和文化素质的要求。另外,我们还要看到在未来的经济格局中,人才相对优势将取代传统的经济发展优势。拥有自然资源未必能致富,拥有高素质的人才,才能真正致富。日本战后首先致力于发展教育,他们既无铁,又无煤,却拥有大批优秀的人才,因而也就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钢铁工业,这就是鲜明的例子。因此,争取人才相对优势,就要求职工要具备技能。这就必须靠教育的繁荣和发展。在21世纪,劳动者的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将成为重要的竞争手段。

3、加大文化投资力度,充实硬件建设

文化是需要投资的,有投资,才有文化建设。有文化的硬件设施,才有文化的载体。南海市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有一点深刻的体会,就是“金钱并非万能,没有金钱却万万不能。”这是颇为实在的。南海市的文明户、文明村、文明镇所以搞得很好,除了思想发动做得好之外,有一定的投资,也是不可缺少的条件。当然,文化投资可以多渠道,有国家投资、社会集资、海外捐资等方式,但主要应该是国家投资。世界上的著名城市,主要的文化设施,都是国家投资的。广东的文化建设,应该加大投资的力度,充实硬件建设。特别是广州市,要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更应该在文化设施上有大手笔、大动作。例如,应该有一流的歌剧院、音乐厅、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科技馆、社会科学学术交流中心、岭南文化馆等。在教育设施方面,应该有一流的大学、中学、小学和幼儿园。这些都是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所不可缺少的文化形象。

4、完善文化经济政策,促进文化繁荣

过去文化事业的管理体制,实行的是统包统管的供给型经济政策,它的根本缺陷是否认文化自身的产业属性,不重视文化事业的经济效益,那种平均主义的分配方法,也影响了文化系统职工的积极性。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就是要在文化事业的发展中积极引入市场机制的作用。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对于文化产品要考虑到它的特殊性,区别对待。一种是社会效益较好但缺乏市场竞争力的文化,不宜完全推向市场,而要采取国家扶持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办法。一种是大众化、通俗化的娱乐文化,它的经济效益好,有竞争力,如通俗书刊、音像制品以及通俗音乐、舞蹈、演唱会等。一种是纯商业文化,如歌厅、舞厅、酒吧、游戏机室等。这后两种文化完全可以进入市场,国家要加强管理。市场文化还有反动、淫秽的文化,这是我们所坚决禁止的。

政府对文化事业单位的扶持,有两种方式可以互相补充:一种是政府直接投入。这种投入应采取一般支持与重点扶持相结合

的方针。投入重点的地区,主要是广州市和边远山区。投入的项目,应该是代表国家整体文化、学术、艺术水平的高层次文化。除了政府直接投入之外,还可以辅以文化企事业单位的税利返还。以广东省直属文化企业单位来说,每年上缴税局和财厅的税利达7000多万元,这笔税利返还,70%给原企事业单位更新设备;30%由省委宣传部集中掌握,就可以支持公益性的文化事业单位和群众性的学术团体。现在广东只先返还“利”的小头,还有“税”的大头尚在“磨牙”中。相信这个问题最后还是能够得到解决的。

5、正确处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关系

市场经济打破了原有的生活模式,不但使人们的生活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而且使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日益向多样化方向发展。现在,精神文化正向通俗化、商品化、生活化、娱乐化、消遣化方面发展,精神文化所反映的对象和反映的方式,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丰富多采。企业文化、校园文化、乡镇文化、社区文化、电视文化、商业文化等,都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但我们也要看到,精神文化发展的多样化和大众化,也大大地冲击了高雅文化、严肃文化,使指导人们精神方向的理想、信念、价值观的文化精品,陷入窘态。同时还要清醒地看到,这些年来,文化市场上确实出现了一些低格调的、甚至有害的俗文化。这就引起了人们的不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化走向泛俗化已成为趋势。亚洲的“四小龙”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随着社会的市场化,同样也出现了文化走向泛俗化的趋势,而且直到现在他们的高雅文化还是没有多大的起色。其中,台湾的情况稍好一些,这同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比较深厚有关。但是,高雅文化所处的窘态,不会太长久的。人类文化的发

展,总是从低级走向高级。市场经济最发达的美国,它一方面通俗文化泛滥,另一方面它的高雅文化在世界上还是处于领先的地位。从历届的诺贝尔奖可以看到,美国在文学、自然科学方面,是得奖最多的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仅为通俗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也从根本上为高雅文化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里的关键在于:一是对高雅文化的扶持;二是对通俗文化的管理和引导。高雅文化是反映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是精神活动的深层境界,是社会理性的标志,是民族文化和世界文明宝库中最宝贵的部分,必须得到国家和社会的支持。通俗文化在市场经济中如鱼得水,不必担心它们的生存,倒是要对它们加强管理和引导。对于处理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两者的关系,应该坚持先进性和普及性的统一,达到“雅俗共赏”的境界。

“雅俗共赏”,第一个层次,从两者的关系来说,雅文化、俗文化并存共荣,在互补中都得到发展。第二个层次,从两者最佳的结合点来说,应融和于一个“共”字,不是雅降低为俗,而是雅引导俗,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欣赏水平,应该“定位”于“好看,有益”,“寓教于乐”。这个“定位”是浮动的,随着群众欣赏水平的提高,“好看,有益”的要求也不断提高,内容上,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形式上,精益求精。

当然,实现广东文化战略目标的对策和措施,还不止这几个方面。不过,这几个方面是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关系密切,而且也是带有根本性和现实性的对策和措施。但愿广东的文化建设能够象经济建设一样,走向全国的前列,引起世界的瞩目。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科联
责任编辑:冯 生

现阶段广东高等教育发展的经济分析

□冯增俊

一、广东现阶段高教发展分析及模式选择

广东 80 年代原有的经济发展优势已在消失,面临着新的挑战,广东的出路在于迅速作出根本的调整和转变。调整 and 转变的重点是实现两个转型:从被动向主动,从速度向效益,即发展注重效益的主动型外向型经济,以全面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依靠科技进步,促进腹地经济转型,加速周边发展,实现全省经济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

广东的经济转型只能是向高科技水平的、适应世界经济要求的新型企业发展,从速度型向效益型转变,所以,实现产业的技术升级是关键所在。在市场竞争中,技术创新是决定因素;在产品迅速更新换代,保护主义四起之时,要打破贸易壁垒,技术创新也是决定性因素。所以,未来的竞争是科技竞争,广东经济转型的焦点是科技创新。它不仅仅是一二个小发明,而是整体劳力素质提高基础上的自然产物。这不是仅仅引进个别人才所能解决的,还有赖于本地区文化素质精神文明水平的整体提高,这就需要广东教育的发展和改革。十多年改革开放为广东发展教育和吸收外地科技人才创造了条件,但是读书作官的传统和追求升学追求文凭的教育机制却阻碍了这一发展。与同等经济水平的国家和地区相比,他们早已完成十年以上的普及义务教育,并建立起系统完备的职业教育体制,但广东普及 9 年义务教育远没有完成。广东近 5 年移入人口 90 多万,不乏知识分子,但广东科技人员仅占总人口的千分之 7.6,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职工教

育水平也低于全国水平。珠江三角洲的学校建筑是焕然一新了,但片面追求升大学之风依然不改。因技术水平和劳力素质低而使产品滞销现象屡见不鲜。在向效益型主动外向型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劳力素质低已成为广东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隐忧。四小龙和亚太各国发展表明,当经济越开放、发展越快时,对人才要求就越多越高越紧迫。这些都不是靠引进几个人才所能解决的,关键是要建立起为经济发展服务的教育机制,培养本地本行业经济发展需要的人才。

广东教育必须进行整体改革,但重点是高教。广东人才需求已属于中上水平,既要有比以往更多的高水平科技专家,更需要大量的中上水平的技术人员和中等职业技术水平的生产者。而实现这一点,必然要发挥高教的作用,促使中专现代化,只有高教体系改革才能对中专起辐射作用。

16 年改革开放使广东高教有了很大发展,普通高校从 1979 年的 29 所,在校生 4.1 万人,到 1991 年的 42 所,在校生 9.2 万人,增长 124%。如包括高中后的中专、自学高等考试、成人高校和普通高等教育四种形式,在校生已从 1979 年的 11 万人增加到 1991 年的 42.3 万人,增长 3 倍。广播电视大学已设 114 所,遍布全省各县市。16 年来广东还创办了一批有特色的地方大学,珠江三角洲地区几乎每市建立(或正在筹建)一所大学,如深圳大学、佛山大学、汕头大学、东莞理工学院、江门市的五邑大学、中山市的孙文学院、肇庆市的西江大学,筹办中的顺德大学、珠海大学等。高教管理体制已由统制性集权管理改为多元办学,私立高校开

始出现,目前申办的已达30多起。随着经济的转型升级和广东高教运行体制的改革,一批急需专业和学科应运而出,改变了大文大理的学科结构,缓解了人才需求。

但是应该看到,80年代广东经济发展对高教提出的要求只是初步的,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经济对人才的需求势头才显现出来,广东高教改革才刚刚拉开序幕。80年代广东引进的大多是低层次产业,对人才要求不高,只须引进个别高级人才就够了,因此在大部分工厂中,科技人才仍很少。90年代起,广东产业结构开始发生质变,已开始从低层次劳动力密集型向高层次的劳动力密集型转移,其特征是从单纯“三来一补”企业转向创建独立经营体系的企业,迫切需要建立规模性的技术研究队伍。珠江三角洲发达地区高新科技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也在迅速崛起,并相应形成了高新科技产业群落。它们不仅需要大批高水平科技人才,也需要提高生产者的技术水平。

国际经济发展经验也表明,当一个地区人均国民总产值达到500—1000美元时,产业就会出现从劳动力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质转型,这就意味着智力投入将决定生产的发展,决定产业向效益型转变,表明人才需求也出现质的转变。不同产业结构对人才的需求结构是不同的,如表1所示。①

产业模式与人才需求宏观数量关系

产业模式	体力劳动与 智力劳动之比	专门人才结构比		
		高级	中级	初级
资源、劳动密集型	9 : 1	1	4	5
资金、技术密集型	6 : 4 或	2.5	4	3.5
	4 : 6	3	4	3
高科技密集型	1 : 9	6	3	1

广东改革和发展高等教育迫在眉睫,广东高教应当在10—15年内建立起一个符合广东经济发展需要并适应广东实际需求的实用型高等教育模式。从广东赶超四小龙的战略要求和高教发展的内在规律出发,这一

模式的形成应分三步实施:

1. 起动阶段。其主要目标有三,一是大力发展科技教育,建立从科技高中、科技学院或理工学院到科技大学的科技教育体系,广东应在八五期间动工兴建一所科技大学;二是大量培养高等应用型人才;三是大力创办社区学院,改革传统的正规普通高教模式,使高教功能真正转向为本地经济发展服务,使精英高教向大众化高等教育转变。在这一阶段,大力发展民办社区学院、五年制职业技术学院或理工学院,专科学校为主、民办公助为主,并兼顾本科和研究生教育,有目的地选派部分优秀人才出国深造,采用优惠政策吸引优秀人才到高教系统,发展高新学科研究所,建立高级人才培养基地。根据国际教育经验,要根据产值增长与人才需求的比例关系来确定全员技术教育的规模和速度,珠江三角洲1982—1990年产值增长与人才增长的比例是1 : 0.343,比美国1950—1980年的比例1 : 0.935低(美国当时已具人才成熟系列),甚至比挪威1900—1955年的1 : 0.556都低。可见,要实现高科技时代的经济起飞,赶上四小龙,非下决心实现更大的人才增长不可。

2. 形成阶段。其主要目标是逐步建立高教一体化体系,使高教各个层次各个部分都形成一个相互作用、相互衔接的整体,一个有效运作的系统。这个系统不仅各个层次和部分都具有适应特定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功能,而且与更高级层次和部分有互动关系,高一级层次和部分不仅对低级层次和部分有导向作用,而且能通过对低级层次和部分的认可,为高一级学校筛选出较优秀的人才,同时又使输往生产领域的人才具备胜任工作的能力和健康心态。如果说,开始阶段是通过分工来完成社会对高教的不同要求,这一阶段则在内在联系上开始达到分工合作的统一,在宏观上体现为一个整体。这应当是九·五期间广东高教的任务。在这期间,社区学院功能进一步得到完善,具有学位教育、转学教育、继续教育、培训教育、文化补习以及社区文化技术中心等功能,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开始从分轨达到合轨,相

互承认学分、承认学历,注重以学分、以知识水平和实际操作能力作为认可标准,而非仅看学历。这期间,有关工种要实现70%以上劳力的中等技术教育,和30%以上的专科学历教育;每万人有在校大学生250—300人(韩国1990年329人),科技人员15—20人,大学学历者达250人以上。年产值上亿元的企业不仅要建立研究所,还应成立培训中心,对员工进行系统的技术轮训。

3. 飞跃阶段。建立以研究生教育为龙头,形成系统的科研体系和科研人员培养基地,带动庞大的应用性学科和激活以应用开发为主的科研队伍,形成初步成熟实用型高教体系,推动经济持续飞跃。这时高教已全面转型,与社会、经济建立起全方位的互动联系,纳入经济发展轨道;镇一级(产值达到50亿元)已建立起社区学院,市已建起多所中心高校;相关行业实现了80%以上劳动力的中等技术教育和40%以上劳动力的专科以上技术教育;每万人有在校大学生350人以上,专业科技人员达30人以上,工厂研究机构主要以硕士学位获得者构成。

从广东发展来看,要形成真正成熟的实用型高教体系,使文理工科之间、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之间、科研与成果应用开发之间建立起良性的多向互动机制,需要20—30年。高教能否实现模式转型和完善,既需要发展速度、规模上的保证,更需要确立正确的发展方向。因此,2000年中期发展有关键性作用,有检验方向正确度和奠定基础的双重作用。按国际惯例,以产值增长与人才增长的比例估算,中国实际产业结构中人力资源较充分,每10万元产值需要1名科技人员,那么,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如以年平均12%增长,2000年将需要130—150万名科技人员,教育投资应达到4.5%以上,普及9年义务教育率达95%以上,高中入学率(包括中专)达80%以上,在校大学生70—80万人,其专业构成是文4:理工6。这都要求广东高教有一个重大改革和发展,才有可能实现如此巨大的增长。

二、广东现阶段高教发展的基本策略

广东高教必须坚持在改革中发展,以改

革促进发展,通过改革保证发展沿着健康的轨道进行,通过发展来巩固改革的成果。这里简要提出几条基本策略:

1. 逐级递进、分合互动

(1) 在发展层次上,先大力发展较低层次的二年制社区学院和三年制专科院校以及五年制的高级职业教育(招收初中毕业生),重点培养生产大量急需的短、平、快高级技术人才,然后逐步向四年本科发展,最后形成以培养高级研究人才的研究生教育为龙头的高等教育体系。(2) 在战略设计上,首先发展沿海较发达地区的高教,然后随着经济的推进依次推进,使高教波浪式地推向内地。根据广东山区教育情况,高教的学术性水平要求应适当低一些,重点应放在培养动手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才上,当经济波浪推进时,再通过其他途径提高这些人的学术能力,国外的经验也证明这是成功之举。目前,我省应鼓励经济波浪即将推到的内地率先发展应用性高教院系和学科,以充分的人才储备适应经济振兴规划,这是高教主动适应当代经济发展的最佳形式。(3) 在高教功能分布上,即从发展单功能院校分工制,进到发展主要功能附带辅助功能的综合高校,使分工高校之间形成相互协作的多样化体系,最后在多样化基础上发展有良好协调关系的一体化高教,逐步使社区学院、成人院校、专科学校与普通大学之间建立起衔接关系,使这些学生通过特定的方式,在高校之间、学科之间自由流动。大学科研成果可通过专修学校、社区学院向社会推广,社区学院中优秀的学生或有志向深入学习的学生也有机会进入研究性大学深造。这是现代高教发展的一大趋势,广东应及早设计高教一体化体系,争取高教发展的主动权。

2. 建立市场运作的高教运行机制

这是关系广东高教能否摆脱旧模式,实现根本性变革,能否在2010年培养72万研究开发人才的关键策略。市场竞争是一种鼓励提供更好的服务和更有效的组织管理,培养更优秀更受欢迎的人才等手段来进行的竞争,择优汰劣,从而调动各方办学积极性,达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广东高教要建立市

场竞争的运行机制,一要改变目前由政府统制管理的体制,变政府领导为指导,或变硬领导为软领导,政府只在拨款方面进行调控,与社会团体、与私人等办学实体进行平等竞争。政府的统筹只是一种拨款引导,这种拨款引导对任何学校都是公平的。二要开放自由办学,允许民间及境外人员来粤办学,公开各种办学审批手续,尤其应鼓励大企业和基层办高校,参与竞争。三要给高校办学自主权,允许高校根据自身特点办学,自主决定学术标准、专业设置、教师聘任、办学规模以及体制运作。四是大力倡导学术自由、教学自由、科研自由、学习自由,实行学分通行,学生可按学科结构的有关学分规定自由选课。教授可根据学科体系和教学特点设置课程,并允许建立个人实验室、研究所。五是给予充分政策,使高校内部、高校与高校之间、高校与社会之间充分竞争。

3. 大力发展高等科技教育

广东必须强化一个高教概念,即科技不仅是生产力,而且是社会进化的排头兵,是突破传统经济模式、社会体制和社会观念的带头要素。从发展远景看,广东必须在15年内坚持每五年建一所较大规模的科技大学,并以一到二所技术学院为依托。建立科技大学也必须实行从低向高循序渐进的方法,每三五年一个台阶,经过6—8年发展达到以培养本科和研究生为主的大学。为了使科技大学具有良好发展前景,应在中学建立科技高中,以及科技中专、科技专院校等,使科技大学有充足的生源基地。韩国科技大学中50%以上的学生来自科技高中生。

4. 推进广东高教国际化

这是广东建立实用型高教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其具体做法,一是吸收国际高教办学经验、办学方式,在大学管理、规则、惯例上尽量与国际通行方式相一致;二是与国际相应大学建立广泛的交往和联系,交流科技资料,互访研讨学术,进行学者交换留

学以及各种协作;三是与国际大学共同开展科技研究活动,建立各种短、中、长期的合作关系;四是吸引尽可能多的外国留学生和学者来广东学习及进行研究,扩大对外影响;五是允许并支持境外人才、团体到广东办学、办文化机构,在政策方面给予优惠。广东高教国际化将有力地推进广东高教现代化,应当给予充分的重视。

5. 立现代高教意识,创精神文明新风

广东高教赶超四小龙,推进高教现代化,是一个全面的概念,它表现为一种教育发展的整体水平,一种包括精神文明在内的综合力。首先是树立高教必须服务于经济发展的观念,懂得如何使高教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二是树立技术立国、教育立国、教育为本、教育先行的观念,在较好的现有基础教育的发展成果上,把高教作为战略重点来抓;三是破除追逐功名、文凭至上、重名轻用及读书做官的观念,树立重效用,以效用论功名的新教育观;四是鼓励大胆创新、勇于竞争的观念和心态,以适应发展主动型外向型经济带来的更积极更高层次的国际化开放,倡导大教育观;五是树立和营造全面吸收人类文明成果的开放型精神氛围,把学校德育由以政治教育为重点转向以品德养成教育为重点,创设最适宜经济发展的社会精神文明体系。面对我国现代化,有必要重复这样一个事实:在现代世界上真正走向繁荣的国家,总是先教育发达,到科技发达,再到经济发达,并形成三者良性互动的发展道路。违背这一发展法则,经济即使起飞也会很快跌落下来。

①黄家驹、颜泽贤、冯增俊主编《改革大潮中的珠江三角洲教育》,广东高教出版社1993年版,第85页。

作者单位:广东省科学教育研究所
责任编辑:陶原珂

“20 世纪中国新文学当代形态与 新文学传统” 研究笔谈

【编者按】关于 20 世纪新文学的研究，本刊继 1994 年 10 月 8 日与广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联合举行“20 世纪中国新文学传统研讨会”之后，1994 年 12 月 12 日又与广东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联合举行了“20 世纪中国新文学当代形态与新文学传统研讨会”。这组笔谈就是在第二次会议的基础上编成的，内容初步涉及新文学当代形态的文化取向、审美特征、承传关系、演进方式以及文学批评方式等方面。还有不少问题有待深入探讨。

世纪之交：当代文学的走向

陈其光

(华南师大)

回顾中国新文学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我认为本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理论与创作，主流仍然是现实主义。这是历史的选择、是民心所向。但在发展的过程中，常常受到政治的冲击、运动的干扰。尤其是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现实主义为某些人和集团所占有、所利用，使伪现实主义和伪浪漫主义创作思潮泛滥以至主盟文坛，出现了“扭曲了的现实主义”局面。从建国后我国当代文学发展史来看，真正的现实主义创作主潮是不存在的，但这并不等于在某些理论与创作中不存在现实主义的特征。在我国当代文学作家与作品中，还缺少真正的现实主义大师与“拳头产品”。近半个世纪以来，当代文学的现实主义一直被“革命理想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积极浪漫主义”、“革命浪漫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创作思潮所抑制、所削弱、所包容、所代替，并以此定为“唯一正确的原则”，或囊括、支配一

切文学现象的“根本法则”。正是这些“原则”与“法则”，以其狭隘的功利主义目的，左右着现实主义理论与创作，陷进了唯心主义的误区。当然，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无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或者文学创作的主体和对象，都不可能脱离政治。但生活的外延远远大于政治。当年，曾有不少追求真正现实主义理论与创作的同志，针对文坛上的“假、浅、窄”、“假、大、空”、“欺、瞒、骗”以及在诸如真实、题材、典型、倾向、悲剧、人性、歌颂与暴露等现象上的“左”的禁律，提出了现实主义要真实、要深化、要干预生活等美学内容，以图改变文艺理论与文学创作上的积弊，招来的却是大批判。文坛上的理论探索与典型塑造常常出现的“看到的和表现的错位”现象，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与条件下产生的。这个时期，并非没有真正的现实主义大师与作品，但他们的个人爱好与个性特征、有独创与突破的艺术风格，常常遭到政治和意识形态原则的干涉与限制，只许定于一尊、拘于一法。当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作家与作品，往往只能以被人扭曲和

自我扭曲的畸形病态,呈现于世人面前。

七八十年代之交,我国社会和文学经历了破坏和更新、分化和发展的演变过程。这是继“五四”文学革命以来,我国新文学运动一次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从我国的国情民情、社会心理以及历史文化条件等方面看,现实主义毕竟比其他一些创作方法具有更多的长处和优越性。八九十年代以来,我国文学差不多走过了西方百年的路途。各种思潮、各种流派、各种艺术视角和各种艺术方法都参照和吸取过了。当前的理论与创作,正朝着全方位、多元化、多层次、辐射式的态势跃动。在中西文化大撞击与交流的背景下,现实主义在改革开放中得到恢复、回升、发展和深化。它虽然受到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和挑战,但仍是文学创作中的主流。许多有成就、受欢迎的作品,仍多出自现实主义作家之手。三届茅盾文学奖中获奖的16部小说,是从1982—1991年间一千多部长篇小说中评选出来的。这些长篇,在既歌颂了生活中的美,也揭露出生活里的丑方面;在追踪以往生活的轨迹和反思国家、民族、个人、阶级的道路方面;在深入开掘人物内心世界的复杂和干预灵魂的高下方面;在折射时代的精神和反映人民的心声方面,都能从社会关系层面逐步深入到文化层面和生命层面,去反映人生、表现社会,介入生活、干预生活。虽然其中有些作品仍留存了某些“从属”、“服务”和“配合中心”、“图解政策”的痕迹,但基本上属于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好的和较好的现实主义作品。对照80年代中文坛上浮现的“中国式现代派”作家与作品,尽管曾被某些文人学者抬得很高,但由于脱离时代、远离民众,终不免昙花一现,为大众唾弃。所以,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更多地兼容其他创作方法来不断丰富、充实自己的现实主义;仍然是更多主体性与创造精神,坚持既勇于歌颂真善美、又敢于鞭挞假恶丑、具有革命精神的现实主义;仍然是更多地吸取、借鉴中外传统文化精华,并立足于我国当代现实、善于极大地满足人民大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审美情趣的现实主

义。以往那种人为的“大一统”的文学时代已过去了,几番风风雨雨,毕竟挡不住春天的脚步。一批以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及其杰作为标志的黄金时代即将到来,当代文学必将走向普通人的生活,走向当代人的心灵,朝着“既是世界的、又是民族的方向”发展。大势所趋,不可逆转。

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化内涵

王晋民

(中山大学)

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化内涵是复合的,至少含三个方面。

第一是以儒、道、佛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儒家的仁爱、忠君爱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经国济世、文以载道的思想,佛家的世事无常、人生如梦、一切皆空的虚无主义、悲观主义、宿命论思想,道家的无为和与世无争的思想,都对当代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例如文革前27年文学中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爱党爱国、为人民服务,尊老爱幼的思想,都与儒家思想有密切关系。新时期文学对中华文化精神的体现更为明显:轰动一时的《棋王》对人物的描写,将对中国的古典哲学、道禅精神的领悟灌注到人物形象之中。《小鲍庄》中的仁义思想,“寻根文学”对中华文化的追寻亦很突出。当代台港文学,也一直渗透着中华文化精神,香港梁锡华的《香港大学生生活》呈现了世界各国众多文化思想,是文化小说,但他独尊儒家,提倡对旧儒家旧道家有所批判的新儒家思想及新道家思想。《香》的姐妹篇《独立苍茫》则流露了生命无常的佛家思想。台湾的现代诗人,在70年代回归传统后,亦普遍接受了儒、佛、道思想,特别是佛家思想,如周梦蝶、余光中、洛夫等即如此。台湾不少作家笔下的人物,年青的时候信仰儒家,讲求经国济世;中年仕途与事业受到挫折,就讲求道家,归隐乡里、田园;到了晚年,仕途无望,便信仰佛家。白先勇的小说《游园惊梦》中的钱将军,《国葬》中的刘行奇,《思旧赋》中的李将军,《梁父吟》中的朴公,

都不同程度地经历了信奉儒、道、佛三个阶段。可见,中华文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是深远的。

第二个方面是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无产阶级文化。无产阶级文学观念认为,文艺是社会现实的“反映”,文艺从属政治,必须为工农兵服务;主张文学家投身工农兵群众中去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作家应采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以塑造英雄人物为根本任务;提倡文学走大众化、民族化的道路。文革前27年的中国当代文学,深受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它的反映论和阶级斗争论的影响。这种影响使中国当代文学在文革时期走向了极端,文学成了少数野心家篡党夺权的工具。新时期,文艺界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特别是毛泽东文艺思想进行了再认识,虽然批判了过去的“从属论”、“工具论”思想,但是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仍然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四化建设服务的口号和改善与加强党对文艺界的领导问题。新时期的作家,很多人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如林默涵、刘白羽等),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的文学思想来指导创作(如姚雪垠、欧阳山等)。就是那些被视为离经叛道的作家如王蒙,其艺术思想吸取了许多西方的东西,但其内容仍有许多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有许多在国内某些人看来是右派作家的,但在海外却被看作左派作家,就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同时渗透着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文艺思想以及西方文化思想,而被人们从不同角度观察的缘故。

第三方面是对西方现代文化的吸取,尤其是接受了西方的哲学思想、心理学说和人文主义思想,如人性和人道主义思想,萨特的存在主义,叔本华、尼采的生命哲学,柏拉图和本格森的直觉主义,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等。受西方文化与文学的影响,当代中国文学的审美意识也具有了现代的特点:一是文学从过去主要反映外部社会的写实观念“向内转”,以描写人的内在真实为中心;二是在描写人物的精神性格方面,从过去的

刻划典型人物的行动和言语,变为描写有如西方小说所常见的荒诞感、孤独感、疏离感、焦虑感、失落感、迷惘感、分裂感等。三是文学审美形式的变化。意识流、象征、暗示、潜意识、梦境、黑色幽默、非主题、非情节、非人物,各种文体的交融,语言的感觉化,代替了过去写实文学的特点。所有这些,都说明了中国当代文学受外来文化的冲击。如从王安忆的《小城之恋》和《岗上的世纪》,我们可看到弗洛伊德心理学关于性本能理论的影响;孔捷生的《大林莽》体现了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戴厚英的《人啊,人!》表现了西方的“人性、人情、人道主义”思想,王蒙的意识流小说体现了在西方文化思想影响下,中国当代文学从内容到形式的巨大变革。

中国当代文学的两种文化倾向

柯 可

(省社科院文学所)

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目前有两种呈对立倾向的文化:“兴都文化”与“废都文化”。兴都文化以大力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需要为目标,是以市场经济化,生活现代化,观念更新化,文化国际化,艺术通俗化,传媒大众化为标志的新平民文化。废都文化则视城市为腐化堕落的大染缸,扭曲人性的恶魔王,充满世纪末颓废情绪,以城市消亡,重返田园,恢复旧经济体制和传统生活方式为取向。

中国经济向市场经济方向奔流,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其影响不仅重构了城乡格局,造成了一批文化中心城市的崛起和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地区撤乡立镇、撤县设市的新气象,而且在深层次上陶铸着华夏新一代平民文化观、价值观、人生观,从而造成了以中国沿海开放城市链为龙头的“兴都文化”大繁荣的壮丽景观。

“兴都文化”与受西方危机论未来主义影响的“废都文化”是势若水火对立的两极,是现代人对自身生存方式的积极选择。兴都

文化视城市为现代文明的大本营,以振兴都市为己任,以改革开放中对社会做出贡献和改变了陈旧观念的人为主要审美对象。废都文化则视城市为发展商品经济而导致人类退化的地方,以表现文人的堕落和痞子丑行为乐事。

兴都文化的作品如《商界》、《裂变》等,人们从中可以感受到改革的艰辛和新观念转化的痛苦,但最终得到的是向上的鼓舞。废都文化的作品则喋喋不休地叙说心中的苦闷,把世界看得漆黑一团,为文痞市侩的种种丑行作辩护。《废都》流露的废都情调,其实是一种在新旧时代交替时,看不到新文明曙光,对政局悲观,对前途绝望,对道德蔑视的文化心态。用作者在《〈废都〉的创作回答》的话来说,那就是“西安在中国来说是废都,中国在世界来说是废都,地球在宇宙来说是废都。”这种废都心态实在是与时代不合、与民心相违的。兴都文化,兴都情结,理所当然的应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主导倾向。因为,从文化内涵看,兴都文化是一种积极向上,广采博收的文化,它必然对世界上所有进步的都市文化艺术感兴趣,对立体多层面地表现都市文化的创造和形象感兴趣,学习包括巴尔扎克、左拉、雨果、托尔斯泰、茅盾、巴金、老舍等文学大家在内的所有国内外进步作家的创作经验,为改革开放的大时代创作史诗作品,创作有益于人民的精神食粮。

当前,特别应强调树立大都市意识,树立大时代意识,变小家子气为大家手笔,从家庭琐事的小市民圈子和公式化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在市民生活的现实题材中注入时代精神,注意以高尚的审美激情去塑造有血有肉的正面人物,使读者从人物心灵的变化里,能够吸取精神力量,完善人格,增强信念。

中国新文学的当代性与承传性

黄树红

(广东教育学院)

中国新文学发展史,是一部文学大众化

的历史。从理论上说,“平民文学”的提出,文艺大众化的探索,乃至文艺工农兵方向的确定,无不是对大众作用的肯定。从创作实践上说,多少有价值的作品,哪一部不是首先从民众的需要、为民众的利益考虑的?20世纪以来,中国出现过两个历史的大杠杆,一个是政治革命(包括阶级斗争),一个是商品经济。中国社会也因此发生从政治/农业社会向经济/工商社会的转变。在社会大转变中,新世纪的文学先驱们首先喊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随之涌现出许多接近大众语的“白话”文学,推动新文学的发展。世纪之初至40年代末,中国作家尽管承受着反动政权的重轭,他们仍坚持为大众而创作,写出了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大批作品。延安时期以及50年代初至70年代中,中国作家尽管受着极“左”政治的影响,他们亦能坚持群众观点,坚持艺术规律,创作出一批深受人民群众欢迎的优秀作品。80年代初以来,中国作家接受着经济大潮的冲击。这一次的冲击的确巨大地震荡着中国作家的整个行动方式和心理结构。刚从政治重轭下解脱出来的作家,面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工商时代,应该怎么办?这是当今每一个作家都必须考虑并作出决择的。“下海”者不必嘲笑“求智”者是“书呆子”,“求智”者不必讥讽“下海”者是“见小利忘大义”之人。事实上,有的作家“下海”后能更好地创作出为大众的文学,不妨“下海”;有的作家“求智”能更好地为大众写出好作品,可以坚持“求智”。关键是为大众出成果。从接受美学的理论看,文学作品是为读者阅读而创作的,它的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只有在阅读过程中才能最终得以实现和完成。因此,读者越多,其作品价值的表现机会就越大。要争取读者,就要了解读者的需求。及时把握读者的心理特点、精神需要、社会心态,以及文化水准、审美心理、审美趣味、审美习惯,这是我们争取读者,实现作品价值的必要前提。面对商品大潮已将文学作品推向市场的现实,我们的作家更应该关注文学市场,把握文学市场的信息。文学作品走向市场,大众是最权威的审查官。美国学者、

《大英百科全书》董事会主席莫蒂然·丁·阿德勒提出选定名著的六条标准,也把拥有读者多少和大众化程度放在头等位置。无论从文学的承传性看,还是从当代性看,世纪之交的新文学,必定是更加走向大众化的文学,更具有时代性的文学。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时代性

黄修己

(中山大学)

“当代性”,这是个非常难做的题目。80年代初讨论现代派问题时,有人说现代派就是现代化,就有“现代性”(我认为“现代性”、“当代性”两词并无区别)。又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思想最先进,以它为指导的文学最具“现代性”。这样的讨论,只好不了了之。无论是拿外部什么时髦的东西,或者自己主观上制订出若干条条,做“当代性”的标准,用以衡量、评论、说明中国新文学,都是非常困难的。文学研究的任务,是从事实出发,在尽可能真实详尽的事实基础上,作出自己的科学判断,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这个工作做得好,自然反过来对现实会有指导的作用、借鉴的作用。因此,我更喜欢“时代性”这个词。尽管它没有“现代性”、“当代性”那么引人、夺目,那么有一种令人产生兴奋感的刺激性,不免客观、冷静了些,然而这恰恰是对历史的回顾、反思所需要的。

20 世纪中国文学有着鲜明的时代性,这正是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它与当代社会的紧密关系,是历史上任何一个世纪的文学所未曾有过的。本世纪初,新文学正在孕育期和临产期,正值一个启蒙时代。从鸦片战争后丧权辱国的痛苦中惊醒,经过了甲午战争、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一连串失败、挫折,第一代启蒙家发现传统文化对民族生命力的窒息,从而发出文化革命的呼声,并且发动了文化批判运动。新文学正在此运动中降生,所以一开始就带着启蒙文学的特色。随着启蒙运动的复遭挫折,新文学先驱者在彷徨中,被迅速兴起的中国政治革命的高

潮吸引,许多人转向马克思主义;为了适应变革社会制度的斗争的需要,新文学结束了它的启蒙时代,从文化批判转向社会批判,社会剖析小说充当了新的先锋。随后,又在救亡运动的推动下,社会批判中增添了许多政治批判的成分,从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到后来的集中批判国民党政权的黑暗腐败。新文学在政治批判的歌声中送别了旧中国,用欢乐的颂歌迎来了新中国。此后,新文学主潮显现出极带时代特色的理想主义色彩,这是特定时期民族精神面貌和心理的表现。这种理想主义又与空前的英雄主义联系着,发展到极点,便是“样板戏”、“三突出”。后来,当人们从理想的梦幻中醒来,看到的竟是废墟般的现实时,理想主义便撞向了另一个极端。“三信危机”的出现,改革开放的实施,中外文化交流的恢复,建设事业的艰难曲折,在诸如此类的背景下,便生出近十余年来文学上的种种现象。一方面从最初的伤痕文学重新呼唤“救救孩子”,人们惊奇地发现了“花甲轮回”的景象,产生重铸民族文化的急切要求。另一方面,在商品经济大潮的猛烈冲击下,人们又惊叹人文精神的失落,面对着文化失范、道德失范,不免忧从中来。所有这一切都反映到文学里了,从“王朔现象”到“废都现象”,够研究家们分析上一阵子了。

20 世纪中国文学,之所以如此紧密地伴随着、反映着时代的动荡,具有强烈的“时代性”(亦可理解为“当代性”),除了从根本上说,它是民族精神之表现外,还因为从一开始人们就把文学看得太重了。从启蒙家的“小说决定论”,到政治家的“文武大军论”,都为了变革社会而对文学寄予厚望,委以重任。度过了近百年的艰难岁月,也许新文学有不胜重负之感了,于是“玩文学”了。到了世纪末,出现了文学从中心向边缘迁移的迹象。也许下个世纪的文学不再象本世纪这样具有时代性,这是后话,重要的是回过头去,看看本世纪文学的这一特征,造成它什么样的优点和缺点,这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文学的失魂

喻季欣

(广州军区创作室)

时代与文学的关系是千丝万缕的。时代对文学的要求与文学对时代的满足,是文学能作为文学存在、具有价值、为人们接受的根本关系所在。不妨这样说:时代精神是文学之魂。

诺贝尔文学奖有一个平庸的开端。本世纪初,英国小说家哈代、俄国文学巨匠托尔斯泰正如日中天,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瑞典大文豪斯特林堡也声名远播。可是首届诺贝尔文学奖却授给了虽在祖国有一定诗名但在世界却鲜为人知的法国诗人苏利·普鲁多姆,引起各国舆论大哗。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1902年对世界舆论的答辩当然是不能说服世人的,尤其说到托尔斯泰对宗教不敬、对政府不恭、对社会批判不尽合理,这更是遭人讥讽,使此殊荣一度名声扫地。但历经90余年,诺贝尔文学奖终于有了今天的荣誉。究其因,是瑞典文学院后来走出了平庸的开端,把该奖授予了20世纪一系列的文化巨人。特别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以及世界各国人民,无不在注意获奖作家的艺术创造时,又褒扬作家对人类共同面临的困境、对时代缠绕的情绪所投入的热情与探索。从他们的作品里,我们领略到了人类的艺术创造成果,感受到了时代神经跳动的脉冲。罗曼·罗兰写道:“一切能够永存的艺术作品,是用它的时代的本质铸造的。”时代精神成为文学之魂,是文学的使命,也是文学的光荣;是文学的追求,也是检验文学的一个尺度。

就其创作的根本而言,文学作品对时代精神的反映与表现,是作家对时代生活的思考与感悟。文学的时代精神,首先是作家的魂魄所在。时下的问题是,我们的许多作品对时代精神的理解不是依然存在对单一观点的图解,就是矫情的甜俗与媚俗,以至虚假、做作、铜臭甚嚣尘上。在商品经济日益发达的时候,文学的落魄与媚态,与其说是源于生活的挤压,不如说是作家操守的失

却。文学的失魂,是创造者的失魂。失魂的文学是维持不久的。

新时期文学创作潮流成因

邝邦洪

(华南师大)

在新时期,先后出现过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中国式的现代派小说等创作潮流,它们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社会潮流影响着文学创作潮流的形成。文学创作潮流是社会潮流的一部分,一般来说,社会上出现什么潮流,文学都会及时反映。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的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当时的社会潮流是:人们从大灾难、大忧患中解脱出来之后,开始痛定思痛,揭批林彪、“四人帮”,控诉给人们带来灾难的“文化大革命”。这一社会潮流就直接促使了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陈国凯的《我应该怎么办》、郑义的《枫》、金河的《重逢》、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莫应丰的《将军吟》、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的出现,形成了一股“伤痕文学”创作潮流。这一创作潮流对人们认识极左路线的危害性,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又如,1978年下半年,以“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为标志展开了全国范围的思想解放运动。清算影响深巨的左倾路线,恢复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是当时的社会潮流。这个社会潮流又直接影响着文学创作,出现了刘真的《黑旗》、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王蒙的《杂色》、谌容的《人到中年》、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等等,形成了一股“反思文学”创作潮流。这些作品通过重新审视“大跃进”、“反右斗争”、“四清运动”等历史行程,揭露极“左”思潮给我们带来的灾难,让人们重新认识历史和评价历史,总结经验教训。这一“反思文学”创作潮流的出现,对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起到了积极

的推动作用。可见,在特定历史阶段形成的社会潮流,只要符合人民的利益、意志和要求,就会直接影响到文学创作潮流的形成。

二、创作主体有切身的体验和拥有丰富而厚实的生活积累,也会促使文学创作潮流的形成。“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潮流的创作主体主要是中青年作家。虽然有不同的人生阅历,但都亲身经历了建国后几十年的历史行程,经历和目睹了人生的艰辛与磨难,这一切都为他们的创作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三、广大读者对文学的关注,也推动文学创作潮流的形成,这是文学形成潮流的共振原因。当《班主任》、《伤痕》、《我该怎么办》、《大墙下的红玉兰》等小说出现的时候,广大读者感到小说写出了他们的血和泪,喊出了他们的心声,于是他们对文学充满着爱,把文学当作与自己密切相关的事业来对待。读者的真情,促使作家更辛勤地耕耘,写出更感人的“伤痕文学”作品。当人们痛定思痛之后,广大读者又要求文学具有更丰富的艺术表现力,更深切的思想洞察力,与他们一道重新审视和评价历史。读者的这种心理状态、欣赏要求,对反思文学创作潮流的形成亦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除了以上三种因素促使文学创作潮流的形成外,还有一些作家公开打出旗号,提出自己的主张,并以创作实绩来实现自己的主张,因而也形成了创作潮流,如“寻根文学”创作潮流和“中国式的现代派小说”创作潮流,就是典型的例证。

当代文学中美与善的进退

翁光宇

(暨南大学)

五六十年代我国的优秀作品有一个好传统,就是辨善恶、明是非,以善为本,以善为美,宏扬文明精神,鼓励奋发向上。这种审美观教诲了一代人为国为民、先人后己、大公无私的美德。但因过分强调理想主义,反映生活和塑造人物则有欠“真”的缺陷。

70年代末80年代中的优秀作品,将理想主义色彩淡化,注重善与真统一的美,人物也由五六十年代的雄壮美转向悲剧美。陆文婷、胡玉音、许秀云这些具有非凡品格的平凡人物,较之梁生宝们更有深度,更可信。虽然他们都是某种善的体现,美的化身,但在反映生活的复杂性和揭示人物性格的丰富性上,更切近真实。它们之间明显有着传统的承传关系——以善为本,又有深刻的时代发展——注重真实,讲究真善美的统一。这是文学的继承和发展,是时代文明的进步,是作家的正途。

但近年某些知名作家的作品,却弃善扬恶,追求审美情趣的庸俗低级乃至色情下流,这是美学观上的倒退,是作家的歧途。试问西京“文胆”庄之蝶们沉溺于唐宛儿、柳月等一个个女人的情欲之中,作者津津乐道其肉欲的过程,并模仿《金瓶梅》洁本的笔法,以丑为美,以恶为“善”,到底有多少“文学”价值?尽管庄之蝶最后被景雪荫们打败了,被市长唾弃了,精神几近失常,生命陷入垂危,但并不能造成悲剧美。其原因就在于它不是美的东西遭到毁灭,善的东西遭到摧残,而是丑陋在与邪恶的倾轧中,被邪恶打败了。以丑为美,以恶为善,强调“生物人”而忽视“社会人”的伪真,是文明的一种倒退,是物欲膨胀年代人性向兽性的退化。

现实主义仍然有很强的生命力

赵士聪

(华南师大)

现实主义精神和传统,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占据着主要地位。在20世纪新文学发展过程里,表现尤为明显。当代文学前17年,虽然受“左”的思想干扰及“文艺为政治服务”口号的影响,但总的来看,是现实主义创作的兴旺期、丰收期,出现了一批艺术较成熟、风格较稳定的作家和一批现实主义的扛鼎之作。

文革期间,四人帮扭曲了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和创作原则,把作品当作他们错误路

线的宣传品,当作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使社会主义文艺濒临崩溃的边缘。

新时期,现实主义在新的条件下得以恢复并更开放,更发展。从描写和反映人们在文革中所受的肉体和精神创伤的“伤痕文学”,到回顾并重新认识解放以后我们党和人民走过的道路的“反思文学”,到直接描述和反映新时期改革开放的经济建设的“改革文学”,都是用现实主义的思维方式,用现实主义的审美观去审视生活,反映生活,塑造形象的。这些作品所用的现实主义写法,已不象以前那样政治化、工具化,不象以前那样塑造单纯的再现型形象以及单一的写法。它已更多地重视审美属性,更多地描写心理,铸造灵魂,创造表现型的典型形象,更多融入多种手法,更呈多样化。

新时期,创作形式、创作形态的确愈来愈趋于多样化。从七八十年代之交出现的朦胧诗,到80年代中出现的探索剧,及运用意识流等西方现代主义手法、对西方模式追逐、模仿的实验文学,以及发端于1984年,兴盛于1985、1986年,而落潮于1987年的寻根文学,以及始于1983年前后,而于1985年形成趋势的纪实文学和勃起于80年代末的新写实小说,还有90年代初出现的新状态小说,都是随着经济开放和文化开放带来的可喜现象。它使人们思想解放,使创作兴旺,文坛活跃。但是,创作形式、形态却是“各领风骚三五天”,其主要原因就是,未能贴紧时代,顾及国情,承传和发展有生命力的文艺传统。如实验文学中的部分探索剧,从荒诞到荒唐,从理性探索变为理性失落。有些小说,远离时代,淡化主题,人物隐退,结构混乱,语言也较艰涩。这些作品,无论道德观念、价值尺度、审美习惯、结构形态、语言形式,都与我们的国情、文艺传统、读者的接受能力,存在较大距离,故难以得到沟通和认同。纪实文学、新写实小说,在多种文学形式争芳竞妍的情况下,所以能得以新生和走俏,主要在于它们能紧贴生活,吸纳现实主义传统之长,又葆有现代主义的色彩。而后来,由于仅仅从外在的视角去描写客观化的“他者”形态,以“零

度情感”去写较繁冗琐碎生活的“原生态”,缺乏现实主义的深度而暂趋落潮。新状态小说,在这一时刻得到一部分读者的青睐,是因为作者把原来的“零度情感”进行“热处理”,将自己的体验渗入作品,渗入人物中去,把原来关注“他者”的“原生态”,变为关注自己的生存状态,并由此及彼,关注他人,把握时代的生存状态,更注重现实感与现实深度(当然,目前尚未成熟,未能成大气候)。

文艺要兴旺发达,固然必须坚持多样化:题材、形式、形态、手法、语言方式的多样化。但是,最重要的是要注意不能脱离现实,不能化掉现实主义精神,不能随便否认或贬低现实主义传统。今天,现实主义仍然有很强的生命力。

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特征

温宗军

(华南师大)

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学虽有其自身产生的历史土壤,但主要表现出与西方后现代主义相同的特征:深度模式消失,主体的零散化,反对智性,反对解释,任意模糊艺术与生活、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等。80年代中期以来的新写实主义、第三代诗歌和先锋小说,是典型的中国后现代主义的文本。由池莉、方方、刘震云等人担纲的新写实主义文学,一反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现实主义经典理论,致力于对平民百姓艰难的生存意识和抑郁的生命意识的描述,借写庸人琐事来实现对典型的消解,借抛弃理想来达到对传统的反叛。在传统现实主义中所固有的主体情感、价值判断和中心意识,都在“零度状态”与“中止判断”的实际操作中还原为生活的“原生态”。新写实主义文学与建国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相比较,至少在三个层面上表现出不同的愿望与努力。其一是在作家与生活的关系上,以往作家所信奉的“文学来自于现实生活而又比现实生活更高、更美、更理想”,不再是新写实主义作家的信条。其二是在作家与作品的关系上,

新写实主义作家更热衷于用近乎自然主义的手法切入生活。其三是在作品与读者的关系上,以往文学强调的教育功能已被新写实主义舍弃。由此看来,新写实主义的主要特点是对文学深度模式的消解。杰姆逊曾谈到后现代主义中消失了的四种深度模式,一是马克思或黑格尔的辩证法;二是弗洛伊德的明显与隐含的不同;三是存在主义所区别的确实性与非确实性;四是符号学所区别的能指与所指。这四种深度模式意味着世界是一个对立的统一体,人们可以通过表面现象发现本质、发现真理。但后现代主义则取消了这种“对立”,削平了这种深度,中国的新写实主义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把生活从深度模式中“解放”了出来,使之回复到原生态,使之平面化。

而以韩东、欧阳江河、周伦佑、李亚伟等人为中坚的第三代诗歌,则无论在诗歌理论还是在创作实践上,都明显流露出与西方后现代主义全面接轨的意图。从1985年四川的《大学生诗报》、《现代诗内部参考资料》,到《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主办的“1986中国现代诗群体大展”,达八十几家诗歌,其阵容声势之大,为文坛所罕见,这本身就是典型的后现代主义的拼贴场景。第三代诗人的目的是明确的,摆出彻底的叛逆者的姿态,野心勃勃地要建立新的诗歌精神。他们竭力主张取消原罪、取消仁、取消道;打碎古希腊瓷瓶、捣毁因果之轮,反美、反和谐、反对称、反完整、反真实;超越逻辑、超越理性、超越语法。第三代诗人不再扮演福音传播者和人格典范一类的角色,他们体验和分享着与读者相同的人生经验、道德观念和审美能力。与前代诗歌相比较,第三代诗歌的后现代主义特征极为突出:多元选择中的意识形态解体,价值标准和松散与悬浮,道德观念的物化和商品化,个人作为主体的中空与耗尽,以及对社会乌托邦幻想的放弃。这一切都表明诗歌的古典精神已告终结。

先锋小说在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中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马原、苏童、余华、格非等先锋小说的实力派人物,通过追求文

学的独立来超越文以载道的传统使命。他们不问时代,不问现实,取消了主观与客观、现实与幻想、真实与虚构的界限,在叙述观念和叙述策略上锐意标新立异,醉心于语言游戏和形式操作,追求个性的充分实现和审美的极端自足。真假是非与善恶美丑在先锋派作家的笔下,都遭到了无情的颠覆与解构。先锋话语的转型带来对普通读者的歧视与冷落,使先锋作家陷入了只为某些批评家和文学史家写作的幻想。在商品大潮横扫艺术领域之际,这种从以往的常规中挣脱了出来,而又不寻求大众的认同和庇护的所作所为,的确显得与众不同。

开放与宽容的社会氛围,使作家们在文学功能、审美理想、审美心理和语言结构等方面,都进行了大胆而有益的探索 and 实验,这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向繁荣的表现。但是,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缺少艺术家的良心和社会责任感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不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后现代主义文学势必走入绝境。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至为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它对真理的追求和对人类终极命运的关怀。

当代文学研究中的“新”与“后”

钟晓毅

(省社科院文学所)

从1989年开始,京沪一些中青年评论家就指出,随着文学的历史转变成为不可阻遏的趋势,“前新时期”的神话已经讲完了,“后新时期”的文学阶段已经开始。就作品来比较,这两个阶段的文学发展有着相当明显的区别。

从审美品格上看,“前新”文学是一种呐喊、控诉、抗争的文学,形成了创作上的“喷井现象”和接受上的轰动效应。《我该怎么办》、《乔厂长上任记》、《人啊人》……这类题目,足以使作者和读者一齐兴奋;而“后新”文学则变得冷静、冷峻乃至冷漠起来:《一地鸡毛》的琐碎、烦厌,《懒得离婚》、《不谈爱情》的疲沓、无可奈何,《千万别把我当人》的自嘲、调侃之后的难得糊

涂,文学的审美观已发生了从外热内热到外冷内冷的明显变化。

从文学和生活的关系上说,“前新”文学和社会的主导意识大体是一致的,它为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清算极左思潮造舆论并卓有成效。而到“后新”时期,文学与社会的主导意识与现实逐渐疏远,除了一些报告文学作品外,即使写到现在,反映改革,也多是揭示现实和人性的丑陋、卑琐的暗面,写变态、写悲剧、写人的心理困惑,更多从文化的角度去表现历史和民族的精神负累。

从文学的地位上说,“前新”时期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界线分明,前者不屑于与后者为伍,后者也不强求登大雅之堂。到了“后新”时期,二者已逐步靠近,一些通俗品格的作品或电视剧,受到社会主导意识的青睐,形成一股股不大不小的“热浪”;而纯文学的领地则越来越显出萎缩。

尤其令人关注的,是在“后新”时期的悲凉之雾中一部分作家与学人的选择。

一、继续视文学为精神家园。如汪曾祺、史铁生、张承志等,他们认为写作就是一只自救的方舟,“只有在模糊不清的忧郁和不幸中,艺术才显示其不屈的美。”(史铁生)

二、赋予“重返家园”以“平常心”的含义。如洪峰、何士光、范小青、阿成等人。虽然他们的主张在语言的组成上有点不一样,但说到底,还是淡泊、达观。他们笔下那些淡泊明志的士大夫、淳朴善良的山民、静虚自守的青年人,都于温柔敦厚、坚韧豁达中显示了佛性,在普通平凡的人生中拥有一块超越尘世烦扰的家园。

走向宗教的神圣。在1985年,刘小枫完成了《诗化哲学》,1987年,他又写成了《拯救与逍遥》,表明了他的明确态度——只有博爱的情怀,才能最终拯救人类,纯洁的平常心、善良的天性是“自救”的方舟。史铁生和张承志等和刘小枫不谋而合,从而共同走向对宗教的求索,是巧合,也是时代精神使然。

当代文学批评中的“后现代”

吴爱萍

(中山大学)

目前中国文学批评的困境逐步显示出来了。某些激进的批评家摧毁着文学批评的固有信念。他们在描述小说文本特征时,往往赋予它们全新的品格,即对人生事象采取冷漠、静观、超然的态度,以往的人文思想和价值观念在此统统失落。这种新的理论定位使用的是后现代语言,文学批评成了语言能指的游戏。

另一些自诩精通传统批评体系,而缺乏适应时代变通和更新的批评家,却以社会批判的外表和迎合大众对奇闻轶事的需求来赢得商业性的成功,这就使文学批评在社会功利的诱惑下,不可避免地失去了指导文学创作的根本意义,轰动效应和新闻价值反客为主成了文学批评的指路人,文学批评失去了对于终极关怀的执着。

西方后现代文学前面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两座艺术高峰,要想在原地超过它们,可能性极小。于是,后现代主义文学将已有的艺术因素发展到极端,或者干脆把小说创作所禁忌的东西如拖沓、节外生枝等披上哲学的外衣,奉为至宝。他们的目的是想通过解构艺术、玩艺术来破坏人类自我设定的、束缚自身的权威话语,使人类再一次获得解放。因此,不管他们的反小说、反艺术、反审美受到以贝尔·哈贝马斯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多么猛烈的抨击,试验者个人却觉得是一种新的创造。这种文学创作原则影响到文学批评的态度便是反叛,抵达虚无的否定和不断置疑的审视。对文本和语言的批判成为中心,个人意识、历史理性、实践生活退出了舞台,纯粹抽象的非人性化的观念和体系充斥前台。

罗姆德·威廉姆斯说:“在大工业的背景下,高技术与低文化的结合是一个最意味深长的现象。这是后现代主义时代的特色。”毋容讳言,我们国家现在已具有颇浓厚的后现代因素,但我们的民族重经验而轻超验,较多崇拜而较少信仰。虽然处于社会转型期

的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和西方后现代社会时期的人们有着类似（仅仅是类似）的生存状态，但他们的人生态度和西方人是不同的。我们很少有来自生命深处的孤独和焦虑，很少有荒诞和虚无的生存体验，当然也就缺乏直面这一切的勇气和要求。在此种境况中，我们不去真诚地寻找和建构新的信仰和价值，重新安置新的精神家园，而要冷漠地、故作超然地去拒绝一切、消解一切，或者忙不迭地向社会功利投降，文学批评就从根本上失却了意义，它对文学创作的指导作用也就只能是个美丽的幻想。

当代文学：批评与创作的疏离

姚玳玫

（《南方日报》社）

当代文学中的两大主体，创作与批评是在两条相邻的轨道上平行运作的，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似乎也不言而喻。其实，若撇开那些大而空的“宏观”把握，仔细注意一些更具体的问题，你也许会发现，当代文学的批评与创作，一直处于貌合神离的状态。至少，从批评的角度而言，隔阂的情形是显而易见的。

解放后，我们的文学批评继续走延安时期《讲话》的路子。50年代又全面推行了苏式理论，形成了社会学批评体系。在政治标准、阶级论诸观念的左右下，文学批评成了意识形态的工具。新时期以后，这种状况虽有所改变，不过，长期以来形成的思维方式和批评操作习惯，却依然不知不觉地捉弄着我们。比如：我们已习惯了批评对创作所拥有的指导性地位，这使批评在面对创作时总带有“我是你导师”的“身分错觉”。居高临下的自信滋生着盲目行为，令批评主体缺少反省意识，若此时又有批评诸“尺度”、“样板”、“套子”玩于掌上，瞎子摸象式的事情就不免发生：

一、以经验和主观是非感作为文学批评的尺度。比如评《废都》，许多文章抛出这样一句话：“知识分子象庄之蝶吗？”不可能，我没有这种经验，我不信。顽童式的任性和

专家式的自信夹杂在一起，令人无法辨别。有的专家认为，文学批评就是剪除恶草、灌溉佳花，好的说好，坏的说坏。似乎好坏之间有清晰的边缘，一刀切开，万事大吉。至于好坏之分，则以直观的是非感作尺度。若所评论之作品恰好黑白分明，倒也罢了；若非如此，凭经验的尺度就较麻烦，能够抓住的恐怕多为皮毛。

二、分类批评。所有作品，不管如何标新立异，似乎都可以归堆。属于“伤痕”的，属于“寻根”的，属于“都市”的，以及现代的、传统的、改革的、乡土的、意识流的、黑色幽默、主旋律的、第几代的、南方的北方的……反正或按题材、或按手法、或按主旨、或按结构、或按风格，分出诸多类型。把作品归入“类”之后，便使用“类”的术语加以评判。本来，分类法作为批评的一种方法也无可非议，只是用多用滥了，把作家个体精神丰富多面的作品强行归入“类”的套子里，即便不至于落入削足适履、捉襟见肘的简单化类型化的框框，却也难免只抓住一面，无暇顾及作品真正的魂魄所在。

三、把批评视为开启作品的一把钥匙，按图索骥，一一追究时代背景、作者生平、文学主张、创作道路等，再把作品隐晦的含义大白话似地复述一遍，以为这便是批评。其实那只是一篇毫无意义的解说词。说其无意义，不仅指艺术品的存在不需诠释，更指没有批评主体参与，不见批评者的思想、智慧、灵魂的文章，不是真正的批评文章。

四、喜欢作花样文章，堆砌生硬的术语。表面上花哨玄奥，动不动就是××性、××观、××主义、××潮、××流等，实际上牵强附会，内容空洞。这类文章与所论作品即使有某些关连，也常常似是而非。

至于各类比较批评，纵向的、横向的、作家与自己的、与他人的、跨地域跨国度的，虽然有时也能比较出一些道道来，终究多属于“外围”的东西。若承认真正的艺术品是作家在特定时空情境下的生命创造，那么，以甲优势指责乙劣势，或以乙长处指责甲短处，都是无稽之谈。

当然，当代文学的批评与创作的隔阂，

并非以上几点所能概括的。不过,若对以上诸盲点有清醒的认识,若能在批评的具体操作中采用一种谦诚的对话的语式而不是居高临下的判断语气,那么,批评与创作的进一步沟通或指日可待。

从读者的接受看社会政治小说的意义

何 慧

(省社科院文学所)

电影《开国大典》有一个意味深长的镜头:晨读的毛泽东和坐在花园里早读的蒋介石相遇,他们摊开了手中的书,竟然都是《资治通鉴》。这样的镜头在早些年的大众传媒中决不可能出现。理由至少有三:一、在政治对立壁垒深严的时候,不能提倡调和。二、对那些曾经用鲜血和生命换取革命胜利的人们,是一种感情损伤。三、这是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污损。然而,这一镜头终于在最近的电影中出现了,无论它是虚构的还是真实的,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信息:时代变了,看问题的立足点变了。

当我们面对那些白纸黑字凝固了历史瞬间的文学作品,并要作出重新评价的时候,我们原有的理论也受到了挑战。我们不仅要有过去的角度,还应该有所时的立足点,更应该照顾到变化中的时代评判。

一、过去的观点。文学功能与社会之间的联系,一直是文学研究的传统课题。尤其在那些政治生活与个人生活密不可分年代,按当时的观念判别作家的创作是推动还是阻碍了时代的发展,我们给他们贴上“进步”或者“反动”的标签。比如50年代的香港小说,马朗所写的《太阳下的街》,反映香港50年代一场反政府的政治暴动。作者对政治暴动持否定态度,在客观上维护了当时的港英政府,因此站在当时的无产阶级立场,我们会否定这部作品。

二、现时的立足点。时过境迁,当我们重读那些政治意味很浓的作品时,当时的政治背景已经隐去,如果不查资料,我们不会发现某个作者的政治态度和生活背景。作者

留给我们的是一个要靠读者通过阅读将之丰富、充实的文本。面对这一文本,我们会以新的经验去填补作品留给我们的空白。只要作品与新时代有契合点,它就会在新时代获得全新的意义。比如《太阳下的街》,太阳象征一个公正和平的社会,该作描写50年代发生在香港的一场追求公正和平的政治运动。运动的结果和它的目的是相反的。在以安定团结为时代主旋律的今天,我们可以把《太阳下的街》看成是一部否定“六四”事件,主张中国不能乱的小说,于是,这部小说就获得了新的意义。

三、变化中的时代评判。每一个时代都有它流行的思潮,大跃进时代不同于文革,文革又不同于新时期。作品的生存有赖于读者的审美意识和社会环境,表现了群体的期待。站在不同的时代,对作品的要求和评判就完全不同,不死的作品是那些与社会群体一致性永远存在的作品。《太阳下的街》今天读来仍不乏味,那是因为作者以个体人的经验来反思社会政治。

追求美好的社会,是人类的共同理想,没有理想牵引,人类社会不会发展,正因为有了理想,我们才对社会时而歌颂,时而批评。排斥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是一种损失,并非关怀社会的作品就必然短命,问题是作者怎样去关怀社会。所谓寻找人生的真正意义,不是避开现世的纷扰,关注抽象的人性、爱情。巴尔扎克说:“我要写的作品必须从三方面着笔,男子、女子和事物,也就是人物和他们的思想的物质表现,总之,就是人与生活,因为生活是我们的衣服。”正是巴尔扎克的创作态度,使他站在保皇党立场创作的文学作品,得到了马克思的赞赏。并越来越绽放耀眼的光彩。

新文学当代形态的形成

陶原珂

(《学术研究》杂志社)

文学当代性,是文学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出现最新质的性质,是立足于当代而言的文学时代性。20世纪中国新文学的当代性,在

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中产生,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体现着当代社会的思想意识,并且在社会和思想的开放格局中,体现着当代世界的文学意识。从新文学当代性的角度来看,承认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划分及其存在价值,不仅仅是因为可以根据社会发展新阶段的出现而划分出一个有别于以往历史阶段的文学历史新阶段来,而且因为它反映着新文学的当代形态,不断出现构成新文学发展的最新质,体现着文学随时代发展而发展的当代性。

新文学的当代形态,起码在三方面体现着新文学最新质的文化蕴含:一是新文学在发展中对本土文化传统的背离或寻根的取向。新文学是在反传统、反对旧文学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四五十年代有追求民族形式和品味而形成的文学流派,新时期文学则出现了挖掘中国本土文化精神的“寻根文学”和大量武侠小说,虽然“寻根”并不是要对中国传统文学或文化回归,也不是要弘扬某种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神或较高的文学品格,不好看作就是新文学对传统的否定之否定,但对文化传统的不同取向,却赋予了新文学在不同阶段的若干新质。二是新文学受域外文化影响而形成文学新质。新文学在反传统中诞生和发展的同时,大量受到西方(以及日本)文化思想和文学潮流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基督教精神、进化论、唯意志主义哲学、生命哲学、心理学等都在早期的新文学留下印记。而新时期文学,在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地位的环境下,近二百年西方文学流派在中国文坛重新演试时,西方现代哲学对新时期文学的影响就小得多,因而在思想文化方面形成了二个时期明显不同的新文学当代形态。三是新文学自身发展中实验性的文化意蕴。新文学主要地是为着适应本国社会的发展、人民大众的需要以及文学自身发展的要求而不断探索或实验的,因而有大众文学的实践,有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有新写实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的“实验”以及语言上的“实验”等等。

新文学当代形态的当代性,是与某种承

传性相比较而呈现的,是在一定的承传关系中存在的。这种承传性,对新文学传统而言,属于新文学自身发展的延续与承接,形成新文学传统的当代形态。新文学从一开始就十分突出地表现了自觉借鉴和吸纳域外文学思想和艺术方式以求得自身发展的文学发展意识,它们在一些不同的演进阶段有所体现。表现为作家历史使命感的文学意识,则是贯穿于新文学各个阶段的。而以现代汉语为基础的新白话文学语言传统,它的词汇语法特点本身已体现着新文学在语言上有别于以往文学(包括古代白话小说)的当代形态,而这一语言传统又不断接受着在新文学不同发展阶段进行的语言实验(如三四十年代进行的文学语言大众化和方言文学的实验,80年代打破语言常规以求增加表现力的文学语言实验等),形成新文学语言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新质。新文学的承传性对原有中国文学传统而言,则属于否定之后的回应(如武侠小说、新章回体等)或作家修养的底蕴。由于五四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与文学意识的根本改变,新文学已根植于不断变革和向现代化发展的当代中国人的本土生活,原有的中国文学意识、形式和审美取向方面的传统,主要以作家修养的底蕴或古体形式存在于新文学当代形态之中。

反映社会生活以及根植于其中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是文学的基本性质。20世纪中国农村逐步打破了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格局,农村社会的变革和农民心态的变化一直成为新文学关注的重要对象;在一系列社会变革之中,关心社会生活及其发展,关心人民大众的要求,便成了新文学作家的历史使命。而在反封建的同时,人的个性亦得到了解放和张扬。因此,在新文学当代形态的承传关系中,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反映农村变革和农民心态变化的乡土文学意识、解放个性的思想意识等,不仅构成新文学当代形态的特色,而且在新文学的发展中表现出较强的延续性,并有汇合成新文学发展主潮的倾向。(笔谈待续)

本栏责任编辑:陶原珂

论笔记体与 传奇体的品格差异

□陈文新

传奇体和笔记体是中国文言小说的两种基本类型，纪昀分别名之为“才子之笔”和“著书者之笔”。笔记体成熟于魏晋南北朝，以《搜神记》、《世说新语》等为标志，在宋、清两代又取得长足的进展，《阅微草堂笔记》是其中的佼佼者，传奇体成熟于唐代，宋以后偏重智慧与伦理的上层知识分子，一向冷落传奇；清代的蒲松龄以极大的“孤愤”和非凡的想象才能将传奇体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笔记体的传奇在品格上有重大差异。朱自清《文学的标准与尺度》曾将中国传统文学用“儒雅风流”来概括：“载道或言志的文学以‘儒雅’为标准，缘情与隐逸的文学以‘风流’为标准。有的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表现这种情志的是载道或言志。这个得有‘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抱负，得有‘怨而不怒’、‘温柔敦厚’的涵养，得用‘熔经铸史’、‘含英咀华’的语言。这就是‘儒雅’的标准。有的人纵情于醇酒妇人，或寄情于田园山水，表现这种情志的是缘情或隐逸之风。这个得有‘妙赏’、‘深情’和‘玄心’，也得用‘含英咀华’的语言，这就是‘风流’的标准。”这个分法稍加变通也适用于文言小说：笔记体虽非正宗的载道言志品种，但既属“著书者之笔”，也就偏于“儒雅”；传奇体既属“才

子之笔”，也就偏于“风流”。

一、传奇体作家的“风流”情怀

唐人传奇的“风流”，大体包括三个侧面：热衷于描写才子佳人的遇合，浪漫的超凡脱俗的爱情；赞美不附俗流、嘲弄常规的“狂生”、隐士和敝屣人间富贵的高风逸调；激赏为儒家指斥的豪侠义士的人格风范。

唐传奇建立的描写才子佳人遇合的传统，一直为后世传奇体所继承。宋代是传奇走向衰落的时期。但从现存的《绿珠传》、《杨太真外传》、《赵飞燕别传》、《梅妃传》、《谭意哥传》看来，文采风流依旧是被瞩目的重点，尽管浪漫和豪迈的程度都有所降低。元代只有清江宋梅洞的《娇红记》堪称唐人传奇的嫡派，也恰好是个爱情故事。明代传奇以《剪灯新话》最著名，“多俚红倚翠之语”，其中《秋香亭记》甚至写的就是作者本人的爱情悲剧。^①传奇体小说的创作在清初再度出现高潮，其代表作即《聊斋志异》。据统计，《聊斋志异》中以爱情为题材和涉及爱情的作品占1/4左右，达120篇。这一数字是惊人的。

无论是《剪灯新话》还是《聊斋志异》，我们都看到因鼓励文采风流而扬文士、抑俗子的明确意向。比如《聊斋志异·连锁》中性情胆怯的连锁原本对杨于畏心存戒惧，后仅因杨于畏隔墙为他续诗，续得很好，她便

主动来到杨的房间，道歉说：“君子固风雅士，妾乃多所畏避。”反之，武生王某于连琐有救命之恩，想一见颜色，却被连琐拒绝了：“将伯之助，义不敢忘。然彼赳赳，妾实畏之。”冯镇峦幽默地评道：“武夫总失便宜。”让骚士占便宜，这是《聊斋》的特点，不妨说也正是传奇体小说的共性。

唐传奇对隐士理想的迷恋在宋传奇中很难见到，但在明代瞿佑和李昌祺笔下又焕发光彩。瞿佑为动乱年代的文人设计了一个仿佛永远不会有陈旧感的方案：隐居。《剪灯新话·天台访隐录》仿照陶渊明《桃花源记》的笔墨推出了南宋末年隐居天台山的读书人陶上舍，并借他的一阕《金缕词》劝导世人“向林间啸傲山间宿。耕绿野，饭黄粱”。李昌祺《剪灯余话·秋夕访琵琶亭记》全篇笼罩着悲凉情绪：不变的似旧江山与变化的人事之间的对照，令人不胜唏嘘，对宇宙、对社会、对人生，油然而生幻灭之感，所以沈韶最终看破红尘，遁入深山。《青城舞剑录》宣称“英雄回首即神仙”，并认为五代末的隐士陈抟较之汉初三杰之首的张良“有过无不及”。

《聊斋志异》以抒写“孤愤”为宗旨。有意味的是，蒲松龄《聊斋自志》将信将疑地说自己是和尚转世，可见他对佛教并不拒绝。《仙人岛》、《蒋太史》、《成仙》、《白于玉》、《罗祖》等都以人世情缘为可笑，以现实生活为空幻，因而其主角一律选择或出家为僧、或入山修道、或飘然仙去的人生道路。

宋传奇写侠，缺乏唐传奇的宏伟气象；明代《剪灯新话·秋香亭记》虽热切期待昆仑奴似的豪侠出现，但缺少正面刻画；《剪灯余话》则不乏对侠的浓墨重彩的描绘。比如《青城舞剑录》的碧线，便是唐传奇中的女剑侠红线之流；《武平灵怪录》里“豪侠不羁，用财如粪土”的齐仲和，《芙蓉屏记》里侠义无私的高纳麟，也给读者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聊斋志异》的主角是“狂生”、狐女，而他们大都具有侠的风采。或昂扬乐观，倜傥卓异，乐于在狐鬼的天地里一发豪兴，比如《章阿端》中的“卫辉戚生”；或恩怨分

明，言必信，行必果，比如《大力将军》中的查伊璜、吴六一，《田七郎》中的田七郎；或矢志复仇。女侠的复仇尤其惊心动魄，细侯为了回到爱人满生的身边，甚至手刃了她和那个骗娶她的“齷齪商”所生的孩子。^②这无疑是对唐人传奇的发扬光大。

上述传奇体“风流”情怀的三个主要侧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处于中心位置，传奇作家热衷于超拔飘逸的色调，因而闪烁出奇光异彩。就主导倾向而言，传奇体小说是作家浪漫情怀的披露，是玫瑰色的人生之梦。

二、笔记体作家的“儒雅”

品格：关于爱情

笔记体偏于“儒雅”。传奇体作家乐于从强烈的不寻常的事件中获得诗意，笔记体作者则较安详平和地看待人生和艺术。

大部分笔记体作家对爱情的见解都绝不迂腐，绝无道学气。葛洪《西京杂记》叙及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越礼放诞之事；《世说新语》韩寿偷香一事，后世传为佳话；《幽明录·卖胡粉男》亦是纯情之作。其它如《搜神记》中的《董永》、《弦超》、《韩凭妻》、《紫玉》，《幽明录》中的《庞阿》、《刘晨阮肇》、《黄原》等，均为小说史上的名篇。清代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更明确地说：“饮食男女，人生之大欲存焉。干名义，淩伦常，败风俗，皆王法之所禁也。若痴儿呆女，情有所钟，实非大悖于礼者，似不必苛以深文。”

笔记体对爱情的处理则大不同于传奇体。首先，笔记体一般只把爱情视为心理生理健全的人正当而平凡的欲求，爱情并非“才子风流”，并不神秘。既然它只是“寻常境”，也就不必过分张扬。笔记体小说写妓女与士人的交往，不只选择那些缠绵悱恻的片断，也注意揭露妓院中污秽、肮脏的一面，俞樾《右台仙馆笔记·绍兴某生》重心即是展示妓女的骗局。在刻画爱情主角时，虽也提到其才情、容貌，但并不突出到独一无二的理想化程度。

其二，笔记体作家通常只把爱情视为整个人生的一部分，它不能覆盖或取代人生的

其它更为丰富的侧面。象干宝、刘义庆、陶渊明、沈括、周密、纪昀、俞樾等，大都具有稳重的现实感，注重情感的平衡、健全。他们既不将男女之大欲视为洪水猛兽，也不赞成将爱情摆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人生中值得关注的层面太多了。“佳话”在笔记体小说中的分量是不重的，《搜神记》共460余条，其中涉及男女关系的仅20余条，而且一部分如《范延寿》、《双蒙氏》、《盘瓠》、《女化蚕》等，还不能算是爱情描写。而唐代裴铏的《传奇》，31篇中就有十来篇以爱情为主或涉及男女爱情。《阅微草堂笔记》与《聊斋志异》亦呈相类似的对照情形。笔记体作家更关心百姓日用、风土人情，关心原始儒家如孔子等曾关心的人格的修养、志趣和言谈的幽默等等有助于使我们日常生活更完善的智慧。所以唐李肇《国史补·序》、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序》、金刘祁《归潜志·序》、元杨禹《山居新话·后序》、清王淦《今世说·自序》、王士禛《池北偶谈·自序》，无不强调笔记“大之可以蓄德，小亦可以博识”的作用。在笔记体作家所关注的广泛的社会人生层面中，爱情是个并不显眼的部分。即使是集中写妓女生活的专题性笔记，如孙荣《北里志》、梅鼎祚《青泥莲花记》、余怀《板桥杂记》、珠泉居士《续板桥杂记》等，主旨仍是记录民情风俗，并不以名士风流为核心。

其三，笔记体作者大多是在中年以后才开始创作的，这些承担过社会、家庭的各种责任，饱经沧桑、儿孙满堂并具有学者气质的人，注重情感的中庸、健康，决不欣赏那种可能对年轻人产生诱惑以致使他们走上邪路的超越伦理界限的笔墨。而这种缺陷在传奇体小说中是明显的，比如瞿佑《剪灯新话》的“风情丽逸”即常流于病态，在作者笔下，正常的夫妻生活已满足不了男主角。《金凤钗记》的中心情节是“私通小姨”。《联芳楼记》津津有味地夸耀郑生与薛氏两姊妹通奸。《申阳洞记》中的陇西李生对三个已被妖猴奸污的女子极感兴趣。李禛《剪灯余话》更有过之。《聊斋》中也不乏这类笔墨。孔生与娇娜之间“棋酒谈宴，若一家

然”的腻友关系（《娇娜》）；尚生与三名女子先后“备尽欢好”、“狎情荡甚”，并因此而被度为鬼仙（《尚生》）。《林四娘》是个历史故事，王士禛《池北偶谈》、陈维崧《妇人集》、杜乡渔隐《野叟闲谈》以及林云铭等清代作家均未涉及风情，蒲松龄却大笔濡染，写陈宝钥与林四娘“狎褻既竟，流丹浹席”的场面。至于仿《聊斋》的《萤窗异草》等，污秽的笔墨就愈加屡见迭出了。

笔记体小说的确干净些，清纯些。纪昀《阅微》多次调侃《聊斋》及其它传奇体小说所热衷的风流艳遇，比如第十三卷：“东昌一书生，夜行郊外。忽见甲第甚宏壮，私念此某氏墓、安有是宅，殆狐魅所化欤？稔闻《聊斋志异》青凤、水仙诸事，冀有所遇，踟躕不行。”结果为狐所戏。作者的结论是：“此均足为佻薄者戒也。”《聊斋》的狐鬼，所礼遇的是风流倜傥的狂生，《狐联》中以礼自处的焦生反而被嘲笑为拘迂；《阅微》的狐鬼，所尊敬的是守礼之士，德州老医叶守甫就因此得到恶鬼的仰慕和帮助（卷十二）。所谓风流倜傥则被批评为“性轻脱”，常为狐鬼捉弄。比较起来，纪昀的态度是庄重、适中的，对于那些承担着社会、家庭各种责任的即将步入中年或已是中年的人，对于那些将要扮演重要人生角色的年轻人，笔记体稳健、中庸的品格是能起积极作用的。

三、笔记体作家的“儒雅”

品格：关于生命力

传奇体作家迷恋隐士的高风逸调，迷恋豪侠的粗犷奔放，在很多情况下可视为对生命力的肯定。尽管侠偏于“狂”，隐偏于“狷”，但无论“狂”，还是“狷”，都蕴蓄着不寻常的力度。所以，在传奇体小说中，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如夏木荫荫般不可摧折、如非洲舞蹈般不可节制的性格。笔记体作家对生命力的舒展也是极为欣赏的，比如《世说新语》就在《德行》、《言语》等篇中激赏文人名士的疏放豁达的风度及隐逸情调，李肇《国史补》肯定张建封对“狂率”的容忍和“刘颇偿瓮值”的侠义举动，《阅微》不止一次地推崇如光风霁月般的魏晋风度；但他们都更重视涵养。笔记体与传奇体的区别还在

于：

其一，传奇体作家更热衷于生命力的弘扬，笔记体作家则较多关心智慧与伦理的健全。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重视内在智慧的时代，风度、言行作为内在智慧的外现才成为众所欣赏的对象。绘画艺术中的“以形写神”，语言艺术中的“言不尽意”，都强调“神”、“意”即思辨智慧的主导地位。魏晋风度的具体形成如药、酒、姿、容等，概由带玄学色彩的人格生发出来。所以，这时期的轶事小说以《世说新语》为代表，“乐旷多奇情”、“类以标格相高”。就著述方式言，以类相从，体例严谨；笔墨简约，风格一致；这种对于笔记体小说创作规律和审美形式的讲究，正是内在智慧向艺术世界拓展的第一步。至于作者以空灵的胸襟、玄学的眼光所体会、所观察、所把握到的美，亦多富于“静”的哲学气质，这就与传奇体多“动”而少“静”大不一样了。甚至轶事小说中笑话类作品如《笑林》也以“举非违，显纰缪”，从反面启迪智慧为主。

宋以后的笔记体小说，在智慧、伦理二者中，似对伦理更看重一些。比如清代纪昀就说他写《阅微》“大旨期不乖于风教”。若干畸形的笔记象金捧闾《客窗偶笔》、梁恭辰《池上草堂笔记》、订奉恩《里乘》，“盛陈祸福，专主劝惩，已不足以称小说。”^⑨其实，宋以后的笔记体小说还是以智慧为主。但已不是魏晋那种基于名理思辨的智慧，而是走向日常生活的掌故意味鲜明的智慧。或为“史官之所不记”的朝廷遗事，如欧阳修《归田录》；或多载“嘉言韵事”，如宋王说《唐语林》；或详于各地风俗及民间杂事，如宋庄季裕《鸡肋编》、周去非《岭外代答》；或记岁时娱乐、市井琐细，如宋周密《武林旧事》；或“上自廊庙实录，下逮村里肤言，诗话小说，种种错见”，如元末陶宗仪《辍耕录》；或将“方言巷咏，嘻笑琐屑之事”点染成篇，如明末张岱《陶庵梦忆》。总之，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涉及，并能对读者的情趣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之臻于儒雅。

连志怪也有明显的偏重智慧的倾向。魏

晋南北朝志怪，其美感魅力的一个主要来源是可以“广异闻”；宋以后的志怪，能向读者提供的新鲜“异闻”看来不多：奇奇怪怪的事经过反复讲述就成了陈辞滥调。要出新，就要另辟蹊径。蒲松龄“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将生命力和“孤愤”注入其中，这是一条路；笔记体作者如纪昀等则是将智慧注入其中，以“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为核心，目的在于益人神智。

其二，笔记体小说写生命力的弘扬，重视雍容的气象，力戒虚浮骄矜，虚张声势。《世说新语》在《汰侈》、《任诞》、《惑溺》等门以皮里阳秋的手法批评了过度的任性放浪与挥霍豪奢；东阳无疑《齐谐记》叙薛道询“服散狂走，犹多剧，忽失踪迹，遂变作虎，食人不可复数”，意在嘲笑那些无节制地服五石散的名士。《阅微草堂笔记》更经常对虚浮骄矜、虚张声势的名士风度予以针砭，如卷十一指出：“伪仙伪佛，技止二端：其一故为静默，使人莫测；其一故为颠狂，使人疑其有所托。然真静默者，必淳穆安恬，凡矜持者伪也。真托于颠狂者，必游行自在，凡张皇者伪也。”而唐传奇和《聊斋志异》中正有大量“狂生”，在蒲松龄笔下，使酒骂座的灌夫尤其受到推崇。比较起来，笔记体风格平易，易为读者接受，但也不免减弱了力度。

四、笔记体作家的“儒雅”

品格：关于“怨”

传奇体作家谈隐论侠，常常别具用心，读者不难体会出他们意在言外的难以平息的牢骚、愤懑。谈隐并非旷达，论侠亦非快意，而是借以宣泄出胸中的郁闷、愤懑之气，他们的作品也以极大的情绪力量见长。

如何对待“怨”本是中国古代一个长期争论的话题。孔子、班固等人主张有节制的达观态度，怨而不怒，或经由怨的抒发而使执政者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怨者也因此获得心灵的平衡，不至偏激。屈原、司马迁等人则是怨而且怒的：他们充满激情，没办法委屈自己的主观感受：纵酒放歌，牢骚发尽，宁可偏激也绝不收敛锋芒。

传奇体作家的性格近于屈原、贾谊，主张抒发“孤愤”的蒲松龄更是愤世嫉俗。读《聊斋志异》，不难发现这样几点：1. 他常常写人不如狐鬼、高贵者不如卑贱者。2. 经常抒写怀才不遇的悲歌慷慨之气：横冲直撞，唯我独尊，其情激，其辞烈，不在乎有伤忠厚，不在乎谩骂之嫌。他在《于去恶》中甚至将试官简单地分为两类：一类瞎眼，不识文章；一类贪财，唯知受贿。一个好的也没有。上述两种情绪在许多传奇体小说如《剪灯新话》、《虞初新志》中也同样是抒写的中心。

笔记体小说中亦有人不如怪之类的感慨，如《搜神后记》卷九《放伯裘》，《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发出过“程太守家有二异：一人面兽心，一兽面人心”的议论；亦不时流露出对怀才不遇者的同情，如《阅微》卷六有关董天士的片段。但一般说来，笔记体作者通常是在人生较晚的阶段开始写小说的，或者是在退隐的沉思中记下人生的若干剪影；或者写作虽早，却庄重诚朴，严于律己，具有忠厚长者的风度。因此，他们对“怨”的处理具有与传奇体作家不同的特点。

其一，他们一方面同情“才士之沦落者”，另一方面又不完全归罪于环境的污浊；在他们看来，才士的不遇，可能与他自身为人的傲诞倔犟有关。《阅微》卷七曾指出：“聪明颖隽之士，或恃才兀傲，久而悖谬乖张，使人不敢向迓者，其势可以乞食。或有文无行，久而秽迹恶声，使人不屑齿录者，其势亦可以乞食。是岂可赋感士不遇哉！”纪昀衡量人、要求人的标准是有区别的，他很欣赏《春秋》责备贤者的作法。《阅微》中一再强调：“阴律如《春秋》责备贤者，而与人善。君子偏执害事，亦录以为过。小人有一事利人，亦必予以小善报。”（卷二）汉代班固非议屈原与群小结怨，那里暗含一个前提：屈原是君子，没必要与群小站在同一等级上较量。无独有偶，《阅微》卷五也

认为君子犯不着去惹小人：“君子之于小人，谨备之而已；无故而触其锋，鲜不败也。”

其二，在评价社会人生现象时，笔记体作家倾向于持“正论”，而对“有激之言”既理解，又有所不满。与“有激”相对的是不偏激，看问题采取多种角度，以避免片面性。如《阅微》卷五：“李又聃先生言：昔有寒士下第者，焚其遗卷，牒诉于文昌祠。夜梦神语曰：‘尔读书半生，尚不知穷达有命耶？’尝侍先姚安公，偶述是事。先姚安公喟然曰：‘又聃应举之士，传此语则可。汝辈手掌文衡，传此语则不可。聚奎常柱有熊孝感相国题联曰：嘒嘒科条，袖里常存惟白简；明明案牘，帘前何处有朱衣。汝未之见乎？’”看到事物的不同侧面，这才是通达持平的见解。

总起来看，笔记体作家追求的是常态的美，淳朴、博大、雍容、和顺的美，向外在世界表达自己的责任感、同情心，情感强度不大，使人觉得温暖、亲切，并受到谆谆的教诲。传奇体作家追求的是一种反常规的美，一种不受世俗约束、任情恣性的美，这种美并不完全代表日常生活中的艺术家，而应视为某一特定时刻的创作状态。但不必否认，他们确实个性较强，大都有着被社会抛弃的失落感，抗争的意向极为鲜明。传奇体作家风流倜傥，雄健奔放，或佯狂，或酒狂，兴会所至，一吐为快，对于反庸俗、反束缚的读者，具有强劲的鼓舞力量。不过，其情感中有杂质，有过头话，也是必须注意到的。

①凌云翰《剪灯新话·序》：“至于《秋香亭记》之作，则犹元稹之《莺莺传》也，余将质之宗吉，不知果然否？”

②见《细侯》二篇。

③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陶原珂

海外的中国古音研究

□李葆嘉 冯 蒸

一、汉语语音史研究的理论模式

汉语语音史的研究，据严学宥先生所论，在现当代有三个框架。其一是高本汉的理论，认为汉语发展从上古到中古，到现代方言，是直线发展的。他的中国古音重建以中古音构拟为枢纽，上推周秦，下接现代方言。这是直线型理论。其二是张琨的理论，认为上古汉语就有方言分歧，诗经音系到切韵音系，到现代北方方言的发展不是直线型的。根据这一观点，他写了《汉语语音史中的方言差异》。这是差异型理论。其三是罗

杰瑞等人的方言逆推研究法，或称“普林斯顿假说”(Princeton hypothesis)。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国语言学计划”研究中，一些学者批评了高本汉的直线型理论，主张以现代方言为研究基础而不必参考古文献记录的证据。在这基础上，为各种单独的方言群分别构拟出它们的原始语，如原始粤语、原始吴语和原始闽语等，由此再构拟一个全面的原始汉语。构拟出来的原始汉语，不象一个统一的语言，而是有内部变异的若干种历时系统。这种原始系统的某些特征，用传统的音韵学方法是构拟不出来的。这一派主要学者及研究成果有：华盛顿大学教授罗杰瑞 Jerry L. Norman 的《原始闽语的声母》(1974)、耶鲁大学教授司徒修 Hugh M. Stimson 的《汉语原始北方话的研究：北京话的阴平调》(1969)、乔治亚州立大学教授贝乐得 William L. Ballard 的《原始汉语：塞擦音初探》(1968)和《原始湘语及其他》(1970)、华盛顿大学教授余霭芹 Anne Y. Hashimoto 的《原始粤语的辅音和复辅音》(1970)、欧柯诺 Kevin · A · O · Connor 的《原始客家话》(1976)、乔治敦大学教授杨福绵的《原始汉语的前缀 *S-》(1975)等。周法高教授在《怎样研究中国语言史》(1955)一文曾说：“过去的拟测，大部分仍是根据文献上的材料，现代方言只是用来帮助音值的考订，并没有能充分使用比较的方法，照说应该根据现代各系的方言，个别的拟测出较早的阶段（如早期官话、早期吴语、早期闽语、早期粤语等），再进一步拟测出它们的共同母语，这才是比较方法的正当途径”，周说为“普林斯顿假说”之先导。“普林斯顿学派”这一名词已经成为一个语言学术语，即“有兴趣以现代方言资料为基础进行构拟的汉学家”。

关于普林斯顿假说，需要考虑如下几个问题：（一）现代方言的存古度，即依据现代方言为基础构拟的早期语言，大致是什么年代的。假若以传统中古音系为参照系，各方言的存古度是不同的，闽语、粤语、吴语、客家语、湘语、赣语、徽语、江淮语、晋语、北方话呈递减状态。根据现代闽语方言构拟的早期闽语可能是中古以前的语言，但根据现代北方方言构拟的“豫燕语”（暂且称之）则约当元明之际的语。（二）现代方言内部的可比度，即某一大方言区内次方言或土语群可比较的差别是各不相同的。北方话（指“豫燕语”，不包括江淮语与晋语）内部

较一致,语言内部可比度不高;闽语内次方言或土语差异性较大,内部可比度较高。语言内部的差异性与可构拟度之间有一定制约关系。(三)几大方言是否有一个共同来源。根据考古文化证明,中华大地上没有原始母文化,即没有相应的原始母语,人种体质学上的差异与文献历史记载也支持着这一观点。这几大方言的形成是周秦以后华夏文明与华夏汉语对周边不同的文明与语言同化程度不同的结果。以不平行的早期方言为基础构拟一个原始母语,虽然方法上与高本汉大不相同,但其基本观点还是相当一致的,即汉语一元分化论。因此,高本汉曾经有过利用方言材料直接构拟早期汉语的设想也就不足为奇。显然,利用现代方言资料为基础构拟早期语言是一种创见,是对一味依赖文献资料,仅将方言作为构拟音值参考的高本汉传统的反动与挑战,但是,正如李方桂先生所说:“系统地构拟上古方言,证据还太少。……由于缺乏早期的文献根据,构拟会不着边际。”

除了这三种模式,我们以为还有桥本万太郎在《语言地理类型学》里的“推移”模式。既然东亚大陆语言的现状在地理上表现出的类型推移是语言历史演变各层次的投影,从而可以把“横”的区域考察与“纵”的历史性比较有机地结合起来,“推移”自然可以作为研究中国古音演变史的一条新思路。李葆嘉对此理论的修正就是,周秦以前中原语言以混合为主,周秦汉语具有某种异质混合性。此外,王士元的“字(词)汇扩散理论”认为,语音的变迁在音值上是从一个可辨认单位到另一个可辨认单位,而在字汇上是从一个字扩散影响到另一个字。究其原因,由于汉语音节结合的紧密性和附义性特点,汉语语音的变化以表语素的音节——“字”为单位。如果说王士元所论主要是一个音系内部的历史变化,那么陈渊泉的“时空投影法”所论就是相邻的亲缘音系之间的语音变化所反映的历史语言变化。将这几类观点和方法结合起来,就构成了“异质·推移·扩散”模式。遵循这一模式,汉语史的研究,特别是汉语语音演变史的研究,可能获得新的进展。

二、北美汉学家的中国古音研究

在美国和加拿大的汉学家非常活跃。在原始的汉语语音研究方面成果累累。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教授张琨和夫人张谢蓓蒂合撰的《原始汉语的韵母系统与〈切韵〉》

(1972),提出四元音系统。康奈尔大学教授包拟古 Nicholas C. Bodman 在《原始汉语与汉藏语》(1977)假定六元音。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蒲立本和康奈尔大学教授梅祖麟认为,汉语声调源于韵尾的脱落,构拟了 $^* -S$ 和 $^* -h$ 表示去声, $^* -ʔ$ 表示上声。依据形态音位学,蒲立本在《关于汉语词族问题的若干新假设》(1973)中认为,汉语词族中存在着诸形态成分:后缀 $^* -S$;前缀 $^* h-$ 、 $^* S-$ 、 $^* r-$; $^* ə/a$ 交替;前半音节与后半音节之间的重音交替。许思莱 Axel Schussler 《原始汉语的词缀》(1976)受印欧语形态学理论影响,将汉语音节切开来加以分析。周秦古音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李方桂的《上古音研究》(1971,国内有中文本),它提出了四个主要元音与两个介音。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白保罗 P. K. Benedict 的《汉藏语概论》(1972,国内有译本),对高本汉上古音系有若干修正。张琨夫妇对上古汉语的鼻冠音进行了拟测。包拟古《汉藏 S—复辅音在汉语里的某些反映》(1973)对复辅音做了探索。关于上古的介音,许思莱撰有《上古汉语中的 r 和 l》(1974)和《中古汉语合口的来源》(1975),认为中古音二等韵源于介音 $^* -r-$;中古四等韵来自上古介音 $^* -l-$ 。蒲立本根据高加索语言,在《评丁邦新〈魏晋声韵研究〉》一文提出上古二元音说。白一平提出三个高元音和三个非高元音系统说。关于上古韵尾,主要有蒲立本的《关于上古汉语 $-S$ 及其消失时间的若干进一步证据》(1973)与许思莱的《上古汉语的韵尾 $-l$ 》(1974)。关于上古声调,最重要的论文是马几道 Gilbert L. Mattos 的《国风中声调不协的韵脚》(1971)。作者认为,国风押韵注意声调,160 篇中共有 71 处声调不协的押韵,涉及 85 个韵脚,仅占韵脚总数的 2025 的 4%,因各章用韵情形平行,诗人们在保持与首章韵例相同的条件下,可以自由地在以后各章中换用其他韵部或声调的字,由此给那些声调不协的韵脚一种新的解释,从而解释了 4%中的一大部分。关于上古汉语诗律学,有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杜百胜 W. A. C. H. Dobson 的《早期汉语韵文诗律的起源与演变》(1968)和澳大利亚澳洲国立大学教授巴纳 Noel Barnard 的《楚帛书文字的韵与律》(1971)。

研究汉魏六朝语音的主要有爱俄华大学教授柯蔚南 W. South Coblin,他主要研

究《尔雅》和《说文》，撰有《郭璞注中的魏晋声母系统》(1974—75)，推测当时有一套不见于后来中古音系的舌面前音 $\hat{k}$ 、 $\hat{k}h$ 、 $\hat{g}$ 。他又根据《说文》读若等，撰有《许慎的声母系统》(1978)和《许慎的韵母系统》(1979)。威斯康星大学教授朱赫尔 Robert A. Juhl 专门研究汉魏六朝音，接受了王士元的词汇扩散论，在博士论文《从魏至初唐的诗人叶韵系统鸟瞰》(1972)中，对魏晋诗人的叶韵作了许多有趣味的观察，还发表了《从魏到梁汉语韵类的音韵演变》(1974)等文。

关于隋唐中古音的研究，邓临尔 Paul Denlinger 撰有《汉语里的长短元音》(1976)一文。梅祖麟著有《中古汉语的声调和超音质音位与上声的起源》(1970)；认为中古上声的产生是由于喉塞韵尾 $-ʔ$ 的脱落。关于《切韵》系韵书的性质，张琨有《论中古音与〈切韵〉之关系》(1974)和《切韵的综合性质》(1979)，认为《切韵》是将以前的韵书系统化而成。关于唐末五代语音研究，美国米勒 R·A·Miller 在罗常培和西门华德等人研究的基础上加以探讨，发表了《敦煌写卷中藏汉译音中的几个问题》(1967)。蒲立本的《晚期中古汉语语音研究》(1970—1971)对唐末、宋、元这一时期的汉语历史语音，依据韵图、《蒙古字韵》《中原音韵》等材料做了详细分析，此文常被国外汉语学者引用。关于《中原音韵》的研究，主要有司徒修的《中原官话：老官话发音指南》(1966)，这是以音位学方法分析《中原音韵》音位系统并以此为基础编的工具书。俄亥俄州立大学薛凤生教授 Hsueh F·S 著有《中原音韵音位系统》(1975)，国内有鲁国光、侍建国的中译本(1990)。本书使用的方法得益于现代音位学和生成音系学的启示，有意遵循着唐宋韵图显示的中国音韵学传统而自创的“中西结合”研究法，其目标是发掘出语言特有的最能代表语感的音系。

关于汉语语音演变的研究，从上古音到中古音这一时期，因受高本汉模式的影响，中间环节长期未能展开充分研究。李方桂《上古音研究》仍然将周秦音系与隋唐音系直接联系，跨过了汉魏之间几个阶段。从中古音到近现代音的演变，因材料较丰富，国外有关论著较多，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陈渊泉 Matthew Y. Chen 教授著有《从中古音到现代北京音》(1976)和《从中古音到

现代方音》，把生成音位学、词汇扩散理论、时空投影法运用于语音史研究。伊利诺大学郑锦全教授和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王士元教授合作撰有《中古汉语声母的演变》(1971)，从“字汇扩散”的观点来考察语音演变。作者认为：许多语言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里都有不合演变规则的字存在，这些例外很可能就是语音演变的发端，或者是语音演变的末梢所遗留下来的字。另外，薛凤生的《入声字从中古汉语到三个现代官话方言的演变》(1978)与蒲立本的《中古汉语声调的本质和到早期官话的演变》(1978)分别探讨了韵尾和声调的演变。

三、日本汉学家的中国古代音研究

关于上古音研究，日本学者赖惟勤发表《上古韵母》(1972)一文，主张上古二十二部韵母，主要元音 a 、 Λ 、 e ，阴声韵尾 $-u$ 、 $-u$ 、 $-i$ 、 $-y$ 、 $-i$ ，阳声韵尾 $-N$ 、 $-ŋ$ 、 $-n$ 、 $-m$ 。入声包括在阴声类里。他因主张上古汉语有一整套圆唇舌根音韵尾 $-gw$ 、 $-qw$ 、 $-gw$ 等而著名于国际汉语学界。高田时雄有《论上古的浊塞音韵尾》(1974)。

日本汉学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汉魏六朝以后。坂本健一的《魏晋南北朝字音研究》(1975)一书，研究了《经典释文》，根据李荣的切韵音值构拟注明反切音值。关于隋唐音的研究，东京大学教授平山久雄有《唐代语音史中的轻唇化问题》(1967)、《论〈切韵〉蒸职韵开口牙喉音的音值》(1972)。桥本万太郎 1965 年在俄亥俄大学的博士论文为《中古汉语的音韵》，广泛利用八思巴字对音、藏文译音和西夏文译音考订中古汉语的音系。大岛正二著有《颜师古汉书音系研究》(1971)，他认为师古音和慧琳音近似，玄应音与切韵音相近。他还写有《唐代南方方言的若干音韵特征——关于李善〈文选〉音注所反映的江都字音》(1971)。

关于近代语音研究，日本女汉学家中野美代子的《八思巴字与蒙古字韵的语音研究》(1971)较为重要。该书认为《字韵》代表的是宋代两京音，而不是大都音。她写道：“《蒙古字韵》的音系中有许多吴语方言成分，虽然它也有部分的官话成分。就其声母辅音系统来说，看来非常奇怪的是《蒙古字韵》保存了浊音声母和卷舌音声母，而这两类声母则分别是吴语方言和官话方言的特征，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蒙古字韵》是元代编纂的，即正好在官话区的语音的浊音声母已经消失之后。但这对汴京人来说保存

这种浊声母可能还是容易的,即当他们迁都到临安的时候在吴方言中还保存着这种浊声母,因为北宋的这次迁都(1138)是在官话仍处在过渡的时候内发生的。……因此,作为一个一般的结论,可以说《蒙古字韵》的音系是吴语方言文读形式的原型之一”。对于中野美代子认为《字韵》“不是大都音”的观点我们表示赞同,但对于“宋代两京音说”与“吴语成分说”则持有疑义。第一,官话形成于明代,若要用“官话”之术语指元代北方话,则有北方官话(燕代语音)、中原官话(汴洛语音)与南方官话(江淮官话)之别。第二,《蒙古字韵》的浊声母与卷舌音声母,并非分别是吴语方言和官话方言的特征。现代北方官话无浊声母有卷舌音,吴语无卷舌音而有浊声母。但现代吴语的前身既有浊声母又有卷舌音。在元明之际,浊声母不仅是吴语的特征,也是南方官话的特征。因此,《字韵》的浊音反映的并非一定是吴语特征。第三,北宋时期,中原汴洛音成为新的标准音,后世称之为汉音或正音。靖康之难,汴洛音迁往临安、建康和江淮。金人统治北方百余年中,留在中原的汴洛音已非北宋时中原旧音,而迁往临安的南宋汴洛音又受到吴语同化。江淮地区(主要指有文学传统的南京)则相对保留了较纯的中原正音。第四,《蒙古字韵》的音系是源于北宋汴洛语音,而于南宋时在江淮得以保存并有所发展的元代汉族人所奉行的正音。第五,《字韵》分韵十五部,与十六摄相当,实前有所因,承袭了北宋以来的韵摄系统。与《洪武》相比,只是审音稍宽,两书基本特征(浊声母、入声韵、闭口韵)相同。而《洪武》正是明代官话的标准音。

研究《蒙古字韵》者,多注意本文,而忽视了注文。日本东北大学教授花登正宏利用注文研究当时语音,在《关于“蒙古字韵”的注文与开口二等牙音的舌面化》(1979)中,揭示了开口二等牙喉音腭化为舌面音的dz(“校”字本文开口giaw,注文dzew)的现象。花登正宏还对《古今韵会举要》作了全面系统的分析(1976—1979)。关于明代语音研究,主要有辻本春彦的《韵学集成与中原雅音》(1976)、佐佐本猛的《明王文璧〈中州音韵〉的性质》(1977)。关于清代语音研究,有日下恒夫的《清代北音的韵类:现代北京方言音系的成立》(1976)、渡井唯允的《音韵集注与五方元音》(1978)。关于语音演变的研究,藤堂明保《北方话音

系的演变》(1966)根据《皇极经世声音图》、《中原音韵》、《韵略易通》、《韵略汇通》、《交泰韵》、《西儒耳目资》和《五方元音》探讨了北方音系中的若干关键,其缺失是未充分注意到这些音系在北方话中属于不同的官话区(如《声音图》为汴洛中原正音《耳目资》为江淮官话,《五方元音》为北方官话)。

关于通论性著作,日本1967年出版了《中国文化丛书·语言》,由牛岛德次、香坂顺一、藤堂明保共编。音韵部分分为上古、上古和中古之间、中古、现代四节,概括地论述了各阶段的汉语语音史上的诸问题。

四、欧洲汉学家的中国古音研究

在欧洲,捷克学者施立策K. Sedláček著有《共同汉藏语的复辅音音变规律》(1967),所做的研究属于原始汉语的范畴。俄国彼得格勒大学教授雅洪托夫C. E.

Я xoтoв教授在上古音研究方面的系列论文,提出了颇有见地的看法。在《上古汉语的复辅音声母》(1960)一文,他依据切韵音系二等字几乎没有来母作声母的,而在谐声系统中二等字与来母字的关系却非常密切,提出二等字在上古都曾有一个带*—l—的复辅音声母,即*Kl—、*Pl—、*ml—之类,其中的*—l—(后来改拟为*—r—)也可看作是二等字特有的介音。在《上古汉语的起首辅音W》(1977)一文,他批评了“喻三归匣”,主张喻三(以及一部分匣母字)应看作一个独立的声母*W—。在《上古汉语的起首辅音L和R》(1976)一文,他把上古喻四拟为*r—,中古演变为*l—。关于上古韵母的研究,雅洪托夫著有《上古汉语的韵母系统》(1959)、《上古汉语的唇化元音》(1960)和《上古汉语的韵母ER》(1977)等。雅洪托夫对近古音系也有兴趣,在《十一世纪的北京语音》(1980)一文,他认定邵雍的《声音倡和图》反映了11世纪的北京音。邵雍祖籍范阳(在北京以南几十公里),但6岁时随父徙河南,约30岁迁居洛阳。雅洪托夫以为邵雍为范阳口音,有些误解。文中所说“邵雍的图表有一个明显不属于洛阳方言而属于北京方言的特点:《切韵》很多收—K韵尾的入声字,在图表中跟其他声调带二合元音的字有关”,如“刀*tau、早*tsau、孝*xau、岳*ηak”,“收—u的二合元音跟较古的有一K韵尾的音相对应,现在只会在北京方言中遇到”。雅洪托夫是根据高本汉构拟的中古《切韵》音,而

周祖谟《宋代汴洛语音考》拟为^hau(舒声)、^ho(入声促音)。我以为拟为^ho与^hok更合四声相承,下江官话多存中原正音,一些方言今音仍与之相合。倘若如此,-K尾与-U尾的对应则不存在于《声音倡和图》。由此可见,拟音的结果决定此说的正确与否。北京大学出版社1978年出版了雅洪托夫的《汉语史论集》(唐作藩、胡双宝选编),选译了他十五篇论文。

匈牙利学者马尔登菲F. Mártonfi著有《论朝鲜汉字音的韵母》(1971)和《义净〈梵语千字文〉研究:唐代音韵的一项资料》(1974—1975)。后者论述精细,是在印度梵文学者师觉月研究的基础上做的,在海外引人注目。关于回纥文中的汉语借词,匈牙利的陈国B. Csongor、李盖蒂L. Ligeti做过不少研究工作。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东方语言研究所所长赵承福(Cho Seung-bog)对朝鲜的《东国正韵》进行研究,著有《朝鲜语音韵研究兼历史分析》(1967),对于元明汉语语言研究很有价值。此外,英国语言学家福莱斯特R. A. D. Forrest著有《汉语》(1973年伦敦第三版)一书,其中涉及汉语语音史的地方亦颇多。

五、海外汉学家中国古音研究的风格

20世纪上半叶,对中国古音研究的西方汉学家主要集中在欧洲,当代海外研究中国古音的汉学家主要集中在北美和日本。他们的研究风格与国内占主导地位的高本汉模式迥然不同,在研究模式与研究方法上表现出浓烈的西方普通语言学的理论色彩。美国学者包拟古、许思莱、李方桂,对断代的汉语历史语音的分析研究,反映了美国描写语言派对汉语音韵研究的强烈影响。乔姆斯基和哈雷创立的生成音位学提出共时音位可以反映历史音位的演变顺序的论断,为历时音位学提供了基础。薛凤生、陈渊泉的研究运用了此种理论。王士元的“词汇扩散理论”对近年的汉语语音史研究有所影响,郑锦全、陈渊泉、朱赫尔的研究也运用了扩

散理论。陈渊泉系统地阐述了相关年代学(他自己称之为“时空投影法”),在《相关年代学:构拟的三种方法》(1976)中从现代语音变化的分布推断出历史语音变化的层次。尽管如此,在汉语的历史研究中,一些学者仍然运用传统的历史比较法。“普林斯顿学派”强调以方言为基础进行构拟,其方法仍是历史比较法。蒲立本受印欧语比较语言学的影响尤为强烈。在原始汉语和周秦汉语古音研究中,形态音位学理论占了主导。

与北美研究的风格略有不同,日本汉学家更注重对音和汉字译音研究,这在三根谷彻(越南译音)、河野六郎(朝鲜汉字音,日本吴音)与中野美代子(蒙古字韵)等人的论著中都有所体现。

主要参考文献:

1. 殷方《1965—1979年国外汉语音韵学研究述评》,载《汉字汉语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2. [日]桥本万太郎《语言地理类型学》(余志鸿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3. [美]张琨《汉语音韵史论文集》,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7年。
4. 《严学宥先生谈汉语史研究动态》,载《语言学通讯》1985年4期。
5. 张世禄《中国音韵学史·重印后记》。上海书店1984年版。
6. 潘悟云《高本汉以后汉语音韵学的进展》,载《温州师院学报》1988年2期。
7. [美]薛凤生《中原音韵音位系统》(鲁国光、侍建国译),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
8. [苏]谢·叶·雅洪托夫《汉语史论集》(唐作藩、胡双宝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陶原珂

“场有哲学”与中西文化比较研究

——唐力权教授访谈录

□本刊记者 陶原珂

唐力权为美国美田大学教授，国际中国哲学研究会执行长，去年8至11月在广州、北京、黑龙江、云南等地作学术访问，11月1—3日在广州中山大学作了题为“存在主义与儒家哲学中的主体性问题——中外哲学的人性论”的讲演。我们在他离华前采访了他。

记者：唐教授，您是在美国研究中国文化与哲学的高层学者，对美国目前研究中国文化与哲学的状况一定很了解，能否给我们的读者介绍一下？

唐：可以的。美国研究中国文化的机构，主要设在一些大学的东方学系和中文系。哲学系里研究中国哲学的向来比较少，因为在美国哲学研究界向来有这样一种意见，认为中国缺乏西方古代哲学形态意义上的哲学。西方有逻辑学、三段论，印度有因明学，而中国没有相当的逻辑理论，因而，他们不大承认中国有哲学。近年，由于中国的开放和发展，作为大国，中国的民族文化包括文学、艺术、语言、哲学与民间文化，开始受到美国知识界的注意。为了与中国这个大国交往，美国政府在经济上是鼓励研究中国文化的，希望能够培养出美国的“中国通”。目前，主要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基本上都有了英语译本，为美国和欧洲人研究中国文化提供了很大的方便。现在美国的哲学系哲学概论课程，有一部分是介绍东方哲学的，包括中国哲学、印度哲学、日本哲学和韩国哲学，也出了个别研究中国哲学的著作，但基本上是介绍性的，还谈不上中西哲学比较，

夏威夷大学出的“Philosophy: East and West”（《中西方哲学》）也不是哲学比较。在中国文化中，美国的中国文化研究者对道家、佛家（特别是禅宗以及密宗）比较感兴趣，而对儒家反而不那么感兴趣。另外，由于文化背景不同，美国知识界研究中国文化也有它自己的特点，如波士顿的新儒家就带有某种美国文化色彩和目的性。

记者：您这次来华讲学，曾对中西文化作了较为系统的比较，研究的视角比较特别，与新儒家要借儒学救治西方文化精神衰微的宗旨及其研究方法似乎也不大一样。您研究中西文化的立足点是什么？

唐：新儒家的宗旨也许是好的，但是他们的研究比较粗疏，不够精细，不成系统。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不应该只是停留在静态的、异同的区别和比较这个平面上。我对中西文化以及中东文化的研究，是从哲学层面进行探讨和概括的，基本上是沿着梁漱溟的《中西文化比较》的路子走下来的。我把这些不同文化的研究纳入了我近年研究形成的“场有哲学”或称“场有论”的格局之中。这是对人类文明发展格局的辩证的自觉。每个哲学家，都有其对人类文明发展格

局的根源性、历史性和理想性的自觉,通过对他们的分析研究,可以达到对文化的概括的认识。“场有论”既是我研究中西文化与哲学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也是我研究中西文化与哲学的“终极关怀”。

记者:“场有哲学”这个出发点和“终极关怀”,对于比较研究中西文化与哲学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和价值?

唐:中国的传统哲学是非实体哲学,20世纪的西方哲学也是非实体哲学,有着内在的共同性。实体主义与非实体主义是相反相承的,犹如“镜像”一般,即所谓“mirror image”。“场有哲学”是对实体的解构,我把这种哲学称之为“超切中道”。“切”就是实体分析;“道”即“道可道,非常道”之“道”;义为超越实体分析而达到非实体主义之道。“场有哲学”又是从大量中西文化与哲学的历史事实中抽象出来的,反过来,用于中西文化与哲学的比较研究,可以在哲学层面得到更为概括的认识。所以,“场有论”本身对于中西文化与哲学的比较研究,又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任何活动都有理性,不同的传统有不同的理性,西方的传统是逻辑理性、支解理性、分析理性,西方的自由来自“爱罗”(eros),是自体性的;中国的儒家道德主体则从良知而来,是互体性的。为了避免理性分析比较的偏颇,应该用曼陀罗理性、根本理性。“场有哲学”就是这样一种理性追求。

记者:从“场有哲学”的理论格局看来,中西文化呈现什么样的形态呢。

唐:“场有哲学”,探究万事万物之间的活动作用。它与以往的西方实体主义哲学的概念根本不同之处就是,以“活动”代替了“实体”,“作用”代替了“属性”。“场有哲学”认为,事物都存在于一定的活动状态之中,活动者即活动本身,无活动之外的活动者。事物之间存有某种体性,即相对相关性的总和;相对性的总和表现为自体性,相关性的总和表现为互体性。“场有”就是所有相对相关性的总和以及相对相关性关系网的存有、蓄积与权能。“权能”为力量的绵延、信息的传递。我从人性论角度,把人类

文化活动的体性高度抽象地概括为“爱罗”(eros)与“良知”,它们是相对相关性的某种特例,它们通过“尊重”(respect)协调两者的关系。“爱罗”属于自体性,是性爱、好奇心、控制欲等;“良知”属于互体性,是仁性、责任感等。中国哲学植根于互体性、良知、责任感;西方古代哲学根源于自体性、“爱罗”、好奇心。中西方文化与哲学的差异就在于,中国文化与哲学的体性是互体性压倒自体性,西方古代文化与哲学的体性则是自体性压倒互体性。

记者:在“场有哲学”的理论格局中,“自体性”与“互体性”、“爱罗”与“良知”这些两两相对的概念之间,都只存在相对相关关系,不讲对立的统一和互相转化关系。而实体主义是属于“自体性”的,非实体主义属于“互体性”,这样的话,应该如何理解和解释20世纪西方哲学从实体主义向非实体主义的转化?

唐:这种转变有一定的历史发展背景。本世纪初,先是出现了迪卡尔的二元论,然后是西方哲学界对他的二元论的否定。迪卡尔的二元论只有相对而无相关。对二元论的否定,便引发了西方世界非实体主义哲学的产生。然而,近年科学主义思潮的兴起,似乎又预示着西方文化与哲学向实体主义的复归。

记者:在您自己看来,“场有哲学”属于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场有哲学”的形成,受到哪些哲学思想的影响?

唐:“场有哲学”既不是中国的,也不是西方的;既是中国的,又是西方的。因为,“场有哲学”的原生方式,就是从大量中西文化与哲学的历史材料的分析和概括中产生的,又可以反过来应用于中西文化与哲学的研究。“场有哲学”的产生,在哲学思想上,主要受到中国的《易经》、西方的海德格尔、现象学、解构主义等哲学思想以及量子物理学的影响,你可以从“场有哲学”理论中看到它们的影子,但它绝不是这些哲学思想简单的重新组合,它是从大量的文化事实中抽象形成的。

记者:您这次来华访问,去了好几个省

市的大学哲学系讲学,对中国哲学界已有大体的了解。您对目前中国哲学界的研究状况有何印象和看法?

唐:哲学研究可以大体上划分为三个层面,由低层到高层依次为:思想研究的层面,哲学史研究的层面、哲学研究的层面。目前国内的研究基本上是哲学思想的研究和哲学史的研究,而以思想研究为主,还谈不上有哲学研究。近年开展的哲学范畴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也是属于思想史研究范围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不仅要比较基本的概念范畴,更重要的是应该进行哲学体系的比较。

记者:您对中国的文化与哲学研究有何建议?

唐:我想,首先应该促进交流,要加强中国哲学界内部学者之间的交流,中国哲学界与西方哲学界的交流,中国哲学界与印度哲学界的交流,哲学界与非哲学界之间的交流。没有交流,便是实体主义。中国现在的哲学构架者(institutional famer)是实体主义的,有相对而无相关。开放和交流,则是非实体主义的。我认为,下一世纪的哲学主潮,应该是非实体主义的。其次,我觉得应该增加教育预算,以促进研究和交流。最后,还应该提倡学术的真诚。目前的研究似乎缺乏对真理追求的真诚,太现实了。搞哲学不能过多考虑功利的,应有执著的追求,对真理的真诚,为学术而学术的真诚。这种真诚一定也会转为对人的真诚的。

欢迎订阅《马克思主义研究》

《马克思主义研究》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主办的全国唯一以专门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理论体系为宗旨的大型学术理论刊物。辟有“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与世界”、“科学社会主义论坛”、“经济学论坛”、“哲学论坛”、“调查与研究”、“理论探索”、“探讨与争鸣”、“国情研究”、“国外流派和思潮”、“动态与信息”、“思想史研究”、“青年论坛”、“学习园地”、“术语与概念”等栏目,并将根据形势的变化与理论研究的需要,不断充实其它新栏目。本刊坚持“双百”方针,提倡不同学术观点的讨论,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欢迎订阅。

《马克思主义研究》为双月刊(逢单月出刊),16开,每期100页,定价5.00元;全年定价30.00元。每期另付邮资1元,全年6元。合计全年36元。自办发行。

订阅:请通过邮局径汇款至本刊编辑部或寄入本刊开户银行(如需发票请申明)。也可来函或电话索要订单。

本刊地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编辑部(建内大街5号13层)

邮政编码:100732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北京东四南分理处

户 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

帐 号:89124731

电 话:512.5004

从传统观照现代 从现代反思传统

——访李宗桂教授

哲 生

李宗桂，1952年生，四川眉山人，现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中国文化概论》、《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主编《“中国文化与现代化”丛书》和《“大思想家与中国文化”丛书》。发表论文130余篇。《中国文化概论》获1988年度“中国图书奖”一等奖、第三届“全国优秀图书奖”、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中青年奖，《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获“北方十五省市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奖”、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被评为“广东省优秀中青年社会科学家”。

记者（下称记）：李教授，你从80年代以来，在中国古代哲学、现代新儒学、中国文化等研究领域，发表了不少论著。给人的印象，都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这个“人人关注的时代课题”有关。你能否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

李宗桂（下称李）：我的三个研究领域，最终都落脚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上。更具体地说，是落脚于当代中国新型文化体系的建设上。我的《中国文化概论》和《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前者侧重传统文化，是从传统认识现代，辨析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后者立足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现状，是从现代反思传统，探讨中国文化出路，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型文化的一得之见。我主编的《“中国文化与现代化”丛书》和《“大思想家与中国文化”丛书》，前者立足“现代”，着重从如何建设当代中国新型文化的理论高度，探讨近现代中国的文化发展历程及其经验教训，辨析建国后文化建设的实践和理论得失，展望未来路向，

对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作出战略性、理论性探讨。后者侧重“传统”，阐释传统，发掘传统，清理传统，力图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建设性研究，从传统文化反观现代文化，促成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这两套丛书关注重点不同，研究角度不一，但都紧扣“传统”，倾心“现代”。这就逻辑地揭示并凸显了“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文化研究的时代课题和理论焦点。

记：你对80年代的文化讨论有何评价？你怎样看待当前的文化研究状况？

李：80年代的文化讨论，一个直接而重要的动因，是学术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的思考。这场讨论，是一场自发的民间运动。今天看来，这场讨论存在着种种不足之处。比如它的政治化、玄虚化、情绪化，影响到文化反思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尤其严重的是，由于功利主义态度的驱使，使文化讨论成为某些人猎取名利的工具，而不是推动民族文化现代化的一个途径。不过，尽管如此，80年代遍及神州并影响海外的这场

文化讨论,仍然有着特殊的意义。这首先表现在它与中国社会现代化和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相一致。它的价值主题是促进社会主义新型文化体系的建立。其次表现为它在民族文化深层结构的层面上思考现代化的症结所在,而不是单纯停留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的层面。这实际上是一次民族文化变革的思想启蒙运动,是从文化现代化的时代高度去提高民族文化素质的有益尝试。再次表现为它继承传统、超越传统的理性精神。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开新,对于新文化体系的创建,以张岱年先生为旗手的“综合创新”论,成为主导思想,从而不仅与“五四”时期的所谓“彻底反传统”区别开来,而且与建国头30年的“大破特破”传统文化的思维路向迥异其趣,更与现代新儒家的“返本开新”的文化纲领截然不同。因此,80年代的文化讨论,对于开拓当代中国新文化的建设思路,功不可没。当然,由于种种原因,比如文化理论准备的不足,以及其他非学术因素的影响,这场讨论没有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结出已经可以看到的硕果。大致说来,这场讨论以1989年为界线,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1989年以前,声势浩大,参与人多,对传统文化持批评性意见的较多;1989年以后,场面相对冷落,参与人数减少,对传统文化持肯定性意见的居多。两个阶段所探讨的问题、依据的价值准则、思维方式,都有重大的区别。但是,如何看待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如何实现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则是共同的价值主题。1989年以后,文化讨论由表面上的轰轰烈烈转为暗地里的扎扎实实。过去那种大而空的论题,浮泛的内容,空疏的学风,逐渐得到矫正。以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为主线,人物研究、思潮研究、通史研究、断代研究、学派研究、专题研究、比较研究,齐头并进,日益深入。以发掘民族文化精华,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宗旨,近年的文化研究取得了重大的成绩。论文成千上万,专著层出不穷。我想,照此发展下去,若干年后,将会有可喜的收获。

记:我注意到,你刚才分别使用了“文

化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两个概念,不知你有何考虑?

李:这是内涵甚为不同的两个概念。顾名思义,“文化现代化”是指“文化”层面的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则是指“社会”层面的现代化。具体说来,如果“文化”是在“大文化”(广义文化)的概念上使用的话,则“文化”泛指现存的一切,指人们的生活方式,那么,“文化”的现代化是指现存的一切的现代化;因而它可以和“社会现代化”是同等程度的概念。但是,实际上,无论80年代的文化讨论,还是当前的文化研究,学术理论界所使用的“文化现代化”概念中的“文化”,实际上是“小文化”(狭义文化),即思想文化(或称精神文化)。因此,在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设的操作层面,“文化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不能等同,更不能互相取代。“社会现代化”,是指整个社会的一切,物质、制度、思想,都现代化,是有机的、整体的现代化。从逻辑上讲,“社会现代化”与“文化现代化”,二者之间有包容和被包容的关系;从哲学上讲,二者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按理,这是不言而喻的问题。但是,从80年代文化讨论甚至当前文化研究的实际情况看,事情决不如此简单。社会上的一般人士姑且不论,即使在学术理论界,不少人仍然是把二者混为一谈的。这大概是很生动地反映了传统思维中的整体、直觉特征,反映了传统思维的模糊性。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传统文化必须现代化;同时也说明,科学的文化研究是一个多么艰巨的任务。

记:这种情况,是否可以说是“思维的惰性”?这种“惰性”还有哪些表现?

记:当然是“思维的惰性”。从类别上划分,可以叫做“惰性思维”。所谓惰性思维,就是自觉不自觉地认同传统思维,以传统思维为思维习惯,没有去仔细辨别认识对象的层次、内容、义蕴、而是从众、从旧,这种惰性思维,还表现为对诸如理想人格、社会转型之类概念的模糊认识。在文化研究中,对传统理想人格的概括,有君子、圣人、内圣外王等不同理解;对当代或未来中国理

想人格的设计,有平民、全面发展、雷锋、“四有新人”等不同归纳。但仔细思量,你就会发现,这些概括或设计,都是把理想人格当作现实人格对待、使用。在我看来,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实际上是存在着“理想人格”和“现实人格”的区别,二者交替作用,推动人们前进。理想人格,是指人们在当下的实际生活中,以之作为榜样、作为完满追求的人格。它属于尚未实现的、追求之中的人格。理想人格的存在,具有强烈的精神激励功能,推动人们超越现实、超越自我,不断在精神境界方面攀登。现实人格,是人们在当下的实际生活之中,以之作为行为准则的人格,或者说是人们当下能够达到的人格境界。理想人格和现实人格,前者具有超越性、前瞻性;后者具有现时性、现世性、实用性。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更多地是用现实人格规范自己的品节,安顿心灵。在对意义世界、价值世界的追求中,在对现世生活的超越中,人们更多地是用理想人格引导自己,提升自己。这就好比“做雷锋”和“做好人好事”的区别。“做雷锋”,属于理想,不一定能够完全实现;“做好人好事”,则可以完全实现或者基本实现。但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人们把二者混淆起来,因此反而导致理想的落空。这两年使用甚广、出现频率甚高的“社会转型”一词,也有类似情况。不同的论者,分别把“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政治第一到经济第一”、“从‘革命’到建设”,概括为、等同于社会转型。其实,这是以斑代豹。科学含意上的社会转型,应当是指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转型。在今天,就是整个社会运作方式、社会组织结构、资源配置、政府行为、社会进步的动力、社会基本的价值取向、社会运行机制等方面的根本转变。质言之,社会转型是农业社会

向工业社会、商业社会的转型。用文化学者的语言表述,则是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记:你开头谈到当代地域文化研究的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些年的地域文化研究成果不少,但都局限于“传统”,而没有倾力于“现实”。因此,很希望你能够结合广东文化建设问题作进一步的说明和分析。

李:中国幅员辽阔,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参差不齐。近年经济学界提出并已经为中央决策所采纳的“梯度发展”理论,有很深刻的道理。同理,我认为,由于历史影响的不同,特别是地理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以及文化“小传统”的不同,不同地域的文化发展也是不同的。因此,在文化建设问题上,也应当采用“梯度发展”的战略。广东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与内地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社会心理、人格追求等方面有诸多差别。如何利用广东的地利与人和,利用资本原始积累已经或者行将结束、经济发展形势甚好的有利条件,建设新文化,以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是一个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问题。广东大众文化建设走在全国前列,影响并引导着全国的大众文化发展。这中间有很多值得从文化学理论、从发展战略的高度进行总结的东西。同样,经济建设先行,文化建设滞后;大众文化生机勃勃,高雅文化沉郁萎顿的教训,也值得认真研讨。最近,广东省委提出建立珠江三角洲经济区,使这一地区在广东率先实现现代化,是一个适乎潮流、顺乎人心的英明举措。这实际上是“梯度发展”理论在广东现代化建设中的运用。我想,如果在建设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时候,在文化建设方面也实行“梯度发展”战略,则一定会对这一地区的现代化事业产生良性作用。

责任编辑:冯 生

敞开历史的襟怀——评《岭南文学史》

□ 区 铁

治史当才、学、识兼备，其中尤以史识最为难得。治史者之所以就同一题材写出观点截然不同的史著，就是因为各人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理论评述历史。假如埋头铺陈史实而缺乏理论经纬，写出来的书肯定是千人一面，干部一腔。相反，高明的史家甚至可以借编史来弘扬自己的学术主张，如法国人丹纳编撰《英国文学史》，自始至终宣传他的“种族”、“环境”和“时代”三因素决定论。还有些史学寓自己的观点于取舍之中，如前苏联学者阿尼克斯特也编过《英国文学史》，书中不收入女小说家简·奥斯汀，因为作者认为文学应该反映重大题材，而奥斯汀的小说做不到这一点。

的确，编写史书时，其选材角度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编者的学养和识力。陈永正主编的《岭南文学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版）选材兼收并蓄，以一部区域性文学史而表现出宽广的历史襟怀，实在难能可贵。只要翻开该书目录，就会发现有专章评介岭南俗文学，在其他章节也有介绍歌谣之类民间俚俗作品的文字。这是还文学以本来面目的第一步，因为无论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的文学也罢，文化也罢，最高的境界都是一个平衡、和谐的整体。雅与俗是互相补充，互相依存的。一味俗固然会俗不可耐，一味雅又何尝不会雅不可耐。只有统一才产生和谐。“一阴一阳之谓道”，这本来是地道的中国哲学。如果把雅与俗对立起来，就同那些抓不住中国文化精髓的西方人一样，以二元世界观来解释中国的一对对相反的概念。《岭南文学史》专辟一章介绍清代的妇女作家，也许连编著者自己也只是朦朦胧胧地觉得有必要，但联系起他们对俗文学的公允态度，可以看出他们的潜意识中实在有一种对

“道”的追求。尽管写女作家的份量与全书相比仍嫌单薄，但已经比其他中国文学史强多了。

宽广的历史襟怀反映到知人论事上就是豁达大度，这一点西方学者要比我们做得好。就连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意大利发表过广播讲话支持法西斯的诗人庞德（Ezra Pound）战后被起诉时，也有许多美国文人学者联名上书恳求宽恕他。至今庞德作为意象派诗歌的奠基人和一代文坛泰斗的地位一直没有动摇过。反之，在中国则常常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有时甚至只是涉嫌失足就成了千古恨，对女作家张爱玲的贬抑就是一例。当然，随着政权的稳固、中心的转移，目前对张爱玲，甚至对周作人都有了比较实事求是的认识。但是，要在文学史上给臭名昭著的大汉奸汪精卫留一席之地并给以公正的评价，那是需要超乎寻常的勇敢的，而《岭南文学史》就有这股勇气，不但肯定他早年因暗杀摄政王载沣被捕下狱时期所作的颇为豪迈慷慨的诗歌，而且对他后来多谈风月、少谈国事的作品也称许其“时有新意”。介绍朱执信的文字中亦不讳言汪精卫拟入京行刺载沣时朱执信给他的赠别诗作。其实，汪精卫的《双照楼诗词稿》中确有不少佳句，如“一死心期殊未了，此头须向国门悬”就与后来陈毅《梅岭三章》中的某句相同，也许这是文学创作中的“契合”现象，但也可能是后者脱胎于前者。

《岭南文学史》论人有湖海度量，论文亦如此。就拿小说《蜃楼志》来说吧，清同治七年它曾被江苏巡抚丁日昌定为禁书，属于“淫词小说”之列。解放后所出的版本也都是“洁本”。该书确有不少露骨的性描写，但这是中国小说史仅有的一部以早期买办

阶层和海关官员为题材的作品,而且对晚清谴责小说有相当大的影响。对于这部瑕瑜互见的书,《岭南文学史》做到褒贬分明,而不是一棍子打死。笔者曾在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借阅过《蜃楼志》全本,发觉该书对于我们研究岭南文化颇有帮助。广东能成为中国大陆开放改革的成功样板,除了因为岭南文化传统中有突出的务实精神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该地区有深厚的市场经济底蕴。从这个角度来看《蜃楼志》,将会起到以小说证史的作用。《岭南文学史》把《蜃楼志》介绍给各界读者,做了一件好事。

作为一部区域文学史,《岭南文学史》确实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这一点不必赘述。值得指出的是,该书的目光并不囿于岭南,而是把岭南文学放在全国甚至世界的坐标来考察,这也是宽广的历史襟怀的具体表现。首先,该书不但评介岭南近代文学中大量的国际题材作品,而且点明一些作家在表现手法上所受的西方影响。比如评述苏曼殊的小说时,指出他的“这种新、旧、中、西杂揉的表现形式,对于丰富我国小说的表现手段,对于促进‘五四’以来新小说的形成,是起过积极的过渡作用的”。又比如介绍黄小配时,指出他的《五日风声》其实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报告文学。其次,在介绍创作的同时,《岭南文学史》还介绍了一些译作,如苏曼殊、陈树人的译诗,虽然着墨不多,但我认为这是编撰中国文学史的一种值得称道的新尝试。如今,人们生活在信息传递极为迅速、信息储存高度集中的世界里,同外国文化的接触势必与日俱增。作家在创作之余,也会搞翻译。不管是创作还是翻译,都是文学生涯不可分割的部分,所以要全面评价一位作家,一定要连他的译作都研究。译笔也能反映作家的创作特色。比如苏曼殊和陈树人都译过英国诗人豪易特的《去燕》。曼殊译来潇洒超脱,不太拘泥原文,难怪郁达夫在《杂评苏曼殊的作品》一文中说曼殊的译诗比他自作的诗还好。相比之下,陈树人的译诗明白晓畅胜过曼殊,但汪洋恣肆则不及。这都与各自的创作特点相一致。至于选什么译材,也常常反映出作家的思想观点。

岭南虽然是远僻之地,岭南人亦曾被称为“獠”,但岭南文化从未脱离过华夏文化的怀抱。《岭南文学史》的编著者深深明白这一点,他们十分重视中原文化对岭南文

化的影响。在“岭南诗派”一章中有一节专谈这个问题。纵观岭南文学的发展过程,有一点很特别,就是每每在国家多变的时候,如宋末、元末、明末、清末,岭南文学就出乎意料地繁荣,这大概是因为中原变故,岭南成为避乱之地,文人学士南来,对岭南的文坛便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这种历史时期产生的文学,多慷慨悲歌之作。即使不在动乱之秋,亦时有官场失意的文人贬谪岭南,如韩愈、苏轼,他们胸中涌动着的一股不平之气,自然反映到作品里。岭南僻远的地理位置刚好使岭南文人避开了中原文坛时有流行的不良习气,保存了古风。了解了上述原因,对于岭南诗之雄直、岭南词之雅健、岭南文之真朴,就不难理解了。

至于《岭南文学史》的缺点,已发表的书评都偶有提及。在我看来,该书最大的不足是和它的优点紧密关联的。比如设专章评介岭南俗文学值得赞许,但这一章的内容不够全面,没有介绍潮州方言和客家方言的俗文学;再如介绍作家的翻译活动,我认为是编撰中国文学史的一种新角度,但在中国翻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一些岭南学者文人的译作没有提到;又比如论述中原文学对岭南文学的影响,虽有专节,但具体到一位作家或一篇作品的分析,则甚少指出他或它受中原文学哪一流派或者哪一位文人的影响。造成这种不足的原因很可能是篇幅有限,因为就我所知,该书主编发表过论韩愈对岭南诗派影响的文章,分析过不少岭南诗人的作品,指出它们与韩诗的共通之处,而在《岭南文学史》中反而减少了类似的内容。另外,关于外国文学对岭南文学的影响以及从译作研究作家等问题,则牵涉到编者运用外语搞研究的能力,或许真是力有未逮。

由此而想起,如今舆论界经常提到要培养跨世纪的人才,为什么不提倡培养可以进行跨文化沟通的人才呢?须知“跨世纪”只是一个时间概念,而跨文化沟通则是一种能力和修养,具备了它,人的文化素质就会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至少眼界和胸怀都更开阔,对异质文化更理解、更宽容,更能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的需要。这是民族与世界的对话,在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的今天,更是刻不容缓。最后写上这几句题外话,与该书编著者共勉。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陶原珂

文学思潮研究漫兴

——王国健《明清小说思潮论稿》读后

□ 童 轩

由文学理论研究而引伸出文学思潮研究，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似乎是近十年中才出现的“新潮”，例如罗宗强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潮史》就是一个显例。文学思潮研究，以其总揽从创作中流露的意念思致直到理论形态，汇为一炉，突破了仅止于理论形态研究的旧框子，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令人为之耳目一新，确实是一种学术的进步。但是，文学思潮研究，较之文学理论研究，要求研究者有更宽广厚实的基础和学问积累。正因其难度较高之故，一般学人往往望而却步，不敢轻易采用。所以，当王国健君以其新著见示，而赫然以“思潮论”标题，我就不禁既惊且喜，钦佩不已。

国健君是完全明白“思潮研究”的难度的，不过，他似乎更为“思潮研究”的境界

所吸引，及至从其新著第一章“绪论”和全书分章的设置布局来看，我感到他又确有驾驭“思潮研究”的纵横之才。《明清小说思潮论稿》（广州出版社1993年9月第1版）全书分为九章，除“绪论”外，其余八章依次为“明清小说思潮的文化土壤”、“明清小说思潮的社会历史条件”、“明清小说思潮的流变”、“文学观念的嬗变与小说独立意识的进退”、“史传理论与明清小说创作和批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与小说‘虚实’理论”、“早期启蒙思想与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理论”、“诗文影响与小说‘文法’”，其前半部（2—4章）是对明清小说思潮总体的概括阐明，后半部（5—9章）是对其理论本体的研究分析，从中已不难看出作者给自己提出的“浓缩的总体研究方法”的构架。作者在“绪论”中，又以其特有的清晰的思路、精辟的概括和学人的激情，对此书的“研究对象、研究途径、研究方法”作出了很好的表述，并且，他在那里提出的种种原则和设想，后来基本上都被贯彻到全书之中。因此，当我读完此书，就发现如果作一般评介，我将无法比作者自己在“绪论”中说得更清楚明白生动感人。与其东施效颦，不如另辟蹊径，所以，决定改变初衷，转而以读后感的方式，借此书来就“文学思潮研究”发一点即兴的感想。

我认为，《论稿》最突出最成功之处，是抓住社会思潮的特征来剖析文学（小说）思潮。这也正是作者十分强调自觉运用的一个要点。普列汉诺夫曾经指出“文学是社会思潮的反映”。这个看法无疑是深刻的。明清之际，是中国近代启蒙主义思想产生、活跃又暂时归于沉寂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包括其理论）兴起并且抵于全盛的时期，这两个“同体共贯”的现象之间，无疑具有绝非偶然的、深刻的关系。作者就是敏锐地发现并紧紧抓住明清小说及其理论作为中国近代启蒙主义思潮的产物和组成部分这一历史特点，作为其观察、剖析明清小说及其理论的依据的。这不仅令全书具有了一以贯之的思想统摄力，而且对于一系列的小说—理论现象的分析能够做到鞭辟入里，洵可谓“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例如，作者把明清社会的历史进程的追溯，与社会—文学思潮之相应起伏结合起来加以研究，就很好地解释了“作为最需要近代思

想为其先导与武器的小说及其理论批评,为什么在明清只能停留在古代文学的范围内,不能像西方那样直接向更高的形态发展,为什么到了近代,不得不借助于西方小说观念的轰击,才能建设近代新的小说及其理论体系”这一个明清小说、理论发展史的难题。(见本书第三章第37—41页)又如,在阐述明清小说独立意识进退的过程中,通过揭示在“几百年之间,文学观念的嬗变在拟古与革新的两极之间循环往复,极其敏感地反映出社会的变动、社会思潮的涨落”,把小说思潮与文学思潮、社会思潮有机地联系起来,从而使这一小说观念的研究置于坚实的历史基础之上。(见本书第五章69—77页)又如,在小说“虚实”理论的研究中,作者从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兴起入手,指出人们的欣赏趣味由“尚实”向“尚虚”转移,以及浪漫主义成为主要的小说思潮,乃是晚明小说“虚实”理论取得突破性发展的根本动力,从而使得这一老问题有了全新的视角。(见第七章第100—111页)类似的例子,书中所在多有,不胜枚举。纵观全书,可以看出,作者对于明清之际的社会思潮、哲学理论、文学思潮都作过认真、深入的研究思考,没有下过这一方面的功夫,没有掌握这一把“解剖刀”,要做到书中这许多对于明清小说思潮的令人信服的分析,是不可能的。

在阅读《论稿》的过程中,由于受到某些触动、某些启发,我也常常离开作者的论述,独自思考一番。这样,慢慢地,我又产生了一点不满,直至形成了一个建设性的批评意见。我觉得,尤其是在后半部对于明清小说理论本体的分析研究中,作者似乎存有不自觉的保守倾向,就是基本上仍然借助西方古典小说理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文学概论教科书中的“小说理论”,作为理论规范。正是在这种规范的指导下,有人得出“中国古代没有自己系统的小说理论批评的轻率结论”,导致“几本主要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对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基本上付之缺如或语焉不详”,(以上引文见《论稿》第1章第4—5页)而且近数十年的研究也难免显得捉襟见肘、步履维艰。《论稿》的研究分析,是我所见最丰满、详瞻、系统的一家,但是,倘就其所论及的明清小说理论命题、评论家乃至引用的文献,也未能令人摆脱从自来评价(按,这个“自来评价”恰正是作者反对并力图推倒的)所得的印象。于是,受马克思“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

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的精辟论断所启发,我便觉得,不妨撇开泊来的规范,迳直从“满足需要”入手,重新审视明清小说的“理论实现”,去归纳总结它的“系统”。换句话说,就是把中国古代(明清)白话小说的创作和理论思潮视为一独立自足的存在。因为既然它并未与西方小说,乃至也不与中国五四白话文运动以后的白话小说相连接。那样做,也许我们将不但不会过分苛责其不合或不足于“规范”,不但不会因为可以纳入“规范”的文献资料不足而苦心焦思,反而会从这“不合”、“不足”中启发出新的思路,并由于摆脱“规范”的束缚而发现新大陆——具有中国特色的小说理论体系。这并非空谈,请就以《论稿》为证。例如,《论稿》在探讨史传理论与明清小说的创作和批评中,在评述明末兴起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中,在论述诗文美学传统对明清小说理论的影响中,都曾经从正面遇上了“新大陆”,并且进行了或多或少的成功的开拓。只是由于作者还处于不自觉的状态,未能把他的发现更加深化,加以贯通,这在我看来,是甚为可惜的。这可说是正面的例子,反面的例子也有的。例如,《论稿》中关于若干理论专题的研究,由于作者未能摆脱“规范”,实际上就陷入了削足适履的境地而无法自拔。在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理论的研究中,情形就是如此,本来,照作者前后所言,完全可以清理出:“史传传统之重视人物形象塑造”——“史传小说与世情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理论(‘虚实’理论)的演进”——“启蒙主义思潮、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影响下的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理论”这么一条线索,并由此发掘出自《左》《史》而下;直至容本《水浒》、金批《水浒》、脂评《红楼梦》之人物形象塑造理论与实践,所体现的真(现实主义的)幻(浪漫主义的)合一的古代小说人物形象的中国特色。这较之作者为论定明清小说理论所达到的高度,把容、金、脂诸评统统纳入现实主义“典型人物理论”的轨范,抹杀了他们中国式的独特的思维内涵,恐怕更为可取,更为准确,也更为深刻一些。

在文学思潮研究中,必须紧紧抓住文学思潮与社会(哲学)思潮之间的相互联系,同时,还必须充分注意思潮所具有的独立自足的性质。这就是我从国健君的《论稿》中获得的启示。

“梁凤仪现象”研讨会综述

□周 文

1994年11月24日,“梁凤仪现象”研讨会在暨南大学召开。参加者近百人,主要是暨南大学、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的教师和研究生,此外还有省文联、省社科院文研所、广东教育学院、广州作协、广州军区创作组、《广州文艺》、《炎黄》杂志社、《周末画报》、上海社会主义学院、西南师大、海南省海口市怡润有限公司及香港中景集团有限公司的代表。会议由潘亚曦教授主持,梁凤仪及其助理程乃珊亲临会场听取意见,并两次坦诚地作长篇答辞。会议研讨内容如下。

一、关于“财经小说”的称名

梁凤仪把自己的小说统称为“财经小说”,对此,不少人提出异议。王列耀认为称作“商战小说”更恰当,因为商场竞争中,双方都在阴谋和阳谋中混战,犹如血肉横飞的战场的再现。司徒杰则认为,也可以称作“商界小说”。雷铎认为如称“商战小说”则火药味太重,可叫“商场文学”。潘亚曦则早已把它称作“儒商小说”。吴锡河建议称为“香港社会问题小说”。

二、关于“梁凤仪现象”

在会上,熊国华等探讨了“梁凤仪现象”赖以产生的社会因素、文学因素以及读者心理等。当论及这一问题时,大家不约而同地从“梁凤仪现象”谈到“儒商现象”。黄修己认为,当今中国大陆经济转型,文化变动,通俗文化流行,文人下海经商。若没有通俗文化的恢复和发展,若没有儒商的出现,“梁凤仪现象”的出现是不可能的。儒商的出现有利于文化的多元化,其意义已超

越出文学范畴。这是一件好事。他送梁凤仪一副对联:“生意兴隆通四海,文思澎湃达三江”,希望她继续写下去。郭正元认为,儒商现象是商业社会中人们寻求发展的一种产物。在繁忙的商界,竞争与金钱成了商业社会运作的两大杠杆。在社会层面上,竞争最终导致人们不择手段,尔虞我诈。在心理层面上,竞争再加上金钱的杠杆,最终使人感情撕裂、扭曲、变形。商文结合,以商养文,以文补商,可补偿心理的不平衡,可弥补精神生活的缺陷和不足。因此,在梁凤仪身上所体现的儒商现象值得注意。他还认为,在儒家思想影响深重的商业社会中,儒商既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也是中西文化撞击的产物。要给儒商现象一个界定,那就是雅文学及正常商业活动的结合,以区别于低级下流的东西及附庸风雅的现象。

雷铎认为,“梁凤仪现象”有两个冲击:一是对大陆的文学观念、文学品种的冲击;二是通过借商成文、以文促商、文商并茂等,对人们价值观念的冲击。他也给她送了一副对联:“出世复入世,收放自如女豪杰;从贾兼从文,精明超达兼儒商。”

周文彬提醒人们注意,在“梁凤仪现象”中,读者、评论界、作家本人都需要冷静思考。她认为,“梁凤仪现象”的产生,与作家的商业头脑及促销手段有关,只要不是太过分,则无可厚非。但“梁凤仪现象”不等于梁凤仪作品,评论时既要把两者区分开,又要注意它们之间的相辅相成。有人也认为要思考“梁凤仪现象”究竟是文学现象还是社会现象。

三、关于梁凤仪的小说

总评。赖海晏说,梁凤仪作品受读者欢迎,这对作家下海是有启发的,可以吸收梁凤仪的经验。吴锡河及王剑丛认为,梁凤仪小说的贡献在于:作者对“九七”香港回归有强烈使命感,真实地反映了香港的社会生活,并塑造了一批在香港这个特殊地区、特殊时空产生的女强人,为中国当代文学人物画廊增添了新形象,她的小说可说是最典型的香港文学,她的作品具有香港转型时期史诗性的意义。

不少人觉得梁凤仪的作品是属于大众的、品味高的通俗文学。陈衡认为它们是用轻松愉快的形式表达严肃的内容。有个别人则从梁凤仪小说叙事空间的诱惑力来看,认为它们比不上《废都》及《白鹿原》。她的小说值得读,也畅快,但这只说明中国大众读者层面正在崛起。张世君则从中西通俗文学传统谈到梁凤仪作品,认为中国的通俗文学没有几部能永垂不朽的,只要能领风骚三五年就成了。

蒋述卓进一步指出,梁凤仪小说的特点是以财经题材作框架,主要写现代社会的人格、人性、人心和人的感情,故事性强,这与她研究晚清小说以及对传统小说的继承有关。她的小说如《豪门惊梦》,既有细腻的心理描写,情节推动也较明快,并在雅俗的接合部有所创新。周文彬则认为,梁凤仪的小说蕴含着正气、志气和锐气,有别于一般软绵绵的作品。有的论者则指出,她的小说格局基本上是“商场+情场”,变化是有的,但较少突破。

关于人物形象。王列耀着重分析了《豪门惊梦》及《九重恩怨》,认为小说在商战的生存竞争中,描写了女性经历商难、情难、家难等许多磨难后成为女丈夫,但只是不完美的女性。于是,作者又在理想的指导下塑造了伟男人,若没有伟男人则难以成就女强人。梁凤仪以理想原则和净化原则为轴

心,使全书出现了一些亮色。何慧认为,若说女性是男性的附属,这是屈辱。梁凤仪的小说主要写女人,男人只是情节的陪衬、奠基石。女强人利用的是男人,她们心比天高,已超越小女子的气量。张金虹则以《千堆雪》和《白云无尽时》为例,指出女主人公以坚强的面貌出现在商场,是无可奈何的自我选择。女人骨子里都离不开对男人的依赖,这是几千年传统的结果。作品中女强人以事业的成就来填补感情的空虚,这是女性自身的悲哀。有的论者则指出,她的小说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立体化、多样化还不够。

关于语言。林为民认为,梁凤仪作品开辟了粤港小说的语言新境,其语言有三个特色:(1)精致、简约、流畅、明快。(2)典型与通俗相结合,两种语言相得益彰。(3)较多使用粤方言,有港味,有浓郁的地域色彩。但也有不少人认为,梁凤仪作品的语言不够规范,尤其是北方人不大好懂;还可以把港式粤语与全民族的语言结合得更完美一些。此外,作品用语经常重复,人物语言的个性化还差一些。

在会上,不少人向梁凤仪提出建议,希望她能有传世之作出现,能留下几个难忘的文学形象。易新农更具体地向梁凤仪谈了两点建议:其一,创作应写心灵,不要为其他所左右。其二,不要太多地听专家、学者的意见,不要让思维受到束缚。

最后,梁凤仪向与会者致答谢辞,真诚地表白了自己的思想,讲述了对文学创作的看法及自己的创作经历,并坦率地表示不能接受关于“女权主义”的分析,因为她不是“女权主义者”。梁凤仪表示,她还要继续写下去,到“九七”将要出版100种(现在已写74本,900多万字),希望大家支持。

作者单位:华南师大中文系
责任编辑:陶原珂

十年育人 成绩斐然

——广东社科大喜庆建校十周年

广东社会科学大学建校十周年纪念大会，于1994年11月20日在广州白云宾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谢非为社科大建校十周年题词：“解放思想，走成人教育的新路子。”广东省省长朱森林的题词是：“社科联办大学是一种新尝试和新模式。”广东省人大主任林若题词：“发扬社科界的人才优势，努力办好广东社科大。”为社科大校庆题词的还有老同志任仲夷、刘田夫、吴南生、王宁、寇庆延、杨应彬、陈越平、匡吉等。

大会由副校长黄中一主持，校长张江明教授作建校十周年的工作总结报告，名誉校长匡吉作了重要讲话。

张江明校长在工作总结报告中说：“广东社会科学大学已走过风风雨雨的10年历程，体现了广东学术界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和勇于创新的精神，在全国各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中，率先走出了一条依靠社会科学界知识密集的优势，走社会办学的新路子。

“社科大是由广东省社科联主办的一所成人高等学校，从创办之初的‘三无’（无课堂、无编制、无经费）发展到今天，社科大已拥有2300平方米的教学基地，校舍总面积达6522平方米。有了一支专职教师队伍和管理工作人员队伍，并在江门、中山、汕头、湛江等地设有分教部。10年来，社科大历届毕业生共有6624人，短期培训生有4000多人。

“充分发挥社科联人才密集的优势，保证师资水平高、教学质量高和工作效率高是社科大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人才荟萃的社科联属下100多个学会，10万多会员，拥有

数千名具有中、高级职称的学者、专家。10年来，我校授课教师半数以上为教授和副教授，一批享誉全国的著名学者、教授等都曾在此任教。”

“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灵活地调整专业和招生计划，保证所培养的专业人才‘适销对路’，这也是社科大能稳步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近几年，我校开设了不少当前社会急需、而一般大学不多办的或一时还未办的专业，如市场营销、涉外经济管理、高尔夫球场管理等，都是学校与市场紧密联系的产物。因此，毕业生是倍受欢迎的。”

匡吉名誉校长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认为社科大十年来取得的成绩起码说明了三件：一是社科大的办学形式是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在一个12亿人口的国家，只有多方面力量来办大学，才有可能较快地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和科学技术知识水平；二是用延安精神办大学，提倡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来办学，才能为国家、为社会培养、输送人才，多出人才，出好人才；三是坚持走社会办大学的路子，继续走下去，在下面各个市发展分教点，这是壮大社科大的重要措施之一。希望省人民政府的各主管部门继续积极支持这个新事物。

省人大主任林若、省人大副主任张汉青、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斯奋，省社联主席梁钊、省社科院院长张磊、省委党校校长肖如川、省高教局成招办副主任黄松金以及老同志杨应彬、陈越平、黄业、赖大超和各界嘉宾、社科大历届领导、校友共400多人出席了校庆大会。

（陈家义）

学术研究

ACADEMIC
RESEARCH



1

1995年10月15日出版 / JOURNAL FOR WORLD EXCHANGE

1995

ISSN 1000-7326



ISSN1000-7326
CN44-1070

逢双月 25 日出版

定价：3 元/册